

发现普列特尼约夫

——作为《现代人》杂志主编的教育家身份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普列特尼约夫作为《现代人》杂志第二任主编,其主持九年的《现代人》在思想激荡的19世纪40年代被认为是“远离争论”“旁观社会”“脱离文学生活”,而在文学史、杂志史的叙述中均“被省略”,主编及其《现代人》的独特价值被忽视。实际上,他不仅主持《现代人》杂志,而且还有丰富的文学事业和教育生涯——先后在宫廷(给亚历山大皇储和皇室)和多所高校讲授俄语语言和文学,又担任彼得堡大学校长20余年(1840—1861),其时正值外部欧洲革命,国内大改革前社会浪潮涌动的时代,他不仅保障了学校的平稳运行,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俄国教育文献,也是不可忽略的教育家。

关键词:普列特尼约夫;《现代人》;教育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01-07

一、被历史“省略”的《现代人》杂志主编

在笔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俄国〈现代人〉杂志主编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生涯》和《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批评》中,我们了解到,普列特尼约夫无论对于普希金还是对于果戈理都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同时他还开辟了自己独具风格的文学批评。不仅如此,在普希金去世后,普列特尼约夫与茹科夫斯基、克拉耶夫斯基、奥多耶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一起,为纪念普希金、抚恤他的家庭,继续完成了1837年四期《现代人》的出版(其中普希金为1837年的第一期已经组织了部分稿件),并在1838年完全接手了《现代人》,执掌《现代人》九年(1838—1846)。

然而,普列特尼约夫几乎就是被历史“省略”的一位人物,无论是俄国的哲学史、思想史,抑或文化史、文学史,均没有他的影子;甚至本该有其一席之地的杂志史,也仅寥寥数语。

我们知道,由普希金1836年创办的《现代人》

杂志,历时30年,期间三易主编。在俄罗斯国内,对普列特尼约夫主持之前的普希金时期(1836)和其后的涅克拉索夫时期(1847—1866)关注较多,有各类研究文章和著述。而对普列特尼约夫及其《现代人》的研究乏善可陈。主要原因在于:通常认为,该时期《现代人》步入衰落。苏联涅克拉索夫研究专家弗·叶甫盖尼耶夫-马克西莫夫在其《40—50年代的〈现代人〉——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前言中,介绍他对《现代人》的“从1836年到1866年‘或多或少’全面的历史”^[1]的梳理时讲,他“略过了衰落的1838到1846年,这一时期杂志由普列特尼约夫主持。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现代人》偏离了俄国杂志的主流,成为小众刊物,反映了一个非常小的和封闭的社会群体的思想,其文学作品没有引起任何广泛的社会反响”^[1]。这一观点非常有代表性。目前俄罗斯有两部比较重要的19世纪杂志史教材,一是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扎巴多夫主编的《18—19世纪俄罗斯杂志史》(第三

收稿日期:2021-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版)；一是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13年再版的戈罗莫夫主编的《18—19世纪俄罗斯杂志史》。两者均没有给予普列特尼约夫的《现代人》以位置。前者在第三章“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到平民转折期的杂志”中论及《现代人》时，仅在该节前用了简短的文字将这九年的《现代人》一带而过。其中这样写道：

普希金去世后，杂志转到彼得堡大学教授、批评家、诗人普列特尼约夫的手里，他迅速将《现代人》变成了一份远离争论、旁观社会和文学生活的刊物。出版人这样做，似乎要服务于“更高的艺术使命和真理”，并以读者无知、充斥着文学和杂志的道德水准低下为由为自己辩护。普列特尼约夫偏安于生活一角，固执地敌视社会运动和生活中新的先进现象，使得杂志走下坡路，沦为不起眼的刊物。普希金去世后头几年，还有果戈理、丘特切夫、茹科夫斯基、巴拉津斯基、柯尔卓夫、维亚泽姆斯基、亚济科夫（当然也有普希金生前的作品）在杂志上发表，但很快他们就终止了。于是《现代人》一期一期发表的尽是雅·卡·格罗特的文章，伊希莫夫的随笔，普列特尼约夫的图书简介，以及他本人和格林卡，还有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诸如科普捷夫、艾布拉特-罗森、马尔萨利斯基的诗歌。^{[2]255}

扎巴多夫的杂志史是俄罗斯第一部该类教材，系20世纪60年代编写，论述的立足点和框架还在“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划分”之下，因此，此后俄罗斯学者对教材予以了全面修订和编写，并于2003年出版。然而在新版中，依然没有普列特尼约夫的《现代人》的位置，仅有的文字为：

在1838年彼得堡大学教授普列特尼约夫成为其主编和出版人。在他的领导下杂志既没能守住原来的方向，也没能严格按照时出版：杂志常常延迟出版，并多为折中的内容。1843年普列特尼约夫试图将杂志调整为月刊，但是在《祖国纪事》不断扩大的知名度下也无济于事，杂志发行量不过300—400份，而到了1846年总计233份。^{[3]263}

杂志的发行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普希金的《现代人》最后两期发行量也仅有600份（且最终没有售完），所以，对普列特尼约夫时期《现代人》的忽视，另一个原因也许更重要，即杂志本身的审美

趣味和社会立场。因为前者不无揶揄地认为它“似乎要服务于‘更高的艺术使命和真理’”，并且说它是“以读者无知、充斥着文学和杂志的道德水准低下”为自己辩解，同时它还“远离生活”“固执地敌视社会运动和生活中新的先进现象”；后者则认为其“多为折中的内容”。

然而，它的“更高的艺术使命”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认为当时的“读者无知”，“文学和杂志的道德水准低下”，它是否敌视且是什么“新的先进现象”，究竟是些什么“折中的内容”，为什么远离论争，远离的姿态有没有价值，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倒是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可是，要回答这诸多的疑问，是笔者的一项重大任务，不是此篇文章能容纳的。在笔者已经认识了其文学生涯和文学批评活动之后，对普列特尼约夫的另一重身份——教育家——的挖掘，也许对我们完成“研究他主持九年的《现代人》”这一重大任务并非无关紧要。正如最重要的普列特尼约夫研究者康·雅·格罗特^①所说：“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他的文集和他之于文学的作用，（就会发现对他的）评判未必全面和公正。”^{[4]90}因而，在这里我们走近普列特尼约夫的与其文学事业同等重要的另一个领域：教育事业；它们是相互融合的。

二、走上教育生涯

普列特尼约夫1792年出生于特维尔省，别热茨克地区，杰别列什小村庄，一个教会执事家庭，也就是说属于教会阶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教育先是别热茨克教会学校，后又到特维尔教会中学。这里之所以很留意他的出身和早期教育，是因为遍阅他的人生轨迹和与众多人的交往，笔者推测，其一生的风格与他的宗教背景或信仰不无关系。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彼得堡师范学院深造。1814年毕业后，当时的校长叶·安·恩格尔哈特（1811起。后1816—1823年任皇村中学校长）发现了他巨大的才华，引他走上教育生涯，随即他在师范学院任教，并先后或同时在叶卡捷琳娜学校（1814—1830年）、爱国女子学校（从1814年开始，至少到1829年以后）和几所武备学校（巴维尔武备学校，1815—1828年；贵族军官学校，1825—1832；近卫军上尉及士官生学校，1830—1832年）任教，主要教授俄语语言和文学。这些教学活动充分展示了他的教学天赋，以致著名的经济学家安·卡·施托希^②听过他的课后，给皇后玛利亚·费多罗夫娜写信道：“我在我们学院发现了一块儿宝贝——普列特尼约夫先生。”^{[4]79}

按天赋讲,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走上讲坛,他很快习惯并迷上了教育事业,迅速在教育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博得了人心;也使他的名字为沙皇本人和宫廷所知晓,因为这些学院与皇家都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与皇室的接近,最重要的中介是一直在宫中担任太傅的茹科夫斯基。正是与茹科夫斯基的相识,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这种影响不限于仕途,还有精神取向;同时,精神取向的影响也并不是生硬的,而是与普列特尼约夫本人温和宽厚的性情、恬静高雅的审美取向相吻合,也可以说,他的气质与茹科夫斯基的气质相吻合。如果说三四十年代,也就是普希金之后的果戈理时期,除了别林斯基力推的“果戈理派”(即“现实主义”流派,如果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观点,这个“派”根本就不存在),还有一个文学流派的话,那就是“茹科夫斯基派”,而笔者认为普列特尼约夫正属于此;而且,他们的友谊保持了终生。不过,这种归“派”的划分,一下子把人群泾渭分明,抹去许多模糊地带和人与人的个性差别。事实上,他们只是某些方面的相似,或某种程度上的气味相投,但这种“气味”却也可以长久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茹科夫斯基和普列特尼约夫的相识,前者善于迅速评价一个人,他很快就喜爱上了普列特尼约夫。1826年,他在自己离开彼得堡去国外那段时间,向沙皇本人推荐普列特尼约夫代替自己在宫中教授俄国语言和文学。1829年普列特尼约夫开始给皇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他皇室人员正规授课。在宫廷的授课一直到1845年^③。普列特尼约夫没有辜负茹科夫斯基对他的信任:不仅授课富有成效,他的性格、脾气、见识,都获得了整个皇室真诚热情的接纳,且他终生享有这种接纳。相信读者不会幼稚地以他与皇室的联系而简单地立即对他肯定或否定。在当时的俄国文学、艺术领域,许多人或与皇室有交往,或兼有公职,或是后来辞去公职专事创作。况且,在几乎所有对普列特尼约夫的回忆中,他几乎被所有人接纳、尊敬,他的谦逊、无私、乐于为所有请托竭尽全力的品行,让所有与他交往的人无不真诚地尊敬和爱戴他。另外,他给年轻的皇储(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授课八年(从11岁—19岁),而皇储登基后废除农奴制、完成改革,是否与普列特尼约夫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也是可以研究的。因为,普列特尼约夫这样理解这一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委托我挑选阅读书目并实施授课,尤其是给皇储授课,我认为兹事尤其重大,因为我知道,阅读不仅对人的心灵发生影响,也影响他们对待人的态度。在这一课程中,我甚至努力保持文学的

滋养,我决定按照年代讲授所有最出色的俄国杂志,利用其中一切有用的资讯。规则由我来定——甚至文体在我授课时也完全改变了。我只寻找叙事的精彩、训诫的力量、性格上应具有的品质,一切不体面不光彩的内容统统都抛弃。”^{[4]79}

三、彼得堡大学教授之职

1832年之前,可以说是普列特尼约夫人生华丽的青春时代:大学毕业,早期教学和文学成就,与文学泰斗相识,与皇家接近。1832年则是其生活新的开端,这一阶段可以说持续到1840年;这一年他得到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应国民教育部(也就是谢·谢·乌瓦罗夫)之邀,开始在彼得堡大学以及自己的母校任教。在母校任教至1838年,此后全身心投入彼得堡大学的教学,一直到1848年。在此期间,1840年被任命为彼得堡大学校长。我们说,这又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连任校长至1848年;1849年,按照新的任命办法,继续担任校长,但应当辞去教授一职,从此任校长至1861年。

他任教授一职近20年,在文学教学领域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当时对教师的裁定极其严苛,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他的教授职位和他的“知识水平”完全不匹配: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当时通行的那样继续到国外完善教育,也就是说没能达到教育的最高水准和完整性,没有得到专门、严格、科学的语文学培养,没有那种德国式的、后来在俄国很盛行的“死啃书本”的知识,他对这些枯燥、僵化的东西,甚至表现出了某种极端的厌恶和偏见。但是,这种“标准学养”的缺失并没有妨碍他完全胜任俄国文学教授的职位,他的任教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另一种标准:引人入胜的课堂,天才的青年人的引领者,给青年们带来了不可替代的益处。

他为课程撰写过《俄国文学史课程详细大纲》,在引言部分这样诠释文学的意义和内容:“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指向提高心灵的能力和力量。”“任何研究也没有像文学研究那样带来正确的令人满意的关于心灵的知识。”“理解作为精神完善的三种形式的真、善、美,应该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4]81}他的第一批学生费·尼·福尔图纳托夫,回忆1832年普列特尼约夫初登彼得堡大学文学课讲坛授课时,讲道:“在文学课的导论课中他要解决四个问题:文学史的内容;文学史与政治史的关系;文学史时期的划分;文学史材料的选择。”^{[5]332}福尔图纳托夫认为,普列特尼约夫明显受到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④的《古今文学史》的影响,其俄译本1830年在我

们这里问世”^{[5]332}。福尔图纳托夫还回忆说,虽然他只来得及讲到俄国文学的罗蒙诺索夫时期,但“他非常关注当下的文学,关注刚刚出现的某个出色的作品”^{[5]333},上课经常会援引新出现的作品。另外,普列特尼约夫认为俄国“文学中主要有四种倾向:宗教倾向、爱国倾向、学术倾向、政治倾向”^{[5]333}。这一判断在后来19世纪的文学活动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不能不说普列特尼约夫对俄国文学有精准把握;这一判断为我们研究俄国文学的类型研究奠定了方向。至今纵观我们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对其爱国倾向、政治倾向研究得较多;宗教倾向到19世纪末才开始,至今正方兴未艾,而学术倾向至今没有得到研究。他的另一位学生米·尼·隆吉诺夫^⑤则说:“他的课不是死气沉沉地读讲义,而是鲜活的即兴讲解,是运用他的知识和对事业的爱而完成的……他将杰尔查文、冯维辛、科斯特罗夫^⑥等这些最优秀作家带入课堂,并一下子妙语连珠,讲出一连串美学的、语文学的有趣的见解,用普希金的话说,就是充满灵感的评论。”^{[5]381}

普列特尼约夫的学生中还有伊·屠格涅夫^⑦、阿·迈科夫、格里戈利耶夫^⑧、斯·巴拉诺夫斯基^⑨等,都对他有回忆和评述。

伊·屠格涅夫在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准备给自己的文集新增一篇“很长的序言”,以回顾25年的创作。可能这个序言一写就收不住了,因此后来(1867年开始)改写为文学回忆录。我们看到的文学回忆录的最初计划,第一位要回忆的人就是普列特尼约夫(1866年普氏去世后,出现了一批回忆文章)。这也难怪,普列特尼约夫正是屠格涅夫走上文学之路的伯乐。这篇文章《在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学界聚会上》也单独刊发在杂志上^⑩。文中回忆,还是彼得堡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屠格涅夫,被他的文学课教授普列特尼约夫邀请参加家庭文学聚会。此前不久,屠格涅夫把自己的习作《斯捷诺》给普列特尼约夫审阅,“在后来的一次课上,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即普列特尼约夫——笔者),以他通常的善意,不点名地分析了这篇完全不像样子的作品,其中是对拜伦的《曼弗雷德》幼稚地盲目模仿。下课走出学校在街上他看见了我,便把我叫到跟前,父亲般地数落了几句,不过他又说,我身上还‘有点东西’。就是这四个字鼓起了我的勇气把几首诗拿给他,他挑选了其中两首,一年后发表在从普希金那里接手的《现代人》上。……这就是我的东西第一次出现在刊物上,当然没有署名。”^[6]对于普列特尼约夫的授课,他则这样评述道:“作为俄国文学教授,他不

以学识渊博见长,学术储备也不丰厚,可是他真诚地热爱‘自己的课程’。他具有某种胆怯的但却纯真、细腻、锐利的鉴赏力,说话简单明了,却不无温情。最主要的是,他善于向听众传达自己饱满的喜好,善于引起他们的兴趣。但他绝不向学生灌输某种夸张的感情,没有任何类似格拉诺夫斯基在他们身上引发的激情的东西;而且连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做不恰当……他非常谦逊,但他受人爱戴。同时,他作为一个与一批杰出的文学家有联系的人,作为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巴拉津斯基、果戈理的朋友,作为普希金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献给他的人,在我们眼里他有着耀眼的光环。我们都能脱口而出这样的诗句:‘无意取悦高傲的世人’^⑪……的确,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非常符合诗人所画的这幅肖像:……美丽的灵魂,/它充满神圣的理想,/生动明朗的诗情,/纯朴崇高的思想。”^[6]

这是伊·屠格涅夫与普列特尼约夫相识30年后的回忆,已经是沉淀下来的记忆。而这种印象却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几乎我们读到的所有关于他的文字都有类似的评价。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几乎完美的人格?费·尼·福尔图纳托夫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笔者前述的推测:他一生的为人品格与他的宗教信仰不无关系。福尔图纳托夫回忆他临终前与孩子们告别的情景:

“孩子们,我就要和你们分别了,在这伟大的时刻,我嘱咐你们,把对上帝的敬畏作为你们思想、言语和行动的基础。”然后他翻译并解释《圣经》的这句话“initium sapientiae est timor Domini(拉丁语:对主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给孩子们补充说:“骄傲和自大只会带来忧烦。”^{[5]337}

他一生的平和、谦逊是在遵照主的旨意。他一生都怀有从孩童起就体验到的一种敬畏,在他那首著名的、受到普希金等诗人高度评价的《故乡》一诗中这样写道:

怎会忘记山丘上那新的神殿,
那是乡亲们用心搭建;
怀着敬畏,在每个星期天,
我都会向神唱起圣歌。
神殿四周,墓地被草丛覆盖,
不成行地蓬乱一片;
还是孩童的我,在春天去那里寻找,
寻找灰色十字架中的坟墓,
在那里,安息着一位父亲,他的儿子还是婴孩,
只在我的朝霞时刻亲吻过我的脸;

在那里,带着一种秘密的敬畏,
呼唤他等待着他可爱的身影……^[7]

普列特尼约夫三岁时失去父亲,从此便怀着神秘敬畏之情拜谒父亲的坟墓。普希金的那首《有两种情感对我们是如此亲近……》中曾有一句“对父亲坟墓的爱”^⑩,就是这里普列特尼约夫的那种爱吧。

普列特尼约夫个头不高,匀称结实的体格,愉快的相貌,行动安静,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有点羞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敏锐的甚至精明的人,但是这种精明从来也没有把他引向工于心计和狡猾。而且他的境遇是,他根本不需要心计,他所有想要的——慢慢地,却不可抗拒地——仿佛飘到他手里一样”^{[6]1673}。是的,他确实是一个幸运儿,仿佛有一颗幸运之星照耀。虽然几乎20岁前,无论是环境还是条件都没有促进其思想的发展、意识的形成,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混日子,他说:“也许在19岁时,我还像一截原木,在地上打滚。”^{[4]75}但是,他天性中的幻想性和诗性已经表现了出来,感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智力能力。他没有特别勉强,没有任何刻意逢迎异己的东西,仅凭自己的天性和劳作。因而,在去世前他对自己的神父说:“我出生时仿佛要让我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度过一生,但上帝却给了我另一种生活……”^{[4]76}19世纪20—30年代是普列特尼约夫最闪耀的时代,除了教学成就,他还有那些卓越的、德行高尚的温情的朋友,杰利维格、巴拉津斯基、普希金以及其他惺惺相惜的朋友,这是普列特尼约夫一生中最闪亮、最充满生机和幸福的时代。上帝给他的“另一种”生活在40年代继续着,另一个阶梯预备好了:1840年被任命为彼得堡大学校长,此后的20年,在教育另一种形式中,他坚守着自己的原则。

四、彼得堡大学校长之职

1840年,普列特尼约夫以圣彼得堡大学校长身份,前往赫尔辛基参加亚历山大大学200周年庆典。这次去芬兰参加盛典,他与茹科夫斯基一起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普列特尼约夫整个40年代的活动和兴趣中留下了特别的印记,包括在他的文学之子——《现代人》中也有反映。这一时期,无论其外在的还是内在的生活都充实、丰富,他不仅有大量官方公务——校长、教授,刚刚成立的(1841年)帝国科学院俄语语言与文学部常任院士;而且《现代人》杂志的选稿、编辑、校订全压在他一人肩上。不得不

惊叹他的勤劳、活跃和能力,能集如此多的职务、责任甚至具体事务于一身,能找到时间既处理庞杂的公务、业务,回复友人信件,完成数不清的文学友人的请托;又从事文学写作和编辑工作;同时也维持他很珍视的上层关系和各类社会交往。因自己的古道热肠、礼貌殷勤,他逐渐被百事缠身,陷入无休止的繁杂事务中,无暇喘息。普列特尼约夫也为自己累及于事务和奔波的处境深感苦恼,几乎要诅咒自己的命运,但他又无力卸去这些负担。后来文学史家弗·伊·申罗克^⑪说道:他常常是“责任的烈士”,各方毫无怜悯之心地给他重负,但“如果看看他所有得到的和他的全部付出,就知道他没有被足够珍惜”^{[4]83}。在校长岗位上他一直做到1861年。无论是从同时代人的反应,还是从他40年代的通信中,都证明了他作为校长所博得的好评、认可和威望。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理想的大学校长,无论是他的管理,还是他对人的关心;无论是对待教授们(作为教授委员会主席)的态度,还是对待学生的态度。

在这一职位上,并非安静、随和的性格就可以应付一切,遇棘手问题时坚守自己的原则,使他化解了无数事件:缓和年轻人的激情,消除学校中各种相互的不满和冲突。有研究者指出:“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能有这样一位领导人——安详稳重,和蔼可亲,因而在所有社会层面都享有认同和尊敬的人——对于圣彼得堡大学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4]83}这里最重要的是他的分寸、适度感。屠格涅夫感叹道:“古希腊人说,神赐予人的最好、最珍贵的礼物是分寸感。古希腊罗马的这一精神在他(指普列特尼约夫——引者)身上表现了出来——他特别赞同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对他来说是关闭的。”^[6]我们知道,在他所任职的20年,正是外部欧洲革命,国内思想论争、社会情绪高涨、官方强力压制、改革舆论激烈、大改革的实施及导致的更激烈的情绪——这些社会浪潮此起彼伏、不断交替的时代,而其中尤以大学生为中坚。身为校长,如何使学校正常运转,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在对待年轻人方面,他最突出的就在于其分寸感和道德影响。他不止一次仅凭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训导,就终止了学生中骚乱的萌芽和激烈的事件,使一切归于秩序与和平。

这一时期,除公务和杂志编辑事务,值得作为文学创作而加以重视的,是他自愿担任的一项并不轻松的工作,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始终如一地编撰彼得堡大学年度报告和他兼职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部的年度报告。而这种年度报告,几乎

就是当时文学批评流行的体裁,正像别林斯基从1840至1847年每年一篇的《俄国文学一瞥》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俄国文学年度系列评论一样。按照雅·卡·格罗特的说法,普列特尼约夫的这些报告的文学式观察,是“40—50年代俄国教育极其丰富的资料,永远都将证明他罕见的才能。他以一种惊人的生活节奏、灵活性和活跃性完成枯燥的、不讨好的工作”^{[8]292-293}。但对他来说,这是文学工作,他热爱并享受它,认为它重要而有益。年度报告中,除俄国大学教育的资料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人物传记,即为大学和各种机构中的优秀人物撰写的杂文,笔者称之为“小传记”。1852年在给茹科夫斯基提起那些被他列入其中的优秀人物、那些机构的成员的小传记时,普列特尼约夫说道:“当然,正像有各种各样的成员,我的小传记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总是乐于真心地以友善的话语提起这些人,他们都以自己生活中的某种东西温暖了我的心。”^{[8]727-728}如果我们通俗一点说,他总是记挂别人的好,普列特尼约夫以真诚和温情缅怀逝去的人。1885年,雅·卡·格罗特打算出版的普列特尼约夫文集第四卷,就准备收入这些传记杂文(后来第四卷没有面世)。另外,他为彼得堡大学撰写了五年(1840—1845)年度报告,结集出版一卷,其中还收录了他1844年2月8日完成的大型笔记《帝国圣彼得堡大学的第一个25年》;科学院的年度报告每年一篇,结集出版两卷(1842—1851年度报告,1852—1865年度报告)。这些构成了不可多得的俄国教育文献。

在同一时段,他以同样的认真、有序和持之以恒,领导着自己的《现代人》杂志。对他来说,这另一项文学事业所耗费的精力、付出的辛苦、牺牲的闲暇时间,又有多少,我们可以想象的。在办杂志的九年间,批评栏目和图书栏目几乎全部由他执笔,仅此一项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成果选入他的文集第二卷就占据了350页。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己的杂志中发表一系列长短不一的文章,其中不乏重要的尤其是批评和传记文章。那么,这就是他生平的第二个方面:文学事业(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两篇文章中已部分呈现),与他的教育事业相得益彰。

注释:

①康·雅·格罗特(К. Я. Грот, 1853—1934),俄罗斯斯拉夫派哲学家,是普列特尼约夫最亲密的朋友、最重要的杂志合作者雅·卡·格罗特(Я. К. Грот, 1812—1893)的次子。他在父亲去世后致力于整理出版父亲的文集,以及父

亲与普列特尼约夫的通信,并成为普列特尼约夫最重要的研究者,俄国各种大、小百科全书中普列特尼约夫的词条,均由他撰写或根据他的研究撰写,他也是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具权威的25卷传记词典(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А. А. Половцова, в 25т)中“普列特尼约夫”词条的撰写者。

- ②安·卡·施托希(А. К. Шторх, 1766—1835),俄国著名经学家,第一个传播亚当·斯密的思想;历史学家,书目编撰家,院士(1804),彼得堡科学院副院长(1830)。
- ③他授课的对象还有皇室成员叶列娜·巴普洛娃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嫂子)、玛利亚·米哈伊洛娃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哥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大女儿)、叶莉扎维塔·米哈伊洛娃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哥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二大女儿、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亚历山大二世的妹妹)、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亚历山大二世的妹妹))。
- ④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Ф. Шлегель, 1772—1829),德国评论家,文化哲学家,语言学家,作家。
- ⑤米·尼·隆吉诺夫(М. Н. Лонгинов, 1823—1875),著名俄罗斯文学家,诗人,传记作家,图书编目学专家,文学史家,著名国务活动家。
- ⑥叶·伊·科斯特罗夫(Е. И. Костров, 1755—1796),俄罗斯翻译家,诗人。俄国第一位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
- ⑦即我们熟悉的文学家伊·屠格涅夫,而不是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阿·屠格涅夫(1784—1845)。
- ⑧格里戈利耶夫(В. В. Григорьев, 1816—1881),俄国东方史学家,担任六年书刊审查官。
- ⑨斯·巴拉诺夫斯基(С. И. Барановский 1817—1890),俄国教育家,轮船和交通领域的工程师和发明家。
- ⑩该文初次发表在《俄国档案》杂志1869年第10期上,几乎同时刊印于《屠格涅夫文集》第一卷(1869年11月出版)。
- 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开端的献词。
- ⑫Александр Пушкин: Два чувства дивно близки нам —/В них обретает сердце пищу:/Любовь к родному пепелищу,/Любовь к отеческим гробам. (1830)
- ⑬弗·伊·申罗克(В. И. Шенрок, 1853—1910),俄国作家,文学史家,果戈理研究专家。

参考文献:

- [1] В. Евгеньев - Максимов.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М]. в40 - 50гг. — От Белинского до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исателей Ленинграда, 1934. 见: http://az.lib.ru/e/ewgenxewmaksimow_w_e/text_1934_sovremennik.shtm
- [2] А. В. Запад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XVIII - XIX веков [М].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3.
- [3] Л. П. Гром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XVIII -

XIX веков: учебник(3-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М]. СПб., 2013.

[4] А. А. Половцов. 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 25 т) [М]. СПб.: Имп. Р. Ист. Общ.; отд. оттиски. 1902. т. 14: Плавильщиков — Примо.

[5] Ф. Н. Фортунат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за 1830—1833 гг [J].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69, № 2. (见 1869 年 1—6 期合订本, 第 305—340 页)

[6]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вечер у П. А. Плетнев

[J].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69, № 10. (俄文网络版见 1869 年 7—12 期合订本, 第 1663—1676 页)。汉语文献可见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屠格涅夫全集》第 11 卷第 497—509 页。

[7] П. А. Плетнев. К моей родине [EB/OL]. http://dugward.ru/library/pletnev_p_a/pletnev_k_.html

[8] Я. К. Грота. 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руды Я. К. Грота. Т. 3) [М]. СПб. 190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Discovering Pletnev

—Educator Identity as the Editor in Chief of Magazine *The Contemporary*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Pletnev had worked as the second editor in chief of magazine *The Contemporary* for nine years, but the magazine isn't "mentioned"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of magazine because it was seen as "the faraway departure of debate", "the onlooker of society" and "the separation of literary lives" in 1840s, a period full of agitating thoughts.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Contemporary* and his contribution as the editor in chief are ignored. In fact, he not only had taken charge of *The Contemporary* for nine years, but also did abundant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held an educational career—teaching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or Alexandr's tzarevich and imperial household) in the court and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erving as the president of Petersburg University for twenty years (1840—1861), when European Revolution was outside and the swarming social tide before Great Reform was inside. In this period, Pletnev not only guaranteed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University, but also left multitudes of precious Russian educational documents. It is he who is the non-negligible educator.

Key words: Pletnev; *The Contemporary*; educator

感觉的寓言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叙事分析

王艺涵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作家、艺术家既关注着族群与文化表征,也关注着那些生活境遇中的个人面孔。石舒清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及同名影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讲述了一个与祭祀仪式有关的故事,也是一部“感觉的寓言”,一部关于个人丰富的内心感受如何超越了外在信仰和文化符号、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感觉的寓言”。

关键词: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民族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08-05

就民族文学的民族志意义而言,作家在记录与虚构之间保持着可贵的平衡,不仅那些纪录性的文字中保留着民族志内涵,在文学虚构的故事中也有着丰富的纪录性内容。一个同样有意义的文学现象是,这些纪录与虚构并没有因为表现族群文化与认知,而淹没族群中的个人面孔。石舒清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和据此改编的同名影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与其说《清水里的刀子》这部作品讲述了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如说它极其细致地表达了一个回族老人面对生死处境时的感受、感觉、感知。影片中,马子善老人的扮演者,他的具有深刻共情力的脸——他的“面孔”,极好地表达了这一难以言说的感觉,对生命与死亡充满忧思的复杂而丰富的感觉。因此,与其说《清水里的刀子》是一部故事片,或者说石舒清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与祭祀仪式有关的故事,不如说它们是一部“感觉的寓言”,一部关于人丰富的内心感受如何超越了一切外部的信仰和文化符号,成为一部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感觉的寓言”。

“感觉的寓言”不是一种理论,它告诉我们的是:个人的感觉如何与共同体的伦理相通,个人的感觉如何具有最真实的伦理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个人感觉与社群伦理之间的对话,这是发生在一个回族老人内心的微型对话,它或许能够唤起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大型对话。虽然在《清水里的刀子》里,围绕着祭祀仪式及其所需财物的筹措,影像叙述涉及人们所熟知的一些民族志范畴,如亲属关系、宗教仪式、经济关系等组织生活的各种方式,但这些都是影像和小说原作中的外部事件,叙事的重心并非指向显然具有民族志内涵的祭祀活动,不是聚焦于社群而是聚焦于其中的个体存在,聚焦于一个回族老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内心感受,以及个体如何更深刻地体现出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人与其他牲灵之间的生命伦理关系。

从外部视角看,可以说这部影像记录了一场“穆斯林的葬礼”及其祭祀仪式的筹措过程。在不同地区和族群的人类学叙述中,都有着关于族群成

收稿日期:2021-09-28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影像研究”(2020BWX006)

作者简介:王艺涵(1981—),女,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阿尔伯塔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民族文学、民族电影批评与研究。

员死亡现象的感知和描述,“他们的葬礼和随后的悼念活动,集中围绕着一个自相矛盾的愿望;在人死后既要保持联系,又要迅速、彻底地割断联系,而且要确保渡过绝望、继续活下去的愿望占主导地位”^[1]。马子善父子的对话既表现出回族人的生死观念、与信仰相关的习俗,也通过祭祀仪式注重表现出人类学家所说的双重愿望。每个死去的人冥冥中都是一个罪人,因此活着的亲属就必须想一些办法来实施对亡人灵魂的搭救仪式。虽然举念一颗枣也能够呈现对亡人的虔敬之心,但显然不足以符合礼仪地招待参与祭祀仪式的族人或邻里。仪式深刻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亡人的悼念,也在于对社群关系的强调。爱弥尔·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写道:“当群体失去它的成员而感到失落时,这种印象构成了哀悼的基础。然而,这种印象也使所有个体团结起来,使他们彼此之间结成更密切的关系……”^[2]涂尔干的分析表明,在人们共同参与的哀悼仪式中,实现了人们心灵之间的共融状态,无论这种心灵的共融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都会增强社会的生命力。仪式作为维系社会的一种纽带,强化了社群关系。

在父子对话时,老人完全理解儿子所说“来的人多”的伦理含义,他默许了儿子的建议,但对要宰杀老牛却内心极为不忍或不舍,长久以来养育他一家辛勤劳作的老牛已经不仅是头牲畜,也不只是犁地的工具,而是他感念和珍惜的生活陪伴者。但现实状况是:同样已衰老不堪、不知还能犁几年地的老牛,也无法逃脱自然秩序或死亡的命运。听到儿子的请求,老人的脸无奈地望向窗外,望向窗外吃草的老牛,我们跟着老人慈悲的目光看到了这一命运,也让人随之看到、听到成长中儿孙们的玩耍与嬉闹。而现在,是这个牲灵为人类的生与死最后做出牺牲的时刻。影片中的老人沟沟壑壑的脸极富表现力,那被岁月的刻刀雕刻过的沧桑面孔,就像是西海固这片土地的一个隐喻。

在向死而生的处境中,信仰和礼仪传统为人类生命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框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唯一有意义的参照框架,尤其是面对生死的重大时刻,信仰及其仪式给予生命超越性的意义。如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说,无论何种宗教与仪式,都意味着一种“超越肉体的信息资源”和超越个人的“意义系统”,它将族群的普遍信仰与脆弱的个人命运连接起来,给予个体的人以心理安抚和精神慰藉。

《清水里的刀子》细腻地表现了马子善老人在亡妻过世后,内心深处的迷恋与懊悔,祭祀亡妻需要宰杀老牛,让他在社群伦理和更普遍的生命伦理之间饱受煎熬,对大牲性命的怜悯和对天命的敬畏让他陷入两难的内心挣扎。当马子善向另一位老人(阿訇)讨教或进行心理咨询时,他所透露的正是这一心理困难:一头大牲能预知到死亡,从而不吃喝清洁内里以至归真。如果可以作为一种“感觉的寓言”来理解的话,几乎可以说,这头老牛既拥有属人的灵魂,也拥有属神的灵魂,属人的灵魂使得牛给人一种预知死之将至的哀戚感,而它属神的灵魂则让这头牛自觉地在祭祀中成为一种已经净化了自身的存在。在《清水里的刀子》这部感觉的寓言里,牛对死亡的感知成为其中最具有民族志意味、也最具有神秘性的部分。这使得老人的面孔所昭示的悲悯之情不仅源于亡妻之痛,也缘于他对另一种生物之必死命运的同情共感。在它所揭示的感觉寓言里,对生命的尊重、对已逝生命的慎终追远,乃至对人类之外的一切生灵必死命运的悲悯,在西海固人中间也同样是一种深厚的伦理情感。事实上,在这部影片和小说叙事中,作为杀戮意象的“刀子”,即使指向的是一头牛,即使是为着一种合情合理的祭祀仪式的举行,在老人的心里,也自始至终成了一种难解的伦理难题。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这部小说和影片成为一种难以解说的关乎生命伦理的“感觉的寓言”。对于预感到自身死亡的牛来说,它能够看见水槽里“清水里的刀子”从而不再进食,既属于西海固回族人的一种特殊信念,又相通于现代社会以来日益被唤醒的生命伦理情感,既具有民族志的细节,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伦理情感特性。

大牲对自身死亡的预感,以及老人对此所感知到的情感困扰,成为小说/电影情节中变动而逆转的环节,也引发出人从牛对死的感知而生成的复杂、微妙的体验。在人文主义传统中,人被视为万物之灵,万物的主宰,仿佛只有人类才有复杂的生与死的感受。《清水里的刀子》则给予了人们与这一认识不同的文学表现——动物也能预感到自己的死亡,由此给人的情感和意识造成了冲击,并最终使人通过目睹具有灵性的(动物)个体的死亡,而感知到每一个自然生物都能感觉到生死,无论它是否显得比人低等,一切牲灵都有着奇妙的、值得敬畏的灵知,正如自然、生命本身就是值得敬畏的存在。

马子善老人正是从这一点感知到了牛的“贵”，貌似愚钝的牲口不仅能够预知自身的死亡，这个牲灵不无悲哀却安然接受自身作为“牺牲”的命运，而且还自觉地洁净自身。这个牲灵让老人的内心产生了“又害怕又高兴”的复杂感受。西海固民间传说“牛是大牲，若举意端正，能从清水里看到宰它的刀子”，这种颇具超现实意味的叙事，为文学/影像带来了富有神秘感的民族志内涵。在民族文学与影片中大多有着人和其他生灵之间的情感交流，人和动物之间生死沟通的叙事。如根据叶尔克西《永生羊》改编的哈萨克同名影片和蒙古族电影《长调》等，其中人和羊、马与骆驼等有灵性的动物之间的息息相通，涉及有关生命的奥秘、精神层面上的相互依存和充满灵性的沟通。或许这就是居于“感觉的寓言”核心位置的生命伦理内涵。就像影片中的老人饱经沧桑的面孔一样，自然时空的苍茫广袤唤起对脆弱生命之同情与悲悯，其中既有对于生死往复现象的平静观照，也蕴含着“参不透真主机密”的惊讶或对生命本身的敬畏。

《清水里的刀子》所展现的葬礼与祭祀仪式，同样是在调和人的内在悖谬性感受：爱与怕，保持联系与隔断联系。就此而言，它所展现的具有民族志内涵的故事，和人们心中固化的形象有所不同，不仅是影片中的葬礼与祭礼所体现的对亡灵的搭救、对牲灵的敬畏之心，通过强调“洁净”和“仪式”观念所展现出来的调解生与死之悖谬处境的愿望，更主要的是，作品向我们揭示了超越族群习俗之上个体生命的共通之处。正如生命伦理的当代奠基者之一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自己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道德。”^[3]而在马子善老人身上，在他充溢着悲悯之情的脸上，在他悲伤与犹疑之面容上，我们能够从中辨认出的正是这一生命伦理。

缘于一种更深刻的生命伦理感受，使得恪守传统习俗的做法并不能让马子善心安理得，协调生与死的仪式也不能平复老人内心的冲突。马子善老人并不是他的族群社会中的一个异己者或陌异者，然而他与亡妻、与牲灵更富有情感的连接让他无法安然接受任何一种成为习俗的仪式，哪怕这一切都是按照传统仪轨和社会良序进行的。马子善老人的内

心感受溢出了本来平淡无奇的司空见惯的事件。事实上，在这部并无戏剧性冲突的影片中，叙述的焦点恰恰聚集在这一点：完全无可非议的、按照民族习俗与仪式进行的祭祀活动，与马子善老人默许宰牲之后内心感受“溢出”的部分，这是必要的事件与盈余的感受之间的对话，这是对无可争议的正当伦理实践的善意“腹诽”。与之同时，老人也没有做出不符合习俗或有违礼节的行为，所有的悖论与内心矛盾都体现他柔顺的沉默行为之中，或许应该说：一切都呈现在他富有共情力的面孔上。

牛待宰前，老人将牛带至田间，让牛享受最后的自由和平静，对于一个将牺牲的生命而言，这似乎是多余的行为，然而这就是从老人的悖谬之心中溢出的部分。在这幅图景中，还有一群吃草、喝水的羊。牛将死亡，但是羊群还继续活动着，一切都预示着周而复始的生死轮回和转换。老人的目光缓缓掠过荒芜的山间田野，只听到老牛踩在泥土上的沉重蹄声，和似乎对生之世界发出留恋的叹息。所有对死的畏惧都包含着对生命本身的留恋，哪怕生命多么卑微、劳苦、困顿，甚至一头当牛做马的牲畜也留恋它的生命和此岸的世界，为它的将要消失感到恐惧，陷入一种忧伤。而这忧伤中隐含着一种服从天命的温顺，或许还有听从天命的高贵。

老人的面孔和目光让祭祀前的一切活动都成为从“故事”“偏离”的时刻，或祭祀事件中“溢出”的部分。马子善老人的面孔与祭祀仪式前的场景构成了一种感觉的寓言：一双手磨刀的一幕，刀锋光亮、透着寒意，磨刀人为了尽可能把刀子磨得锋利，尽可能减轻牲灵的痛苦，用铜瓶里的水不停地向刀子上浇清水，它预示着一场祭祀仪式的前奏；女人们忙碌地在厨房准备着菜食，切洋芋、洗辣椒、泡粉条。一切琐碎的细节都被赋予了溢出日常生活之外的仪式感。马子善老人静默无声地目睹了这一切，然后他离开了这个为宰牛仪式做准备的场所，独自回到屋中点起蜡烛，在昏黄的烛光里虔诚地念起经文。在老牛待宰的前夜，老人提了一盏灯走进牛棚默默地陪伴着老牛。

三

在《清水里的刀子》里，尽管一切仪式都符合族群习俗，然而老人并不是一个参与者，就像他在影片开始的时候走在送葬队列的最后，与群体保持着一种充满隐喻意义的距离，最后宰牲的时刻老人也躲避到荒山野外，举目霜雪覆盖的山岭，仰望苍茫的天

空,在那张沧桑的脸上,内心无限的忧伤溢出。他的内心偏离了正在进行的合情合理的事件,老人的不忍之心将人们的内在目光转向一种普遍性的情感,这种情感超越了习俗,超越了仪式,回归溢出习俗与仪式、溢出语言表达的伦理时刻。正如孟子所说的作为“道”之发端的“不忍之心”,也是古希腊悲剧诗人所拥有的一种信念:有力的情感如怜悯和恐惧是人类生活洞见的源泉。

马子善老人的面孔,是《清水里的刀子》中最具感染力的影像,这是一张唤起普遍共情力的脸,自始至终在没有戏剧性冲突的事件之外溢出一种个体化的悲悯之情。他沉默寡言地祈祷、劳作、生活,他对一切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异议,然而他的面孔仿佛始终诉说着另一种伦理。即使面对着合情合理的事态,这张面孔仍然溢出深深的不安、愧疚、悲悯与无奈。比起一个族群或共同体所共享的习俗与仪式,马子善老人的面孔上溢出的是人类共同体都能够分享的怜悯和同情,他是那样的贫穷、衰老,并自觉无知,他深深自责不如一头大牲尊贵,却依然有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闪闪发亮”的高贵性,因为这种高贵的怜悯和无动于衷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

或许,这正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所说的“面孔”的伦理意义,影像让我们得以与他人的脸“面对面”,并深刻地揭示了“面孔”的真理,即他者或“陌异者”(陌生的异己者)的真理。对“面孔”的表现,其真实意义正在于此:“绝对陌异者单独就给我们以教益。而只有对于我来说才能是绝对陌异者——抗拒任何类型学,抗拒任何属,抗拒任何性格学,抗拒任何分类——因此,才能是一种最终越过对象的‘知识’的端点。他人的陌异性,他的自由本身!”^[4]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在讨论与民族志相关的论域时,依然需要做出重要的区分:一方面是具有共同体意义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秩序,那些以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文化秩序,以及表现这一秩序的仪式、习俗及其文化符号;另一方面则是那些置身于共同体中的个人,那些活生生的个体,置身于具体生活情状的个人所拥有的情感、感受、认知与理性能力。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简化为前者的一个符号。事实上,人们更应该从这些个体的人身上,去辨认那些本来已经固化的群体信条,重新激活表达它的语言。它最终将迫使共同体聆听个人的声音,使共同体倾听个人的表达,并与之对话,而这正是文学与艺术的伦理功能。虽然置身于某个共同体之中的个体,并不能像列维纳斯所说的那样超越于任何

种与属,也不能够成为“完全赤裸的”自然存在,但就更普遍的意义而言,就基于人的共情力和共通感基础之上、发展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理念而言,个体的确是“知识的端点”。这里是否隐含着文学艺术与一般来说的民族志书写之间的悖谬?或许,这正是文学艺术作品之中所蕴含着的民族志诗学与那种“科学”的民族志之间的认知差异。因为只有文学艺术,而不是其他学科化的范畴,才能将对个体的认知视为“知识的端点”,即将情感与感受视为“道之端”。

在没有戏剧性冲突的叙事里,围绕着一场仪式的准备,《清水里的刀子》将西海固回族人的日常生活、习俗、劳作,他们的生活空间与物质条件,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之间的物质交流与情感交流,他们相互依存的社群关系等等,组织进具有记录意义的影像叙事之中。而围绕着无可非议的祭祀与马子善老人不忍之心的内在张力,才得以让生与死的思考转换为影像叙事与观众之间沉默的对话。影片中的马子善老人体现了这一哲思,但在其意图的实施中,并没有采用内心独白,而是通过各种具有民族志意义的仪式与场景的显现,让生活自身说话。正如人类学家E. 马库斯所说:“民族志可能正是对话自身;或是关于共同环境的一系列并置的并列叙述……或者也可能仅是探寻共同主题的一系列独立叙述;甚至是各种叙述或一个主旋律和多个变奏曲的对位交织。”^[5]可以说,《清水里的刀子》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富有民族志内涵的对话,其中的人物既显现为对“共同环境”的“一系列并置”的叙述,关于生活之艰辛、关于贫困、关于互助和相互需要;也是一个“共同主题”的“一系列独立叙述”,关于死亡,关于哀悼与追思,关于生命的无常,关于生物的灵性,关于信仰;当然,影片也完成了“一个主旋律”与“多个变奏曲的对位交织”。

正如石舒清的原作所展现的,影片展现的不是某种固化的信仰,甚至也不是一般所说的传统文化及其符号,而是个体生命乃至一切牲灵的生与死,除了日常劳作之外,是与人的生死密切相关的仪式、施舍、筹借、馈赠礼物……有限处境中的互助行为,这些与仪式本身都是维系着社群或族群关系的方式,由此构建人类的团结、互助、交流,构成一种社群或族群的纽带,并构成社群族群伦理的基础。无论是物质的交流,物品或礼物的流动,钱财的筹借,还是人类情感行为(如影片中的祭祀仪式所传达的哀悼之情)的传递,无论是个体之间的互助互动还是群

体仪式,都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重要的仪式,意味着需要社群或族群每个成员的共同参与,是共同体精神戏剧的一部分。而至为重要的是,这一切维系族群或社群的方式,都发端于个体的生命感受,基于个体的精神需要;而人所建构的社会、社群与族群,即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的外部形式,都植根于个体敏锐的感受,所有伦理关系的外部形式,都是一部与个体生命相关的“感觉的寓言”,就像个人的感觉已经是召唤着新的生命伦理认知的“寓言”。因此与民族志相关的文学艺术式的记录,不仅聚焦于族群特征与群体经验,也不应忽略族群中的个体,尤其是族群中的那些“陌异者”的面孔——他的面容所诉说着的感受与感受。

就此而言,《清水里的刀子》极大地提高了其他族群分享西海固人生活与情感的机会,与之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族群共享其他文化群体所认同的伦理情感的可能性。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其他的因素,每个族群都形成了它自身的特有信仰、仪式、习俗,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性,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展,族际之间文化的封闭性正在让位于族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分享或共享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情感,是建构新的族际关系、从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础。而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

形式所产生的感受力分享不仅具有美学意义,也具有深切的社会伦理价值。一种具有共情力的伦理感受,不仅属于某个特定族群,也属于人类社会。一切感人至深的人类情感的艺术表达,不仅没有固定的疆域,即不应受到族群的地理边界或语言—社会边界的人为限制,而应成为族际交流与沟通的媒介,并最终融入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知之中。

参考文献:

- [1]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2]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敬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3]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4]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M].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5]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llegory of the Senses

—Narrative Analysis of *Knives In the Clear Water*

WANG Yih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literature and film or television works, writers and artists focus on personal faces in life situations as well as on ethn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Shi Shuqing's novel *Knife in the Clean Water* and its namesake film are examples of this aspect. It tells a story related to sacrificial rites, which is an “allegory of the senses” and an allegory of how the rich inner feelings of an individual transcends all external beliefs and cultural symbols, and has universal eth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hi Shuqing; *Knife in the Clean Water*; ethnography

“在家”与“在场”的生态书写

——论刘慈欣《三体》中的女性形象

韩玉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人文艺术教育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三体》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赋予了女性应对生态危机的隐喻书写。在自然和生命秩序中,女性处于守成和家园的地位。女性由稳定的“在家”走向漂泊的“在场”,隐喻了生态危机的多重性和严重性。小说中人类生存由女性选择,女性关于“在家”和“在场”的抉择悖论体现了各自的规定性。依存“在场”的生命本性,坚守“在家”的约束、爱与责任。“在家”和“在场”各自的局限性诠释了生态危机救赎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作者通过深邃而精密的思考,赋予女性更多破解生态危机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三体》;在家;在场;女性形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13-06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以宏大的宇宙叙事见长,时间绵长无限,空间广袤无边,人心诡谲多变。其主要内容是反映在“三体文明”的入侵威胁下,地球人的生存应对。不同族群、不同个体在生态灾难面前的表现和抉择,体现了生态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作者站在大地之上,仰望苍穹,穿越无限延展的时空,对终极问题的追寻苍凉透彻,令人震撼。刘慈欣能够凭借《三体》获得“雨果奖”,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在人类未来生存方面思考的深邃和广博。可以说,刘慈欣是一位有着前瞻性生态思考的作家。面对宇宙零道德的底色,人类如何生存?小说以女性人物叶文洁的抉择为起点,以程心的抉择为尾声,构筑了女性对于生存—文明—爱欲的深度解读,包含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问题,如:是竭尽全力的人性回归,还是迎合未知世界的猜想而建立新的规则?刘慈欣的思考显然是开放和包容的。“在家”与“在场”的区分,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精神层面的归宿选择,也是后现代生态观如何实现的追问,等等。

一、人类整体生存状况:“在家”走向“在场”

在性别设定中,母性一直是女性的第一性征。

生育子嗣,抚养后代,在对生命的延续上,女性比男性倾注的情感要强烈得多。特别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母系氏族的女性是家的象征。父系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大多数男性建设家园,女性守护家园。在男性的笔下,无论对女性的妻性和女儿性是歌颂还是逃离,对于女性的母性却是一致认可。毋庸置疑的是,在有历史传统的人类文明中,人类公认:有母亲便有家园。

家园是身心栖息的港湾,对家的渴盼,返乡的愿望,在文学中被长久吟唱。“在家”代表着皈依,代表着牵绊,代表着血缘情感的连接。“在场”是一种变动不居的生存状态,代表着漂泊、代表着流浪、代表着无乡可返的哀伤。人类中的很多个体或族类,穷尽一生就是为了有一个安稳的家,农耕文明一向是安守于乡土,游牧文明驰骋多年也选择了定居,海洋文明面对未知浩渺的海洋祈求生存环境的恒定。

在《三体》中,作者以独特的想象,塑造了33位女性,其中用墨较多的女性有6位:叶文洁、程心、智子(女性机器人)、艾AA、庄颜和杨冬。叶文洁、杨冬是当代知识分子;程心、庄颜是穿越未来的当代

收稿日期:2021-09-06

作者简介:韩玉洁(1976—),女,河南兰考人,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人文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等。

人；艾 AA 是威慑纪元的未来人物；智子是让人类叹服的机器人。这些女性突破了传统女性的“在家”特征，诠释了五千年中国女性的心路历程。她们的精神世界彰显了女性在生态灾难面前的担当，暗合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很多主张。更难得的是，从“在家”到“在场”的转变打开了生态思考的多维空间。

《三体》中女性的“在家”感是非常弱化的，灵魂无处安置的“在场”感却处处可见。这些女性基本都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小说中，“三体”组织的最高统帅叶文洁是“在家”感基本缺失的一个人。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叶哲泰在“文革”中被自己的学生批斗致死；母亲在关键时刻充当批斗父亲的勇士，后来并无精神负担地寻求自己的新生活。家庭的不幸让她心寒。父亲去世后，她独自一人去了大兴安岭。人类对于森林的肆意破坏，自私盲目让她心凉。《寂静的春天》中揭示的杀虫剂对地球生命的摧残，让她心惊。看似一腔热血地反对森林砍伐的白沐霖，曾经被脆弱的她视为知音，却因自保而陷害她。当她带着残存的希望找到当年打死自己父亲的红小兵时，她们诅咒历史，却拒绝忏悔。一系列人性的丑恶，让叶文洁完全绝望。以至于后来父亲的学生杨卫宁多次保护她，并与她组成家庭，也没有让她感到“家”的温暖。“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使叶文洁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上的流浪感残酷地折磨着她，在组成家庭后，她的心灵反而无家可归了。”^{[1]70}后来叶文洁按下了向“三体文明”求救的按钮。为了保守秘密，她冷血地杀害了丈夫和领导。

杨冬是叶冬洁的女儿，受母亲的影响，她成为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后来因为在触及宇宙真相的过程中，精神世界完全幻灭，选择了自杀。她也是基本没有“在家”感的人物，活着是为了寻求宇宙真理，没有婚姻，也没有孩子。艾 AA 是未来的威慑纪的女性，那个时代本来就没有婚姻和家庭，她随心漂泊到地球各地，从来没有纠结过家园的问题。庄颜是面壁者罗辑的妻子，也是作者描绘的最具有妻性和女儿性的人物，应该算是集美丽、善良、优雅、知性的理想女性，不过她的存在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最后也离开了罗辑。“智子”是日本女人的隐喻，谦恭、隐忍、多变，好像是最“在家”的人，但她是机器人的事实改变了“在家”的本来含义，是最根本的“在场”。

程心是小说中形象最为丰满的一位女性。在她身上，寄托了作者对于生命、文明、人性、自然的多重思考。程心是个遗弃的孤儿，她的养母宁愿孤独终老也不舍弃她，养母的爱是她感受到的最恒久的温

暖，养母的培养使她善良、坚韧、富有爱心和责任感。在女性化的威慑纪元，她被选为取代罗辑成为人类的第二个执剑人，其地位如同女娲神。她身上的母性光辉普照每位面对生存危机的地球人，可以说有她就有“家园”。不过，也因为她选择了放弃黑暗森林威慑，让地球人陷入灭顶之灾。她为了弥补过错，执着地寻找新的家园。可是在寻找家园的过程中，一步步发现了宇宙的本相：宇宙是零道德的，死神永生。希望——失望——绝望——希望，选择——坚守——放弃——选择，在程心身上，跨越了地球亿万时光，经历了无数次人类无助的轮回。在她身上，“在家”的愿望最为动人心弦，“在场”的无奈最让人类叹息。作者对她的塑造，看似不带任何情感，但每一回从“在家”到“在场”的变动，都力透纸背，含蕴深远。

守护家园的女性从“在家”走向“在场”，寓意着人类原有封闭的、完整的家园意识正逐渐走向瓦解，一个开放和复杂的时代已经开始。“家园意指这样的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2]15}家园的概念，对于当代人来说，大多是破碎和疏离的，因为很少人会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一辈子，并和小时的伙伴一起工作。家园成了陌生概念后，一切都与过去不同。人口按几何级不断增长，资源不断消耗，环境不断恶化。没有了守护家园的意识，甚至有些人叫嚣着，地球如果不能生存，我们可以星际移民。且不说能否星际移民，就算移民成功，我们要继续糟蹋另外一个星球吗？处于“在场”状态的人类非常痛苦。痛苦主要来自不可控，自然灾害的不可控，技术和官僚主义的不可控，人造机器、机械化对人性伤害的不可控。《三体》中的当代女性，基本上都遭受了不可控的痛苦——对人类极度绝望的叶文洁，在人类遭受灭顶之灾时眼睛失明的程心，自杀的杨冬。“在场”的痛楚让人触目惊心；“在家”的缺失在小说中成为人类必然的遗憾。由“在家”走向“在场”，这一真相和事实引出，牵出了人类生存中危机的多重性。“在家”是否是人类一种恒久的状态？女人走向“在场”对人类的文明有什么影响？从“在家”到“在场”是一种对家园的远离，这种远离是客观的存在还是主观的选择？或许两者都有。人异化后人性怎样重新界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坚守应是什么？一系列宏大的问题在《三体》中提出，“在家”和“在场”的抉择为我们渐渐梳理出答案。

二、人类的生存困境：“在家”和“在场”抉择的悖论

从小说中几位女性的选择和人生历程来看，人类文明对于“在场”和“在家”这一问题上，男性和女性的处理方式并不十分一致，但是最后实现了认同。《三体》中影响人类命运抉择的是叶文洁和程心两位女性，她俩的抉择显现了“在家”与“在场”的各自规定性。

叶文洁因对人类极度失望，按下了向“三体文明”求救的按钮，她写道：“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1]206}她不知“三体文明”是否强于地球文明，她不知“三体文明”是否对地球文明充满敌意，她也不知这样的抉择是否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她毫不犹豫地背叛了人类，并因保密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和领导雷志成。她冷酷并充满血腥的选择，彻底抛弃了生命的家园。可以说，叶文洁的选择是疯狂和盲目的。她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科学、美好的新文明，至于与外星人接触是否能达到目的，她也没有过多的思考。就像人类为了更好地改变生存状态，进行工业革命、信息革命、能源革新，至于文明要走向何方，却不可知。技术的魔力是不可控的，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灾难会一个个降临。

叶文洁为了改变地球，放弃了“在家”，选择了“在场”。叶文洁放弃的“家”，是地球上不同物种的家。生态女性主义一致认为，女性与自然一样，受到男权社会暴力的伤害。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人把自然当作任意索取的物的世界。女性也被打上了物的烙印。生态危机的解决，应从女性的解放开始。叶文洁经历的人性中的黑暗，正是文明危机的体现。文明的危机同时出现在各个领域，之间又相互关联，而且防不胜防。如文明的冲突，信仰的丧失，技术对人的控制，单向度的人的大量出现，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如今的危机，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都出现了紊乱。作者对文明的危机的揭露入木三分。他借叶文洁的抉择，揭示了生态文明危机严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面对不可知的“在场”，叶文洁赌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抛弃了亲人。她的丈夫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她，给她庇护和家庭；她面对丈夫的死亡却无动于衷，她说：“冷静、毫不动感情地做了。我找到了能够为之献身的事业，付出的代价，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不在乎。同时我也知道，全人类都将为这个事业付出史无前例的巨大牺牲，这仅仅是一个微

不足道的开始。”^{[1]216}

叶文洁并不是一个杀人恶魔，相反她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热爱科学和真理。尽管她身遭不幸，还是一次次地希望人类能够反省自身。她最后的绝望，凸显出人类个体面对生态危机的可怜和无助。不过选择“在场”就可以了吗？也不尽然。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温室中成长的人类更是纠结万分。从“在家”到“在场”，人类失去了稳定性。无根的断裂之感，让人类感到无尽的痛苦。怎样应对“在场”带来的接踵而至的生命缺失，是一个难题。“在场”后，人性还是现在我们认同的人性吗？当叶文洁与“三体文明”接触后，了解到“三体文明”程度之高远超出人类想象。“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之间科技力量的对比，就像人类和虫子的对比一样。“三体文明”的生存环境天然恶劣，急需突破现状，殖民其他文明。小说中没有关于叶文洁心理斗争的刻画，只显示她的行动。她告诉罗辑（男性，叶文洁女儿杨冬的高中同学，后来的人类面壁人和执剑人）宇宙真相。“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宇宙社会学呢？……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要想从这两条公理推论出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图景，还有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怕是没有机会了……或者，你就当我随便说说，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尽了责任。”^{[1]139}也正由于叶文洁的提示，罗辑找到了破解“三体文明”侵入地球的黑暗森林威胁体系。

叶文洁关于“在家”和“在场”的抉择，存在着逻辑和情感的悖论。她通过理性思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让地球文明走向不可知的“在场”改变，在最后关头，又出于本能给出守护地球家园的答案。叶文洁不是恨地球文明，而是极度绝望，绝望之余又渴望得到拯救。她的人生中还是得到过很多温暖的。她刚生完孩子时，奶水不足，女儿杨冬吃百家奶长大，大兴安岭质朴的山民无私地帮她渡过了难关。在山村的梦乡里，她常常梦见自己变成了婴儿，躺在一个温暖的环抱了。她感受到“在家”的安稳和恬静，心灵的寒冰也渐渐融化。

生命的抉择正是充满这种悖论，作为科学家的叶文洁先是选择了“在场”，后又选择了“在家”。而《三体》中另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程心则恰恰相反，她一直执着地选择“在家”，最后却走向了广袤无边的“在场”，频频回首，却越走越远。

程心因为养母的爱护和影响，成为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心的人。她经历了四次冷冻和苏醒。第一

次是因为云天明。这个濒临死亡的男人,用他全部的积蓄为她买了颗名为 DX3906 的星星。她却为了人类文明的延续,游说云天明以一己之力对抗“三体文明”,把云天明的大脑送到“三体文明”中间。为了看到未来,她带着爱选择了冷冻。第一次苏醒后所在的威慑纪元是女性化的社会,纤弱、善良、美与天真。威慑纪元的人类把执剑人罗辑当成独裁的威胁,不愿意再让男人掌控世界。他们把程心当成圣母玛利亚,呼吁她改变男人的野蛮和嗜血。程心也把新世界的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她决定全力保护他们。出于母性和爱,她竞选新世界的执剑人,成为替代罗辑的女性执剑人。就在她接任执剑人的5分钟后,“三体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侵。她可以选择按动威慑森林开关,但她没有。如果她选择了,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会因为宇宙规则而被其他星球消灭。结果很残酷,地球还是地球,不过已经不属于人类。她的善意并没有阻止“三体文明”侵占的步伐,相反他们把剩余的人类集中到澳大利亚,并让人类相互吃食。抱着婴儿充满爱意的程心,选择了地球家园。地球是所有生命栖息的家园。因为她选择“在家”,人类走向永远的“在场”。人类没有了,家园有什么意义呢?她对接她的人说,她没有家。“家”这个词,像刀子一样割着她痛苦麻木的心。

人类濒临灭绝,程心无法面对事实,双目失明。但她别无选择,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但是地球不可以消失。她选择了地球本身。“这个决断不是用思想做出的,而是深藏在她的基因中,这基因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十亿万年前,决断在那时已经做出,在后来几十亿年的沧海桑田中被不断强化,不管对与错,她知道自已别无选择。”^{[3]6}

远在地球母体之外的“在场”的“蓝色空间”和“万有引力”号飞船,选择发射太阳系坐标。“三体文明”飞速撤离了地球,逃出太阳系。人类没有灭绝,地球和太阳系随时面临消亡的威胁。

经历了短暂冬眠后的程心治愈了眼睛,内心却陷入永久的黑暗,活下去变成了负担和折磨。为了责任和赎罪,她必须活着。与云天明通话后,她又致力于寻找守护太阳系的生命安全。为了保证光速飞船研制的顺利进行,她进行了第三次冬眠。醒来后,她中断了维德的战争准备,终止了他们的研究。安全声明没有找出,太阳系消失了。程心和艾 AA 进行了第四次冬眠。她带着人类的残存希望走向未来。可未来比人类的死亡更可怕,宇宙将变成坟墓,所有的历史和文明都将变成虚无。程心面临着新的

抉择。她放弃了经营的小宇宙的“在家”,决定回归“大宇宙”,为了新宇宙的诞生。“在家”和“在场”都结束了,只留下生态球和漂流瓶。

三、新秩序构建:“在场”中“在家”的意义

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生态理念,来进行高远的整合。《三体》系列第一部《地球往事》,首先触及现代性带来的生态危机和人类世界的精神危机。在《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中,是一次次价值向度不同的生态重建。小说的结局沉重而悲悯,表现了“在家”的稳定和坚守,“在场”的漂泊和希冀,在死神永生面前不堪一击。然而,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坚韧的生存努力,爱、责任、尊严,是“在场”中“在家”的内涵,如草叶上经太阳映射的生命露珠,夺人心弦。

小说中的六位女性关于“在家”和“在场”的认知,基本上可浓缩到叶文洁和程心两位女性身上,她们的认知综合了知识女性的生存认知——知识分子的身份,加上女性的精神特征。她们的抉择,同时也触及人类对于生态危机和生命本色的认知。“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不仅仅是尚存着的能知者,而且自己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4]2}当前很多问题,是由于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认识的不足造成。

人类中心主义者毫无顾忌地掠夺财富。人们把工业革命的进步、科学的成就、信息革命当作人类的进步,其实不尽然。人们的身体得到了满足,精神却无处安放。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无论是科学的成就,还是工业技术的进步,都不等同于真正的人类进步。科学和技术仅仅是现存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尽管取得了那些辉煌的成就,其他因素甚至社会整体本身可能都在倒退。”^{[5]248}

《三体》通过叶文洁和程心抉择的悖论告诉人们,生存危机的残酷性不容忽视。面对多重的生存危机,人类真的需要建立新的生态哲学了。

新的生态哲学和新的文明方式的建立,既不能依赖复古主义的乡愁呻吟,也不能完全受未来主义的左右。复古主义充满哀伤、软弱无力,人类不可能回到原初的“在家”状态。弗洛姆指出:“人的存在不同于其他所有生物;人永远处在不可回避的不平衡状态中……人是唯一会感到他自己的存在是个问题,他不得不解决这个回避不了的问题的动物。他不能返回到与自然和谐的前人类状态中;他必须继续发展他的理性,直至成为自然和他自己的主人。”^{[6]56}

人类本来就是从“在场”中来,“在家”只是短暂的停留。未来主义对“在场”的认识充满乐观,对危机的存在毫不在乎,以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寄希望

于刺激和冒险,从一个“在场”走向另一个“在场”,失去了“在家”中人性的美好。

程心作为人类中最具有“在家”渴望的女性人物之一,她的抉择过程虽然是悲情的,但却充满了生命亮色,显示出人高贵的尊严、爱的力量以及责任感;更难能可能的贵是,小说凸显了“在家”的价值是由叶文洁、程心与四位男性共同完成的。

首位执剑人罗辑,这位原本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个体,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对学术的虔诚。他被选为面壁人后,刚开始极为抗拒,后来人们派来了庄颜,给了他美好温暖的家。再后来,庄颜听命于组织,为让罗辑承担面壁人的使命,自愿离开罗辑。罗辑为了再见到自己的爱人和女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直视了自己面壁人的身份。他凭着天生的敏锐和直觉,回想起与叶文洁的对话。凭着叶文洁对人类的爱与责任的余温,捕捉到了黑暗森林威慑,为地球带来半个世纪的和平。也正是他,凸显了男性世界的责任和担当,他成功执行了执剑人的任务,为人类的延续付出了努力。

托马斯·维德,是程心工作的 PLA(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局长,是人类理性、刚毅、前进、力量、冷酷、野心的代言人。维德在任何挫折面前都不退缩,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也不在意别人的生死,他做出把云天明的大脑送到三体世界的决定,曾经为了执剑人的地位谋杀程心。最后的结局却出人意料,他遵守了无论什么时候都同意由程心来决定诺言,中断了反物质武器的开发。维德抬头看着程心,目光中又露出了那种罕见的无助和祈求,他一字一顿地说:“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程心说:“我选择人性,我想你们也是。”^{[1]382}维德以反人类罪、战争罪和违反曲率驱动技术禁止法罪被判处死刑。对于维德的死亡,程心曾非常矛盾,她甚至后悔自己的决定,如果她不加以阻止,人类或许有更多的生机。但人之所以是人,除了动物性生存的一面,更重要的还有人性的光辉。为了个体和类的延续,我们必须做出一些痛苦的抉择,毕竟人类的生生不息,不仅是一种自然体的延续,同时也是文化和人性的延续。

与维德不同,小说中的云天明是一直支持程心的男性。云天明是程心的高中同学,也是程心的暗恋者。云天明封闭、自卑、敏感、聪颖,他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是程心的微笑和关怀,尽管这微笑和关怀不关乎爱情。他在垂危之际,用全部的财产为程心送去了星星。在程心来劝说他同意冷冻并把大脑送到“三体世界”时,他非常伤心。他说:“我不宣誓,在

这个世界我感到自己是个外人,没有得到过多少快乐和幸福,也没有得到过多少爱,当然这都是我的错……”^{[1]70}也正是这样一位男人,看到程心为人类奋斗的热情,便同意为了人类去“三体世界”。云天明在“三体世界”里始终关注着程心,并冒着巨大的危险,通过童话故事告诉程心如何发布安全声明。这样一生凄凉的个体生命,其人性的美好,整个人类为之动容。

小说中与程心并肩战斗到底的是关一帆。关一帆是“万有引力”号飞船上的随舰队研究员,冬眠了四个世纪后与程心相遇。他让程心明白了一个道理:宇宙死神永生,生存高于一切。面对这样的生命真相,程心痛哭起来,“这是一种放弃,她终于看清了,使自己这粒沙尘四处飘飞的,是怎样的天风;把自己这片小叶送向远方的,是怎样的大河。她彻底放弃了,让风吹透躯体,让阳光穿过灵魂”^{[1]491}。这就是说,人类始终是地球上的“在场”者。

四、人类共同体家园:“在场”与“在家”的结合

新的文明方式必须要开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在前现代,人类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丰富的有情世界,自然植被葱茏,人们的情感联系紧密,万物各有各的位置和价值。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技术之上的时代,生态被破坏,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人类现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向大地“在家”历史和宇宙“在场”过程寻找答案。

《三体》中,作者以理性宽厚的心态,来表现人类中的女性群体。不管是对叶文洁、杨冬、艾 AA、智子、庄颜,还是对程心,作者笔端呈现的都是男性对女性的最平和的认知,没有妖化,也没有神化。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作者表现出了对女性的极大信任,并赋予她们优先权。作者认同女性在母爱方面的作用,正是女性弥补了男性的缺失。“从其存在的根基上讲,在男人历史动荡不安的戏剧面前,女人仍然那么安宁、娴静……”^{[7]12}作者的观点与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不谋而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隐忍和退让,更懂得牺牲和成全,也更懂得爱和责任的价值。小说中的“智子”隐喻“异化”的人类,她在程心决定回归大宇宙时,对程心说,你还是为责任活着。两千年的时光汇成对人类的情感:悲哀、敬佩、惊奇、责备、惋惜。也许,这正是人类对自己的评价。

新的生态文明需要新的生态哲学,新的生态哲学也意味着新的价值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指出:“使社会得以维系的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共同情感和信仰,社会团结的核心和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共

有价值观和共同的道德规范。”^{[8]203}新的生态哲学建立在人类“在场”的本相上,人类其实就是“短暂”的在场,敬畏和珍惜是人类应有的生命态度,这样才能自我满足和自我限制。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名声和地位,而是时刻意识到死亡难以避免的生命存在,活着并且感受到生活的快乐,明了“在场”的本质,更加坚守“在家”的价值。有了“在家”的价值,“在场”才会是自足的、自然的。关一帆对程心说:“我当然知道你不怕,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你作为执剑人的经历,只是想说,你没有错。人类世界选择了你,就是选择了用爱来对待生命和一切,尽管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实现了那个世界的愿望,实现了那里的价值观,你实现了他们的选择,你真的没有错。”^{[1]485}男性的信任和温暖给予了女性,包容了女性的天真和脆弱。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女性和男性都选择了“在家”的爱与责任。

刘慈欣构建的小说世界虽然底色苍凉,但是每一点都涂上了生命斑斓的色彩,持久而坚韧地发出守护人类的光芒。对于生存危机的解读和破解,刘慈欣作为一名科幻小说家,并依托《三体》进行了非常令人震撼的探索和尝试,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开

放性启示,构建了新的生态哲学的基本核心内容。对于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颇具前瞻性和启示性。

参考文献:

- [1] 刘慈欣. 三体 I:地球往事[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2]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的阐释[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 刘慈欣. 三体 II:黑暗森林[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4] 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5] 马科斯·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李小兵,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6] 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M]. 孙依依,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8.
- [7] 舍勒. 资本主义的未来[M]. 罗悌伦,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8] 埃米尔·杜尔凯姆.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Ecological Writing of “at Home” and “Present”

—On the Female Images in Liu Cixin’s *The Three – Body Problem*

HAN Yujie

(Arts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Center,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 Body Problem* endows women with metaphorical writing to cope with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 In the order of nature and life, women are in the position of security and homeland. Women’s transition from being stable “at home” to wandering “present” is a metaphor for the multiplicity and severity of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novel, human existence is chosen by women, and the paradox of women’s choice about “at home” and “present” reflects their respective stipulations. The nature of life depends on “presence” and sticks to the restraint, love and responsibility of “home”. The limitations of “at home” and “presen” explain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faceted nature of ecological crisis redemption. Through deep and precise thinking, the author gives women more spiritual power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Key words: *The Three – Body Problem*; at home; presence; female image

中原学与《道德经》

李庚香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中原学将《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和《史记》《资治通鉴》作为自己的“二史三经”,侧重的是传承方式,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原学研究的思想文化土壤。《道德经》研究了人类和宇宙的根本性问题,被称为“万经之王”,是中原学的“智慧”宝藏的源头活水,在中原学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对于中原学的思想框架和核心范畴的搭建具有重要价值。《道德经》所蕴藏的天地精华,超越现实利益的精神境界,亦将照亮新时代的征程。

关键词:中原学;《道德经》;“万经之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04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19-10

经典的严肃性、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稳定性。马克思在评价希腊艺术和史诗时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中原学将《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和《史记》《资治通鉴》作为自己的“二史三经”,侧重的是传承方式,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原学研究的思想文化土壤。

在中国古代,经与典两个字是分开使用的,经说的是永恒的道理。《文心雕龙》指出:“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典字,从甲骨文分析,上面是册字,下面是大字,两者合一为大本大册的书。经与典合在一起,就是永恒真理的书籍,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籍,有意义有价值的书籍。但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被我们忽略了,比如对积极的道家、真实的法家、上进的儒家的认识是不够的,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激活。虽然我们常说经史难分,但史是实践着的善恶。例如,读《史记》和《资治通鉴》,就会想起“以史为鉴”这几个字,因为“史”让我们在参照之下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读史修身,不仅仅指阅读中的是非判别,还指心智与境界的扩展。由此

可知,把世代沧桑、万千人物装在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有容乃大的气象,“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讲的不正是这种“有容乃大”吗?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将中华民族的品格、民族精神高度浓缩在字里行间,凝聚成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

中原学研究,离不开三部典籍——《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中华文明的五大基因:一是易。易是“变”,但不是一般的“变”,而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变,是“无中生有”的“变”。变化是无穷的,其本质是“阴阳相荡”、对立统一。二是道。三是仁。四是理。五是心。这五大基因无不与“三经”密切相关。《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王”,在中原学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对于中原学的思想框架和核心范畴的搭建具有重要价值。在 worldview 方面,《道德经》把“道”看作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起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如果说《易经》开了一个易门,叫作“阴阳”,“阴阳易之门”。现在《道德经》也开了一个道的门,叫作“有无道之门”。常存“无”,才能发现天地的奥妙;常存“有”,才能发现千变万化的现象。真正的德,其实

收稿日期:2021-12-10

作者简介:李庚香(1966—),男,河南淮阳人,文学硕士,法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研究员。兼任河南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

只有两个字,就是“不争”;真正的“道”,也只有两个字,就是“无为”。一个人最高的德行就是无欲。《道德经》是“万经之王”,是被翻译为外文最多的文化典籍。在中原学的视野中,重读《道德经》不是为了回顾而溯源,而是为了“重燃”而溯源。站在《共产党宣言》和《实践论》的立场上重释《道德经》,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研究中国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是新时代中原学的研究取向。

一、《道德经》是中原学的“智慧”宝藏的源头活水

先秦时代思想多元并起,道儒墨法四家的影响都很大,传承数千年。儒家有两个字:一是“时”。这个“时”,在孔子与南子相处、评价管子时都有体现。二是“仁”。老子曾经担任周朝的史官——“守藏室之史”。而老子的核心词:一是“自然”。中岳庙、嘉应观,都体现出对于自然的敬畏。二是“道”。“道”是相对于“天”而言的。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凡是可以标注出来的名,不是亘古不变的名。对于《孙子兵法》而言,如果用两个字讲是“诡”,那么用两个字是“算”和“骗”。如果说老子是讲“转化”的,那么韩非子则是讲“矛盾”的。儒家的人文传统和伦理情怀,墨家的兼爱思想,也蕴含着伟大的人道精神。法家反对人治,反对贵族特权,主张法治,积极入世,这些思想中内蕴的价值,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可忽视。

诸子各家思想相斥又相生,道家的艺术心态可以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和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其天道自然的观点也可以纠正儒家的天命论和墨家的天志论。而儒法墨积极入世、顽强奋斗的精神,又可以补道家无为之不足。道家教人谦卑逊让,知足寡欲;教人创造而不占有,成功而不自居;教人将取先与,以退为进,以柔制刚,以弱胜强。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受与非攻思想,庄子的齐物思想和艺术人生,都各有其价值所在。老子和庄子都承认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认为道没有意志情感,这与儒家不同。他们反对暴力,反对强制的秩序,这与法家不同。但道家不同于儒家、墨家的传承,多是后人的归类。

老子和庄子的区别体现在哪里呢?老子追求的是天下、万物、百姓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但到庄子时这种追求已经不可能了,庄子关心不了大局,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改变社会现实和个人在现实中的命运,他将无可奈何的处境归之为命。在这个意义上,

庄子只能改变自己的内在世界,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安之若命,形象地讲出了个体对外在境遇只能采取安然随顺的态度。但是如果仅仅是安然顺应外在的无可奈何的境遇,那就不是庄子了。庄子将安然顺命作为思想的起点,由此开始,通过齐物坐忘、心斋等思想和心灵的修养,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体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游乎四海之外的享受。因此,老子关心的是天下、万物、百姓如何达到自然而然的秩序,庄子关心的则是个人的精神自在。如果说老子关注天下百姓,承认圣人的作用,当然这种圣人不同于儒家的圣人,而是辅万物之自然的圣人。那么庄子则不再关注现实的秩序了,而是关注如何从现实的道德、政治秩序中解脱出来。在老子看来,圣人无为,万物得到自己健康正常的生长空间。而在庄子看来,守护自己的自然本性最为重要。老子和庄子都体现出一种超越性,老子超越的是一般的君王治道,而庄子要超越的则是一般的世俗生活。例如,多读《庄子》就能让我们在精神上自得其乐。道家讲天和、人和、心和,讲天乐、人乐、心乐,因此能够用一种更宽广的思维来看待“和谐”。这种天地观、宇宙观构建了中国的和乐情怀和礼乐文明。这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讲的完全不一样。在改造世界的问题上,孔子屡次失败,但始终知其不可而为之,最后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但庄子要达到的是一种逍遥的状态,在他看来,改变世界已经不可能,所以他努力追求一种精神的自在,而这又经过了一个齐物的过程,即把美丑、善恶、高低、寿夭、苦乐、朝三暮四都看得没有价值上的区别。就对现实的漠然而言,庄子是消极的。但他对于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精神的自在逍遥、保持心灵的自在独立上却又是积极的。心斋、坐忘、朝彻、见独等,都是实现精神自由的方法。庄子承认“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但认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主张无己、无名、无功,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在这里,孔子和老子对于混乱的时代如何应对,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对周代遗产,即其礼乐制度上产生了分歧。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坦诚地说:“您所说的周礼,制定它的人早已死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君子遇到适当的时候就出仕,遇到不适当的时候就隐居起来。”“除掉您的娇气和过多的欲望,除掉你雍容华贵的风度和过高的志向吧!”对此,孔子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面对老子这位高深莫

测、变化无形的智者，孔子感到难以把握对方。孔、老之间的观点差异，也代表了儒、道两家文化观上的差异。老子的本体是道，孔子的本体是仁。韩非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在老子看来，“失德而后仁”。所以，他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正是在这些要害处，老子道家与以仁学为基础的儒家区别开来。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两种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的分歧，从而为中国文化开出了两种不同的传统。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道是对世界的认识，而人道则是对人自身的认知。天人关系包含着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不直接的就是这一问题。在中国哲学家的眼里，天道与人道应该是同一个道，而不是两个道，即是说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一致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思路。从现实层面来说，天之道与人之道并不一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那么，什么才是合理的天人关系呢？老子的主张是“玄同”。老子主张天道，但往往忽略了人道的特性。“人法天”，就是要求服从普遍性的天道。在老子看来，“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当然，儒道也有会通之处，在孔子的“中庸”之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道家的“无欲”“不争”“慈俭”“无为”等原则。“道”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但他强调只有“守雌”“贵柔”“致虚极守静笃”才能得道。这就与《易传》强调的刚、阳、“自强不息”显著不同。

知来处，明去处。正是中华文化典籍的代代传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坚强屹立，中华文明饱经沧桑而薪火相传。在先秦典籍中，《道德经》由于研究了人类和宇宙的根本性问题，其地位是十分独特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典籍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家都给予了《道德经》以极高评价。希腊哲学的辩证法与论辩直接相关，因此西方哲学“爱智”，强调对自然的把握。而中国哲学更强调领悟，更侧重于人事，“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皦”，因此中国哲学是“闻道”。法家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他的《解老》《喻老》开启了《道德经》的注解史。司马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概括得十分精要，“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

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穷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近代思想家魏源说：“老子之书，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鲁迅说，不读《老子》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在他看来，“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柢”。苏联汉学家李谢维奇则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对于《道德经》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视之为君人南面之术，或视之为气功长生之作，或以之为兵战之书，或崇之为仙道祖籍，或推之为哲学宝典。就内容而言，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悲观主义、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等都有所体现。中华文明看似柔和，实则坚强。这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为什么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早已进入了博物馆，唯有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风吹雨打依然生机勃勃，在人类文明的灿烂星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同时，也可以纠正和弥补西方文明的缺陷和不足。

二、《道德经》蕴藏的天地精华

（一）道法自然

《道德经》的核心范畴：一是自然。二是道。“自然”和“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什么是自然呢？道法自然是从本体、本源角度转到价值取向。道法自然，不是效法自然而而是自然而然，是自然的、本然的，没有外力和强力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道与自然而然有一致性，不是任何意志能够主宰和干预的。因此，老子讲的自然是整体的自然秩序，这使他不同于庄子的“外物”的自然，也不同于王弼的个体的自然本性。王弼讲的自然，就跟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这个转变大约从汉初强调个体修身开始，主张“因自然”“顺自然”“任自然”。这个自然就到了个体的层面。万物皆以自然为性，自然而然的状况是万物的本性，王弼不把道德的善作为人性。儒家认为，世界的秩序，特别是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圣人发现的、安排的，是理想的。但在老子看来，这种个别人、少数人有意安排的秩序并不理想，因为个人和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老子认为，宇宙的整体秩序是道所决定的，应是自然而然的，即尽量减少外在的强力干预。因此，老子考虑的是天下、万物、百姓这些总体的最佳状态，是一种全局性关照。总体的自然是自

己本然如此，这首先要排除有意的、外力的强迫。在道家看来，人为的努力往往自以为是，常常走向反面。“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恒自然。”“辅万物之自然”，就是“道”的最高境界。人、地、天、道，域中有四大，这些都是着眼于全局的眼光。所以，老子的自然是全局性的关照，是天下、万物和百姓，是整体性眼光。百姓皆谓“我自然”，辅万物之自然，道法自然，都是没有外在的强制压迫，也没有内在冲突的自然而然。这个自然不是野蛮状态的自然，不是动物弱肉强食的自然，不是生物个体的本能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归根结底，人要法天法地法道法自然。在这里，自然是一种价值、一种原则，是“自己如此”的秩序。从人到道到自然，首先是人法道，然后是道法自然，最后是人法自然。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是第一个自觉研究本体论的思想家。他把道看作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起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之道首先是天道，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先秦时期是天命鬼神逐步衰落的时期，但即便是孔子亦强调“畏天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有老子强调“道法自然”，道是“象帝之先”。道具有无形无物的特点。道的无形表现在：“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道的无物表现在：“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正因道不可名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此老子也很矛盾，“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由于道似有非有，似无非无，所以，“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然而，道却具有无穷的创造力，“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老子之道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在时序上是先后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道”，是世界的本原和法则，是最高存在。如果从功能的角度来讲，道是万物的总根源和总根据，是讲万物从哪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道就相当于无，万物从没有的状态中产生出来。这是宇宙万物从无到有的一个说法。但老子还没有笼统地讲道就是无，这与王弼是不同的。西方讲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或本来就有，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中国哲学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西方哲学的

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老子精彩的解答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无”比“有”更加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无”就是他反复论述的“道”。正是因为这样，便不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所以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说“道”是“一”，是“朴”，是“惟恍惟惚”，也是这个意思。虽然老子的“道”与自然现象相联系，但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正研究和总结。他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过是借自然以明人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都强调的不过是“道”对“象”“物”“天地”的优先地位。这种道有极大的概括性，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运用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灵活性。在老子看来，天下的运行变化是没有也不需要情感的，圣人的统治亦然，重要的只在于遵循“道”。有一种在天地之前生成的东西，它寂然不动，廖然空虚；它独一无二，自古至今不改变，流行于万物而不倦怠，这就是“道”。

在老子这里，在政治层面是“德”和“无为”，在哲学层面却是“道”“无名”。“道可道，非常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认为，道在创生宇宙万物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反”，另一种力量是“弱”。反是物极必反，而弱则是道的基本品质。虽然“道”也讲了自然现象，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但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正研究和总结。“道”难以用有限的概念和语言来界定，“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是“一”、是“朴”，是“惟恍惟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这里，“道”“一”“无名”是老子的哲学本体，“德”“一”“无为”则是老子的政治社会理论。那么，如何才能认识道呢？“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皦。”在他看来，“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正由于此，“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因此，“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如何才能得道呢？在老子看来，“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老子看来，“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他把柔弱胜刚强视为治国之利器。“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是说，在对立项的列举中，他特别重视“柔”“弱”“贱”的一方。这就是著名的“守柔曰强”的思想。老子再三强调，“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吕氏春秋·不二》认为，“老子贵柔”，指明了老子之道的真谛。在老子看来，“天下莫柔弱于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与之相应，谦卑是柔弱的本质规定，而处下是谦卑的重要规定。“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居后则是谦卑的又一规定。“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无为和不争则是柔弱的具体运用。

（二）以百姓心为心

中国的人本思想影响深远。“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圣人永远没有私心，所以圣人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从《诗经》《尚书》，都可以看到“天命无常，民情大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民心、民情，充溢着人本思想和人文情怀。对比之下，中国的人本、民本思想与西方的神本主义有极大的区别。在老子看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者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老子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懂军事，懂兵道，却不喜欢战争。兵不是“君子之器”，而是“不祥之器”。只有万不得已，才能用。“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因此，“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三）无为而治

老子之道的本质是治道。所谓治道，就是政治之道，就是阐述以及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道效法自然，人道效法天道。当然，人道与天

道是不同的。“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同时，老子激烈批判人道的不公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的政治思考既有天道的理论构想，又有治道的实践模式。在政治思想方面，老子强调“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相比而言，无为更多地用于政治领域，而不争更多地用于人生领域。无为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无不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把古往今来的统治状态分为四类，即“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最高的状态就是“不知有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老子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道”“上德”“一”“无”“朴”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法家看来，显然，“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必然“无为”才能“无不为”。因为统治者如果不是处“无”而是“占有”，那就不能总揽全局了。在这里，以“无为”求“无不为”是老子，庄子则是以“无为”求“无为”，而韩非则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孔子和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禅宗则以有为求无为。在老子这里，无为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是为了达到无不为的效果，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在这里，“辅”就是“无为”，是“为”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无为”不是消极的，而是体现了一种责任感。老子的圣人不是要放弃对天下万物的责任，而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辅的方式来尽自己的责任。显然，老子的圣人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地位、名誉、权力，而是说，圣人应该面对天下、万物、百姓，把它们当作服务对象，关切重点在于行为对象的利益和处境，而不是行为者自己的利益。“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别折腾老百姓，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在“无为而治”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他得出结论，“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

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由此出发他强烈反对战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当然，老子的“无为而治”也与他“不知有之”这种治理境界的追求相关，其核心在于“无私”。“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四）上善若水

《道德经》把柔弱看作朴素的表现和生命力的象征，“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的特点，一是不争，二是处于始终谦下的位置。老子强调的是水往低处流的趋势，它不与万物相争，甘于一般人所不喜欢的角色、处境。最好的善好像水一样，水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正是由于“无为”，所以才有“不争”。“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然而上善若水，泽被万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此，“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成百谷王”。在这里，弱胜过强，柔胜过刚，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实行。因此，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不争”“竞争”和“斗争”的关系，对于我们是一个考验。人类社会很多冲突都是由“争”引起的，怎样不争，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玄德”“上善若水”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所以才会“不争”。玄德的特点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简单说，就是“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它只给世间万物提供自然的条件和空间，而不去干涉或者改变它们。

（五）朴素辩证

《道德经》分上下篇，上篇第一章至第三十七章为道经，下篇第三十八章至第八十一章为德经。“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自然。”

人道思考的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研究的是人的德性问题。修身的本质就是处理人与道的关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在这里，老子推崇的是上德。复归婴儿，保持精神上的纯真，是老子之道的内修本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然而，欲望和知性，又会阻挠人的赤子状态。如果说“复归婴儿”是对人生修养对内的的心灵指导，那么向水学习则是人生修养对外的行为指导。而圣人就是与道合一之人。这是因为普通人常常为贪欲所诱惑，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才能尊天道，法自然和明人事。“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在方法论方面，老子是朴素辩证法大师，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这是老子哲学最深刻的思想，也是老子给中外思想史留下的最鲜明的标记。在他看来，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行，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人间的祸福变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最早提出系统的辩证法思想，揭示出矛盾的对立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老子的道是很朴素的，就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根据，是万物之母。当然，老子的辩证思想也是需要我们来继承的。他指出，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智与愚、巧与拙等，因此，“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讲了许多矛盾对立项，如明昧、高下、先后、直曲、美恶、巧拙等。在他看来，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可以说，他提醒人们从事物的反面关系中来观看正面，主张正言若反，是有深意的。因此，“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讲的都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同时，矛盾也是相互转化的，而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他把用兵的“奇”转化成了治国的“正”。这种相互转化还体现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是变动的。他的“正言若反”，就是最好的体现。当然，在对立项的列举中，老子特别注重“柔”“弱”“贱”的一方，这就是著名的“守柔曰强”的思想。《老子》再三强调：“弱也者，道之用也。”“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因为人们只有处于“柔”“弱”的一方，才能永远不会被战胜。只有“守雌”“贵柔”“知足”，才能保持住自己，才能持久而有韧

性,就能战胜对方而不会被转化掉。在这里,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对于我们理解在忍让和委屈中以求得生存的可能和积蓄力量的“中国智慧”具有巨大价值。“哀兵必胜”,“宁受胯下之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的都是这种十分深刻的人生体会。如果说《易传》肯定的是刚、阳、自强不息,那么老子面对“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强调的却是“守雌”“贵柔”“致虚极、守静笃”的一面。老子讲了自己的许多“与众不同”,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同时,“正言若反”,正面的话好像在反说一样。因此,他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人生价值方面,老子从“道法自然”出发,把素朴规定为人生的本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当然,老子的思想也有问题:一是退化。不同于近代史上的“进化”,老子的历史观是“退化”。他把整个文明都拿来批判,“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似乎在满怀恐惧和慨叹地总结着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面对“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困局,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呢?老子向往的是比孔墨理想更为久远的“小国寡民”时期。在那个时期,一切任其“自然”,“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因此,对于文字、技术等方面的人类进步他是否定的,庄子更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社会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无为而治”在政治层意义上是积极的,在社会层意义上却是消极的。他反对贪欲,进而反对智慧,主张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这显然是消极的。在小国寡民中,虽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仍然有正价值,代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却是今天的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二是愚民。这既表现在绝圣弃智上,也表现在绝仁弃义上。他反对以智治国:“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还看到了大道之废与仁义兴起之间的关系:“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要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但要求百姓不要追求过多的欲望。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都是指代过度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基本的

需求。其实人类社会的冲突都是由于过度的欲望引起的,如对物质的欲望,对名誉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然而,老子对于愚、智的理解又是十分独特的。他说自己,“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也是讲君主茫然无知,而臣属却工于算计,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得道者必静”。“治大国如烹小鲜”,君要愚世要智,可能也有其积极意义。在他看来,小国寡民的社会图景和无为而治原则,只有具备圣人品格的统治者才能担当和组织实施。三是循环。老子充满了“反本”思想,他认为,循环运行是道运动的必然结果,任何事物运动都会复归,回到原初状态和原来的出发点。“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四是无为。与庄子的无为不同,老子的无为是“无不为”。如果把无为理解为遵守规律的为,才能求得正解。正是由于这些糟粕,人们视道家为消极的。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看出的却是一个积极的道家。

三、典籍如灯,照亮新时代的征程

面对新时代的新语境,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道德经》。一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必须对于我们价值观进行重新提炼。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说,新时代,面对新的文明轴心期,我们需要的,正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中华典籍,是古圣思想的载体,是先贤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永远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河永远奔腾不息的文化密码。当代又有多少人能够读得懂、读得进传统典籍呢?再辉煌的文化,一旦失去传承,就必然衰败。如何让典籍活起来,仍然我们念兹在兹的梦想。在李书磊看来,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与从容。

(一)文化典籍是我们与世界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大优势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西比较十分重要,跨文化交流十分关键。文化典籍,是我们与世界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大优势。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认为应该把人们的思想从西方移到东方,因为那里有开阔的思想视野。他还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把老子归为“形而上学的创造者”,把孔子与释迦牟尼、耶稣

并列“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从希腊哲学开始,西方文化习惯于区分现象论和本体论。老子从现象界看到始源和演化的问题,看到万物的“本根”。这个“根”,在《老子》里出现了六次以上,他注重从表面现象探讨根源,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与《老子》不谋而合。

过去我们提炼的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还有仁义礼、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无为而不为,以及法术势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必须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进行重视概括和提炼。如果说西方文化是“神创论”,那么中华文化则是“道气说”。气生万物是中国哲学的表达,道气论是宇宙的本体。否定中华民族的“道气说”,而讲西方的“神创论”,这样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

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以人为本、关注人生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所在。与儒家、墨家大力倡导人道原则不同,道家大力倡导自然原则。但是,在道家的自然原则中,也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的道法自然中,就包含“顺应民心”的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他大力倡导的自然原则也包含着公平的原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西方近代,曾经有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思想是相对于西方宗教传统而言的,是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的以人为本思想,则是相对于商周时期原始的天命观而言的,从而逐渐推倒了“天命”或“上帝”的权威。在老子看来,“道”是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从而为中华民族增进理性智慧之光开辟了道路。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有落后的一面,但其精华却是主要的,如与人为善、利他利群、忧国忧民、严以律己、向往高尚人格等。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同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证明,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以下问题就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一是个体与共同体,二是知识论与境界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

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2]。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本义就是“爱”“博施”“济众”。孔子把“仁”视为做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甚至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老子曾经区别“为学”和“为道”的区别,他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学说以天道自然观为主要内容,认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应当效法“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大道,主张“无为而治”,“绝仁弃义”,体现了与儒墨法家不同的治国理政思路。道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秘诀就是道法自然。

三是经济人与伦理人、政治人、社会人。四是自由与自律。五是权利与责任(义务)。六是平等与平衡。七是和谐与竞争。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他特别重视“不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争的关键是无私无欲,“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反之,就是“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总之,“自然”和“无为”是老子一贯的明确主张。陈鼓应先生说得好,“我在人生的多次挫折中,《老子》的柔韧、《庄子》的达观,让我重新站起来,学会不再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从正负两面看问题,这是经典对我个人生活的实际意义”^[3]。

(二)发掘早期文明之幽光,熔铸新时代中国之魂
典籍如灯,能够照耀我们。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不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而是为了人生而求做人,伦理思想比较丰富,道德色彩比较浓厚。如果说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爱智”,那么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于“闻道”。冯友兰指出:“由于哲学探究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4]孔子推崇的是君子,本质是“仁者爱人”;墨家推崇的是“贤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法家贵法,力主法治,其理想人格是尊主卑臣;老子贵柔,主张无为,推举圣人。老子的理想人格,迥异于孔子、墨家、法家的理想人格,最大的差异在于理论基础不同。老子的思想基础是道,这使他比其他思想家更深刻,逻辑更彻底。

《老子》全书浑然一体,贯穿着尊道贵德的思想。关于世界的本源,老子做出了如下回答:万物,包括天体在内,都是道生的。道是什么东西?道生万物有规律,万物一生出来也都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从生到死,即从有形又化为无形,回到道中。这就是

有无相生,反复无穷。这就是老子的宇宙观。老子写《道德经》,目有在于用天之道引导人之道。天之道就是自然规律,人之道就是社会意识。怎么引导?比如人人都知道“天长地久”。老子突然问:你知道天地为什么能长且久吗?老子告诉你:“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即天地的生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万物。这就给世人一个启发:为己者命短,奉献者寿长。还说天地,只为万物的生存提供适宜的条件而不干涉、控制万物,这就是无为;而万物都能按自身的规律取得成功,这就是无不为。由此引导治理者:要尊重治理对象的自身规律,顺应而不干涉,治理对象一定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得很好。这就是老子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大到治理天下,小到农民治禾。农民常锄禾日当午,怎么能是无为呢?这是顺应禾的生长规律而不是去干涉它,对禾来说就是无为;而拔苗助长则是干涉禾的生长规律,那就是妄为。正是这种无为,五谷都能丰收,这就是无不为。把国人当作禾,治理者就相当于农民,要想获得治理的成功,也必得如农民那样,只服务,不干涉。因此,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公民自身修养,《老子》中都有正确指引。

老子似乎是在满怀恐惧地总结着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长治久安的氏族社会正在迅速崩毁,“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所追求、称道的乃是一切任其“自然”的“小国寡民”时期,“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如何能达到呢?在他看来,“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孔子讲“修己以安百姓”,老子也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儒家讲百善孝为先,《道德经》则讲“孝慈”,“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无辍”。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在我们看来,《道德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理智思考的好奇心,还能在困顿中给予人动力,激发人的生命活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老子的思想,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当然,老子思想中还有一些特别的认识,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这些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

(三)文化典籍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首先,《道德经》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老子将

“道”提升为最高哲学范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次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春秋以前,人们都认为“天”是最高最大的,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而老子则认为“道”最大。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主张,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规律。毛泽东对《道德经》的“以弱胜强”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老子》这部书,“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老子》上说过‘不敢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道德经》第六十章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影响很大。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要不折腾,不‘翻烧饼’,这是治大国的重要方法。大国政贵有恒,不能朝令夕改,不要折腾。今天喊这个口号,明天要换那个口号。这不叫新思想,而叫不稳当”。“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中国几千年朝代更替兴亡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盛世就是“无为而治”的结果。《道德经》中“以百姓心为心”,“治大国若烹小鲜”,“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

其次,《道德经》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提供很多借鉴。《道德经》讲:“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致的。老子讲了59次“天下”,只有一次讲到“小国寡民”。小国寡民,本义是小邦寡民。老子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一个个小土侯安于现在封疆,安于百姓自得其乐,而不崇尚战争和扩张。他是这样看待“大邦”与“小邦”的互动的,“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老子认为,大邦应该处于下游,即“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先哲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就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

《道德经》中,“贵以身为天下”,“大邦者下流”,“有容乃大”和“天下”“神器”等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多方面的智慧,能够从根本

上解决人类的各种危机。一是谦下。老子讲过“大国者，下流也”。这个下流不是卑鄙下流，而是大国要甘心处于江河的下游。“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老子在这里以雌雄关系来比喻说明大国应该采取的外交原则：一是静。二是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总之，“大者宜为下”。二是不尚武力。老子不崇尚武力，他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对此，他有三原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主张，“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但打了胜仗以后要有悲哀的心情，这点值得现代人思考。“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种原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种态度启示我们怎样用更宽广的心怀面对世界、面对战争。例如，全世界的兵法都说要战争，而且要打赢，只有我们的《孙子兵法》以不战为上策。三是包容。“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体现出来的就是包容天下的胸襟。老子讲的圣人，体现的是玄德，而玄德是道的体现，所以圣人是道的人格化的体现。老子讲：“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和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在不同层面上讲的。“报怨以德”，讲的是事前而非事后。“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这些体现的都是圣人包容天下的胸襟。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过程中，怎样展示大国风范，《道德经》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老子非常关心大国治理，虽然他讲过“小国寡民”，但“小国寡民”不能代表老子的主要思想，因为他讲“大邦”讲了很多次，讲“天下”也讲了很多次。比如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圣

人抱一为天下式”，就是要做天下人的楷模；还有“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个“天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国际化眼光、全球性眼光。在这个意义上，老子的思想可以为中国培养大国风范提供文化思想资源。

在我们看来，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是五千年象形文字垒起的一座座精神巅峰，登高望远，于我们个体，可以拓展人生的长度和宽度；对于我们的民族，则可以夯实精神的高度和厚度。《老子》讲，“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体现出一种宽广的视野。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给我们确立了“文化中国”的一个共同的、明确的价值源泉，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超越现实利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因此我们要深入挖掘《道德经》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参考文献：

- [1] 老子. 道德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 梁启超. 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488.
- [3] 专访/陈鼓应. 我为何主张多读《老子》与《庄子》? [EB/OL]. 凤凰网国学, 2018-12-10.
- [4]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六卷)[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1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bout the Zhongyuan Studies and Tao Te Ching

LI Gengxiang

(Henan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Zhongyuan Studies regard the Book of Changes, Tao Te Ching, Huangdi Neijing,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The Book of Reflections as their “two histories and three Classics”, focusing on the way of inheritance, because they constitute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oil of zhongyuan studies. Tao Te Ching studies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mankind and the universe, and is known as the “king of all Scriptures”. It is the source of the treasure of “wisdom” of Zhongyuan Studies and play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Zhongyuan studies,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ological framework and core categories of Zhongyuan studies. The essence of heaven and earth contained in Tao Te Ching, the spiritual realm beyond practical interests, will also illuminate the journey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Zhongyuan Studies; Tao Te Ching; “king of all Scriptures”

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内大循环的视角

黄潇¹,王海霞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北京 100720)

摘要:利用2007—2019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与全体居民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考察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及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从总体来讲,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教育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影响显著。因而,应从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倾斜力度及加强民生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等方面提升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效能。

关键词:民生性财政支出;居民消费;内循环;新发展格局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05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29-07

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经济政治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加剧了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全球肆虐更使得不确定性加剧,世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在大变局中抓住发展机遇,推动我国经济迈向更高发展层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其中。迈向新发展阶段,我国要转变以往以投资、出口为主要发展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挖掘内需潜力,发展壮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畅通货币流通以及引导生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图1所示,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07年以来逐步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0.8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36%,已连续六年成为我

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到39.2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58%,但仍然是特殊时期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力量。随着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消费增速有所放缓,但超过14亿的人口总量以及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预示着我国消费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增加居民收入与减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作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措施。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然相对偏低,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如表1所示,2019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39.25%,而同年美国、俄罗斯、韩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则分别为67.86%、50.38%、48.55%。可以看出,2019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从时间维度来看,2001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45.52%,而到2010年,则下降到了34.33%。从2011年起,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开始逐步提高,但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中低水平。

收稿日期:2021-12-28

作者简介:黄潇(1994—),女,陕西咸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财税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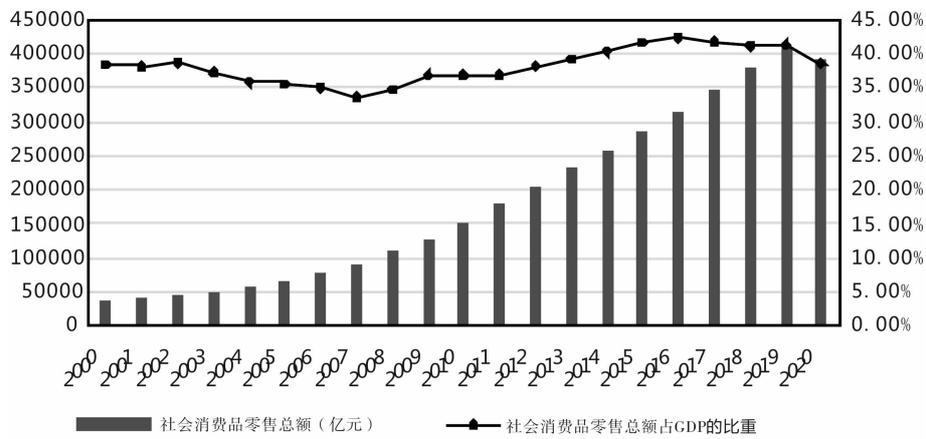


图1 2000—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占GDP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1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居民最终消费率比较(单位:%)

年份	中国	加拿大	印度	韩国	新加坡	俄罗斯	英国	德国	美国
2001	45.52	55.29	64.15	55.40	46.24	49.39	66.42	56.46	66.77
2006	37.75	54.58	56.11	53.03	38.11	48.78	64.04	55.69	67.03
2010	34.33	57.13	54.72	50.44	36.34	51.49	64.25	55.11	67.94
2011	34.92	56.03	56.21	51.20	36.62	50.38	64.28	54.39	68.46
2012	35.39	56.02	56.46	51.27	37.31	51.45	64.56	54.91	67.96
2013	35.83	55.96	57.65	50.51	37.33	53.17	64.85	54.56	67.43
2014	36.71	55.80	58.13	49.94	37.58	53.76	64.45	53.42	67.45
2015	37.77	57.81	59.01	48.54	37.16	52.68	64.47	52.97	67.48
2016	38.67	58.48	59.30	47.96	36.48	53.25	65.10	52.75	68.23
2017	38.54	57.93	59.02	47.55	35.29	52.87	65.01	52.27	68.34
2018	38.52	57.94	59.32	48.02	34.78	49.46	65.48	52.30	67.99
2019	39.25	57.79	60.29	48.55	36.00	50.38	64.81	52.39	67.8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并没有持续有效刺激国内消费,主要原因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刚性生活支出压力使得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及预防意识增强,从而导致国内居民整体储蓄率较高,消费信心欠缺。另外,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推进使得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改善,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2012年的6667.10元提高到2019年的13327.70元。然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20》数据,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8063.40元,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1倍。随着我国进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广大农村潜藏的巨大消费潜力也是振兴国内消费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综上所述,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是重中之重。而在这一过程中,减小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情绪焦虑、激发居民消费信心从而振兴国内消费是打通堵点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财政支出

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以及释放消费潜力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要充分发挥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就要充分关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投入与效能。

二、研究综述

近年来,财政支出及其对消费影响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一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作用。毕成(2020)^[1]通过TVP-VAR模型论证了财政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进而通过收入效应提升消费,而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及民生保障的加强会通过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蒙昱竹等(2021)^[2]将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提出政府财政支出在短期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在长期会推进城市化发展,进而对消费产生显著“挤入”作用,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而张晓芳(2020)^[3]则通过构建异质性消费的DSGE模型,提出财政支出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二是研究不同类别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王静雅、侯帅圻(2020)^[4]通过构建省级城乡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消费性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

影响,提出消费性政府支出对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并非必然的挤入或挤出,因此应对不同区域不同省份政府支出结构做出不同的优化调整。常文涛(2020)^[5]研究了包含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及保障性住房支出四项的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提出财政基础性公共服务支出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中存在中介效应。赵欢(2016)^[6]、沈梦颖和雷良海(2020)^[7]、杨越(2021)^[8]、景辛辛等(2018)^[9]从省域角度或区域角度研究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焦健(2017)^[10]、陆乃菁和叶金阳(2019)^[11]、张东玲等(2020)^[12]则从城乡消费差距的角度入手,研究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论证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的不同影响,提出应关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及地区分配比例。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时期,数据选取及研究方法的异同会使得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别。进入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深化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对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激发居民消费潜能,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一)关于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界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持续关注人民生存与发展需要,保民生、惠民生成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中心内容。关于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界定与分类,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在财政部关于2020年预算报告的解读中,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住房保障、残疾人扶持等作为民生领域的重要任务。安体富(2008)^[13]将财政支出中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就业、环保以及公共安全领域的支出定义为民生支出。姜扬(2019)^[14]对民生财政支出的界定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在综合借鉴政府有关工作报告及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界定为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由于从2007年起,我国对财政支出分类指标及口径进行了大幅调整,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及可比性,本文以2007年以后的财政支出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

(二)民生性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如图2所示,2007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为16453.90亿元,占同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3.05%,2007

至2019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及其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均具有较大幅度的提升。2012年,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增长到46304.54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上升至40.32%。2013年,该比例有所下降,但随后一直保持较快速度的上涨趋势,增长到2017年的38.52%。2018年该比例略有下降,但从2018年到2019年,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占全国财政支出比例又呈现出提升趋势。2019年,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达到38.65%,支出规模达到92317.87亿元。

如图3所示,从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项目来看,从2007到2019年,伴随国家经济增长及财政支出总额的提升,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额度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从比例上看,教育支出占比一直居于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之首,2012年达到16.87%,近年来虽略有下降,但基本维持在14%以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从2007至2012年有所下降,但从2012年起,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到2019年,该项比例已达到12.30%。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从2007年的4%提升到2019年的6.98%,在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居于第三大类。环境保护支出占比稳中有升,从2.32%提升到3.09%,目前已经成为民生性财政支出中的第四大类。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比一直稳定在1.70%左右,在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占比相对较小。

如表2所示,从国际上来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FS数据库同一统计口径下,2018年我国经济事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为22.70%,而同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经济事务支出基本维持在10%左右,说明现阶段我国财政经济事务支出比重仍然偏高,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依赖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亟待调整。2018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26.20%,加拿大、日本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达到30.20%与41.90%,美国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虽然为27.60%,但其市场化保障体系较为成熟,社会保障水平实际较高。有力的社会保障是增强居民消费信心的重要推动力,相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仍显不足。在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方面,日本、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均超过19%,同年我国该项支出比例为9.30%,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2012年以来,我国基本保证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不低于4%。2018年我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1.50%(上述统计口径下),高于同年美国、日本该项比重,体现了我国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另外,2018年,我国环境保护支出占

比为 2.40%，高于同年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在该项支出上的投入比重，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的

生态文明思想及绿色发展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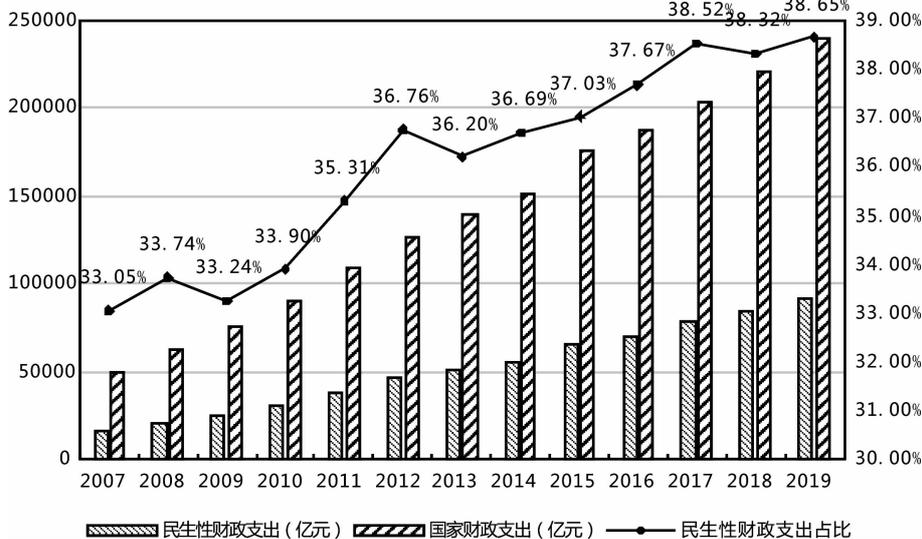


图2 2007—2019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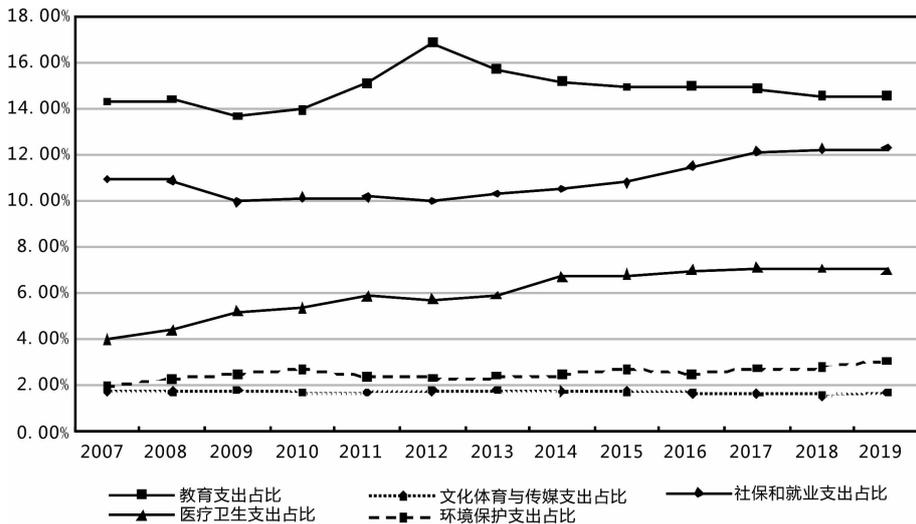


图3 2007—2019年我国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情况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表2 2018年部分国家部分财政支出项目占财政支出比例情况(单位：%)

项目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中国
经济事务支出	8.70	11.90	8.10	9.30	22.70
环境保护支出	1.50	2.30	2.00	2.90	2.40
健康支出	5.40	19.50	22.00	19.90	9.30
教育支出	9.00	15.10	12.90	8.10	11.50
社会保障支出	27.60	26.50	30.20	41.90	26.20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GFS 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 2007—2019 年我国全国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考察民生性

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在进行建模时，引入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引入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为减少多重共线性影响并消除量纲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做对数处理。另外，为探讨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本文在做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建模分析。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 C = \alpha_0 + \beta_0 \ln Edu + \beta_1 \ln Cul + \beta_2 \ln Sec + \beta_3 \ln Med + \beta_4 \ln Env + \varepsilon_1 \quad (1)$$

$$\ln City = \alpha_1 + \gamma_0 \ln Edu + \gamma_1 \ln Cul + \gamma_2 \ln Sec + \gamma_3 \ln Med + \gamma_4 \ln Env + \varepsilon_2 \quad (2)$$

$$\ln Rur = \alpha_2 + \delta_0 \ln Edu + \delta_1 \ln Cul + \delta_2 \ln Sec + \delta_3 \ln Med + \delta_4 \ln Env + \varepsilon_3 \quad (3)$$

其中, C 代表我国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City$ 代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Rur 代表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Edu 、 Cul 、 Sec 、 Med 、 Env 分别代表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及环境保护支出水平, α_m 为常数项, β_k 、 γ_k 、 δ_k 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参数, ε_n 为随机误差项。

2. 变量选取与说明

(1) 居民消费水平指标

综合考虑数据的真实性、可比性和连续性, 本文选取《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 2007 至 2019 年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居民消费水平衡量指标。

(2) 民生性财政支出指标

由于本文考察全国层面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因此, 本文主要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家财政支出数据中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 并用每年度各项支出分别除以该年度年末全国总人口得出各项支出的人均数, 作为衡量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指标。各个变量符号及其定义如表 3 所示。

表 3 计量模型各变量符号及其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ln C$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值
$\ln City$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值
$\ln Rur$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值
$\ln Edu$	人均教育支出的对数值
$\ln Cul$	人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的对数值
$\ln Sec$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对数值
$\ln Med$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对数值
$\ln Env$	人均环境保护支出的对数值

(二) 数据描述性统计

将 2007—2019 年各研究变量数据导入计量软件 Stata 中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执行命令“summarize”对所有变量的统计特征进行考察,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C$	13	9.443	0.383	8.794	9.979
$\ln City$	13	9.785	0.326	9.230	10.242
$\ln Rur$	13	8.876	0.436	8.171	0.498
$\ln Edu$	13	7.232	0.502	6.290	7.818
$\ln Cul$	13	5.089	0.460	4.220	5.676
$\ln Sec$	13	6.923	0.531	6.022	7.649
$\ln Med$	13	6.314	0.666	5.015	7.082
$\ln Env$	13	5.469	0.572	4.322	6.269

(三) 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通过利用 Stata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检验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Stata 软件多元回归结果

	$\ln C$	$Coef.$	$Robust St. Err.$	$t - value$	$p - value$	Sig
$\ln Edu$	-0.095	0.077	-1.23	0.258		
$\ln Cul$	0.352	0.136	2.59	0.036	**	*
$\ln Sec$	0.631	0.042	15.16	0	***	*
$\ln Med$	-0.047	0.088	-0.54	0.606		
$\ln Env$	-0.061	0.065	-0.94	0.381		
$Constant$	4.595	0.157	29.27	0	***	*
$R - squared$				0.999		
$F - test$				3140.20		
$Prob > F$				0.0000		

注: ***、**以及*分别代表 $p < 0.01$ 、 $p < 0.05$ 以及 $p < 0.1$ 。

1.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回归结果

为防止由于存在异方差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通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 OLS 回归。从表 5 中可以看出, 在回归模型中, $R^2 = 0.999$, 且检验模型显著性的 F 统计量的值高达 3140.20, 相应的 p 值 ($Prob > |F|$) 为 0.0000, 表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相关, 即印证了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存在的显著影响。

分项来看, 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从检验结果来看,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631, 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352, 在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而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2.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回归结果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通过利用 Stata 软件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检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 6、表 7 所示。

表 6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多元回归结果

	$\ln City$	$Coef.$	$Robust St. Err.$	$t - value$	$p - value$	Sig
$\ln Edu$	-0.079	0.065	-1.23	0.258		
$\ln Cul$	0.297	0.111	2.67	0.032	**	*
$\ln Sec$	0.534	0.033	16.32	0	***	*
$\ln Med$	-0.044	0.072	-0.61	0.559		
$\ln Env$	-0.042	0.051	-0.83	0.434		
$Constant$	5.661	0.128	44.24	0	***	*
$R - squared$				0.999		
$F - test$				4119.85		
$Prob > F$				0.0000		

注: ***、**以及*分别代表 $p < 0.01$ 、 $p < 0.05$ 以及 $p < 0.1$ 。

表7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多元回归结果

lnRur	Coef.	Robust St. Err.	t-value	p-value	Sig
lnEdu	-0.279	0.105	-2.67	0.032	**
lnCul	0.623	0.201	3.11	0.017	**
lnSec	0.924	0.060	15.32	0	***
lnMed	-0.130	0.124	-1.05	0.329	
lnEnv	-0.202	0.096	-2.11	0.073	*
Constant	3.257	0.221	14.76	0	***
R-squared			0.999		
F-test			2742.50		
Prob > F			0.0000		

注：***、**以及*分别代表 $p < 0.01$ 、 $p < 0.05$ 以及 $p < 0.1$ 。

为防止由于存在异方差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通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 OLS 回归。从表 6 中可以看出,在回归模型中, $R^2 = 0.999$,且检验模型显著性的 F 统计量的值高达 4119.85,相应的 p 值($Prob > |F|$)为 0.0000,表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相关,即印证了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存在的显著影响。

分项来看,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从检验结果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534,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297,在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而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前文,本文通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 OLS 回归。从表 7 中可以看出,在回归模型中, $R^2 = 0.999$,且检验模型显著性的 F 统计量的值为 2742.50,相应的 p 值($Prob > |F|$)为 0.0000,表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相关,即印证了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存在的显著影响。

分项来看,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教育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均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从检验结果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924,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623,在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279,在 5%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202,在 10%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医疗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运用 2007—2019 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考察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衡量了国家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根据计量模型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1. 从全国层面看,在我国各项主要民生性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主要包含了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就业补助、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最低生活保障以及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等。合理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能够有效增强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扫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影响充分体现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消费需要。

2. 从城乡差异的角度来看,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传媒与体育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支出、环境保护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作用不大,而教育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医疗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影响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路径铸就了中国发展奇迹,但在这一过程中,城乡发展速度及水平差距有所拉大,城乡居民收入消费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城乡协调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使得广大农村获得了更多发展机遇,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力度显著提升,有效改善了农村民生状况,也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而教育、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该两项支出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所致。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影响也说明了在乡村振兴新阶段,持续加大对农村居民民生事业财政投入力度、补齐农村民生短板的必要性。

(二) 政策建议

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点,而目前我国相对较低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也预示着未来我国在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方面存在的巨大空间。通过前文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本文认为,应从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投入力度、推进民生性财政支出向农村倾斜、补齐农村民

生短板以及加强民生性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等方面入手,提升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投入效能,进而发挥其在促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方面的作用。

1. 从国际范围来看,当前,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然偏低,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投入力度,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消除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进而有效激发消费潜力。具体来讲,首先,前文数据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投入比重仍然偏低,但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投入规模,提升养老保障水平及覆盖范围,增加就业补助,加强对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生活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促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其次,加大对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事业的投入力度,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文化旅游及体育生活需求,例如加大旅游景点、文化体育场馆等建设力度,为居民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休闲娱乐体验选择,从而释放国内文化旅游及体育休闲等方面隐藏的巨大消费潜力。最后,还应加大财政在医疗健康、教育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力度,有效扫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2. 实证结果表明,与城镇相比,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当前,我国应继续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倾斜力度。首先,增加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及就业补助,提高农村整体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改善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及收入预期,增强消费信心。其次,应继续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教育投入,积极促进教育支出在城乡间的公平分配。最后,要注重财政支出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农村的环境保护支出,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生存发展环境,激发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从而激发消费潜力。

3. 当前,我国财政收支矛盾及财政可持续问题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尽可能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及比例的同时,也要聚焦民生性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一方面,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改善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与传媒及环境保护等领域间的支出比例,对标居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从而提高资金支出的有效性,更好发挥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预算编制及绩效管理,以城乡居民的现实发展需求及科学发展规律作

为支出预算的编制依据,并制定明确可行的预算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强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绩效考核力度,有效提高资金支出效率,切实发挥其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毕成. 消费信贷、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 TVP-VAR 模型[J]. 商业经济研究,2020(23):163-168.
- [2] 蒙昱竹,李波,潘文富. 财政支出、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对扩大内需的再思考[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1,23(1):10-23.
- [3] 张晓芳. 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及消费的效应研究:基于异质性消费的 DSGE 模型[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41(4):7-15.
- [4] 王静雅,侯帅圻. 我国消费性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基于省级城乡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5):31-41.
- [5] 常文涛. 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效应检验[J]. 学习与探索,2020(3):103-110.
- [6] 赵欢. 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以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以及农业补贴为例[J]. 金融经济,2016(8):23-25.
- [7] 沈梦颖,雷良海. 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泛珠三角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2020(34):58-60.
- [8] 杨越. 财政民生性支出对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 投资与合作,2021(1):78-79.
- [9] 景辛辛,章晟,辛冲冲. 民生性财政支出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动态驱动效应研究:基于 LMDI 模型的再检验[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6):132-141.
- [10] 焦健. 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7,33(4):43-50.
- [11] 陆乃菁,叶金阳. 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 中国财政,2019(22):70-73.
- [12] 张东玲,范伟丽,陈景帅. 民生性财政支出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的视角[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3(5):37-46.
- [13] 安体富. 民生财政: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转折[J]. 地方财政研究,2008(5):4-8.
- [14] 姜扬. 地方政府质量与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J]. 中国行政管理,2019(3):133-13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下转第 49 页)

销售转型视角下食品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分析

——以“好想你”并购“百草味”为例

窦伟,李珂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金融与会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好想你”并购“百草味”为例,阐述并购动因理论和绩效评价方法的相关理论。结合并购前企业资源互补及市场优势进行并购动因分析,并购完成后结合双方实际的发展情况及销售渠道的融合进行并购的效应分析,得出本次并购在经济方面是成功的,能够明显改善公司的短期绩效并帮助并购方摆脱财务困境。但是,在战略转型方面不能算是成功,没有很好地利用资源互补来拓宽并购方的线上销售市场。总体来说,此类并购活动不仅需要企业关注新渠道下产生的机遇,还需要双方做好整合工作防范整合所带来的风险,才能有效保证并购的成功。

关键词:企业并购;销售转型;财务指标法;非财务指标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06

中图分类号:F271.4;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36-06

一、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食品消费市场迎来了新的变化,食品行业也进入了新的升级和优化阶段。传统的食品行业面临着销售转型,急需解决在当前销售环境下实现销售渠道多样化、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升级问题。但是,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企业的优化和升级往往面临着资源配置困难的问题。因此,通过并购整合相关资源,实现销售转型成为增强企业实力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选择之一。

并购经常发生在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中,为了实现一方或者双方的结构的调整,资源的优化配置而采取的一个经济决策。并购不但会对并购各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对行业所属领域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从食品零售企业并购情况来看,自2014年以来,随着我国食品零售企业在线上网店和线下实体店销售双渠道发展的兴起,引发了线上销售和线下实体店企业之间的并购浪潮,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公司并购可以快速实现双渠道销售模式的建设。传统食品零售公司也经常以整合资源为目的进行收购,因此在多种动因的作用下,传统食品零售业已进入

并购和整合时期。

陈爱贞^[1]认为,并购作为企业之间重组资源的重要方式,是企业成长与创新的重要手段。林伟^[2]认为,由于现在受线上网购和线下零售结合的影响,传统零售业的繁荣有所减弱,增长率也放慢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并购重组与资源互补已成为传统零售业保持其增长,使其迅速发展并在已有业态基础上发展新兴业态的公认法则之一。曹翠珍、吴生瀛^[3]认为,在企业并购初期,较高的盈利能力和负债能力有利于实现财务协同效应并提高企业整体的实力;相关并购比不相关的并购更容易实现协同效应。李倩^[4]认为,基于企业内部结构的角度,并购协同效应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内部各种要素的优化和整合。Panayiotis C. Andreou等^[5]认为,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是并购双方选择并购最重要的动机。Kim J.^[6]认为,企业选择进行并购活动的主要因素是并购各方通过并购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优势互补,进而提升并购后企业的整体价值。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自身的发展特性对于并购动因方面进行了研究,虽然与国外学者的观点略有不同,但是基本上也认为并购的初衷就是为了提升公

收稿日期:2021-12-08

作者简介:窦伟(1974—),女,河南商丘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金融与会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司治理、内部控制。

司价值、提高经营业绩。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并购绩效评价方法大致相同,都认为企业并购可能只会给企业带来短期的财富收益,不排除某些年财务绩效会出现负增长的可能。目前理论界针对传统食品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分析的理论很少,还没有有足够的案例分析来支持传统食品企业的并购理论,对传统食品企业并购的资源整合还没有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实际操作上缺乏有效指导。本文通过对传统食品企业在销售转型视角下的并购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传统食品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的提升路径,促进我国传统食品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问题的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对传统食品企业在新的消费需求的背景下通过并购实现销售转型时提供参考。

二、企业并购动因及效应相关理论

(一) 多元化经营理论

多元化经营理论是指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该公司用于其产品与行业之间的商业策略。具体的实施方案分为以下三种:首先,该公司使用其目前拥有的生产技术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制造原有产品的技术和制造新产品的技术具有相似性但是使用方式却不一样。其次,公司通过技术升级来创新产品并将其销售给原有的客户群体,其主要优点是通过原有产品的销售关系出售一个全新的产品。最后,公司实施整体多元化的经营方式并通过大量的资金去开拓与原有产品无关的市场。

(二) 市场优势理论

市场优势理论是指在其所属行业内某公司越处于重要地位,企业的人才储备、管理体制、生产技术、销售渠道则越完善,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就越大。在这种市场优势理论的推动下,行业内并购也成为公司发展战略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根据市场竞争法则,同一领域中优势企业并购劣势企业可以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同时还给行业内的新兴力量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企业通过并购同行业中的其他公司,会在占领被并购方市场份额的同时,增强自身对市场的管控力,通过产品价格的提升来增加其超额收益。

(三) 企业并购效应理论

企业并购的主要动机是获取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包括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是指公司在并购完成后其经营效率的提高。它基本通过经营和生产呈现出来。一是在经营方面,通过并购活动公司可以融合被并购方的优质资源以提升自身产品在行业领域内的竞争优势,减少期间成本并改善公司的业务绩效。二是在生产方面,公司选择用并购来达到扩大生产规模,压

缩生产成本,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市场占有率并进一步提高利润空间。

财务协同效应是指通过并购使业务量增多带来更高的财务收益。并购双方之间的营运资本和资本营运机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并购后可以优化其营运资本,不仅可以为公司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可以减少资本需求,降低企业战略规划的成本。

管理协同效应是指并购完成后,并购方可以充分利用并购各方在本领域的原有品牌和优势,在组织和管理上尽可能地达到相互补充的目的,最终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标。因此,并购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被并购企业的优势,并购后积极地吸收和利用它们,以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技能,最终实现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 企业并购评价方法

1. 财务指标法

财务指标方法,主要是通过比较和分析企业实行并购前后各项财务指标的变化,来评价并购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主要包括发展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这三个指标。关于财务指标的选择,国内外学者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只需选择少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对企业并购完成后的绩效进行分析;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需要选择更多的指标来分析。

2. 非财务指标法

非财务指标法与上述的评估方法不一样,它很难通过财务数据对其进行量化的衡量,并且通常面向未来,例如研发新产品,建立市场份额。这些度量标准迫使公司提供充足的人力和精力,并且当这些指标完成时,企业的运营绩效将得到显著改善。当前最常用的非财务指标主要包括公司的潜在发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这些指标通常可以促使管理层提升企业的整体绩效。

三、“好想你”并购“百草味”的动因分析

(一) 企业资源互补动因分析

“好想你”可以说是全国红枣产业领域的领导者,并购之前它主要针对中高端消费者的线下零售商店市场,销售的产品也相对单一。“百草味”属于一个年轻化的电子商务品牌,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其产品主要是休闲零食。因此,并购双方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互补的:“百草味”并入“好想你”将有助于增加并购方的品牌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影响力,并扩大其营销渠道;“百草味”还将利用“好想你”的资金链和线下零售渠道来实现更好和更快的发展。此外,并购后双方可以相互学习最佳的管理经验,以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能力。

1. 品牌互补

“好想你”在红枣领域成了红枣品牌的倡导者和开拓者,快速占据了消费者的消费资源。“百草味”在中国休闲零食领域打造成电商品牌第一名,在食品零售行业的电商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有着突出的品牌效应和优势。合并后,并购方将与被并购方产生良好的互补作用,通过其品牌效应有效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电商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并购后企业的产品更加丰富,进一步提高并购后企业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为树立行业内优秀的健康零食品牌确立稳固的基础,增强与别的企业相互竞争的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好想你”这个红枣品牌在我国市场中的地位。

2. 渠道互补

“好想你”在线下拥有 1200 余家专卖店,KA 商超系统渠道覆盖的完成率达到 90% 以上,可以看出“好想你”的线下专卖店的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原有的销售模式已经进入了瓶颈期;而“好想你”在互联网销售渠道的拓展中,由于其自身品牌线上的影响力有限,加上较为单一的产品品种,致使“好想你”线上销售的开展遇到许多问题。“好想你”通过并购“百草味”,可以利用其丰富的产品线以及在线上销售的品牌影响力,实现销售渠道的互补,与其他企业开展差异化的竞争。

3. 产品互补

目前“好想你”通过在其领域内产品线的不断增加及加工技术的不断创新,红枣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达到 200 多种。作为倡导电商渠道并进行实践的“百草味”,拥有多元化的产品类别。2016 年,“好想你”计划从红枣健康休闲零食向全类别休闲零食转变,通过并购“百草味”并利用“百草味”丰富的产品线提高自身在红枣销售领域中的竞争力,而“百草味”多元化的产品类别可丰富“好想你”的实体店的产品类型,从而实现双方的产品互补。

4. 消费者互补

“好想你”产品能够覆盖广泛的人群,其消费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和白领阶层。而“百草味”主打的是电商休闲零食,其消费人群主要是消费观念更新潮的青年人。

5. 区位互补

“好想你”扎根于原产地河南新郑并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但中原地区依旧是主要的销售地区。“百草味”起源于杭州,在华东地区盛行,而江苏和浙江地区则是其主要市场。

6. 产业链互补

“好想你”的整个产业链系统是从材料的采购

与储存,到研发与生产及实体店的销售共同组成。合并前的“百草味”主要是电商平台的销售。此外,“好想你”与“百草味”联合进行战略转型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二) 企业市场优势动因分析

1. 人力资源情况

人力资源是指在公司运营和开发过程中录用的各种人才,其知识能力将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和回报的资源。公司通过增强人力资源管理,以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并购后“好想你”将继续进行人力资源的整合。并购初期“百草味”管理层动员双方进行人事调动,财务总监由并购方任命,使双方能够充分发挥人才互补的优势,完善更广泛的人才储备体系,以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发展需求。作为中国红枣领域的龙头企业“好想你”对员工的能力和素质有更严格的要求。本文根据其并购前后的年度报告对所属员工受教育情况,对公司的贡献情况及专业人员的构成,更直观地分析“好想你”的未来发展潜力。

根据表 1 和表 3 可以看出,并购后“好想你”一方面吸收了“百草味”的大量后备人才,使得 2017 年的员工人数较 2015 年增长 22.7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和技术人员,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相反销售人员的数量却在不断下降。主要原因是并购完成后其销售渠道的变化,从单一的线下实体店渠道到线上线双渠道同时销售的新模式。另一方面从表 2 可以看出,在并购后的两年中其员工的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并且员工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创造收益增长幅度变大。其中 2017 年人均创造收益是 2014 年的约 3 倍,人均员工利润达到上市以来的最高值。这说明并购使“好想你”集中了人力资源,并提出了有效的整合措施。

表 1 “好想你”2014—2017 年员工受教育情况 单位:人

	2014	2015	2016	2017
本科	336	466	732	769
专科	1887	1655	1056	1046
其他学历	1301	1767	2475	2958
员工总人数	3524	3888	4263	4773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表 2 “好想你”2014—2017 年员工对企业的贡献情况 单位:万元

	2014	2015	2016	2017
员工薪酬	21161	24638.38	28774.18	36740.25
人均薪酬	6.01	6.34	6.75	7.7
人均创收	27.61	28.63	48.6	85.28
人均创利	1.52	-0.08	0.92	2.24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表3 “好想你”2014—2017年员工专业构成情况 单位:人

	2014	2015	2016	2017
生产	1575	1191	2082	2529
销售	1163	2151	1602	1480
技术	194	166	266	302
财务	91	86	122	129
行政	422	294	191	333
其他	79			
合计	3524	3888	4263	4773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2. 技术创新情况

技术创新能力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衡量企业未来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假如一家公司继续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尽管效果在短时期内不显著,未来也将具有不错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假设公司一直不进行技术的创新,那其未来的发展将很不乐观。“好想你”一向非常重视自己产品创新,在红枣市场低迷的背景下,它还积极开发和创新红枣有关的新产品,使得它在这个领域中一直位居首位。并购后,它从未减少对产品的研发及创新,并不断提高其产品质量,以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并购后“好想你”非常重视研发技术人员的培养,在并购初期的两年里其研发人员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在研发支出方面,尽管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近几年有所下滑,但其研发支出的金额在并购后的2016和2017年环比上涨。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并购完成后“好想你”的营业收入有了大幅提升造成的。

表4 “好想你”2014—2017年研发人员结构

	2014	2015	2016	2017
研发人员(人)	194	166	266	302
员工总人数(人)	3524	3888	4263	4773
占总数的比例(%)	5.51	4.27	6.24	6.33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表5 “好想你”2014—2017年研发支出占比

	2014	2015	2016	2017
研发支出(万元)	1711.69	2221.8	2133.21	2658.29
营业收入(万元)	97292.4	111305.03	207183.2	407044.97
占营业收入比例(%)	1.76	2.00	1.03	0.65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三)“好想你”并购“百草味”的效应分析

为了更好地说明此并购对“好想你”的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从并购的动因出发,以协同效应的角度对比分析相关财务指标。协同效应理论主要探讨公司是否可以在并购后获得被并购方的部分资源,以及并购后在经营、管理和财务等方面是否都能产生“1+1>2”的积极作用。

1. 经营协同效应分析

从2012到2015年,“好想你”的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长迟缓,但在2016年完成并购后其两者的增长率比并购前分别高出1/10和1/3。这也是“好

想你”自公开上市以来的最大涨幅。在并购后的近两年中,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的规模并未显示出特别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大致看出,通过此次收购“好想你”达到了扩大自身经营规模的目的。收购之后,并购方终于改变了业绩下滑的局面,经营效益也在逐步恢复。

一方面在被并购后“百草味”的净利润连续两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17年其净利润接近9800万元。同时也完成了给“好想你”的业绩承诺。另一方面“百草味”是2018年唯一获得“消费者最喜爱中国自主品牌”的荣誉称号的全类别休闲零食品牌。由于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加速了它的战略转型。综上所述,“好想你”此次并购不仅扩大了业务范围,增加了净利润,还给“好想你”带来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2. 财务协同效应分析

(1) 营运能力分析

如表6所示,公司并购后应收账款周转率上升的趋势明显较2014年增长53.67%。尽管2019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并购前,表明收购完成后公司营业额迅速增长,应收账款的流动性变得越来越强,资产管理能力也有所改善,存货周转率比2014年增加近3倍,表明库存管理水平与并购前相比有了不错的改善。由于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的不断提升,可以明显看出其周转率在稳步提升。总资产周转率小幅上升说明公司所有资产周转效率略有提高。基于以上分析,并购“百草味”提高了“好想你”的营运能力。

表6 营运能力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7.08	6.45	7.79	11.61	12.05	10.88
存货周转率(次)	1.20	1.42	1.85	2.55	2.98	2.89
固定资产周转率(次)	2.33	2.03	2.44	3.59	4.14	3.39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1	0.48	0.56	0.80	0.93	0.72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2) 发展能力分析

从表7可以看出,在并购的前两年“好想你”的净利润呈负增长。企业在2016年将“百草味”纳入合并报表后,净利润增长率上升至13.15%。营业收入增长率在并购初期突然升高,虽然后期增速放缓,但总体来说仍比并购前要好。此次并购活动弥补不足,使得并购方在规模、销售渠道及品牌影响力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营业利润和收入也大幅上涨,未来具有较好的发展趋势。综上所述,“好想你”在完成并购后发展能力大大提高。

表7 发展能力指标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净利润增长率(%)	-0.47	-1.06	13.15	1.49	0.12	0.36
营业收入增长率(%)	0.07	0.14	0.86	0.96	0.22	0.13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3) 偿债能力分析

从表8得知,并购于2016年完成,并购完成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流动比率的下降幅度远大于速动比率的下降幅度,说明其存货的库存量大幅减少,存货周转率大幅提升。从“好想你”的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来看,并购后的2016和2017年是下降的趋势,表明“好想你”具有的长期偿债能力是增加的,财务结构也更加稳定。2018年和2019年有上升趋势,其中有公司大量回购股份的原因,但其财务杠杆在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

表8 偿债能力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流动比率	3.32	2.30	2.00	1.75	1.43	1.27
速动比率	1.37	1.41	1.07	0.94	0.77	0.89
资产负债率	0.38	0.42	0.37	0.36	0.40	0.41
产权比率	0.60	0.72	0.58	0.57	0.66	0.70

数据来源:“好想你”年度报告整理得出

(三) 管理协同效应分析

管理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企业的并购行为能够扩大企业的规模,实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而这对其自身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并购之前两家公司核心业务的销售渠道并不一样,“好想你”是“专卖+超市”的实体店销售模式,而“百草味”则是单一互联网销售模式。并购完成后希望双方能够资源互补,对于“好想你”的管理有了更高的要求。受到新的发展战略的影响,重新调整品牌定位,实行“好想你”和“百草味”双重品牌的运营模式。其中“好想你”侧重于高端健康食品,“百草味”更侧重于健康休闲食品。自上市以来,“好想你”在枣类相关产品上拥有相对独特的线下销售渠道,随着这种销售模式的弊端的出现,也逐渐意识到了线上线下双渠道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并不断投入人力和财力来扩大其线上销售渠道的建设。但是由于缺乏在线销售模式的管理经验,“好想你”互联网的销售市场没有完全打开。并购前的“好想你”也尝试推出更多价格亲民的产品,并且着重发展商超渠道,但未能改变利润下滑的局面,2015年甚至出现了300万元的亏损。本次并购“好想你”希望通过“百草味”多年的互联网销售经验,为并购方打开线上销售市场,收购“百草味”改变了其持续下滑业绩局面。但是根据“好想你”年报数据可知“百草味”的营业收入增速从2017至2019年呈现下滑的趋势,同时“好想你”的营业收入增速也不断放缓。这三年中“好想你”红枣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在总营收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百草味”营业收入占比虽呈上升趋势,但营业收入增速却有所下降,说明并购后双方业务没有完成良好的融合,使得“百草味”和“好想你”两者的

业务相互独立,线下渠道的仓库也没有进行融合,导致并购所带来的线上流量红利消失。一方面是线上资源融合状态不佳,另一方面是“好想你”在积极拓宽主体的业务,新业务的拓展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需要“好想你”的管理层对未来发展做出抉择。

最终在2020年,“好想你”向百事饮料(香港)有限公司出售“百草味”100%股权,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企业价值为7.05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接近50亿元人民币。管理层这一抉择使得“好想你”在出售“百草味”之后获得的投资收益为35.9亿元,对净利润的影响为23亿元,同时获得40亿元现金流量。而资产负债率由47.08%下降至7.28%。财务费用由1852.52万元的利息净支出调整至1.29亿元的利息净收入。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并购后的融合发展,但出售依然是目前财务状态下最好的抉择。

四、“好想你”并购“百草味”的启示

(一) 关注新渠道下产生的机遇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调整期。同时互联网公司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传统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务院根据这一新情况发布了《中国制造业2025》,迫使传统行业考虑转型和升级,促进传统企业良好发展。近年来,国家鼓励发展“互联网+”的创新应用,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互联网+”发展的措施。它为传统企业的转型打开了可能性,而传统企业的转型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轻松获得投资,这使得传统行业更有动力去实现转型和升级。因此,企业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和导向,把握市场的发展趋势,才能充分享受国家政策的红利,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新的整合形式,使消费者拥有了方便顺畅的线上消费体验。消费者的升级,技术的更新迭代使得互联网的发展有更大的空间。打破传统的商业模式实现线上和线下销售渠道的融合是传统食品企业的不二选择,进而以新渠道的资源寻找该领域的新进展。当今社会互联网消费已成为必然趋势。对食品企业来说线上和线下消费并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互相补充,线上销售模式可以扩大零售的覆盖范围,同时线下实体店可以吸引更多的线上流量,线上线下相互依存互相补充,成为消费模式的两个支柱。从中长期来看,加速消费升级的趋势要求销售渠道更加有效,并能够迅速捕捉并响应消费者偏好的改变。

“好想你”在2016年以9.6亿元收购了“百草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借助“百草味”在食品市场上的经营方式及其品牌影响力来帮助“好想你”拓宽线上销售的渠道,实现其渠道整合发展模

式。从上文对并购之后的财务和非财务指标分析来看,在并购完成前,“好想你”的业绩一直在下降,甚至有些年度的净利润是负数。并购完成后“好想你”的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其市场份额也在逐年增加。此外并购完成后,其线上市场进一步打开,大大改善了其年度经营业绩,并对其财务业绩和销售战略转型规划产生积极影响。

(二)做好整合工作防范整合风险

从“好想你”发布的2020年半年报中可以看出其完成了净利润22.5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6倍,令人震惊的是受疫情影响其业绩仍保持上升趋势。相反“好想你”的非净利润亏损高达8300多万元,比去年下降2倍;营业收入虽然接近25亿元,却比上一年下降了1/8;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减少一半。或许这才是其选择出售“百草味”背后的真正原因。此时“好想你”表示其在完成“百草味”母公司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出售事项后,导致其在近五个月的营业收入和非净利润的数据有所下降。此外“好想你”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因疫情的因素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售使“好想你”获得了近23亿元的净利润。综合这些来看,“百草味”的出售使其获得了丰厚的财务回报以

及应对未来发展的充裕资金。可以说“好想你”并购“百草味”虽然没有完成最终的整合效应,但出售“百草味”却是“好想你”应对整合风险作出的最佳选择。“好想你”未来发展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 [1] 陈爱贞. 企业并购的行业创新效应与产业创新发展[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0, 57(5): 23-36.
- [2] 林伟. 零售行业并购案例研究[J]. 财经界, 2019(35): 59-61.
- [3] 曹翠珍, 吴生瀛. 企业并购的财务协同效应实证分析[J]. 会计之友, 2017(24): 35-39.
- [4] 李倩. 企业并购协同效应及其案例研究[J].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20(1): 14-15.
- [5] Panayiotis C Andreou, Christodoulos Louca, Photis M Panayides. Valuation Effect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Freight Transportation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2012, 48(6): 1221-1234.
- [6] Kim J. Synergy Effect of M&A Heterogeneity and Alliance Homogeneity on Stock Market [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ciences, 201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 and Effect of Food Enterprise 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les Transformation

——Take “Haoxiangni” M&A “Be&Cheery” as an Example

DOU Wei, LI Ke

(Schoo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Haoxiangni” and “Be&Cheery” as an example, and introduces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M&A motivations and corporate M&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tivation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ased on the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and market advantages of the enterprise before the merger. After the merger is completed, the actu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both part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ales channel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conclude that the merger is economically successful. 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mpany’s short-term performance and help the acquirer to get rid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However, it cannot be regarded as a success in terms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it has not made good use of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to broaden the online sales market of the acquirer. In general, the research on this type of M&A activity not only requires compani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new channels, but also requires both parties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integration work to prevent the risks brought by the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merger.

Key words: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ales transformation; financial indicator method; non-financial indicator method

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财务评价与蛛网重构

李梦旭

(安徽新华学院 财会与金融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摘要: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及其决定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全球化意义重大,利用跨国化指数从财务角度测量2002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并重构8因素蛛网模型,进一步探讨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及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自2002年以来快速提升,目前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受到多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其中政策因素是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企业生命阶段和资产管理能力是最主要的内部影响因素,而创新能力也非常重要。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财务评价;蛛网模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07

中图分类号:F279.23;F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42-08

一、文献综述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通过整合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其他国际市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提高商品销售数量,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而企业国际化水平是指企业在本国经营范围以外,进入国际其他市场进行生产、销售、管理等活动所达到的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其国际化水平是我国社会经济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其国际化水平影响因素能够直接反映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相关因素和问题。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不再是单纯的以商品和物质为媒介的经济全球化,而是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企业不能再单单从企业内部资源开始创新活动,而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获得利益的创新资源。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活动将分散在全球范围的各种创新资源搜集到一起,开展更加高效的技术创新。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弱势,这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无法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进行,我国企业要抓住这一机遇,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以

全球化视野谋求新发展,实现更高的经济利益,而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自然是责无旁贷。

目前理论界已经有不少学者在企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 Mac(2004)、Luo(2007)、吴先明(2020)等学者在企业国际化动因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1-3],邱景(2009)、曹朝晖(2015)、Matteo(2015)等学者利用多种方法对企业国际化水平进行了评价^[4-6],杜义飞(2018)、Pradeep(2020)等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及新经济体的国际化进行了理论分析^[7-8]。而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的研究很少,部分学者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但对于影响因素的归纳也不够全面,大多学者只是从某一方面或少数几方面研究了影响国有企业国际化的因素,比如王益民等(2020)研究了企业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9],Funk等(2020)研究了可获得资源及资源管理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10],侯治平等(2020)研究了研发投入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11]。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利用财务评价法和蛛网模型评价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探讨各方面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我国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参考。

收稿日期:2021-10-10

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2019jyxm0495);安徽新华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2018jy023);安徽新华学院教学方法改革示范课程项目(2019jgkcx05)

作者简介:李梦旭(1987—),女,安徽阜阳人,硕士,安徽新华学院财会与金融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财务与国际化。

二、研究设计

(一) 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方法选择

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评价提出了比较多的方法,比如 Andrew 等(1999)、Farok 等(200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提出的基于各种财务指标计算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财务评价法^[12-13], Daniel(1994)、鲁桐(2001)、李朝明(2007)等学者提出的基于各种影响因素的蛛网模型法等^[14-16]。财务数据是企业发展状态的最直接体现,利用各种财务数据评价企业国际化水平可以更直观地展示企业国际化状态。然而,企业的国际化是在各种宏观微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经济活动,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应该将各种宏观微观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应该尽可能地多方面进行衡量。本文选择国际认可度比较高的财务评价法中的跨国化指数和国内认可度比较高的蛛网模型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进行衡量。其原因在于:

(1) 国内外接受度较高的方法相结合可以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避免单一方法评价结果偏差过大现象。

(2) 将这两种方法相结合,不但能够将决定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财务、人才等各种内部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还考虑到了政策、市场等外部因素,使得本文研究结论可信度更高,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判定也更加全面。

(3) 二者所涵盖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继承性。跨国化指数主要从财务因素角度评价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而蛛网模型既包括相关财务因素,同时还包括人才、融资、市场等多方面因素。

(二) 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方法

1. 财务评价:跨国化指数

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的跨国化指数是目前国际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国际化水平评价方法之一,主要是利用国外资产量、国外销售量、国外员工数等企业主要海外经营成果占企业整体经营成果的比重来反映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TNI_i = \left(\frac{Fasset_i}{Tasset_i} + \frac{Fsale_i}{Tsale_i} + \frac{Fstaff_i}{Tstaff_i} \right) \times 100\% \quad (1)$$

式中, TNI_i 表示企业 i 的跨国化指数,此指标数值越高则表示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 $Fasset_i$ 和 $Tasset_i$ 分别为企业 i 的国外资产和总资产, $Fsale_i$ 和 $Tsale_i$ 分别为企业 i 的国外销售额和总销售额, $Fstaff_i$ 和 $Tstaff_i$ 分别为企业 i 的海外员工数和总员工数。

2. 蛛网重构:8 因素蛛网模型

鲁桐(2001)提出的 6 因素模型和李朝明

(2007)提出的 n 因素蛛网模型是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企业国际化问题过程中使用比较多的蛛网模型,二者将若干个影响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因素融入评价体系,综合考量了多因素对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但可以发现,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提出的蛛网模型中体现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因素不够全面,均为企业内部相关因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因是根本力量,但外因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及浓厚的行政性,来自企业外部的政府政策和市场因素对其国际化水平的作用不可忽视^[22-23]。所以,本文综合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的研究,在蛛网模型中增加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两个外部因素,重新构建更适合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 8 因素蛛网模型。同时借鉴王治(2010)、Wu(2019)、Sergio(2019)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原蛛网模型中的部分因素进行调整,比如将海外人力资源能力调整为包括中方人力资源管理和海外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以尽量全面地评价企业内部因素对国际化水平的贡献^[24-26]。重构的 8 因素蛛网模型中各因素的选取及打分标准分别为:

(1) 企业生命阶段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在不同生命阶段所表现出的发展战略及扩张速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其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不同生命阶段所表现出的对外扩张诉求以及扩张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初创期阶段的国有企业的主要诉求是生存下来,企业整体实力有限,在国际市场上扩张的能力较低。成长期或成熟期阶段的国有企业,会因为较强的整体实力而表现出较强的扩张欲望,此时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提升较快^[27]。而当国有企业进入衰退期后,其整体实力及业务范围都处于收缩状态,即使之前的国际化水平较高,但此时也会快速下降。根据国有企业不同生命阶段对其国际化水平的评分标准如表 1 所示。

表 1 企业生命阶段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1	企业处于初创期或衰退期
2	企业处于快速成长阶段或者存在国际战略
3	企业开始积极出口
4	企业处于成熟期
5	本地国际化阶段

(2) 资产管理能力

资产管理能力关系到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较强的资产管理能力能够使得企业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得较高的收益,是企业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主要体现,

也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部驱动因素。资产管理能力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多渠道释放,根据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的研究,可以用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体现资产管理能力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表2)。

表2 资产管理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1	其他
2	企业的季度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比较稳定
3	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大于2
4	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大于2
5	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大于2且应收账款周转率大于2

(3) 创新能力

创新是企业获取生存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创新能够带给企业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效率的经营手段,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抢占市场份额的最主要途径。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来说,国际市场竞争对手多而复杂,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也更高,及时且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及竞争对手情况对于其国际化至关重要,所以根据竞争对手及市场需求情况进行创新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而国有企业的创新不仅仅是产品技术、生产工艺的创新,在服务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也是其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本文参考 Joao(2012)^[28] 和李东阳(2018)^[29] 等学者的研究,从生产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评分(表3)。

表3 创新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1	企业在信息收集能力上具备明显优势
2	企业的售后服务技术较强
3	企业的管理技术较强
4	企业的生产技术优势明显
5	品牌和质量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4) 融资能力

融资能力也是衡量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一个内容,不同的学者对其的衡量方式和衡量的替代指标也不尽相同。根据鲁桐(2001)和李朝明(2007)的研究成果,企业资产的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是企业融资能力的主要衡量标准,同时根据目前我国企业资产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的一般水平,将流动比率为2以及资产负债率为20%作为门限值对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行打分(表4)。

表4 融资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1	其他
2	企业资产的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稳定
3	企业资产的流动比率大于2
4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于20%
5	企业资产流动比率大于2且资产负债率大于20%

(5)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一家企业中员工的质量以及对其的利用效率是企业自身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国有企业对中方人才招聘、培养能力、人才利用效率等方面的重视程度进行赋值以体现其中方人力资源管理能力^[30]。能够雇佣到海外国家或地区当地的人才以及具有国际化能力的人才也是体现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内容^[31]。以企业能否雇佣到足量、高质的海外人才、有无长期海外人力资源政策为主要依据对企业海外人力资源能力进行打分(表5)。

表5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1	中方和海外员工数量能够满足企业日常运营
2	员工学历及技术水平是招聘的硬性条件
3	存在长期的高层次、高水平的海内外人才引进战略
4	能根据需要随时对海内外人才进行培训
5	随时有足量、高质的中方或海外员工派往相应岗位

(6) 全球布局能力

国有企业的分支公司、销售网点、科研机构等在海外的布局状况是企业国际化水平最直接的表现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在海外设立的分支公司、销售网点、科研机构等数量状况、分布的地区、密度状况等都是企业海外布局能力的一个体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2]。所以,全球布局能力深刻影响着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根据企业在海外拥有的机构的种类、数量为主要依据对国有企业的全球布局能力进行赋值(表6)。

表6 全球布局能力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1	企业在海外没有相关直属或派遣机构
2	有少量海外机构
3	海外机构数量较多且种类齐全
4	海外机构以产品研发为主要业务
5	海外机构数量多且以销售网点、生产中心为主

(7) 政策因素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主体,其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国有企业“走出去”、实现更深远的发展是政府部门所期望的^[24]。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依靠自身力量非常重要,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也必不可少。作为国家资产,政府部门有责任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国有企业国际化,同时也有必要通过扶持政策帮助国有企业更好、更快地走向国际市场,以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同时,行政色彩是国有企业区别于非国有企业的主要特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很大程度

上要服从相关监管部门的政策安排,尤其是像进行国际化这样的战略性经营策略,如果没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则其国际化进程很难得到显著的突破,甚至是不能开展国际化业务^[32]。借鉴白胜玲(2009)^[33]、Matteo(2018)^[6]、王绛(2020)^[34]等学者的研究,从表7中的5个方面对政策因素打分。

表7 政策因素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1	国家政策不作为
2	存在一定力度的支持政策
3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4	国家政策大力支持
5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大,且在相关领域的支持政策种类多

(8) 市场因素

市场环境是企业产品市场销售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市场环境可以给国有企业提供宽松的国际化渠道。国有企业在走向国际过程中,若国际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市场进入门槛过高,则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以及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均会受到限制。我国出口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优势一直是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在此方面是国有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有利条件。参考孙光慧(2003)^[35]、王治(2010)^[24]、杜义飞(2016)^[7]等学者的研究,市场因素的评分标准见表8。

表8 市场因素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内容
1	国际市场没有明显进入壁垒
2	国际市场未完全饱和
3	产品或服务价格存在一定优势
4	产品或服务价格存在明显优势
5	国际市场存在明显空白

将各因素分值标在相应的坐标轴上,用直线将各个坐标轴上的点连在一起即可围成一个多边形,此图形即为蛛网模型(图1),图中多边形面积占其可达到最大面积的比重即为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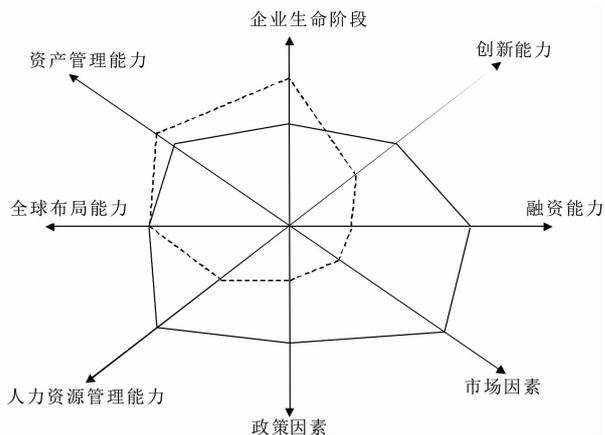


图1 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8因素蛛网模型

运用三角函数计算蛛网模型中多边形的面积,假设各因素的取值为 $X_1, X_2, X_3, \dots, X_8$,即为图1中自“企

业生命阶段”轴顺时针数各轴三角形的边长, S 为各三角形面积,则8因素蛛网模型中多边形的面积为:

$$S = \frac{1}{2} \sin\left(\frac{2\pi}{8}\right) \left[\sum_{i=1}^7 (X_i X_{i+1} + \dots + X_8 X_1) \right] \quad (2)$$

三、计算与分析

(一) 样本选择

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WTO,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国家号召下,国有企业纷纷选择“走出去”,自此,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出现了质的改变,所以,本文以2002年为时间界限选择样本国有企业。具体样本的选择条件为:

(1) 在A股挂牌交易;

(2) 2002年以后不存在超过1年及以上的停牌现象;

(3) 2002年以后不存在重大经营事故和违法现象(证监会责令停牌整顿)。

根据上述条件,从我国A股市场筛选了79家上市国有企业作为样本,样本数据和财务信息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个别企业的个别指标缺失数据用内插法弥补。以样本企业2002—2020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进行后续量化分析,所有量化计算过程均由Eviews 10.0实现。

(二) 跨国化指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法计算的跨国化指数是针对单个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度量,而本文计算的是我国国有企业整体的跨国化指数,所以无法直接计算。首先,利用各样本企业2002—2020年数据计算出各样本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海外员工占总员工比重等指标。其次,将这些指标数据带入跨国化指数的公式中,计算出各样本企业的跨国化指数。最后,计算出样本企业2002—2020年跨国化指数的算术平均数,代表我国国有企业整体的跨国化指数(图2)。

从图2跨国化指数曲线走势来看,除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较上一年下降幅度较大,以及2007—2009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仅以很小幅度上升外,2002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均呈现明显的上升状态,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在不断加快。排除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情况,2019年我国国有企业的跨国化指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值44.2%,但根据吕蕊(2015)^[22]、Matteo(2018)^[6]、Wu(2019)^[25]等学者的研究结论,此数值与我国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国际化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之路还有

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三)8 因素蛛网模型

结合样本企业 2002—2020 年的相关资料和数据,根据前文评分标准对各样本企业的 8 个因素评分。为了提高样本企业各因素评分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对各因素的评分采用“三轮匿名”的形式进行。

首先,屏蔽企业名称,避免因对部分企业的主观偏好而产生评分偏差。其次,对样本企业各因素进行三轮评分,最终每家企业各因素得分用三轮评分的均值替代。最后,计算所有样本企业各因素评分的均值,据此得到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 2002—2020 年 8 因素分值,并计算各年份蛛网模型面积占比(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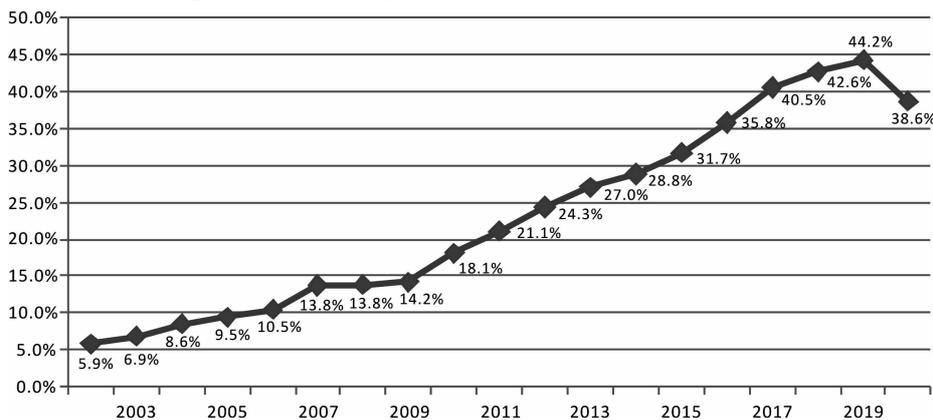


图 2 2002—2020 年我国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走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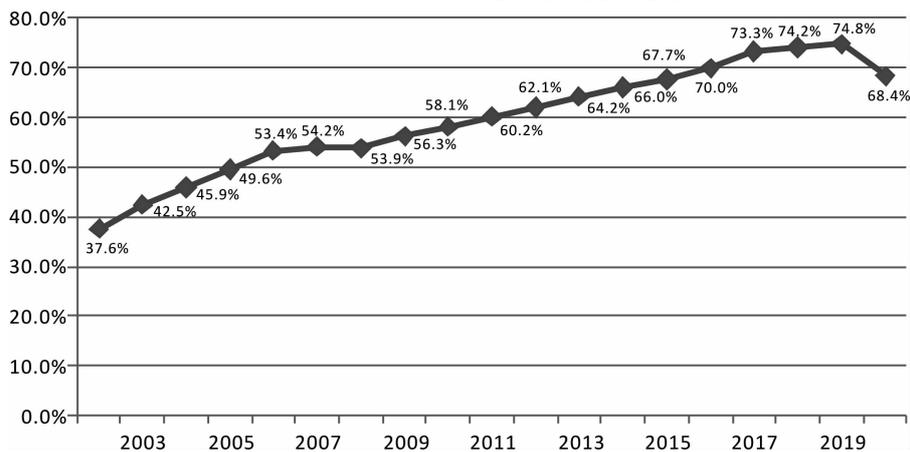


图 3 2002—2020 年国有企业蛛网模型面积占比走势图

从图 3 可以看出,2002 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蛛网模型面积基本处于不断上升状态,除 2008 年小幅度下降和 2020 年较大幅度下降外,其他年份较前一年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其中 2002—2006 年曲线走势比较陡峭,蛛网模型面积占比提升速度较快,这是因为 2002 年我国开始加入 WTO,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号召,开始积极向国际市场拓展,此时进出口贸易成为我国 GDP 快速提升的主要动力。而 2009 年以后,蛛网模型面积占比上涨速度开始放缓,尤其 2017 年以后,蛛网模型面积占比的增速更加缓慢,这主要是我国将经济增长驱动集中于内需造成的。2019 年蛛网模型面积占比虽然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74.8%,但相对于前一年增幅不大,距离 100% 的最高值还有较大差距。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蛛网模型面积占比前一年有较大幅度下降。总之,我

国国有企业 2002—2020 年蛛网模型面积占比的走势情况与前文跨国化指数的评价结论基本一致。

在 2020 年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及相关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并没有表现出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一般规律。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描述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本文选择绘制 2019 年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蛛网模型图(图 4)。根据前文“三轮匿名”的评分,2019 年国有企业国际化 8 要素的评价分别为:企业生命阶段 4.2 分、创新能力 3.1 分、融资能力 3.3 分、市场因素 2.2 分、政策因素 4.7 分、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3.2 分、全球布局能力 2.8 分、资产管理能力 3.6 分。经计算,2019 年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蛛网模型面积占比为 74.8%,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平,但距离 100% 的占比依然有较大距离。

进一步从图4来看,蛛网图形饱满程度有限,且并非对称,各要素对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距,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应该重点关注图中的短板因素。8因素中,政策因素的评分最高,对蛛网模型面积的贡献最大,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比另外一个外部因素市场因素的贡献大得多,政策支持对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影响明显。内部因素中,企业生命阶段和资产管理能力评分分别为4.2和3.6,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贡献比较突出,而融资能力、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评分均略高于3,这三个内部因素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力一般,而全球化布局能力的影响力最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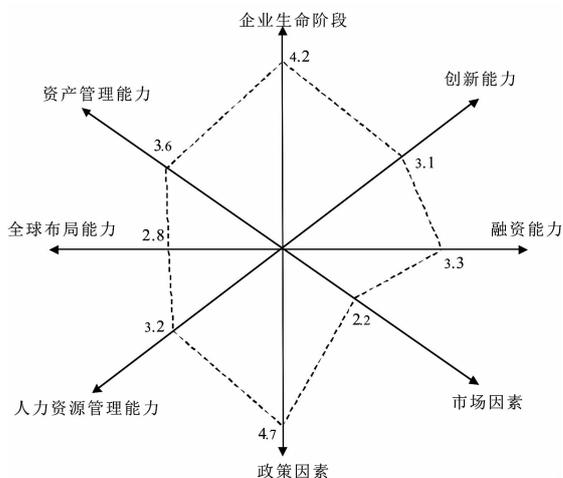


图4 2019年国有企业国际化蛛网模型图

四、结论与建议

(一) 基本结论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其国际化水平对于我国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财务评价和蛛网模型重构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对于了解我国国有企业当前国际化状态及更好地推动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具有很高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整体上处于快速提升状态,目前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2)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不仅受到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融资能力、发展阶段等内部因素影响,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也是重要影响因素;(3)政策因素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企业生命阶段和资产管理能力是最主要的内部影响因素。

(二) 政策建议

(1) 强化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

平的作用力明显,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因素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强化政策对国有企业国际化的支持力度的同时,政府部门也要注重政策供给多元化,可以在税收、资金、目标国家或地区合作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帮助,以刺激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比如,可以建立海外直接投资的专项基金,将其纳入我国统一的财政预算管理范畴,用以专门支持我国国有企业产品国际化以及国外资源的开发与投资,将国有企业国际化的风险成本在国家和企业自身之间平摊,以降低国有企业国际化面临的风险;还可以通过区域合作的形式加强与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通过官方合作的形式为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打通渠道,为国有企业的走出去奠定政策、法规、渠道等方面基础。

(2) 注重培育国际化人才,提升核心竞争力

创新能力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受到创新能力支持的力度有限。创新能力的获取关键在于人才,国有企业可以从外部引进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在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初期可以通过优越的福利政策以及具有高激励性的薪资政策,吸引和留住优秀的国际化人才尤其是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高端人才,成为打开企业国际化大门的第一股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内部要有一套完整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属于本企业的土生土长的人才,层层培养,强化人才的稳定性和对企业文化的认可度。

(3) 推进多元化融资体系,提升融资能力

融资能力是影响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是国有企业融资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式,除了可以采用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内部融资等传统融资方式外,还可以采用诸如融资租赁、保理、委托贷款等新型融资方式,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以提升国有企业在融资方式选择上的能力。同时,在融资范围上也需要扩大,除了国内融资,也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

(4) 提升资产管理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资产管理能力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在可获得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高资产管理能力对于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很重要。国有企业在充分利用政府部门给予的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身内部的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国有企业可以加强与下游企业的合作,尤其是在去库存上,强化与分销能力强的下游企业合作的同时,对于分销能力一般但愿意达成战略合作的下游企业可以多给予销售渠道、产品宣传等

方面的帮助,以提升这类下游企业的分销能力。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中国有企业尽量少采用赊销方式,提升企业资金回笼速度。对于企业内部成本和费用也应该加强控制,尤其是在作为国家资产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及员工的自我节约意识比较淡薄,要注重内部节约企业文化的建设,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参考文献:

[1] Mac Dougall D. Why is EU Countries Focusing on R&D Credi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 2004, 63(7): 38 - 43.

[2] Luo Y, Tung R L.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88(4): 481 - 498.

[3] 吴光明, 张玉梅. 国际化动因、生产率异质性与国有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0, 40(10): 2581 - 2601.

[4] 邱景, 张永安. 企业国际化测度方法的比较及其适应性分析 [J]. *企业经济*, 2009(6): 22 - 24.

[5] 曹朝晖. 企业国际化测度方法及其应用 [J]. *统计与决策*, 2015(22): 186 - 188.

[6] Matteo Landoni. Corpo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2018, 25(2): 221 - 240.

[7] 杜义飞, 万青松, 陈丽华. 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未来研究展望 [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 18(4): 74 - 81.

[8] Pradeep Kanta Ray, Vinish Kathuria, Vikas Kumar. Slippery Space and Sticky Places: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IT Industry [J]. *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Science*, 2020, 7(1): 325 - 351.

[9] 王益民, 赵志彬, 王友春. 高管团队知识断裂带、CEO - TMT 交互与国际化范围: 行为整合视角的实证研究 [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23(6): 39 - 51.

[10] Funk C, Treviño Len J, Oriáifo J. Resource curse impacts on the co - evolution of emerging economy institutions and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0 (prepublish).

[11] 侯治平, 吴艳, 杨塍, 等. 全产业链企业国际化程度、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 [J]. *中国软科学*, 2020(11): 124 - 133.

[12] Andrew Delios, Paul W Beamish. Geographic Scope,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11(8): 711 - 727.

[13] Farok J Contractor, Sumit K Kundu, Chin - Chun Hsu. A three - stag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the link between multina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in the service secto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54(34): 5 - 18.

[14] Daniel Sullivan. Measuring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 Firm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4, 33(2): 325 - 342.

[15] 鲁桐. 中国企业国际化实证研究: 以工业企业为例 [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1.

[16] 李朝明.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7.

[22] 吕蕊, 邹媛春.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国有与民营企业的对比分析 [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29(6): 100 - 107.

[23] 谢先达, 程聪. 我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创新模式研究 [J]. *科研管理*, 2021, 42(5): 31 - 38.

[24] 王治. 国有大型企业国际化模式研究 [J]. *现代管理科学*, 2010(3): 31 - 33.

[25] Wu. Debt Financing Structur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Comparison of the Listed State - owned and Non - state - owned CMNEs [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9, 17(2): 147 - 168.

[26] Sergio Mariotti, Riccardo Marzan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9, 50(5): 669 - 691.

[27] 张天顶. 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J]. *统计研究*, 2017, 34(1): 33 - 43.

[28] Joao Paulo Torre Vieito. Gender, Top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Gap,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Tournament versus Behavioral Theory [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2, 20(1): 142 - 167.

[29] 李东阳, 蔡甜甜, 崔晔.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国际化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8(6): 35 - 40.

[30] 王胜利. 大型国有企业创新型科技人才激励模式探讨 [J]. *科学学研究*, 2007(S1): 144 - 146.

[31] Fynn - Willem Lohe, Andrea Calabrò, Mariateresa Torchia. Disentangling the drivers of family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oemotional weal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21(5): 1 - 31.

[32] 王国顺. 国有企业经营低效率成因的系统性分析 [J]. *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4): 315 - 320.

[33] 白胜玲. 出口退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基于主要贸易国的实证分析 [J]. *税务研究*, 2009(9): 37 - 40.

[34] 王绛.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调整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转型发展 [J]. *清华金融评论*, 2020(4): 46 - 49.

[35] 孙光慧. 比较优势理论与我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分析 [J]. *甘肃社会科学*, 2003(4): 89 - 9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 Financial Evaluation and Cobweb Reconstruction

LI Mengxu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and its determinan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China’s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since 2002 is measured from a financial perspective using the Transnationality Index, and the 8 – factor spider web model is reconstruct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and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China’s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has increased rapidly since 2002, reaching a high level.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is affected by a varie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which policy fact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while enterprise life stage and asset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financial evaluation; cobweb model

(上接第 35 页)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for People’s Livelihood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reat Domestic Circulation

HUANG Xiao, WANG Haixia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AS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livelihood fiscal expenditure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y using the data of the livelihood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rom 2007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whole, the livelihood fiscal expenditur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residents. Among all kinds of private financial expenditures, social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expenditure, cultural expenditure, sports and media expenditure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all residents, and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livelihood fiscal expenditure, increase the scale and proportion of livelihood fiscal expenditures and increase the tilt of livelihood fiscal expenditure to rural residents and strengthen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livelihood fiscal expenditure to stimulate residents’ consumption potential.

Key words: livelihood fiscal expenditure; household consumption; great domestic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郝艳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国家中心城市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并能代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城市。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应充分重视文化建设,以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引领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分析郑州的文化形象,寻找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通过引入顶层设计理念、定位城市文化核心资源、聚合人才资源优势等策略手段来助力郑州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关键词: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文化形象;提升策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08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50-05

城市是人类社会构造中最重要的载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目前,我国正在谋划“国家中心城市”这一新型城市化发展格局。2007年,原建设部上报国务院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中首次提出“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2016年12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当前,我国九大国家中心城市的格局体系已经比较清晰,其中郑州如一匹黑马异军突起。《国家发改委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郑州要努力建设具有创新活力、人文魅力、生态智慧、开放包容的国家中心城市,在引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支撑中部崛起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作出更大贡献。郑州进入国家中心城市方阵,面临机遇和挑战,探讨郑州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的文化形象建设,有利于突破以往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文化软实力落后的瓶颈,提升城市的人文魅力,发挥郑州的文化辐射力。

一、郑州城市文化形象解读

(一)历史文化名城形象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灵魂,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积淀和独特气质。郑州在1994年就已经被国家

确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是长久以来,郑州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却得不到彰显,老百姓常说郑州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这句话说出了近代郑州伴随工业和铁路的出现而发展的事实,却也湮没了郑州在历史中的古都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郑州的考古工作喜报频传。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郑州发现完整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这一发现,将郑州建城历史上溯3600年,一举确立郑州“古都”地位。1995年,考古人员在郑州北郊邙岭余脉发现西山古城遗址,这一发现又把郑州地区城市出现的时间提前到了约53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由此,郑州又被视为中国城市文明的源头。此外,据史料,公元前约4000至5000年间,黄帝在新郑建都;公元前约2070年,夏禹在登封建都;另外,郑州还是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重要州郡。郑州与北京、西安、南京、杭州这些闻名于世的古都一样,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与成都、扬州一样是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郑州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城。时至今日,作为现代化新城的郑州与作为五千年古都的郑州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而交相辉映,呈现出勃勃生机。

收稿日期:2021-12-27

作者简介:郝艳燕(1978—),女,河南蒙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文化。

（二）自然文化形象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一道,共同孕育和繁荣了郑州的城市文化形象,赋予其鲜明的地域环境特征,对其文化形象的构成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中,人类建立起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条件以及经济、文化、风俗等的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特色。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西依嵩山,西部多山地丘陵,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地理条件优越,自然环境和谐美观。从气候上来说,郑州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季节分明。从生态资源上来说,郑州水资源虽然不如南方城市丰富,但在北方城市中却是水源状况较好的城市,她北依中国第二长河黄河,南部贯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城市内又有东风渠、贾鲁河、金水河、索须河、熊儿河等八大河流,称得上是“城在水边,水在城中”。从森林资源上来说,郑州辖区内植被丰富,历来有“绿城”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为郑州城市的未来发展创造了优势,也为城市自然文化形象的建设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中,郑州的山川河流,风花雪月,一草一木,都曾经作为文化符号留存在诗词歌赋中,留存在郑州人民世代代的劳动实践中。一代代文人墨客将丰富的人文思想内涵赋予郑州地域内的自然景观,使纯自然的生态景观变为具有思想性及生命活力的胜景,从而形成了郑州独具的地域文化。《诗经·郑风》中富有自然情趣的低吟浅唱就发生在郑州的林间、河边;子产廉洁千古传,成就金水河的美名;嵩阳书院依山而建,至今传出朗朗读书声。自然环境与人文涵养恰到好处地结合,成就了郑州自然文化形象的大气从容。

（三）文化产业形象

21世纪城市文化的竞争已经从单纯的文化魅力展现扩大到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越是发达的城市,其文化与经济结合的能量就越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可持续发展性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并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方略。从城市产业发展来看,与文化结合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产业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创意产业。二是会展博览业。三是文化旅游^[1]。近年来,郑州积极承接了很多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会展、会议、论坛、博览会,有效地提升了郑州文化形象。2019年郑州承办全国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提升了文化产业效应,增加了全国上下对郑州的注意力,进而会对城市发展起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四）市民文化形象

市民的文化素质是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展现,也是提升城市文化凝聚力的关键。快速城市化带来人口的大量汇聚,2020年统计郑州城区常住人口已超1200万。随着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加快,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力仍在不断增强,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市民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积极性,提高市民素质,展现郑州城市市民风貌,使人与城市和谐共生,是郑州未来城市文化形象提升过程中需要重视的。

提升市民文化形象要大力弘扬郑州城市精神。每一座城市的城市精神都是这座城市市民在从事生产、生活过程中凝练总结出来的城市象征,综合凝聚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传统、精神积淀、社会风气、价值观念以及市民素质等诸多因素,是城市文化的提炼和浓缩。郑州的城市精神确定于2008年,表述为“博大、开放、创新、和谐”。郑州城市精神源于郑州历史文化传统,成于郑州人民的伟大创造之中。嵩岳文化、黄河文明是郑州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千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郑州人民开展的伟大的社会实践活动,是郑州城市精神生长发育的沃土。“博大”是指郑州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积淀。“开放”是指郑州城市的鲜明个性和城市品牌。“创新”是对郑州市历史、现实精神面貌的总结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展现。“和谐”是对郑州地域文化的本质概括。郑州城市精神深植于郑州厚重历史文化内蕴和接纳四方来宾的开放胸襟,展示着未来创新发展的城市远景,是郑州人民城市生活的精神导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座城市的个性表达,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精神动力。

二、郑州城市文化形象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中原经济的排头兵,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城市的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均衡发展过程,当前,在一味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理念下,郑州的城市文化形象建设也存在着几大弊端。

（一）文化形象理论研究滞后

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城市文化形象的研究大部分是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研究多拘泥于经济效应,开拓性和创新性已经明显落后于我国现代城市发展的实践需求。对于郑州这座城市而言,面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急切需求,现有的城市文化形象理论已难以回答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导致郑州城市文化形象建设上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在建立统领性的城市文化形象方面理论准备不足。二是城市文化形象定位缺乏连贯性持续性,难以一贯持

之。三是对本土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体系深耕不够。

(二) 文化建设层次较低

城市文化形象建设涉及城市建设方方面面,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既属于物质文明建设范畴,又包含精神文明建设内容^[2],其地位高屋建瓴。但是在城市具体规划建设的过程中,文化建设的地位未得到足够重视,导致文化形象提升度较弱,表现在:第一,重建设计,轻设计。随着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中由钢筋水泥混凝土造就的高层建筑纷纷拔地而起,构成了城市最直观的形象表达,今天的城市几乎成了钢筋水泥的森林,而这种对城市空间的无序使用大大削弱了其古典文化气息。第二,重景观,轻文化。郑州近几年在城市的自然景观方面投入较多,但在文化景观方面的建设有欠缺,此外文化和自然景观的结合方面也还比较薄弱,整个城市的文化内涵需要提升。第三,重当前,轻长远。近年来,郑州曾在城市形象定位方面进行过很多探索,先后致力于商贸城、服装之城、旅游之都、会展中心、智慧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城市名片的打造,此外还在宣传少林文化、炎黄文化、书院文化、古都文化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这些城市名片大多是紧跟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但定位太多的另一面就是城市整体文化品牌比较分散和多样,平淡无序,没有形成合力。

(三) 塑造提升合力不够

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内容,多个环节,多个部门,要实现最优结果,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给予综合全面的考虑,需要各个部门协同合作,形成系统合力。目前郑州还存在着城市建设各自为政、合力不够的问题:一是城市文化形象塑造还不具备全局性工作地位。目前,还只是一个职能性、局部性的工作,主要由宣传、规划、城建、旅游、文化等职能部门分头负责,导致工作的战略地位不够突出,统筹协调力度等不够大。二是城市文化形象塑造工作各个部门分头出击,有可能造成城市形象多头定位、多头建设、多头宣传的现象,很难形成系统合力,还可能因为缺乏有机协调整合导致各部门之间的内在冲突,产生消极效果。

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需要多个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所以政府应尽快引进文化治理新策略。文化治理是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方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3]。文化治理这种方法,是在对政府、社会与市场作用发挥失调的反思中产生的。未来只有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一起参与,才能带来郑州市整体文

化形象的有效提升。

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背景下进一步塑造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的对策

(一) 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组织保障,把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提升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顶层设计原本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它强调的是要完成一项大工程,就要以统一的蓝图、一致的理念、协调的架构、共享的资源、标准化的部件等系统性的方法,从全局视角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各种要素进行统筹考虑^[4]。当前,郑州与中国大多数大城市一样,其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中后期,即将由量变到质变,此时,在城市建设上加强政府顶层设计,从粗放型发展转变为节约型、集约化、精细化、人文化发展势在必行。

在城市文化形象塑造和提升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意味着政府领导层面要高度重视,战略布局,全局谋划,面向未来,有序进行。应该从政府层面上充分认识文化瓶颈对郑州未来发展的制约,从制度上给予文化发展以强有力的保障,制订落实城市文化形象塑造和提升方案的时间表。郑州目前已经确立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短、中、长期目标,其中,中期目标是到2030年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向全球城市迈进;远期目标是到2049年,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城市^[5]。这份城市发展的远景规划瞄准的是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城市的高远目标,其中已经蕴含对郑州文化形象提升所提出的要求,郑州在未来的三十年城市发展中,要置身国际坐标,参照世界一流城市,参与国际城市间竞争,尤其是在城市文化功能的发挥方面,应该向世界先进城市学习其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规划先行,将文化建设与城市建设进行良好对接。

(二) 找准城市核心资源,准确定位郑州城市文化形象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彰显人文特色,建设国际化现代都市”,目标瞄准国际化现代都市,那么,对郑州众多文化资源应该优中选优、优中取特,选取能够彰显城市人文特色的核心资源,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将核心资源建设凸显出来,作为对标郑州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文化支点。

目前,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等辐射力都处于首位,但是文化辐射力还达不到期望值。未来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有责任对河南在内的中部地区承担强大的文化辐射

力,代表中部地区向世界展示河南厚重的文化形象。要做到这一点,仅凭郑州一个城市的力量是不够的,需集河南之力促郑州发展,集合河南省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如洛阳、开封、安阳等地的资源,将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做大做强。从地理上来看,河南又称“中州”“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有“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样的历史文化条件,而郑州又占据河南之中,其他古都名城环绕周围。2021年3月,郑州市市长以“山、河、祖、国”介绍郑州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4月,郑汴洛以“三座城三百年”三城携手联动举办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这些富有创意的文化活动正是基于郑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核心资源的运用实践,也为未来郑州继续发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区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范本。

郑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优秀文化资源的整合首先应以一大批保护良好、利用合理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为核心载体的城市文化空间来体现和支撑。其次,依托河南两所“双一流”大学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整合省内文化研究基地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第三,利用现代数字科技手段,通过在郑州建立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等项目来充实河南历史文化资源库。通过集合河南省内其他地市优质文化资源,形成“众星拱月”之势,将郑州打造成为在文化上能够代表河南的龙头城市,打造成为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从核心资源视角来看,郑州还应该充分重视黄河文化。奔流不息,源远流长的黄河,她以雄浑的气势和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融合集萃,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文明,同时也塑造了中原大地的山岳河川,城池乡村。郑州这个城市在黄河母腹中孕育诞生,也在黄河的惊涛中历经磨难,数千年的历史赋予了郑州古城与黄河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也赋予了中原人民勤劳勇敢、坚忍顽强的黄河精神。黄河不仅是自然,是文化,黄河还是郑州这座城市的精神和灵魂。当前郑州应当更加注重以黄河生态系统为核心来规划城市未来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合理地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应该注重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此外,还要注重处理黄河水资源保护、治理和利用三者的关系,将保护和治理放在首位,保护好城市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建设和环境的同治,提升郑州自然文化形象。最后,要把黄

河的自然文化形象和历史文化形象统一起来,加快推进郑州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建设,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三)聚合人才资源优势,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

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离不开人才的出谋划策和参与,然而从郑州目前的人才资源现状来看,高层次人才跟不上发展需要,文化人才外流严重。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大力营造人才发展的软环境,吸引文化人才的扎根和加盟。

一是继续通过培育、吸引高水平大学、高端研究机构在郑州的设立和建设来增强高水平人才建设。高校是一个城市科教、文化人才的“蓄水池”,从已经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九大城市来看,郑州在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上还存在短板。郑州应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加强人力资源投资和开发作为一项重大举措。通过内推外引把高等教育做大做强,才能吸引各地人才到郑州,才能为郑州未来发展提供源头活水,优化郑州人力资源。

二是集思广益、广范围吸引高层次人才对郑州城市及文化发展的研究和立项。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具有吸纳人才的条件,因此,市委、市政府应该从顶层设计出发,牵头建立郑州文化智库,储备专项资金,整合省内高教资源,搭建高端的、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开办论坛、年会等形式,吸引各方面人才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出谋划策,形成面向国内、国际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政府要积极组织整合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学术科研机构、新闻媒体人士、社会民众代表,针对城市文化形象开展学术研讨、政策调研,形成一批质量高、应用性强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塑造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形象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撑。

五、结束语

城市化浪潮给郑州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今天,郑州走上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道路必须直面挑战。百年来,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文化兴,则城市兴”,一座有着良好文化形象的城市也必定是引领未来城市发展、在竞争中争得先机的城市。在未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郑州应该以文化战略的眼光来审视城市建设,从全局和创新的角来思考和分析,以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为契机,切实推动郑州城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强市的目标。

(下转第108页)

意志与意识: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刑事责任论

刘德法,白雅楠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刑事责任论的发展和演进是刑法学说史的重要内容,也反映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理念更替。晚近以来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该前沿技术的法律规制仍需保持鼎革态势,既要变动原有规范内容,又要彰显稳定的传承延续。在明确人工智能型设备不具有自由意志的前提下,无人驾驶汽车相关犯罪问题仍应问责于利害关系人。对于无人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的过失犯罪,刑法应在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基础上考察成立犯罪的合理性,并以信赖原则排除刑事责任。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的犯罪问题,刑法应在算法规制与严格责任框架下考虑入罪路径,同时确立技术中立原则限制刑事处罚。

关键词: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刑事责任;出罪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09

中图分类号:D9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54-08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的数量时代转质量时代大变局。未来十五年,科技研发将继续作为社会第一驱动力,并在国家发展规划中扮演“改进效率”“迈向和谐”的内核角色。电子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算力经济会催生出一系列新产业与新模式并打破内卷。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会在5G通信网络这一基础设施之上构建起多个新兴数字产业并成为核心经济支柱。^①智能交通、智能制造等内容会成为数字化社会应用的主要场景,其中包含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运用。当下道路交通犯罪立法扩张趋势是之前经济增益流向公共交通领域的应然治理模式,但也加剧了“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在立法以及司法层面的矛盾冲突,甚至动摇了刑法规范在社会交通治理中的谦抑性。司法对醉驾犯罪的零容忍打击以及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犯罪化的立法处理推动了刑法在风险观念下积极发挥治理能力,但也伴有些许过度治理的嫌疑。鉴于未来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构成的新型智慧交通会加剧这一混沌状况,甚至混淆机器意识与人类意志差异导致刑法规

制对象直接指向机器,颠覆传统刑法理论关于责任主体的规定,因此,厘清刑事责任论自由意志基础与人工智能操作意识差距,明确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情境中刑事责任的适格主体,建立责任归属路径,有助于保护未来智慧交通安全与秩序稳定。

一、刑事责任论与自由意志

究“刑事责任”之根本,是刑法非难犯罪行为并对犯罪人展开负面评价或施以刑罚的依据。德日刑法中的“责任”属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重要评价内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成立都必须具有有责性。行为人有机会选择实施除犯罪以外的其他行为,却最终通过犯罪方式施以作为或不作为,是责任评价的重要内容。^{[1]193-196}英美刑法理论的“责任”内容贯穿于客观犯罪行为(Actus Reus)与主观精神状态(Mens Rea)之中,例如严格责任推定规则以及可宽恕抗辩事由。^{[2]206}我国刑法当中的“刑事责任”,多指犯罪成立后行为人所负担的接受、容忍刑事处罚的义务,是罪犯与国家机关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责任”描述为成立犯罪后判处刑罚的依据,犯罪意图与心理认识的内容均集中于认定故意、过失这些

收稿日期:2021-12-18

作者简介:刘德法(1963—),男,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刑法学。

前置的犯罪主观内容当中。^[3] 各国刑法理论关于“刑事责任”的理解与定位均存有差别,但概括而言,刑事责任论所解决的问题是刑法能否非难某种行为或类型化后果或对刑事主体用刑。共通的特点即在于“刑事责任”都是针对行为主体的评价,并且是以行为本身作为评价依据。行为作为价值判断的客体,是刑事法律评价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如果说责任是评价结果,那行为就是评价对象,难以割裂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辨析“行为”之义,又可明确其与“单纯的身体动静”之间存有意志成分的细节差异。作为意志的外在客观表现形式,行为本身所蕴含的指向性或针对性均来源于人的主观意志。动作则包含下意识举动,如神经条件反射。^[4]⁴⁷ 对此,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指出:“行为各个阶段都受到意志之设计,且由意志所构成。”行为意志决定行为的方向与过程,“志向有思维指导功能”^[5]。

(一) 决定 VS 非决定

在法哲学领域,行为是否完全由意志决定等价于人的意志是否自由这一问题,已然成为一个悖论。起初,西欧中世纪时期教会法有较多基于道义内容而施以刑罚的做法,但当时由于社会道德多被宗教定义,刑法也就受宗教道德的干涉和支配,导致刑罚的适用较为恣意。^[6] 如出一辙的是,我国古代违反君臣之礼的“不敬”“大不敬”也属于君臣道义支配下的峻法严刑。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刑事古典学派为打破上述封建思想、提倡人权保障理念,将道义责任论的内容置于个体角度,从具有自由理性这一论点出发阐释了刑事责任的含义。古典学派认为,人只要达到一定年龄且精神正常就完全具有选择善恶行为的自由意思,此即“自由意志论(非决定论)”。前有康德对人类理性的探讨,后有黑格尔基于人类理性对自由意志这一客观定在的论证,都强调了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行为主体具有鉴别善恶的能力,最后却以犯罪的方式付诸实践,能为善而不为的客观表现需要承受来自道义上的谴责与非难,道义责任论也就成了刑事责任论的主旨。

但近代刑法学派借生物学、社会学等内容扩展了刑法学研究视角,发现人的行为抉择与行为结果往往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因果进程。活动、习性甚至是人格总会受到所处环境或自身生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行为往往受其他多种因素决定。意志的形成可归结为社会、个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意志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刑事责任论在近代学派这一观点之上又呈现出多种责任理论的演变与学说更替,其中包括心理责任论、人格责任论、社会责任论、

规范责任论等众多理论观点。自由意志这一概念则逐渐被抛弃,并被认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内容。不承认自由意志的社会责任论与人格责任论关注到了犯罪行为人的 人身危险性与反社会性格情操,并认为这不完全是个人因素决定的,而是成长环境、教育程度、经济因素等内容促成的。社会责任论基于社会防卫思想,认为针对这些有反社会性的主体,社会当然具有防卫的权利并可以采取相应强制措施予以治理。

最初的刑事人类学派注重生物学原因对犯罪的影响,基于“生来犯罪人”理论的犯罪人定型说导致刑罚波及面广,甚至发展出了优生学并加剧民粹主义思想在刑事法律中泛滥。近代刑事社会学派则更为注重犯罪的社会学原因,基于社会防卫思想的社会责任论主要关注社会防卫措施的应然内容以及预防犯罪的方法。但仅关注“反社会性”的社会防卫论存在过激的弊端,譬如格拉玛蒂卡的社会防卫处分几乎全部颠覆了原有的刑罚制度。近现代刑法多以“非决定论”为主,“决定论”辅之构建责任论体系,又称为相对的意思自由论(相对的非决定论)。^[7]²⁴⁴ 尽管存在社会因素、生理因素影响,刑法依旧需要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是不能被其他因素决定的,并且自由意志是形成目的内容的关键基础。但这也不排除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场合,尤其是那些行为人为人无法选择适法行为的情境。通说认为刑事责任的产生以主观罪过为重要依据,同时也应当考虑刑法要求行为人在现实中不实施犯罪这一做法在具体情形中的正当性问题。我国刑法理论采取的规范责任论即属通说立场,《刑法》第 16 条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强调了刑法在此情境中不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客观上合乎构成要件的行为。《刑法》第 17 条更是认识到了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认为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易受环境因素影响,不能将未成年人的意志与成年人等同。不仅如此,《刑法》第 20 条正当防卫更是认可了人基于意志自由形成的保护国家、社会、他人、自己权利的目的合法性。行为人虽在客观上做出了合乎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选择,但刑法依旧为行为人提供了出罪路径。《刑法》第 21 条紧急避险的“不得已”要件也是“非决定论”与“决定论”交织的产物。

(二) 自由意志的基础:意识自由

在缓和决定论立场,意志似乎是自由的,但又好像是不自由的,这种论断正体现了辩证之意。我们既不能彻底离散两种对立观点的统一关系,也不能对各自立场进行过分解读。总而言之,如果认为刑法的宗旨在于保障人权与自由,也即“刑法从根本

上只有在为保护个人自由和更大的社会利益时才是正当的”^[8]，那就必须承认意志自由。尽管其存在论难以证成，亦需要法律对此内容的向往与认同。自然人法律人格正缘于行为人可以选择不为，不仅仅是刑法，我国《民法典》第13条同样也基于意志自由赋予自然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资格。事实上，意志是以意识活动为基础，受心理导向产生，这种自由以意识活动多样性为基础。换言之，意志自由本质在于意识自由，两者区别主要在于意志带有强烈主观色彩。从生物进化理论来看，人在进化过程中演变出的强大意识能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人类有高强度意识并不意味着其他生物就没有任何意识。举例而言，黑猩猩同样有制造、使用工具的意识，甚至还会拉帮结派搞政治斗争。因此，生物都具有意识，只是程度不同。相较于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不具有快速分裂、复制繁衍的能力。但是多细胞生物借助脑部意识活动可以在其生命周期内通过有意识地学习，认识周遭环境、建立经验模型，使得自己在日后相同或类似情境中快速找到解决方案并施以应对。从脑部生理结构来看，人脑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联想与思考，是因为百亿级神经元之间亿亿级的突触可以实现瞬间联动。^②突触之间的联动使得生物主体认识到的客观现状与过去经验记忆发生联系，进一步主导行为，也就形成了法律层面描述的包含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行为事实。

与上述人类的意识自由相比，人工智能则不具有这种生物学上的高强度意识。其基于算法预先设定的程序所呈现出的自主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比拟。

二、人工智能刑法规制的责任论缺失

自1956年起，人工智能研究已经发展了六十年有余，机器学习与人工神经网络成为主要技术支撑，使得智能型机器能够主动采取措施应对目标场景。但是这种“机器意识”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差距似乎蒙蔽了多数人的判断，以至于人工智能刑法学研究过度激进，甚至主张以“阿西莫夫三定律”^③作为刑法规制基本准则并建立针对机器人的特殊刑罚体系，包括“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9]且不说上述刑罚措施是否能够成为贝卡利亚所描述的“易感知的力量”，单就责任层面而言，如若得出机器能拥有等同于自然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这一结论，仍需结合机器学习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机理，将机器意识同人类意识做出比对。

（一）机器学习与人工神经网络困境

参照多细胞生物有意识的学习进程，假设生物

肢体可以视为机器硬件设备，那脑部意识所进行的学习活动无外乎是按照一定规律总结认知，这就更像是机器的软件内容。“机器学习”在这一观点之上，通过编程语言来设计程序，将生活中种种事物甚至是各种行为活动编译成代码以供机器识别，在能够识别目标客体的基础上让机器衔接后续程序完成操作。^[10]目前已有的无监督学习算法，是计算机在无人为介入的前提下自主实现分类与建模预测功能。但计算机本质在于逻辑^[11]，受制于逻辑单一性和有限性，这一研究路径并不能完全让机器意识代替人类意识活动。逻辑本身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并不能永久消除问题。从微观而言，就单个问题展开的逻辑推理是客观且必然的，但用于推理的前提——有效信息却是人为的、主观的、偶然的。即使是机器推理，就算是拥有海量数据，也难逃脱这一束缚，又或忽略特殊情形。从宏观角度出发，物质运动性导致客观事物多元多次，前提动态变化往往会导致逻辑结果的普适性难以恒久维稳。因此，机器在面对特定待解决场景，其所得出的结果在同一时间点以及同一逻辑路径上即使经过反复推演都不会改变。与人类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相比，算法自身局限让机器反应丧失了多样性。鉴于逻辑奠定机器自动化性能的同时也限制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机器学习算法也就无法创造出意识上的自由。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自主性并非判定算法是否会思考的标准，更无必要因此而修改责任制度，这只会得出荒谬且矛盾的结论。^[12]如果说机器在特定时点得出的逻辑结果有违法律，那法律也就不可能期待机器不违法。

人工神经网络研究则是从人脑生理结构出发，解构人脑智力活动，并用电子元件实现对人脑的模仿以便让机器更显智能。按照“通用型计算机”设计理念，计算机结构通常可以分为硬件与软件两个层面。^④就硬件而言，如果可以用一个硅片来代替人脑神经元细胞，设计仿突触链接的离散型连接方式就可以设计出以芯片为计算单位的电子元件“大脑”。但这一设想对数字电路集成技术要求极高。截至目前，尽管SoC(System-on-a-Chip)芯片已经实现了在5纳米制程下集成150亿枚晶体管在其中，单位芯片之间的连接却成了设计难题。人脑中平均一个神经元细胞会与其他约7000个神经元细胞建立双向交互机制，较为活跃的神经元细胞甚至可以和其他10000个神经元细胞在同一时间点实时交互。这种极度错综复杂的交互机制，使得仿造电子神经元大脑成为天方夜谭。就软件而言，人工神经网络设计与机器学习相结合，产生的“深度学习”

理念是凭借符号逻辑来模拟人脑各区位功能。人脑中神经元细胞之间的信息交互可以归结为负责嗅觉、听觉、视觉、触觉等多个工作区位。负责感知的神经细胞相互之间建立链接并汇总信息,最终会在脑部建立认知或形成画面。大脑对此进行分析便可得出特定解决方案。但软件层面对这一脑部活动进程的模仿和设计必然要以硬件层面的支持为基础,缺乏更为简便的硬件操作平台使得上述研究进展受限、发展缓慢,目前只是找到了存在相应算法的证据。总而言之,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现状尚不足以证明机器意识可以与人类意识等同,法律评价更须立足于此。

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逻辑算法束缚下的机器意识根本不具有多细胞生物意识的多样性,也就更无自由可谈。实际上,从哲学不可知论来看,人类也不可能对自我意识有全面的认知。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关于“不存在至大无外”的论断一般,反思的过程意味着思的主体将会被包括在这个思之内但又无法在客观上包含这个思本身。因为思的主体在此时是思的对象,与思对立。但不可知论并非消弭了“大全”旨趣,人类仍须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以及无人驾驶汽车均是如此,其研究设计与发展制造即使创造不出和人等同的高级意志,仍具有实际应用的意义。智能汽车借助高速信息传输与处理,终会将人类从驾驶活动中解放出来,解决当下城市道路通过度拥挤、流量不可控的难题,从而助力科技社会的构建与发展。法律此时仍需紧随其后,将治理重心聚焦于受技术更新后的社会既定事实与现实经验当中。因此,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对象仍在于“人”而非“机器”。无人驾驶汽车的交通环境治理内容也就必须立足于智慧交通的应用场景予以展开。

(二)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应用场景

所谓“无人驾驶”,即指在完全脱离人为操控前提下实现车辆自动行驶。^⑤无监督学习算法可以让无人驾驶汽车模仿人类驾驶操作并形成相应电子数据。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即可完成对路况信息的分析与建模预测,对类似情形自动作出类似的应对方案。人工神经网络会加快算法运行速度并缩短硬件运转时间,使得汽车在高速行进过程中反应灵敏、避险及时。晚近以来我国各省市机动车政策多趋向于传统燃油汽车限制出行的常态化治理,与此相对,电动化(新能源)汽车则从最初购置补偿到上路行驶都有各方面的补助与扶持。电动汽车被大力推广

的举动也反映了我国发展智能交通环境的决心。与此同时,汽车行业竞争内容也从工业制造水平逐渐转变为汽车软件系统研发,多通过设计汽车与手机的交互来实现拓展应用。汽车制造商现阶段还以收集海量人为驾驶信息为目的,形成数据用以升级辅助驾驶系统并优化车机整体。在大幅提高汽车设计与更新灵活性的同时,让汽车通过深度学习升级自身。与之相似的发展趋势比比皆是,最终都会引向驾驶活动的机器自主性。但前文已论及,这种自主性技术仍然不是判断人工智能具有自由意志的确切标准。

然而,无人驾驶的智慧交通环境又是我国现实之需。我国拥有 14 亿人口基数,出行需求数量庞大。截至 2020 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达 2.81 亿辆,与美国同居于世界首位。北京、上海、郑州等城市汽车保有量均居于国内前列。^⑥人民日益增长的出行方面物质需求同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有限性的关系之弦愈发紧绷,智能交通环境是目前缓解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案。当 5G 通信网络覆盖于城市各个角落,无人驾驶汽车不仅会在行驶过程中自行汇总路况信息,完成分析处理,物联网技术还可进一步建立车与车之间的信息交互模式(Vehicle to Vehicle, V2V),进一步提高道路交通秩序稳定性。如果用超级计算机设置道路交通管理中心,那么将实现对城市中所有无人驾驶汽车出行的管理需求。海量行驶数据的汇总、计算以及分析工作,有利于为每个车辆提供便捷出行方案,同时管控交通设备,合理规划城市交通流量。这一数字化应用虽不能将道路交通风险直接清零,但会有效降低人为风险,让交通秩序更加有条不紊。鉴于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的有用性,智能交通环境这一“被社会允许的风险”需要厘清负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三、无人驾驶归责的实然与应然路径

风险社会中的法律责任认定依赖于风险分配的法理,被社会允许的风险多由当事人注意义务分担承受。即使是无人驾驶汽车情境,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仍需相关利害关系人承担起应为、能为、可为的法律要求。尽管道路交通管理中心会负责主要的监督维稳任务,无人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以及汽车制造商和设计者依然可能危害交通环境的公共安全秩序,甚至是个人生命财产法益。

(一)汽车所有人、使用人的罪与非罪

作为机动车一方当事人,法律规范要求的一般理性标准往往高于非机动车一方。^⑦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 条规定机动车一方在没有过错时亦

需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这种无过错赔偿可以认为是严格责任的一种。又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7条均赋予了车辆单位主管人员、所有人、承包人以及乘车人更高的监督义务。因此即使是无人驾驶汽车,也应当秉持传统责任认定思路,对无人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提出更高的注意义务。

故意犯罪由于主观恶性明显,不论是以无人驾驶汽车作为犯罪工具,还是犯罪对象,基于平均人标准说或者规范拟制说的责任论都可以清晰评价应受刑罚的依据。过失犯罪由于紧紧依附于规范责任论,认定时需严格把握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否则可能出现似是而非的状况。鉴于社会关系复杂性,监督过失是过失罪过的重要类型之一。负有监督过失的行为人并没有直接实施危害行为,其创设的危险或侵害法益的结果均通过被监督者实现,监督者也就负有预见和回避的义务。^{[1]216-255} 尽管无人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不再实施驾驶行为,其依然应当审慎监督这一被社会允许的危险,此时无人驾驶汽车也就成了“被监督者”。汽车所有人、使用人怠于监督或因疏忽导致重大损害结果的,应在符合规范要求的前提下考虑定罪量刑。举例而言,无人驾驶汽车如若真的发生了低概率的交通肇事情形,肇事汽车所有人仍应担负起保护现场、及时救助的责任义务,符合“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的,仍可依据上述解释第5条的规定,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我国在民事法律实践中已经认可了汽车所有人对自动驾驶系统的监督责任:孙某驾驶李某某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上路行驶并发生交通事故。法院认为,李某某作为汽车所有人并系乘坐人,理应对汽车的行驶承担合理监管义务。^⑧ 管理过失则是考虑到管理者的安全保障立场,认为管理者负有回避某些特定危害后果发生的义务。对于无人驾驶汽车而言,除了生产者、设计者等厂商以外,汽车所有人、使用人也属于汽车的管理者,应当定期检查汽车工作状态并实时更新车机系统,及时修复故障并对车辆采取必要保养措施,这都是实际生活的必然需求。怠于维修、保养或定期维护汽车安全行驶状态的,可以视为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是认定过失责任的考量因素。目前,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于过失责任的成立多基于结果本位,考虑的是行为主体对自身行为结果的回避过程。但在无人驾驶情境中,驾驶行为与自身脱离之后限制了疏忽大意与过于自信的评价能力。实际上,监督过失与管理过失仍然有必要融入

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理念之中,不仅可以合理评价无人驾驶汽车过失犯罪的人罪问题,也有利于推动法益保护早期化趋势。

与此同时,为避免刑事处罚范围过广,也应当明确注意义务的合理上限。信赖原则与监督过失、管理过失相对,是起源于道路交通犯罪中的基本限定原则。^[13] 信赖原则要求,如若在行为人立场上可以合理确信他人不会做出不合法的行为,那种合理确信的内容就值得法律保护。此时被害人、第三人做出的不合法行为就是一种对行为人合理信赖的损害。尽管行为人在此情形中对危害结果发生负有过失,依旧不能认定行为人成立过失犯罪。美国侵权责任法也存在与之类似的“促成的过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但由于被害人对于损害结果发生在客观上也付诸了贡献、提供了影响,因此侵权行为人不负赔偿责任。促成的过失在结论上全面否定了行为人的赔偿义务,许多州因此摒弃了这一理论。但就刑事层面而言,其仍然有着与信赖原则相同的作用与意义。日本判例将信赖原则要义作为道路交通领域注意义务的限定标准:车站乘务员未能注意下车的醉酒旅客坠入轨道,最终酿成了死亡事故。对此日本法院认为,如果能够根据乘客外观表现相信其不存在滑落进轨道的可能,那乘务员只需将其视为一般旅客,无需格外注意。^{[1]254} 进言之,适用信赖原则应坚持主客观统一的认定思路。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基于审慎义务与一般社会经验判断出对方会实施恰当行为,并且客观上的反应也符合一般理性人的经验,此时就不能认定其有过失。以监督义务为例,其并非要求无人驾驶汽车使用者实时监督汽车行驶。若经观测当前属于无人驾驶汽车专属路段,且根据社会理性经验可以信赖智慧交通不存在失序可能,那此时在车机系统正常稳定运行的过程中,乘坐人完全可以将精力转移至驾驶之外的其他活动。前提是的确有理性判断在先,有合理信赖的依据。这也意味着使用者所需倾听到驾驶活动中的注意力多取决于所在路段的状况。如果是城市繁华路段、乡间路段,道路存在行人通行的可能,使用者所需负担的注意义务就要高于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情境。

(二) 汽车制造商、设计者的罪与非罪

除了所有人、使用人,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也应当担负起从硬件生产制造、软件算法设计到投入流通整个过程的安全保障义务。只有严格且周全地把控人工智能车机系统,让刑法深入算法设计层面,才能有效防止系统内部风险外部化。^[14] 从

现有的规范体系而言,道路交通犯罪多属于侵害公共秩序的犯罪类型,具有行政犯(法定犯)的基本属性。我国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规制也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二元规制模式,刑事领域的道路交通犯罪多以行政违法行为为入罪前提。倘若通过增设行政犯的方式对人工智能车机系统的内部风险予以把控,就必然离不开行政与刑事二元规制模式。进言之,需要预先设立相应的行政违法行为,才能进一步增设行政犯的刑罚法规。此时,就应当以明确安全技术标准的行政规范内容为基准,赋予汽车制造商、设计者相应的产品安全保障义务。违反安全技术标准,也就同时违反了行政规范,或者说是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违法行为,此即入罪的前提和理由。行政规范中的安全技术标准,并不以全面了解人工智能车机系统算法为前提条件,也不需要汽车制造商、设计者将自己的算法内容变得透明,只需通过了解算法设计初衷与基本运行原理就可以满足治理需求,又称“鱼缸式透明度(Fishbowl Transparency)”^[15]。不仅如此,关于车机系统算法的安全技术标准,还可以按照行业需求不同以及危险程度的差异,来制定相应的白箱测试、黑箱测试^⑨结果标准。^[16]法律同样也可以要求制造商在汽车投入流通后,继续履行汽车售后的路况分析与安检义务。制造商、设计者生产未达标的无人驾驶汽车导致上路行驶后引发相关犯罪的,在利用信赖原则为汽车所有人、使用人提供出罪路径的同时,也要评价制造者、设计者可能的刑事责任。从责任主义角度而论,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担负上述安全保障义务的本质是一种瑕疵担保。因此在引申到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应当以严格责任为桥梁。

严格责任起源于英美刑法,多指在不能清楚认定行为人主观罪过或者没有必要证明行为人主观罪过时,只要实施了相应犯罪行为就足够追究其刑事责任。^{[2]156}以严格责任为依据设置的犯罪均为法定犯,并且多始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初衷。该责任理论早期在美国饱受诟病,多数人认为仅从行为本身来认定犯罪人主观意图的做法过于片面。例如“莫里赛特非法窃取政府财产”案,联邦基层法院与上诉法院一致认为行为人犯罪意图可以依据客观行为本身来认定。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如果犯罪意图属于一个犯罪的构成要素,则不能仅以行为本身作为评价依据,此时应当交由陪审团来评价这一要素内容。^⑩尽管如此,仍有部分人认为严格责任在刑事责任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面对社会重要且特殊的公共利益时,具有适用合理性。原因在于的确

存在一些情形难以清晰评价犯罪行为入罪主观故意或过失,但不是不能认定罪过的有无。例如“巴莱特贩卖毒品”案,被告人提出申诉认为公诉机关未能证明其主观属于明知是违禁药品但依然销售的故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麻醉药品管理法案的规范目的本身即蕴含着赋予行为人查清销售药品合法属性的义务,行为人不能以自己的无知和善意作为辩护理由。^⑪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而言,利用严格责任设计入罪思路是能够找到合理依据的:首先,智慧交通环境对我国而言是一个重要且特殊的公共场域,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该类型汽车所蕴含的危险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需求相比是可以被社会允许的。其次,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的可信赖程度决定着汽车本身的交通安全性,相较于所有人、使用人,制造商、设计者更有能力在源头控制这一风险。最后,严格责任制度貌似与责任主义违拗,实质上只要将其限制在混合过错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合理评价甚至提高司法实用性。将违反前置法的安全技术标准视为入罪依据与罪过来源,从而避免后续行为罪过在实务中难以评价的问题。尤其对于过失而言,这一主观罪过在无人驾驶汽车的实务案例中很难执行。^[17]换言之,刑法意义上的严格责任并非不要求主观罪过,而是在能够认定行为人存在罪过但是不能分明地评价为故意或过失时才适用。举例而言,假设制造商生产了质量不合格的无人驾驶汽车并将其投入流通,汽车最终上路使用并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制造商在生产之时对质量瑕疵的疏漏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可能无法查清。有可能制造商在生产环节存在监管过失,但其后为产品收益不愿意召回问题车辆,又具有放任的故意。对此,严格责任会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行政规范确立的安全技术标准与刑事意义的严格责任是构成二元规制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的基础,但这一入罪路径若不加限制仍然可能导致刑罚权泛滥,甚至施加给汽车行业过重的桎梏。制造商、设计者安保义务不能过高地要求制造、设计一方成为福柯全景敞视主义中的观察者,更不能要求其承担全部结果回避义务。^[18]此时,应当由技术中立原则支撑建立出罪路径。

198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索尼侵犯环球城市影音公司版权”案中确立了技术中立原则作为免责事由。^⑫此案中,索尼公司生产的录像机被购买者用于录制环球城市影音公司作品并将其售卖。环球公司认为,索尼公司在本案中为行为人提供了工具,

起到了帮助作用,理应一并承担侵权责任。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项没有质量瑕疵的产品或技术在投入市场流通之后,制造商、设计者不能预测出所有被用于非法用途或合法用途的情境。当这项产品技术被非法使用时,不能因为制造商、设计者提供了工具就认定其具有帮助关系或者对权益损害结果作出了贡献。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帮助犯正泛化现象也使得中立帮助犯成了学界研究热点,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必然要接受更多有用性大于危险性的风险。^[19]中立帮助行为罪与非罪的标准,是一个动态发展且需不断考察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一问题还应当以社会容许风险的最大限度作为考量基座。如果说社会需要人工智能来营造智慧交通环境,与此同时就必须接受该技术所伴随的风险,而不是通过刑罚予以遏制。具言之,若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尽到了安全生产义务和日常维修监管义务,交通事故在车辆没有质量瑕疵与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发生,就不能仅基于因果关系条件说来认定刑事责任,需要结合具体个案严格把握制造商、设计者是否对危害结果提供了原因力、影响力。在无人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利用无人驾驶汽车实施故意犯罪的场合中,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设计者是否成立帮助犯的问题应当考究其是否对故意犯罪创设的现实、紧迫危险作出了贡献,也即客观主义立场的限制处罚说。这种客观上的贡献又与前述算法规制和严格责任联系紧密,首先需要判断制造商、设计者是否违反了先前义务。除此之外,也需要恪守主客观一致原则来考量制造商、设计者的主观认识与期待可能性。

四、结语

科技发展推进社会演变,但法治建设仍须秉要执本。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驱动力,其对法学研究的影响举足轻重。恶性意志是刑法惩罚行为主观认识内容之根本,意识不自由从来都属于刑法应当考虑减轻、免除处罚的重要因素。面对智慧交通,本文冀望通过探寻责任认定路径,使传统刑法理论得以惩治相关利害关系人,治理新型道路交通犯罪。明晰人工智能刑法规制样貌,反对另辟体系,以维护刑法之谦抑。诚然,无人驾驶汽车也不过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冰山一角,责任论也至多算作是人工智能刑法学的总论部分。探知还需与发展并行,以实践证成理论之真谛。

注释:

①参见2021年3月13日,两会受权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 ②人脑拥有约860亿个神经元细胞,这些细胞之间形成的突触连接约有 22.5×10^{16} 个。
- ③“阿西莫夫三定律”出自科幻小说家艾萨·阿西莫夫的作品《我,机器人》。它规定了三点主要法则: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且确保人类不受伤害;第二,在不违背第一法则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 ④“通用型计算机”多指现今用于日常生活的平板电脑、台式电脑,由于结构固定,可通过不同软件来解决不同问题,故有“通用”之意。“通用型计算机结构”又称“冯·诺依曼结构”,主要包括“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和“输出”五大模块。
- ⑤《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定,自动驾驶是指汽车能够在没有驾驶员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在道路上驾驶前行。《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完全自动驾驶是指驾驶系统可以完成所有驾驶操作,完全不需要驾驶员介入。汽车工程师协会(SAE)规定的完全自动驾驶,是指不需要有人接管,系统自主解决所有驾驶过程中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汽车上可能根本没有有人,或者有人却完全不懂驾驶技术。
- ⑥2021年4月3日,访问于汽车网:<http://www.qqzone.com.cn/Wap/hynews/7011.html>。
- ⑦原《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机动车一方”是指机动车驾驶人、使用人,以及负有过错的机动车所有人。本文谈及的“使用人”包含驾驶人之意。
- ⑧(2020)皖13民终2792号,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8月15日访问于法律文书裁判网:<https://wenshu.court.gov.cn/>。
- ⑨白箱测试,是指通过产品内部工作状况的反馈,检验预设的算法是否能够达到预定的标准。黑箱测试,是指通过运行已经编制好的算法来检测各项功能是否能正常运行。
- ⑩Morissette v. United States, 342 U. S. 246, 72 S. Ct. 240, 96 L. Ed. 288 (1952). 2021年10月16日访问于LexisNexis: <https://www.lexisnexis.com/community/casebrief/p/casebrief-morissette-v-united-states>.
- ⑪United States v. Balint, 258 U. S. 250, 42 S. Ct. 301, 66 L. Ed. 604 (1992). 2021年10月22日访问于LexisNexis: <https://www.lexisnexis.com/community/casebrief/p/casebrief-united-states-v-balint>.
- ⑫Sony Corp. of Am. v. Universal City Studio, Inc., 464 U. S. 417, 104 S. Ct. 774, 78 L. Ed. 2d 574 (1984). 2021年9月30日访问于LexisNexis: <https://www.lexisnexis.com/community/casebrief/p/casebrief-sony-corp-of-am-v-universal-city-studios-inc>.

参考文献:

[1]山口厚.刑法总论[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 出版社,2018:193-196,254.
- [2] 约书亚·雷德斯勒. 美国刑法纲要[M]. 姜敏,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
- [3] 贾宇. 刑法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273-274.
- [4] 顾骏,许春明. 意志与责任: 法律人工智能[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
- [5] 马克昌,莫洪宪. 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551.
- [6] 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M]. 黄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0.
- [7] 张明楷. 刑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6.
- [8] 何荣功.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J]. 中外法学,2015(2):523-547.
- [9] 刘宪权. 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与刑罚体系的重构[J]. 政治与法律,2018(3):89-99.
- [10] 陈海虹. 机器学习原理及应用[M].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26.
- [11] 尼尔森. 人工智能[M]. 郑扣根,庄越挺,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30.
- [12] Kami A Chagal - Feferkorn. Am I an Algorithm or a Product: When Products Liability should Apply to Algorithmic Decision - Makers[J]. Stan. L. & Pol'y Re., 2019,30: 62-113.
- [13] 张明楷. 外国刑法纲要[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20: 209-210.
- [14] 赵秉志,詹奇玮. 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 关于人工智能的刑法学思考[J]. 暨南学报,2019(1):98-110.
- [15] Cary Coglianese, David Lehr. Transparency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J]. Admin. L. Rev., 2019,71(1):2-55.
- [16] Deven R Desai, Joshua A Kroll. Trust but Verify: A Guide to Algorithms and the Law[J]. Harv. J. L. & Tech. 2017,31(1):2-42.
- [17] David C Vladeck. Machines without Principals: Liability Rul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Wash. L. Re., 2014, 89(1):117-150.
- [18] 袁彬,徐永伟. “人机共驾”模式下交通肇事罪的适用困境及突围[J].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76-84.
- [19] 李灿. 风险社会背景下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探究: 基于德日刑法理论的对比考察[J].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S2):77-8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Will and Consciousness: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ilotless Vehicles

LIU Defa, BAI Yanan

(School of Law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riminal law theory, 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change of idea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Rece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his cutting-edge technology still needs to keep the trend of change, not only changing the original standard content, but also showing the stabl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n the premis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quipment does not have free will, the crime related to driverless cars should still be held accountable to the stakeholders. For the negligent crimes committed by car owners and users,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investigat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stablished crimes on the basis of supervision negligence and management negligence, and exclude the guilty cases with the principle of trust. For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nd designers, criminal law should consider the path of committing crim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lgorithmic regulation and strict liability, and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to limit criminal punishment.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ilotless driving;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path of removing guilty

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路径

章琦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深度伪造制造的虚假音视频,正在不断地重塑大众对于真实的认知,并可能瓦解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状体现出其可能对自然人、法人、国家和社会的潜在威胁,深度伪造风险的严峻性、隐蔽性和多样性导致现有规制路径的局限和治理困境。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干预,避免该技术滥用紧急且必要,作为颠覆性技术的深度伪造的现实风险需要对其治理进行顶层设计,而民法、行政法規制的有限性和刑法规制的正当性要求特定情形下的刑法规制以维护数字社会的基层信任和网络。

关键词:深度伪造;人工智能;网络犯罪;数字社会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0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62-05

数字化时代,新技术的赋能激发了社会新气象,尤其是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便利且丰富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与此同时也增多了虚假信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数字社会中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信息加剧了人们辨别虚假信息的困难程度。《民法典》通过保护个人肖像权能够间接对深度伪造的滥用予以约束,但是极其有限;《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的打击,但是深度伪造(Deepfakes)技术的发展为编造“真假难辨”的虚假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目前对作为人工智能发展下的深度伪造技术的关注更多集中于发展科技的视野中,缺乏对技术本身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网络秩序甚至是社会混乱等风险的评估。本文立足于现行监管逻辑和法律体系,分析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风险及其特点,从深度伪造的现有规制所面对的难题出发,分析民法和行政法处理特定深度伪造情形的有限性,在积极刑法观下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正当性,并初步构造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具体设想。

一、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社会风险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中立技术被滥用时则可能

意味着技术升级增加犯罪现实危险性。利用深度伪造技术构建虚拟现实场景打破了大众对于“眼见为实”的普遍认知,在网络占据人们广泛日常空间的当下,对于个人数据隐私和安全保障不力与深度伪造技术野蛮生长并存,深度伪造技术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网络空间,对犯罪具有颠覆性影响效果。

(一)高度真实性下增加犯罪既遂的可能性

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对“眼见为实”社会信任发起挑战。深度伪造技术和精准个人信息的结合,无论是针对公司、个人的诈骗还是利用个人的虚假色情音视频以及其他对公司、个人名誉有损害的敲诈勒索类型的犯罪,都将提高犯罪行为人得手的可能性。因为目前对深度伪造音的打击仅仅要求网络平台的打击,只有在通过邮件、通信平台进行传播构成犯罪的情形下才能够对虚假音视频进行打击,造成对于被伪造者保护乏力的困境,即要么让行为人得逞,可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要么让行为人掌握被伪造音者对其社会身份有影响的音视频。而技术的快速迭代则意味着“虚假”越来越“真实”,以现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为例,是犯罪人以虚构真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

收稿日期:2021-12-20

作者简介:章琦(1998—),女,河南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因被害人的自我处分行为最终导致财产的损失,因此蕴含着被害人过错的因素。但是如果被害人完全没有识别出虚假的可能性之下,是否仍然能够称其为存在被害人过错,值得思考。

(二) 深度伪造作为网络行为的极端隐蔽性

网络社会导致犯罪边界被打破。^[1] 深度伪造技术的商业化泛滥,可以将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的人分为深度伪造技术的研发者和深度伪造技术的使用者。就深度伪造技术的研发者而言,其有能力研发深度伪造技术也就意味着能够利用自身技术实现网络浏览和网络匿名化。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造虚假音视频的人,尤其是有意使用深度伪造音视频来造成社会冲突或实施犯罪时,相比于一般网民往往具有更强的利用计算机知识使自己的网络行为匿名化及难以追踪的能力。由此,在对深度伪造音视频检测还不甚成熟的前提下,想要探寻到深度伪造技术的实际研发和使用者极其困难。

(三) 深度伪造制造风险的多样性

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的高度真实性对于“真实”概念的挑战,导致深度伪造技术风险的多样性。当其被用作侵犯具体权益的工具时,则存在侵犯公民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社会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危险。此外,深度伪造技术对社会信任基础的颠覆作用也是一个不能避开的问题。当深度伪造技术成为一个广泛且日常适用的技术时,就会造成社会底色中“所见即所得”变色,甚至动摇,尤其是在个人信息保护不周全的背景下,可能颠覆人们的日常判断。

二、深度伪造的现有规制及难题

信息化浪潮下,为把握住此次发展的机遇,国家在保障基本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主要持包容态度,因此对深度伪造技术更多的是一种防卫性质的规定,采取消极的立法和规制模式,出现在零星的法律和规范中。

(一) 现有规制路径

《民法典》第 1019 条表明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行为的侵权性。《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对利用如深度伪造技术制作、发布、传播的音视频信息应当以显著方式予以标识。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虚假音视频并不标识的,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以显著方式标识后可继续传输。对于利用深度伪造技术产生的虚假音视频的鉴别责任在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即平台一方,并有利

且有责任对虚假音视频进行处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生产者和平台不得利用包括深度伪造技术在内的新技术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否则由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约束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研发、利用和传播的法律,而是从保护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等角度,对深度伪造虚假信息的创作、发布和传播进行规范和约束。^[2]

(二) 现有规制的局限性

目前法律在面对新兴技术时,显然是站在企业和平台一方,对于企业和平台收集信息以及被收集信息的去向缺乏打击力度,反而是在保护企业和平台的收集行为。而深度伪造之下则造成了个体在面对被收集时的完全“裸奔”。^[3] 对于单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音视频的情况,现有的规制路径要求音视频发布者进行显著标识,当平台发现深度伪造的音视频没有进行标识时,应当叫停该音视频的传播,在发布者进行显著标识后仍能够继续发布该音视频。也就是说,对于深度伪造音视频的监测的权利和义务均在平台一方,而这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一,深度伪造技术所产生的音视频并不完全是通过狭义网络平台进行传播。此处所指的狭义网络平台有权对在其平台传播的音视频进行检测并进行技术分析。例如绕开网络平台利用电子邮件或者私人电话的方式传播虚假音视频的情况下,现有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规定落空。

第二,要求平台承担起深度伪造技术的检测本身并不现实。深度伪造技术的特性之一就在于其难以检测性,就一般网络平台而言,往往依靠“技术+人工”的检测方式,随着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的完善,平台并不一定能够承担起检测的责任。从《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来看,其对平台的要求也只是发现之后应当叫停音视频的传播,如果平台本身并没有发现,似乎平台就不需要承担制止该音视频传播的责任。此外,深度伪造音视频的传播与网络平台本身的商业性追求并不相符。深度伪造技术的高度真实的虚假性,往往能够更加引起音视频点击者的注意。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是真实消息传播速度六倍的网络环境和以点击、点赞、评论、转发为评价标准的网络平台模式,平台本身并没有减少自己流量分成而规制音视频数量的动力。^[4] 随着深度伪造技术的商业化和大众化发展,其适用途径将不

仅仅是面向社会媒体和互联网相关的领域,而是渗透进个人生活中,科技商业化的特征表明仅仅要求科技去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太现实的。

第三,缺乏对深度伪造技术增加犯罪既遂可能性的关注。如前所述,深度伪造本身所追求的即是其“以假乱真”,该项技术在诈骗、敲诈勒索等罪的适用中将极大提高犯罪的既遂可能性,尤其是该项技术的发展逻辑和迭代所追求的即是让人不能判断真假,作为一种具有隐蔽性的音频、视频插件更加容易让人陷入错误认识,但是目前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关注则更多放在最终造成受害结果之上,而对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容易使人陷入认识错误,最终导致错误处分缺乏必要关注。

(三) 深度伪造的治理困境

互联网犯罪因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导致仅仅依靠与上传音视频相关的源数据追踪到深度伪造音视频的制作者是不够的。此外,如果该项技术所使用的服务器本身属于借用或盗用他人服务器的情况时,对于深度伪造制作者的追踪将更加困难——那些能够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行为人往往也有能力和技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匿名化处理。而基于互联网的全球性,深度伪造音视频的制作者可能位于其所上传平台管辖国之外的地域。一旦深度伪造成,法律往往缺少有效的方法制止其传播,也即深度伪造滥用的危害性是和其行为本身同时存在的。

我国网络信息监管体系主要包括四个层次:行业监管、平台把关、社会监督和网民自律。四个层次的赋权上,出于网络发展的需要以及平台中立观念的原则,更多是依靠社会监督和网民自律。这实际上是不科学也不可行的,行业内部尚存在着深度伪造检测的困境,要求社会和网民识别深度伪造音视频自然不可能,而被深度伪造的对象发现时,危害结果已经造成,再去进行反向破解,就缺乏对深度伪造滥用的预防机制。

三、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合理性与设想

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需要坚持刑法谦抑性为中心^[5],同时也需要以新理念进行应对。要求网络平台和科技公司自行监督和监管的现状低估了对于技术滥用风险的评估,民事、行政规制的有限性和传统犯罪借助网络和人工智能进行变异之下,需要以积极的刑法观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规制。

(一) 民事、行政规制的有限性

由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创建者往往采取的是匿名的方式实施违法的行为,且对深度伪造技术的检测还处于发展阶段,个人并没有自主检测的工具。而

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符合起诉条件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网络环境的开放性和无形性,侵权主体的分散性以及网络空间的无形性,都成为个人在面对网络侵权维权时的绊脚石。网络侵权的救济手段的单一性,且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侵权影响的二次发酵,司法诉讼的成本高和时间长等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个人在网络维权时的困难重重。^[6]“谁受害、谁通知、谁服务、谁取下”的规定,过分要求受害者主动发现予以维权,导致平台和政府监管在此侵权链条中的缺失,网络对于“附近性”的消解,个体在网络空间“他者”概念的空缺,真实空间中的“道德感”和“秩序感”的减弱,都不断降低网络侵权的成本。随着智能城市的建设,改变了原本个体参与网络生活的可选择性,人脸识别作为许多小区、单位的门禁系统,涉及肖像的信息在网络系统上渗透。而目前对于网络信息的监管模式则更多是网络平台向监管部门报告,通过计算机产生的深度伪造音视频并不一定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传播,导致行政监管的落空,且在行政监管更多是针对行业、商业主体而非自然人个体的现状之下,对于个人面对深度伪造的侵权显得无助。

由此可见,尽管民事补偿途径可以作为个人维权的途径,但是在互联网本身的跨国、跨省和匿名的背景下,要求作为深度伪造的受害人主动维权是过于沉重的负担,诉讼程序的繁杂性和长期性可能导致即使收到道歉和赔偿对于受害者而言也没有太大意义。而行政手段的监控,面对商业主体和行业的现状,以及通过计算机产生的深度伪造音视频不一定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的监管乏力,让深度伪造技术之下的个人权益保护落空。

(二) 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正当性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以寻衅滋事定罪处罚。这确立了刑法对于网络空间秩序与线下空间的统一对待的处理方式。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3.81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8个小时,网络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必需,互联网充当着重要的社会职能,网络秩序亟待重视。刑法的存在理由与机能是通过报应刑内的科刑预防将来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但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法益变得亟待保护。^[7]深度伪造作为一项专门创设虚假的技术,虽然对于

作为一些有益技术的中间技术具有价值,但是其欺骗性本身在检测技术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精度的情况下,就具有损害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如果人们能够利用虚假的技术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且不会受到有效及时的惩罚,那么自然会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从而消解社会的信赖体系。

虽然从表面上看深度伪造只是在技术上为虚假信息、诽谤、敲诈勒索、诈骗等犯罪增添了一种新型手段,并不是一个独特的问题,然而当商业公司或平台通过营利为目的提供给大众一种增加社会虚假信息的工具,甚至是可能引发社会信任基础和网络秩序瓦解的工具时,自然应当特殊对待。此外,风险社会之下,尤其是网络全面侵入公民生活之下,公民对于风险的感知通过媒体、社交网络的传播更加直接、强烈,由此产生对于国家治安形势恶化的感知。基于“破窗理论”,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对于自身行为的规制感直线下降,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高度技术化,个体在其中对于自身主体性的控制愈发下降。一方面,深度伪造技术的异化消解了对于“眼见为实”的社会信任,尤其是针对政府工作人员、公众人物、亲属之间的深度伪造,将导致社会基础认知体系的瓦解;另一方面,深度伪造一旦被利用,基于互联网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法律难以控制和阻止其危害的弥散。因此,对深度伪造的规制应尽可能在事前或事中,将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遏制在源头。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与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的层面上,虽然目前在简体中文媒体上很少对深度伪造技术的报道,但是深度伪造所造成的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和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已经引起了英、美、俄等国家的关注,并且美国在其专门针对深度伪造技术的立法,即《2019年深度伪造报告法案》中特别强调国家情报局和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提交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深度伪造技术的研发情况的报告,由此可见美国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关注,也透露出对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担忧。基于此,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刑法规制具有正当性。

1. 域外深度伪造刑法规制情况

2019年,美国国会提出《深度伪造责任法案》和《2019年深度伪造报告法案》两部法律草案,对深度伪造技术采用刑事犯罪视角的规制。其中《深度伪造责任法案》对三类行为规定了不超过5年的刑事处罚:(1)未对作品进行水印标记,且具有羞辱他人的主观目的,提供含他人虚假的性行为或者裸体的视频的;(2)意图造成暴力或者身体伤害、引发武装或者外交冲突,或者干扰政治运作,包括选举,威胁

社会信任的;(3)受外国势力或者代理人指示,意图介入国内政治争议,影响联邦、州或其他的选举,以及实施其他不法行为的。法案还规定了深度伪造的被害人有权采用各种救济措施。2019年2月和10月,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分别签署了《犯罪欺骗性记录》(*Crimes: Deceptive Recordings*)和《选举:欺骗性的音频和视觉媒体》(*Elections: Deceptive Audio or Visual Media*),分别禁止“深度伪造”用于传播色情内容和帮助政治选举。

欧盟虽然没有出台直接针对深度伪造的立法或者相关法规,但是其通过《欧盟不实信息实践准则》和《可信赖AI伦理指引》的方式将深度伪造纳入规制范围,并直接把深度伪造作为虚假信息进行管理。^[8]其中,2018年6月通过的《欧盟不实信息实践准则》附件中列出对不实信息的应对做法,通过“行业—利害关系人—消费者”的模式降低虚假信息可能带来的危害。^[9]

2. 我国深度伪造刑法规制设想

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刑法规制存在两种选择路径。一是在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传播但不进行显著标识,或者提供给大众可以用来制作深度伪造的音视频的工具/平台但可通过购买等方式不进行标识时,情节严重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刑法就进行干预,以避免在不断传播中加剧虚假传播的影响或者利用该音视频实施下一步危害行为。二是对于仅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传播或提供深度伪造技术的开发者/平台,但不进行显著标识的行为不进行干预和处罚,等到实际危害后果发生后,按照具体的实害结果是否符合刑法的规定来定罪量刑。显然后一种做法忽视了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的危害性,并且也没有考虑利用此项技术对于网络秩序所带来的破坏力。深度伪造技术的风险多样性、多元性和其产生的音视频的难以检测性,以及基于深度伪造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暴力和民意诱导,都将对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秩序产生巨大伤害。通过点击和个人算法的网络商业模式,社交媒体更多按照用户的兴趣和喜好来进行推荐,深度伪造音视频的猎奇性和新鲜性,以及通过深度伪造所营造出来的“熟悉感”和“附近性”,对于吸引用户而言具有“良好”效果。诚然,深度伪造技术在一些领域具有潜在的价值,然而在尚未存在恰当和有效的监管方式的情况下,允许个人可随意使用该项技术,则更是在没有防御武器之下的“引狼入室”。^[10]

具体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深度伪造行为包括:(1)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破坏社会信任的行为,即深

度伪造产生的虚假信息本身侵犯法益的行为;(2)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盗用他人身份的行为,即滥用他人身份性信息,捏造他人虚假行为。对于前者是深度伪造技术本身指向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因此应该强调规制性刑法。通过对技术本身的限制性规定,要求发布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的音视频必须标注该音视频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所合成,否则在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如大范围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就构成犯罪。对于后者是借助深度伪造技术侵犯他人法益和社会法益的行为,因此应该强调法益侵犯性,以借助深度伪造技术最终侵犯的法益确定性作为影响量刑的标准,尤其是针对在诈骗、敲诈勒索、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中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的情况,应当考虑深度伪造技术对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予以定罪量刑。

四、结语

国家应当积极干预对于可能危害公民正常生活秩序的行为,不能够将其完全留给受害者,让受害者自行寻求民事救济,尤其是针对网络行为侵犯个人权益的行为,要求个人在现行民事诉讼体制之下寻求救济并不可行。而放任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做法则只会让互联网重返丛林社会,并进而消解个体对社会体系的信任。风险社会之下要求更多层次对于新兴技术的治理,“科技向善”的希望之下蕴含着对法律积极规制的需求。换脸软件 ZAO 被叫停之下,

并不能够完全制止技术的继续蔓延,因此应当以更加前瞻性的思考来应对新技术的发展,并以更加积极的刑法态度来维护公民的生活秩序。

参考文献:

- [1] 刘宪权. 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刑法规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J]. 法学家,2016(6):105-119.
- [2] 白国柱,王蓓蓓. Deepfake 技术监管政策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及建议[J]. 信息安全研究,2020,6(5):454-457.
- [3] 卢阳旭,何光喜. 我国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基于科技公共治理视角[J]. 行政管理改革,2019(8):29-36.
- [4] 陈昌凤,徐芳依. 智能时代的“深度伪造”信息及其治理方式[J]. 新闻与写作,2020(4):66-71.
- [5] 张明楷. 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谦抑性为中心[J]. 人民检察,2014(9):6-12.
- [6] 王禄生. 论“深度伪造”智能技术的一体化规制:从“杨幂换脸视频谈起”[J]. 东方法学,2019(6):58-68.
- [7] 张明楷. 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J]. 现代法学,2020(5):150-166.
- [8] 石婧.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治理模式比较研究[J]. 电子政务,2020(5):69-79.
- [9] 辛嘉. 两条路径:欧美的规制实践[J]. 检察风云,2021(12):18-19.
- [10] 凯文·沃巴赫,林少伟. 信任,但需要验证:论区块链为何需要法律[J]. 东方法学,2018(12):83-11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On Criminal Law Management Approaches to Deep Forgery

ZHANG Qi

(Law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Fake audio and video created by deep forgery is constantly reshaping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truth and may disrupt the foundation of trust in society as a whole. The current state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eep forgery technology reflects the potential threat it may pose to natural and legal persons,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severity, concealment and diversity of the risks of deep forgery lead to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gulatory paths and governance dilemmas. Intervention in deep forgery to avoid the misuse of this technology 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he real risk of deep forgery as a disruptive technology requires a top-level design for its governance, while the limited nature of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legitimacy of criminal law require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in specific situations to maintain trust and stabili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of the digital society.

Key words: deep forgery; AI; Cybercrime; digital society

抗战时期国统区警察薪酬待遇问题研究

——以四川省会警察局为中心

曹发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各地经济形势日趋恶劣,严重影响了警察的生活,为了维持警察队伍的稳定,当局采取了包括提高警察薪金、发放生活补贴和食米等方式来提高警察的待遇,这些措施对于保障警察的基本生活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大量增发货币,在国统区各地造成了持续性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的速度远远超过工资的增长速度,加上警察局内部收入差距悬殊,一直到抗战结束,省会警察局长、警夫役等基层警务人员生活贫困的状况都没有得到明显改观,以致警察逃亡的现象愈演愈烈。

关键词:抗战时期;警察;待遇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1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67-05

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大片国土陷落敌手。中国沿海各地相继沦陷后,国外对中国物质运输的海上通道几近中断,国统区各地逐渐陷入物资缺乏的境地。同时,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国民政府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严重,为了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此种恶劣的经济形势对包括警察在内的公职人员的薪酬待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进而影响了警察的生活。本文以四川省会警察局为例,研究抗战时期通货膨胀背景下警察的薪酬待遇情况,希望能窥一斑而见全貌,对此类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一、警察薪酬待遇概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官和长警^①适用不同的工资制度。警官所领报酬称为“俸”,警长警士所领报酬称为“饷”。由于时局动荡和国家政治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警官的“官俸”和长警的“薪饷”各自适用的标准也都不尽相同。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的《警察官官等表》,将警官分为三

个任别、七等,共十六级。其中一、二等为简任,内分四级;三、四等为荐任,内分五级;五至七等为委任,内分七级,并规定警官的俸额由其官等决定,不受地区差别和警察机关经费多寡的影响。《警察官官等表》实施后,内政部于1929年又公布《文官俸等表》,规定文官官俸标准。由于《文官俸等表》规定的文官官俸标准明显高于警官俸给,引起了警界的普遍不满,以致国统区各地提高警官官俸的呼声很高。在各省代表的倡议下,1932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决议“警察官俸给应昭文官俸给表支給”。根据此项决议,1934年5月,内政部参照文官俸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警察机关的实际情况,公布了新的《暂行警察官官等官俸表》,将警察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4个任别,共36级,并重新规定了不同等级的警官的薪俸支給标准。虽然《暂行警察官官等官俸表》规定,省会公安局长为荐任五级至一级,其薪俸为一百八至四百元;局长以下设秘书、科长、督察长、训练官、分局长、督察员、技术员、科员、队长、队副、分队长、分局员、技佐、医官、巡官、侦探、办事员等,均为委任职,俸额依其等级从五

收稿日期:2021-12-19

作者简介:曹发军(1968—),男,河南信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

十五至二百元不等。^{[1]694-696}但是,由于当时四川政局还未完全稳定,四川省会公安局^②还靠收取捐税来筹集经费,处于自收自支状态,财政收入不足且不稳定,自然无法按照官等官俸表来发放警察官俸禄。1935年初,川政实现统一。当年7月,四川省政府颁布《四川省整顿警务暂行通章》(以后简称《通章》),开始着手整顿四川警政。《通章》不仅明确规定:“省会公安局及各市公安局之经费准照部颁确定警察经费办法由省政府统收统支”,而且还规定“省会公安局各级警察官准照部颁警察官等官俸表

表1 警长警士薪饷表(单位:元)

	警长						警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甲种	50	47	44	41	38	35	32	30	28	20	24	22
乙种	40	37	34	31	28	25	23	21.5	20	18.5	17	15.5
丙种	33	30	27	24	21	18	16	15	14	13	12	11

资料来源:《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警察法令》,首都警察厅警察训练所民国36年3月印,第101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第3-2-89号。

《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将“长警薪饷分甲乙丙三种”,但“以何种支給,由各级警察机关视其服务地方经济状况及实际需要编订”。据此,《四川省整顿警务暂行通章》比照部颁《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规定:“省会暨各特种公安局各市县之警饷,警士分为三等,一等警士月饷13元,二等12元,三等11元;警长亦分为三等,一等警长月饷19元,二等17元,三等15元,但因地方情形得呈准省政府减少开支。”^{[2]79-81}很显然,《四川省整顿警务暂行通章》规定的长警薪饷标准要远远低于内政部颁布的《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规定的标准,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标准,四川省会公安局也未完全遵照执行,长警的实际待遇为:一等警士实支月饷12元,二等9.6元,三等8元;一等警长实支月饷24元,二等20元,三等16元。^{[3]10}

1937年9月,由于抗战爆发,四川省政府根据上级要求,飭令四川省各级政府机关压缩经费开支。四川省会警察局随即发布《本局规定国难期间职员薪俸》,规定:“自九月份起,月薪未超过30元之职员,准仍照预算开支,其超过30元之月薪,以七五折支給,有不公平之待遇时,得由该局在核定预算数字内,酌量增减,……凡每月实支在30元以下者,自应免除折扣,在30元以上,40元以下者,折扣另表附发,在四十元以上者,自当遵照通案,七五折扣。”^{[4]12}但是,鉴于“警士薪饷本属低微,不足以资贍给”,省会警察局报请省政府核准后,拟从1937年12月1日起提高警士待遇:“除一等警士仍支饷12元外,二等警士月支饷11元,三等警士月支饷10

叙俸,但得以省令减呈开支。”^{[2]79-81}之后,由于有省政府提供经费,四川省会公安局才有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并开始参照部颁警察官等官俸表发放警官俸禄。

至于长警的薪饷,在1934年11月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完全由各地自行裁定。1934年11月内政部颁布《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后,长警薪饷方有全国统一的标准。《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为长警规定了甲、乙、丙三种薪饷标准,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元。”^{[4]12}经过此番调整后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夫役薪饷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四川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夫役待遇一览表(单位:元)

职务	月额	实支
局长	400	240
秘书、科长、督察长、分局长	160	96
会计主任、出纳主任、庶务主任、警训所长	140	84
一等科员、一等督察员	90	54
二等科员、二等督察员、一等局员、习艺所长	70	42
三等科员、三等督察员、二等局员、一等巡官、会计员、拘留所管理员、渣滓船管理员、迷失济良所管理员	50	32
二等巡官、一等办事员	30.6	30.6
三等巡官、书记、二等办事员	28	28
一等警长、三等办事员、教官	24	24
二等警长	20	20
三等警长	16	16
一等警士	12	12
二等警士	11	11
三等警士	10	10
公差夫役	7	7

资料来源:《四川省会警察局造具员警夫役待遇一览表》,成都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93,目录号:1,案卷号:89,第15页。

表2显示,四川省会警察局实行等级工资制,警官的薪俸标准和长警的薪饷标准随等级的降低而逐步降低。根据规定,警察局内部凡月薪在40元以上者月薪都有不同程度的压缩。经过调整后,局长的月俸是240元,秘书、科长、督察长、分局长月薪为96元,会计主任、出纳主任、庶务主任、警训所长等月薪是84元,其他绝大多数职位月薪都在50元以下,占人员大多数的办事员、警长、警士、公差、夫役等待遇微薄,其薪酬标准从24元到7元不等。尽管在此次调整中,教官、办事员、警长、警士、公差、夫役

等月薪饷在 40 元以下者,薪饷标准没有被压缩,原先待遇偏低的警长、警士的饷额甚至还有小幅上调,但警察局内部薪酬待遇差距悬殊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薪俸最高的局长和薪饷最低的警士之间薪金收入差距仍然高达 30 倍之多。

二、通货膨胀背景下警察的薪酬状况

抗战爆发后,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国统区各地的物价在经历战争初期的短暂稳定后便开始了长时期的持续暴涨。地处大后方中心地带的成都从 1939 年起物价就开始暴涨,此后便快速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漩涡。抗战时期,成都物价上涨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显示,成都的物价在经历 1937、1938 年两年的徘徊后,从 1939 年开始,成都物价上涨步伐明显加快并呈现全线上涨态势,到 1941 年时,物价即开始呈现非理性的暴涨,恶性通货膨胀的魅影显露无疑。在物价暴涨的形势下,由于货币工资没有相应的提高,警察的实际收入大幅缩水。物价的暴涨严重侵蚀着货币的购买力,不仅使那些收入微薄的工人和其他城市贫民生计艰难,陷入严重的生存危

机,也使警察局那些官阶较低的警官和长警依靠薪金不足以维持生活,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1942 年 11 月,四川省会警察局总务科曾根据当时的物价情况绘制了一份长警、夫役收支比较表,这张表基本上真实地反映长警、夫役的实际收入状况和当时的生活境遇,现照录如表 4 所示。

表 3 1937—1945 年成都趸售物价指数(1937 年上半年 = 100; 公式:简单几何平均)

年代	总指数	粮食类	衣着类	燃料类
1937 年	103	98	108	99
1938 年	128	95	162	104
1939 年	225	113	348	194
1940 年	665	395	1000	766
1941 年	1769	2013	2032	1978
1942 年	4559	3799	7704	5955
1943 年	14720	11198	30489	22446
1944 年	56965	41405	104193	88326
1945 年	170397	102475	222050	293008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编《中国抗战时期价格史料汇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87—305 页。

表 4 长警、夫役收支比较表(薪金单位:元,食米单位:斗)

职级	月收入				现实物价每名每月应支						比较约计	
	月总收入	饷额	副食费	食米	月总支出	柴、菜	洗衣	剃须	草鞋	食米	盈余	不敷食米
一等警长	50.4	42	8.4	2.75	58	30	10	3	6	3	-7.6	0.25
二等警长	46.4	38	8.4	2.75	58	30	10	3	6	3	-11.6	0.25
三等警长	42.4	34	8.4	2.75	58	30	10	3	6	3	-15.6	0.25
一等警士	38.4	30	8.4	2.75	58	30	10	3	6	3	-19.6	0.25
二等警士	36.4	28	8.4	2.75	58	30	10	3	6	3	-21.6	0.25
三等警士	34.4	26	8.4	2.75	58	30	10	3	6	3	-23.6	0.25
公差	62	14	48	2.5	58	30	10	3	6	3	4	0.5
夫役	61	13	48	2.5	58	30	10	3	6	3	3	0.5

资料来源:《四川省会警察局三十一年度长警夫役收支比较表》,成都市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93,目录号:1,案卷号:179,第 82 页。

表 4 显示,根据当时的物价,普通人维持最基本生活每月需支出 58 元法币和 3 斗食米,而长警、夫役的月薪除 2.75 斗食米外,一二三等警长每月的薪金分别是 50.4 元、46.4 元、42.2 元,一二三等警士的薪金分别为 38.4 元、36.4 元、34.4 元,公差和夫役的薪金分别为 62 元、61 元。在身处省会警察局底层的警务人员中,除副食补贴稍高的公差、夫役依靠薪饷还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外,所有等级的长警每月的薪饷都不足以支付买菜、买柴、买草鞋、洗衣、剃须等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费用,所得薪金入不敷出,生活陷入困顿。

三、当局应对通货膨胀改善警察待遇的措施

由于物价暴涨,身处警察局底层的警长、警士微薄的薪金不足以谋生,导致四川省会警察局长警逃亡案件频繁发生。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仅 1941

年一年,四川省会警察局就有 916 名长警逃亡,逃亡长警数量占编制总数的 49.7%,有接近编制半数的长警逃亡。由此可见,当时警察逃亡的现象十分严重。大量警察逃亡,造成警局内部人心思逃,严重影响了警察队伍的稳定,进而影响到警务工作的开展。由此,警界内外呼请提高警察待遇之声高涨。例如,1941 年,在第三次全国内政会议上,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方超向大会提交了题目为《拟请提高警察之待遇以改善警察之素质加强警察之力量而应抗战之需要请核议案》的提案,强烈要求提高警察的待遇。他在提案中说:

我国警察待遇照 23 年行政院、内政部规定之“暂行警察官官等俸表”与“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已未免太薄。自抗战以来,物价飞涨,工资增高,政府亟谋救济,

经于去年实行粮餉划分,然而巡官之粮餉,生活津贴合并计算,尚不能与人力车夫相比,警长、警士则仅有餉银十数元,食米双市斗一斗二升五合,个人温饱已觉困难,遑论仰事俯蓄,因此,官警多数改业,尤以警长警士之逃亡数字激增,而又无从招募补充,是则非为不能吸引与罗致优秀之人才,以谋改善官警之素质,且不能保留原有之优秀官警,若长此以往,恐智力低劣者亦不能久安其位,而另谋劳动职业,警政前途与后方治安不堪设想,现在为谋改善警察官警之素质,防止警察官警之改业,以加强警察之力量,维护社会之安宁,而应付抗战之需要,对于警察官警待遇之改善实急切而不容稍缓者也。^{[5]10}

其实早在方超在内政会议上提交上述提案之前,内政部就已经电令各省府:

当此物价腾涨,生活增高之际,全国各省市警察人员之待遇,极为菲薄,殊难维持其生计,值此抗战时期,后方各地,竭赖警察维持地方治安与秩序,警察人员之待遇,亟应提高,内政部现已分函各省政府,从二十九年度起,一律酌量情形,增加警政人员之待遇。^{[6]42}

四川省当局根据这一要求,即把提高警察待遇作为健全警政以适应战时需要的重要步骤。1940年当年四川省就开始着手提高警察待遇。鉴于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当局在根据警察职级普遍提高警察底薪的同时,还按规定给每个人都发给一定数量的生活补助费和食米,这样四川省会警察局警察的薪俸就由三部分组成:底薪、生活补助费、食米。然而,由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实在太快,警察薪金提高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之后,国民政府又进一步加大改善警察待遇的力度。为了提高警察待遇,1942年,国民政府内政

表6 1945年四川省会警察局官员待遇(薪金单位:元)

项目	原薪	薪金共计			薪俸加成数			生活补助费		
		一至二月	三至七月	八至十二月	一至二月 加成12倍	三至七月 加成35倍	八至十二月 加成90倍	一至二月	三至七月	八至十二月
局长	600	10200	28000	66000	7200	21000	54000	3000	7000	12000
主任秘书	240	5880	15400	33600	2880	8400	21600	3000	7000	12000
督查长、分局长、科长	220	5640	14700	31800	2640	7700	19800	3000	7000	12000
教员	60	3720	9100	17400	720	2100	5400	3000	7000	12000
雇员	55	3660	8925	16950	660	1925	4950	3000	7000	12000

资料来源:《员官待遇》《四川省会警察局统计年鉴》(三十四年度),第7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第3-2-105号。

表6显示,1945年1—2月、3—7月、8—12月三个时段,四川省会警察局警官的薪俸加成数分别

部再次重新修订了警长、警士薪餉表,将警长、警士的餉额提高了二分之一到一倍,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还决定,警察人员待遇除依官俸表、薪餉表予以提高外并按当地物价指数增加生活津贴,与公务员同。^{[1]698}此后,随着物价的暴涨,警察的薪金和生活补助费也大幅提高。在普遍提高警察待遇的同时,四川省政府还根据长警待遇偏低的实际情况,着重提高长警待遇。1944年,四川省开始发放长警生活补助费,最高为1800元,最低为1200元。如此,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四川省会成都乃至整个国统区就陷入了物价和薪金轮番上涨的怪圈,到1944年时,四川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的账面收入已经是抗战初期的数倍了。1944年,四川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薪俸、薪餉和生活补助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1944年四川省会警察局员官长警待遇(薪金单位:元,食米单位:斗)

项别	等级	薪俸	生活补助费		食米	
			共计	原支		加额(斗)
局长	-	2100	1000	500	500	10
主任秘书		1200	1000	500	500	10
分局长、督察长、秘书、科长、分局长	-	1100	1000	500	500	10
会计主任、统计主任、户政主任						
户政副主任、车务主任、大队长	-	900	1000	500	500	10
科员、督察员、局员、会计员、医官	-	750	1000	500	500	10
办事员	1	500	1000	500	500	10
警长	1	65	1800		30	5
	2	60	1700		30	5
	3	55	1600		30	5
警士	1	50	1500		30	5
	2	45	1400		30	5
	3	40	1200		30	5

资料来源:(1)《四川省会警察局职官待遇》,《四川省会三年来警政统计简编》,四川省会警察局统计室1944年11月编印,无页码。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类”3-2-106。(2)《四川省统计年鉴》(1946年,第三分册),第66页。

此后,随着物价持续暴涨,警察的薪金和生活补助费每个月的数额都创新高。1945年,警察的薪俸加成数和生活补助费更是每隔数月都要大幅度提高。具体情况如表6所示。

是基本俸额的12倍、35倍和90倍,生活补助费分别是3000元、7000元和12000元。四川省会警察局警察的账面收入在数月内实现了翻几番,相对于日益高涨的薪金加成数和生活补助费,警察薪俸表上所规定的薪俸反而日益显得微乎其微了。

四、结语

抗战时期,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对警察生活造成的影响,根据国民政府的饬令,四川省会警察局通过增加警察薪金标准、发放生活补助费和粮食等办法来保障警察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些措施对于稳定警察队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恶性通货膨胀笼罩下物价暴涨的速度远远超过工资增长的速度,加上警察局内部收入差距悬殊,一直到抗战结束,处于警察局最底层的长警、夫役生活贫困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由此引发的长警逃亡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恶性通货膨胀下,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的处境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注释:

①长警是警长和警士的统称,其地位比较低微,不入官阶等

级,不属于“官”的范畴。

②根据《各级警察机关编制刚要》的规定,1937年1月1日后四川省会公安局改称四川省会警察局。

参考文献:

- [1] 朝廷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94-696.
- [2] 四川省整顿警务暂行通章[Z]//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14):79-81.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54,案卷号:9111.
- [3] 四川省会公安局警察训练所第一期毕业纪念册[Z]//四川省会公安局警察训练所教务处,1936(10):10.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24,案卷号:32.
- [4] 本局规定国难期间职员薪俸[Z]//警察半月刊(第四期).四川省会警察局总务科,1937(12):12.
- [5] 奉令呈寄内政会议提案伏祈审核由[Z]//《中华民国30年11月》,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93,目录号:2,案卷号:74.
- [6] 内政部函电各省政府提高警察待遇[Z]//警声(第四卷,第一期),1940:4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tudy of Policeman's Treatment Problems During the Tim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aking Police Bureau of the Capital of Sichuan as Center

CAO Fajun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roke ou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became worse and worse in Kuomintang ruling areas, which seriously influenced the policeman's life. In order to keep police force steady, the government of Kuomintang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policeman's salary, distributing living allowance and giving them rice. These measures played a great role to safeguard the policeman's basic life needs. However,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sued large amounts of paper money for making up financial deficit, which led to persistent hyperinflation in their ruling areas, and thus the price rising speed overtaking the speed of the policeman's salary. In addition to the wide margin of the policeman's income, till the end of the war, the leaders and the common policeman's poor living situations didn't change obviously, leading increasing policemen fleeing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olicemen; treatment

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研究

周术槐,石婧逸

(贵阳学院 李端棻研究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5)

摘要:制度是关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民国时期的贵州,灾害频仍,赈务活动空前繁重。赈务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赈务活动的成效,直接关系到贵州灾民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服务中的伦理关系,直接关系到整个贵州基层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基于这一考量,民国时期的贵州省政府不仅组织成立了贵州省赈务会,而且还制订了系列有关赈务工作的管理规章。赈务活动堪称民国时期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建设活动。以民国时期贵州自然灾害概况为切入点,结合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具体内容,深入分析了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进行总体的评价。强调制度建设是民生之本。民国时期贵州社会救济成效的取得,与政府强化赈务管理规章的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然而,这些管理规章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制约了民国时期贵州赈务活动应有的成效。

关键词: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2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72-06

民国时期的贵州,灾害频仍,民众不堪其困。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地处西南枢纽的贵州省政府,也被纳入全国灾赈体系之中。不仅组织成立了相关的赈务组织机构,而且还讨论制订了系列赈务管理规章。为推动贵州赈务活动的开展、缓解灾民的困苦、解决灾民的生存危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本文对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内容、特点与成效作一定的探讨,强调制度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基础与前提。灾害当头,必须秉持以灾民的生存与发展为中心的理念,为灾害救济提供良好的赈务制度保障,以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一、民国时期贵州自然灾害概况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自然灾害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触目惊心的。它们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台风、洪水等突发性灾害,也有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干旱、海岸线变化等在较长时间中才能

逐渐显现的渐变性灾害,还有臭氧层变化、水体污染、水土流失、酸雨等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之间又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甚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自然环境一直影响与制约着我国农业的正常发展。其中,表现十分突出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与旱灾。此外,虫灾与冰灾亦时有发生。

据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贵州省水文资源局编辑的《贵州水旱灾害》统计,1927年至1949年间,贵州发生极早有3次,重早有13次,轻早有3次。其中,旱灾发生频率大的地区分别是遵义、黔东南和黔南地区。22年间,遵义仅有七个年头没有发生旱灾,其他15年均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旱灾。黔东南也仅有九个年头没有发生旱灾,其他13年同样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旱灾。^[1]

收稿日期:2021-12-15

作者简介:周术槐(1965—),男,湖南衡阳人,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三级教授,研究方向为灾荒救济、行政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

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统计,1932年,贵州因灾报告的县市是4个,有42942户受灾,8750户因灾转移,220950人遭灾,因灾死亡人数为20665人,财产损失达2089800元。^[2]1933年,贵州铜仁等地河水陡涨十余丈,人口死亡数以万计。同年,还有13县遭受旱灾,有3县遭受雹灾。1934年,贵州全省遭受水灾的有12县,遭受雹灾者有9县,同时遭受水旱灾害的有3县。全年被灾区域达40余县。^[3]1935年夏季,贵州发生水灾。据1935年7月18日《大公报》消息,贵州省“入夏以来,淫雨连绵,河流暴涨,田畴漫溢,公路桥梁冲断不少,……黄平、施秉、平越、麻江等县,则已成泽国。”一些县城“人民牲畜,死亡无算”^[4]。

民国时期贵州旱灾尤其严重的年份,当属1937年大旱,“灾区几遍全省,灾民270余万,赤地千里,死亡枕藉,惨不忍睹。”^[5]当时居于急赈等级的就达44个县。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县份需要政府急赈。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贵州自然灾害的种类,主要是水旱灾害。此外,雹灾也时有发生。灾害的发生,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而且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此时如果政府赈济缺位,或赈济不到位,灾民唯有流离失所,远走他乡,寻求赈济。有的灾民甚至演变成难民,给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带来严重冲击。面对此况,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贵州省政府亦迎难而上,组织成立赈务管理机构,制定系列赈务管理规章,积极开展了系列社会救济活动。

二、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制定

所谓赈务管理规章,即用于规范政府与基层赈务活动所制订的与赈务有关的行政法规与规章制度。其基本内容涉及赈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开展施赈活动的人、赈务活动的对象、赈务活动的成效等方面。其最终目的在于规范赈务活动的行为,提高赈务活动的成效,改善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民国时期贵州赈务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参照中央政府所制订的赈务管理规章,结合贵州赈务的具体实际,讨论制定了涉及范围广、涉及财政、民政、赈务、慈善等相关管理机构的、有利于推进贵州本省赈务活动开展的一系列赈务管理规章。现列举部分赈务管理规章的名目于下:

(一) 国民政府层面

1.《修正国民政府赈务处组织条例》(1928年8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同日施行。原公布日期1928

年8月27日)

2.《修正赈务委员会组织条例》(民国1931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同日施行。原公布日期1930年1月25日)

3.《各省赈务会组织章程》(1929年3月国民政府中央赈灾委员会)

4.《修正各省赈务会组织章程》(1930年5月中央赈务会修正公布)

5.《赈务委员会处务规程》(1933年3月中央赈务委员会公布)

6.《赈务委员会各组办事规程》(1930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

7.《赈务委员会各组联席会议规则》(1930年6月中央赈务委员会公布)

8.《赈务委员会收存赈款暂行办法》(1931年12月中央赈务委员会公布)

9.《赈务委员会提付赈款暂行办法》(1931年12月中央赈务委员会公布)

10.《赈务委员会助赈给奖章程》(1932年6月行政院核准公布)

11.《赈务委员会职员奖惩规则》(1930年6月中央赈务委员会公布,1933年4月修正公布)

12.《赈济委员会组织法》(1938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

(二) 贵州省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层面

1.《贵州省赈务会组织章程》(1935年6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2.《贵州省赈务会办事规程》(1935年7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3.《贵州省赈务会各组办事细则》(1935年7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4.《贵州省赈务会订定各县赈务分会组织章程》(1935年7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5.《贵州省铜仁县赈务分会办事规程》(1935年9月铜仁县政府公布)

6.《贵州省铜仁县赈务分会总务组办事细则》(1935年9月铜仁县政府公布)

7.《贵州省铜仁县赈务分会筹赈组办事细则》(1935年9月铜仁县政府公布)

8.《铜仁县赈务分会审核组办事细则》(1935年9月铜仁县政府公布)

9.《贵州省赈务会临时组织章程》(1937年4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10.《贵州省赈务会修正各县赈务分会组织章程》(1937年5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11.《贵州省赈务会查放急赈办法》(1937年5月贵州省赈务会公布)

12.《修正贵州省赈务会组织章程》(1938年2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13.《修正贵州省赈务会办事规程》(1938年2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14.《贵州省赈务会办事细则》(1938年2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15.《贵州省赈济会组织规程》(1939年4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16.《贵州省赈济会办事细则》(1939年4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17.《贵州省各县赈济会组织规程》(1939年6月贵州省政府公布)

18.《贵州省农村合作社兼营农仓办法》(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省政府公布)。

19.《贵州省各级仓储保管委员会组织规程》(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省政府委员会通过)。

20.《贵州省各县储粮登记推进办法》(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省政府委员会通过)。

21.《贵州省各级积谷仓保管办法》(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省政府委员会通过)。

22.《贵州省非常时期推广农仓暂行办法》(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省政府委员会通过)。

由上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系列赈务管理规章的制定,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范围广泛。既考虑到赈务活动的主体,也考虑到赈务活动的客体;既考虑到赈务活动的物质与经费的问题,也考虑到赈务的手段、赈务的方法、赈务的过程和赈务的考核与奖惩。这些赈务管理规章的制订,有利于规范赈务工作的具体行为,有利于确保灾民的利益得以实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三、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特点

从上面列举的国民政府与贵州省政府所颁发的系列赈务管理规章来看,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体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高度的集中统一性

民国时期的贵州,作为中央政府统一管辖的地方省级行政单位,其赈务活动要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与管理。在这一前提下,涉及赈务机构的组织与成立、赈务活动的办事规程、办赈人员的统一管理、赈款的保管、划拨与审核、赈济物质的发放、办赈人员的奖惩等方面的内容,一律参照中央政府所制订的相关规章,结合贵州本省赈务实际来统一制订。譬如:1929年10月,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

世英在给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贵州省赈务委员会主席的毛光翔的信中指出:“贵处敬电嘱补寄赈务会组织章程以便组织等因,兹特捡寄一份随函奉寄,即祈!”^[6]此信表明,贵州省赈务会的组建,显然是在参照中央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组织成立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央政府的赈务管理规章就是贵州省政府以及贵州地方各县制订赈务管理规章的范本。这种集中统一的特性,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政治运行体制。其优势在于统一、高效,可以防止赈务活动的无序状态,从而更好地满足地方灾民的需要。

又如《贵州省赈济会办事细则》就该会具体开展赈务工作时作出了明确规定。关于赈务会议的召开,该细则规定,每月必须定期举行一次。但如果因赈务工作的变化,需要临时召开会议,规定由主任委员召集,或委员当中有2个以上的委员提出来后,方可召开赈济会的赈务工作会议。这种赈务会议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确立赈济会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可以确保赈济会在开展赈务活动时的高效运转。让上层的工作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到赈济会的各个部门当中。

(二)鲜明的针对性

规章的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保持鲜明的针对性,是考察规章是否管用的重要尺度。从民国时期贵州省赈务管理规章的内容来看,所针对的主体包括:赈务组织机构的运行问题、赈款的收存、管理与发展的的问题、办赈人员的作风问题、办赈成效的奖惩问题、灾况的勘查问题、办赈的时效问题、赈务物质的募集与发放问题等方面。系列办赈管理规章的制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赈务活动在规范、有序的状态下协调运行与良性发展。

我们以1937年贵州大旱为例。当年的大旱,在贵州灾害史上是空前的。全省大部分地区干旱延续数月,农作物的播种十分困难。贵阳的情况是:“去冬(即1936年,笔者注)迄今,数月未雨,小春枯萎,包谷亦未下种,收成无望。”遵义的情况同样严重:“入春久晴,全未得雨,稻麦无法播种,小春收成无望。”其他大部分县域,同样呈现大旱景象^[7]。严重旱灾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农作物歉收,粮食紧缺。在这种情况下,贵州省赈务会联系到湖南西部的芷江县,派人前往芷江县采购粮食。在粮食采购的过程中,有两个细节可以看出赈务管理规章明确的针对性。一是办赈人员出于公关需要,给湖南当地政府官员所赠送的办赈礼品问题。二是办赈人员在运输粮食过程中实行日报制的问题。

从前一个问题来看,当时赠送的办赈礼品是贵州茅台酒。贵州省赈务会总务组为确保赈品采购的顺利进行,让办赈员陈职民携带60瓶茅台酒前往湖南芷江县采购大米。陈职民在赠送礼品的过程中,根据当地机关长官、法团领袖官职的高低,先后给芷江县军政官员分别赠送8到2瓶数量不等的茅台酒。共送出54瓶茅台酒,余下的6瓶主要用于宴请需要。对此,陈职民专程给时任贵州省赈务会主席的雇祝同文字报告。报告中列出了具体礼品赠送数目清单。

从后一个问题来看,办赈人员在运输大米的过程中,实行严格的日报制。每天将大米运输的情况呈报省赈务会主席过目审核。譬如:1937年5月16日呈报的内容包括:运输了120包大米,重量共计24石,运输的号数是16号至17号,大米存放的地点是贵阳仓库。押运员是刘尚镛。与此同时,在当天的日报表的备考中对大米运输的总体情况作了说明。说明中指出:“自三月十三日起,截至5月15日止,车船共运赈米伍千柒百玖拾陆石,合计贰万捌千玖百捌拾包。”^[8]

以上两个问题表明,赈务活动涉及人、财、物等敏感问题。办赈人员在办赈过程中,尤其应注意规范自己的办赈行为。对赈款、赈物实行报告制度,这在省赈务会颁发的赈务管理规章中有明文规定。因此,从1937年贵州省赈务会办赈人员赴湘采购大米过程中所发生的办赈史实中我们窥探出贵州省赈务管理规章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三)具体的可操作性

制度制订的目的在于执行与可操作性。不能执行的制度,形同白纸一张,没有效力。譬如:关于放赈工作的问题。贵州省赈务会对放赈工作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同时又有可操作性。在《贵州省赈务会查放急赈办法》中对放赈的基本程序和过程作了具体规定。该办法规定,放赈时,“县政府会衔布告,规定各区放赈地点及日期。并令保长先期二、三日传知灾民,届时持票集合领赈”。同时规定,放赈地点距离灾民住址不得超过二十里。而老弱残疾疾病孤寡不能远行者,则可以请人代领。前提是必须在赈票上填明代领人的名字。放赈时,为避免作弊现象,还必须邀请各机关及地方公正士绅到场协助会同监察。由于放赈采取的是集中办理,为防止放赈时发生拥堵、踩踏事件,对放赈场所也作了要求。要求:“放赈场所宜觅广大地点,须有前后二门,一出一入。”不仅如此,还要求现场必须有保安团队、士兵维持秩序。对于办赈有功、成绩卓著者,还规定

由省赈务会考核成绩,咨请省政府予以奖励。对于办赈出现问题者,则予以惩罚。^[9]

灾民在领取赈款、赈品的同时,必须填具相关的受领表格,以防漏赈或重复受赈。对于放赈机关而言,同样应将办赈的具体情况填具相关表格上报并备案,以便对办赈机关的办赈工作进行督察。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交互运用

恩格斯强调,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民国时期贵州的赈务活动相当活跃。在具体的办赈过程中,出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交互运用的局面。一方面,传统的办赈方式,譬如:粥赈、米赈、以工代赈等都在实际的赈务活动中得到有效的借鉴与运用。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办赈方式,譬如:电报的广泛推广、现代交通工具在赈品运输的使用、近代工矿与民用企业的创办等,为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增添了诸多新的办赈特色。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互运用,对推动民国时期贵州赈务事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四、对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总体评价

赈务工作是一项十分繁杂的社会救济工作,也是一项积极的社会建设工作。赈务工作系着千万家庭,事关千千万万灾民的生存。赈务活动成效高,政府形象得改善,民众受益有归属感。赈务活动成效差,政府形象受损伤,民众怨声载道,制约着社会的进展。对于民国时期的贵州赈务活动而言,基本成效的取得,得益于有效的管理规章。完备的赈务管理规章,在民国时期赈务体系的构建和赈务能力的提高中,曾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民国时期贵州管理赈务规章的总体评价应从以下诸端来考虑:

第一,民国时期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制定,离不开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一方面是国民政府中央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贵州灾情发生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就贵州省赈务会的组织机构来看,贵州省赈务会组织机构的设置离不开两方面因素的重要影响:一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推动,一是本省具体灾情所产生的影响。由于贵州省赈务会是在国民政府中央赈灾委员会与中央赈务委员会的倡导下组建的,因此,其组织机构的内部结构与中央赈务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内部结构基本相一致。但贵州本省的诸多因素,如严重的自然灾害与战争因素等又必然要求其救济组织适应本省赈务的需要。因此,贵州省赈务会组织机构尽管是根据中央政府相关管理规定组建起来的,却也并非完全雷同,全部照搬。贵州省赈务会根据本省灾情的变化,对省赈务会内部组织机构

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本省灾情变化的需要。中央赈灾委员会领导时期(1929年年末至1930年春),贵州省赈务会的组织机构囊括三个办事部门,即事务、执行、监察三处。1930年春,国民政府改组中央赈灾委员会为中央赈务委员会,统一制定了《赈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并颁行了《修正各省赈务会组织章程》。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贵州省赈务会对其内部组织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即将原事务、执行、监察三处改为总务、筹赈、审核三组。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贵州省赈务会是由此三大职能部门所组成。直到1937年贵州特大旱灾发生时,贵州省赈务会在征得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对其内部组织机构进行扩大改组,在原有三个职能部门的基础上,增设救济组和工赈组。1938年灾情减轻之后,即又恢复原有组织结构。1939年春,贵州省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将贵州省赈务会改组为贵州省赈济会。组织机构的名称虽然有所变化,但其从事赈务的工作职能并没有放弃。所不同的是,此时的赈务重点在于因战争而造成的难民救济。1943年春,贵州省赈济会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将赈济事务移交给贵州省社会处经办。

第二,要正确看待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历史价值。

从贵州省赈务会的组织章程与办事规程来看,贵州省赈务会成立之后,制定颁发了一系列的组织章程与办事规程,从而使其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虽然贵州省赈务会在其所开展的赈务活动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譬如:办赈人员的思想觉悟不高;办赈过程中的贪腐现象时有发生;赈务活动存在效率低下以及赈务活动不平衡的问题等,但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章程与办事规程的话,问题肯定会更多。因此,我们应该肯定其组织章程与办事规程对贵州本省的赈济事务曾经起到的历史作用。即使在今天看来,其组织章程与办事规程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要结合贵州赈务活动具体内容的变化,综合考虑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时代性与针对性。

对于贵州省赈务会赈务活动的具体内容而言,可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赈务活动与抗战爆发之后的赈务活动。前期主要开展因自然灾害而引起的社会救济活动,后期主要开展因战争原因而造成的难民救济活动。在其自然灾害救济活动中,包括因水、旱、蝗、冰雹等自然原因引起的灾害救济。自然灾害的救济活动对稳定社会、恢复生产等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抗战时期对战

争所造成之难民的救济,在保存抗战实力、稳定社会、稳定人心、增强抗战的信心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贵州本省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两个方面的社会救济,因救济内容与救济主体的变化,赈务的管理规章亦随之加以修改与微调。这反映出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时代性与针对性。

第四,要辩证看待贵州赈务管理规章的传承与创新。

一方面,关于贵州省赈务会赈务活动的基本程序与具体措施的问题。赈务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贵州省赈务活动同样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民国时期的贵州省赈务会在其赈务活动中,既对传统赈务程序与赈务手段有所传承;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还有所创新与发展。传统赈务程序无外乎四个方面,即报灾、勘灾、查赈与放赈。传统的赈务措施包括急赈、工赈、农赈、调粟等方面。对此,贵州省赈务会在其赈务活动中均有所继承。但作为现代救灾机构的贵州省赈务会无论是赈务的组织机构,还是赈务的经费来源,亦或是赈务的具体手段等,均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对贵州省赈务活动所产生的内在影响。

另一方面,基于贵州省赈务管理规章视野下如何评价贵州省赈务会及其赈务活动的问题。对此,应秉持辩证思维,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应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贵州省赈务会无论其组织机构、内部管理、人员管理与办事规程,抑或其所开展的所有社会救济活动,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肯定。但贵州省赈务会及其赈务活动由于管理上、制度上、经济上、交通上等方面的缺陷,加之办赈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从而影响与制约了贵州赈务活动应有的成效。

第五,赈务活动实际上也涉及整个政府与社会民众当中相关的伦理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度。灾难发生以后,涉及千家万户,方方面面。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赈务工作处理得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处理不当,则容易引起灾民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民国时期贵州省相关赈务组织机构的设立以及系列赈务管理规章的制定,实际上对政府当中办赈的主体、灾民当中受赈的客体都作出的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对规范各方面的伦理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推动灾害发生以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贵州省水文资源局. 贵州水旱灾害[Z].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94.

[2] 李文海.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347.

[6]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 全宗名称: 贵州省赈务会[Z]. 全宗号 M24, 案卷号 279.

[7] 贵州省图书馆编. 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Z]. 贵阳: 人民出版社, 1981: 257 - 258.

[8]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 全宗名称: 贵州省赈务会[Z]. 全宗号 M24, 案卷号 870.

[9]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 全宗号 M24[Z]. 案卷号 1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Guizhou Relief Management Regulation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OU Shuhuai, SHI Jingyi

(Li Duanfen Research Institute, YangMingxue and Qianxue Institute, Guiyang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55005, China)

Abstract: System is a fundamental, overall, stability and long – term issue rela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uizhou suffered from frequent disasters, and relief activities were unprecedentedly heavy. The soundness of the relief system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ief activitie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ctims in Guizhou,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uizhou. Based on this consideration, Guizhou Province not only organiz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uizhou Provincial Relief Affairs Association, but also formulated a series of management regulations related to relief work. Relief activities can be regarded as a very important social construction activity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Gui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Gui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n entry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regulations of Guizhou relief manag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ulations of Guizhou relief manag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is basis,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Guizhou relief management regulation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s given. It is emphasized that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chievements of social relief in Guizhou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overnment’s strength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lief management regulations. However, thes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lso had defects of one kind or another,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ed and restri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Guizhou relief activ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Guizhou relief; management regulations

孙健初西北地质考察研究

张传卿,王永强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受个人成长环境和求学时报国之志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孙健初顺应国人开发西北的声潮,不畏艰险,毅然献身西北地质考察事业。他三进绥远、三到酒泉、冒险青海,并成为首位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孙健初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士气。尤其是玉门油矿的成功,对支援抗战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此外,孙健初还对西北地区煤、金、铁等其他矿产作了详细考察与整理,为之后更好地开发与利用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为着我国石油及地质矿产事业的长足发展,孙健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地质工作者,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质工作中立下辉煌建树。

关键词:孙健初;西北地区;地质考察;民国时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3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78-08

九一八事变后,“自东北四省沦亡,国人视线始集中于‘西北’,而开发‘西北’之声浪乃高唱入云”。^{[1]12}政府、有志之士不断讨论开发西北的计划。在此环境下,孙健初毅然踏上勘察西北地质矿产的道路去实现自己的报国梦。自1930年绥远考察至1952年孙健初逝世,他的工作重心一直在西北地区地质矿产考察方面。在气候复杂,交通、信息相对不便的西北地区,孙健初与队友克服重重困难,成为我国地质学者中翻越祁连山的第一批。他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知识,重新测绘,纠正地质地形图,探测各类矿产的蕴藏量,并对各类矿产的开采情况及发展前景作以分析。孙健初对我国的石油事业贡献巨大,他三到酒泉,成功寻得玉门油田并主持开采,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在西北地区的地质考察成果不仅为此后地质地形、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且为抗战提供了资源支持,鼓舞了抗战士气,对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目前学界对于孙健初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张江一著有《孙健初传》,对孙健初个人及其主要

地质考察活动作以整体阐述,但对于孙健初在西北地区煤、金等矿产考察情况论述不够详尽。而其他学者则多关注到孙健初与玉门油矿的关系及孙健初对石油事业的重要贡献,对于孙健初在西北地区除石油矿产外其他矿产的考察情况仅略有涉及。李四光曾评价孙健初“不仅对石油有重大贡献,对铁及有色金属勘探也是有贡献的”^{[2]6}因此,对于孙健初在西北地区多方位的地质矿产考察活动以及他坚持献身西北地质考察事业的原因分析仍有一定空间。本文拟在爬疏史料的基础上结合跨学科的方法,突出孙健初对西北地区各类矿产的地质考察活动,并尝试分析他坚持献身西北地质工作的缘由,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孙健初对西北地区地质考察事业的贡献及对此后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影响。

一、求学报国与开发西北

孙健初,字子乾,1897年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城郊后孙密城村一个败落地主家庭。祖父孙光风年轻时是一条硬朗的农家汉子,父亲考中秀才后在村里开办私塾。童年时期的孙健初常听祖父教导“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一颗恒心,要咬着牙干下去,决

收稿日期:2021-12-25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研究”(16AZD037);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资料整理及研究”(19ZDA218)

作者简介:张传卿(1995—),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不能半途而废”。^{[3]14}孙健初在父亲的私塾学习之余,便在田间劳作,强健体魄的同时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1912年6月,孙健初进入濮阳县高等小学,在学校响应了辛亥革命“剪辫子运动”,积极接受革命新思想。小学毕业后,孙健初进入山东曹州(今菏泽市)鲁西国立第六中学继续学习。在这里,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立下“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男子汉大丈夫,理应为国捐躯”的豪气志向。^{[3]23}1920年春,孙健初中学毕业,于同年9月,考入山西大学采矿系预科班,两年后进入本科。自此,他与地质科学考察工作结缘。

在大学里,孙健初遇到了踏入地质学之门的“引路人”——瑞典籍教授新常福。新常福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源于实业的发达与否,所以他提倡“实业救国”。孙健初十分敬仰这位地质造诣颇深的外国教授。大学毕业后,孙健初于1927年加入由新常福主办的“瑞华地质调查会”,成为第一批中国会员之一。二人在学术接触中,孙健初接受了新常福“以纯正科学来救国”即实业救国的思想,同时“只相信学术可以救国,一心学采矿地质,并且把它学得很好”。^{[4]183}1929年,孙健初由新常福推荐加入中央地质调查所。

晚清至民国时期,国人出于富国强兵的需求,已有开发西北的声音。然当时开发的重点主要在严密西北行政建置、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修筑铁路、发展交通运输、兴办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地质则关注较少。而欧洲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探险队”“考察队”接踵来到我国进行考察,包括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及四川部分地区。例如1866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曾来西北各地作地质旅行。从1870年起,先后有七支俄国考察队进入甘肃或经过甘肃进行考察活动。^{[5]484}1877—1880年,奥地利人洛采随斯成义公爵来华调查地质,曾至陇南及兰州一带工作。1923—1924年间,瑞典人安特生来甘肃西南部考察地质。^{[6]15}这些外国探险队和考察家有的未经政府允许私自行动,在我国任意发掘遗址遗物,使我国大量珍贵遗址文物和资料遭到破坏和外流。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物司设立地质科,这是我国政府机构中第一次出现“地质”二字,由章鸿钊担任科长。1913年9月,地质科改称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后又几经改名,最后终于1916年7月正式开始工作。^{[7]2}1941年称中央地质调查所,以区别地方地质调查所。1943年设西北分所于兰州。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新的地质机构。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人才真正进入西北地区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逐渐发掘该区

域丰富的矿产资源。“1921年、1923年,国人谢家业及袁复礼先后调查甘肃北部及兰州附近地质。1929年国人赵亚曾和黄汲清调查秦岭之地质。”^{[6]5}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爱国人士纷纷提出御敌之策。斯时,开发西北以支援抗战的讨论此起彼伏。如1932年南洋著名的华侨实业家林义顺与张继、居正等人到西安审甄建设陪都及考察开辟西北事宜时,深感开辟西北之重要,曾疾呼“救国必须开辟西北,有决心不患无办法”。^{[8]72-75}中国第一女飞行家林鹏侠也喊出“往西北去”之口号。在此环境下,中央地质调查所顺应开发西北的潮流,重视西北地质情况,并派孙健初等人到西北地区做野外考察。

二、孙健初三到酒泉寻油矿

“日本夺得满洲后,又行石油专卖,故石油工业已成为世界重要问题之一。全世界将因战争而争石油富源,亦因石油而生战争也。”^{[9]1039}中国石油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展极为迟缓,原油产量甚少。当时美国石油可采储量14.3亿吨,而我国的石油储量约仅为美国的1%,中国“贫油”论甚嚣尘上。^{[2]61}这不仅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还严重不利于国家安全。“一旦战事发生,各国竞相贮备石油,则中国对此种燃料将有绝断之虞。”^{[9]1041}虽然1914—1915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在陕西、四川钻井采油,但均因获利不多而停止。随后政府又在陕西钻了几口浅井,同样未获得良好结果。因此“找油”成为国家、人民亟需待办的要事之一。在此情形下,孙健初表示“每次调查皆努力肯干,尤其对荒凉之西北调查,无人愿去,我却自动前往”。^{[2]46}

(一)初次“寻油”受阻

玉门一带蕴藏石油的消息早有传闻。“嘉峪关西有石漆,今按赤金东南一百五十里有石油泉,土人取之燃灯。”^{[10]20}1892—1894年,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曾来这里考察;1921年中国地质学家翁文灏、谢家荣到玉门一带调查过石油情况;1928年地质学家张人鉴到此获取石油样品化验,证明油质良好;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到玉门调查地质。虽然玉门油矿早有考察者涉足,但至1937年以前,我国的石油仍以夸脱计算,不能精炼,而且绝大多数用作润滑油。且政府及相关学者对甘肃的石油分布及开发情况知之甚少,对玉门地区的地质地文、油矿分布、矿产开采等问题进行细致、深入调查的人亦不多。该时,大多仅是浅坑挖掘获得少量石油,而对于新疆油区的了解仅限于俄国地质学家考察后的出版物中。

1935年,孙健初、周宗浚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安排下,从青海省祁连山南麓多次翻越海拔4000米

雪线以上山峰到达祁连山北麓,拟到甘肃酒泉寻找油矿。当他们熬过饥寒交迫、挺过雪山暴风、扛过森林猛兽到达酒泉时,却因军阀马步青害怕自己在石油河附近淘金被发现,借口玉门石油河附近土匪太多,无法保障其人身安全而断然拒绝考察活动。^{[11]42-43}二人只好沿着祁连山北麓查看了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永昌、武威、古浪等地的地质情况,于12月中旬回到北平。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使孙健初气馁,他决心等待机会再探酒泉石油。

(二)与美国专家合作寻油

1936年7月12日,顾维钧、周作民、钱永铭、严恩榘、张盛隆五人联名呈文国民政府实业部,获得专探专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的经营特许权,年限五年。随即,顾维钧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并与美孚石油公司合作,寻得美国专家韦勒博士、萨敦工程师的协助。^{[12]75}

1937年初,孙健初与美国专家韦勒、萨敦、金城银行史悠明等人组成西北采矿勘探队,于“7月5日正式从兰州出发开始野外寻油考察工作。他们先利用驼骡西上黄河、湟水至湟源,再向西南行至青海湖、共和,然后东下至黄河谷地的循化,再南行穿过山脉和高原至拉卜楞,于8月26日返回兰州,共计1000千米”。9月8日再次离开兰州,先乘车至甘肃西北部的酒泉肃州,行程约725千米,在酒泉找好运输和野外工作用的骆驼,即赴甘肃玉门县及青海、新疆等处调查矿产。^[13]完成由酒泉沿祁连山山麓西行至敦煌,然后折向北行至哈密公路上的红柳园,最后再回到酒泉的1400千米的考察。^{[14]188}这支穿越戈壁、在西北黄土高坡上找油的队伍,除了勘探队的4人,还有4个工人和15名驮夫,27匹骡马,其中5匹马供人骑用,其余22匹骡子用来驮设备和行李。一路上,他们像玄奘取经一样经历了诸多困难。遇着有客店的村子自然是好,没有旅社的村庄,就在街上的小商店屋檐下过夜。天黑行至荒山野岭,便搭帐篷或露宿。因此次部分考察路线甚为偏僻,前人涉足较少,导致地图上标注不够精准,故孙健初和韦勒、萨顿等人一边考察一边绘制路线和地图。此前加拿大建筑师哈里·赫西曾从一位俄国地质学家口中听到一个关于石油湖的消息,即“在甘肃与青海的边境上接近青海湖的地方,有大片地区渗出原油,据说这一地区面积达250平方英里且散发着强烈的使人‘怕被窒息死’气体”,^{[15]111}他将这一未证实的消息告知顾维钧。但孙健初等人通过对青海湖周边地质条件的分析以及向当地人求证,最终证实哈里·赫西口中的巨大石油湖并不存在。10月初孙健初一行人西行出嘉峪关,

对石油河、干油泉、石油沟等地进行调查。在石油河上游东岸边发现一座小破庙,这便是后来的老君庙。15日,他们从白杨河到马莲泉宿营,考察了这里的油苗。然后在马莲泉、小马莲泉、干油泉、石油河一带考察油苗和石油河背斜情况,共逗留4天,用手勾画了7幅地质图。^{[16]94}考察进行至12月时,气候十分寒冷,无法继续进行工作,“西北煤油试探队美国人韦勒、萨敦与孙健初等由玉门返回兰州”。^[17]

本次活动虽然“惟限于时日,未及详查,仅获其梗概而东返”。^{[18]234}但他们对甘肃西部和青海湖东北部绘制了一系列剖面图,并通过计算二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的定碳比,得出甘肃西北部有石油存在。此外,对甘肃玉门石油河背斜的位置、油苗情况以及开采此处油矿的可行性包括交通、燃料和水以及最短时间等因素做了分析估测。这些丰硕的成果为后来玉门油矿的成功开采奠定坚实基础。

(三)主动请缨,寻得玉门油矿

1938年4月韦勒和萨敦离开甘肃。日军侵略还在扩大,孙健初面对“国破家亡山河碎”的情形,向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阐述玉门一带是“煤油之希望”的思想。并从经济和战时两个方面衡量玉门油矿的开采价值,他认为:“抗战军兴,海路多被日军封锁,洋油来之不易,如果我们立即开发玉门,当有助于抗战,利之有民,价值无量。”^{[19]115}并主动请缨前往甘肃玉门开发玉门油矿。

1938年6月,国民政府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玉门油矿开始实质性勘探。11月3日,孙健初、严爽同苏联专家崔林根在苏联外交代表处会晤,在听取苏联专家的建议后于11月28日离开兰州,于12月4日到达酒泉。这是孙健初第三次到酒泉,目的很明确:找到油田,开发油矿。孙健初与严爽、靳锡庚等人到老君庙后,在石油河、干油泉、三概湾、石油沟、夹皮沟等地踏勘,测量地形,绘制地质图、构造图及剖面图。^{[20]287}一行人为此次石油钻探工作进行详细筹备。他们先酌量以木桩定出四千余点,然后用精确平板仪,逐一依法测量,在石油河、干油泉、石油沟、夹皮沟等处,测成缩尺一万分之一油田地质图二幅,地质构造图一幅及剖面图多种,以清晰表示地层之分布,构造之情形,以及各岩层之组织厚薄等。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进一步估量石油之储量,并对石油河区和石油沟区的位置、交通、地质、地层、石油储量、石油性质等情况分别论述,以便根据开采油矿附近必需之燃料及水源,初步确定钻井位置和钻探计划。同时将玉门油田与新疆、苏联部分油田作对比阐明其异

三、对西北地区其他矿产的考察

(一) 三进绥远做考察

1930年春,新婚不久的孙健初被指派调查察哈尔西部地质矿产。此次“先由张北调查向西而进,至土木路、兴和折西而行,经淮安而去阳原,后至山西之天镇,小作逗留,及返回北平”^{[21]8}。当时地质调查人员几乎没有任何保障,野外考察只派一两人进行。孙健初形单影只,只随身带一个罗盘,一把小铁锤便向绥远进发。^{[22]14}在绥远东端大青山的地质考察中,孙健初于兴和县东北15千米的二道牌附近发现了几处绿柱玉矿床,并发现了石英和绿柱玉晶体。^{[23]36}1932年春,应绥远省政府之邀,翁文灏指派孙健初再次赴绥远做调查。4月8日,孙健初“由北平出发,次日抵归绥,越四日向西北进行,经察素齐入武川西部,多日而返归绥,复由归绥东进,经集宁陶林,旋阻军事,折向西行。经萨拉齐、包头、安北、固阳,而返归绥,由归绥乘车回平。此次考察延续上次任务,主要在绥远一带从事各类矿产调查”^{[24]2}。由建设厅第二科科长王永寿陪同前往,孙健初“每至一处必作详密之考察”。“陶林兴和间因军事发生,未及考察”,所以1933年春,孙健初第三次到绥远“以补所缺而竟全功”^{[25]3}。

从1930到1933年,孙健初共三次赴绥远、察哈尔做调查,“计费时共四月余”,其范围“在北纬四十四度三十分至四十一度三十分,东经一百零八度至一百一十四度之间,幅员占绥远省之本部及察哈尔之西南隅”,徒步曲折行程三千余里。^{[21]8}三次考察共发现二十多个煤田及十几个石棉、水晶、石墨矿等。其中煤田主要有二叠石炭纪层位上的狼山煤田、拴马桩煤田、童盛茂煤田等,下侏罗纪层位上的官井沟煤田、二分子煤田、窝沁壕煤田、石拐煤田等。这些煤田以直深采500米计算,总计量估算为4亿多吨。由于当时绥远省煤矿业发展迟滞,全省煤炭产量仅为6万多吨,总值不过13万元,全省每人平均竟不及一角。^{[23]31-32}其他矿产的情况孙健初悉数整理在《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地质志》一文中。

(二) 冒险青海,翻越祁连山

祁连山是我国西北屏障,塞上要冲,且矿产资源丰富,号称“万宝山”。然而19世纪末叶,外国人以各种名目接踵沓至。特别是斯坦因测绘祁连山地形时,竟将酒泉高台以南五道山脉冠以外国人名,孙健初气愤道:“祁连山是我们中国的山,竟让外人勘测后而始见知于世,乃我之惭愧。”^{[26]14}因此他下定决

1934年5月,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安排,孙健初与侯德封离开北京,经绥远到达甘肃,对甘肃皋兰、永登、靖远、海原及中卫做了初步考察。孙健初以实际感受和实地考察为基础,并根据西北自然环境及地质地貌特征,从“地质之层序及其经济意义”和“从地文上观察其与人生之关系”的角度分析西北地区经济贫困,土地利用不合理的现象。^{[27]183}他认为对于“宁夏附近之谷地,地沃水丰,惟面积甚小。陇南、秦岭北坡、陇西、祁连山北坡之山谷,石山嶙峋,却宜林木;坡岗茂林,适宜牧畜;宽谷缓坡,得成沃田。东自六盘山西至古浪,南由渭水至祁连山东端,种植不甚适宜”,而对于整体上地广人稀、气候相较南方干燥的西北地区,则应“西北畜牧当重于农业,谋西北经济建设当首重工业”。^{[28]82}此外,孙健初在甘肃南山一带的考察中,发现了许多新地层,并分别为其命名。后经证实,地质界承认并沿用了这些名称。此次考察的重点在甘肃和宁夏境内,共历时五个月,“至岁冬间,因天气寒冷,工作不便,孙健初乃由甘往返北平”。^{[29]5}

1935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决定组成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孙健初负责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地质总图任务,限期一年,及西宁、酒泉的区域地质图任务,限期三年。该年4月“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派孙健初、周宗浚来甘调查地质矿产”,考察路线“由兰转赴青海从事调查,并拟在青调查完竣后,再转高台、玉门、金塔、张掖等县调查”^{[30]3}。这次考察是孙健初初踏青海,他与队友周宗浚从兰州到西宁,然后骑骡马从西宁南门出发经湟中、西行至湟源,对贵德的矿苗和温泉做调查后,继续沿黄河西行过龙羊峡、都兰县城。孙健初与队友虚心向当地居民学习野外尤其是高原生存技能,常常露宿野外,饥寒交迫,辛苦异常。好奇又无事跟着孙健初“打酱油”的都兰县县太爷、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派来的副官和青年翻译吃不了这种苦,各自返回了。^{[2]50}孙健初和周宗浚雇了几匹骆驼,继续向茶卡出发,沿青海湖北上。

在青海湖,孙健初根据1927年德国地理学家非希纳氏所制地图计算湖之大小深浅,结合专业知识分析青海湖之成因。并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了“青海湖附近地形略图”和“青海湖附近地质略图”。^{[31]184-186}从青海湖返回西宁稍作休整后,孙健初北上考察祁连山。祁连山位于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祁连山“湟北三脉”即是有名的三大坂,该地地势险峻,气候多变,当地人称“马怕走悬崖,

人怕过大坂”。^{[2]59}孙健初为全面调查祁连山周围地质矿产情况,多次往返奔波于南北坡之间。历时三个月的祁连山考察之旅比之以前更加艰苦,不仅气候恶劣,且常常食不果腹,他们花费两个月时间,穿越12个要隘,最终翻越祁连山至金佛寺,后出酒泉,成为首次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32]40},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地质学界的士气。10月底,孙健初、周宗浚二人由酒泉沿祁连山北麓的地质调查完毕,返回兰州,后乘兰海快车由省转往北平调查所报名,并整理各项器材。^{[33]5}

在青海、祁连山的八个月地质考察中,孙健初依据自己扎实的地层剖面知识对甘青地区地层关系做

了详细梳理,并对前人所绘地图不完整或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修补。此外他还根据自己调查所见及采访所得对该区域的几类主要矿产做了详细整理与分析,撰写了重要论文《甘肃及青海之金矿》《祁连山一带地质史纲要》《青海湖》等,测绘了《青海湖附近地形略图》《青海湖附近地质略图》两幅图及整理了《甘肃青海矿产一览表》。后又与严爽合著了《甘肃青海矿产图表编制余言》,内容分为《甘肃青海省矿产图》图表说明和《甘肃青海矿产一览表》图表所载矿产之价值说明。^{[34]13}下表为《甘肃青海矿产一览表》中的部分内容,以助大家直观了解甘青两省矿产情况。

表1 《甘肃青海矿产一览表》节选^{[35]279}

省别	县别	矿区	矿别	位置	储量	矿质	地质时代	根据
甘肃省	皋兰	阿干镇	煤	北距皋兰约四十里	约21Mt	烟煤	侏罗纪	孙健初
甘肃省	皋兰	阿干镇	煤	北距皋兰约四十里	约21Mt	烟煤	侏罗纪	孙健初
	永昌	青土井	石油	县北一百四十里			白垩纪及第三纪	孙健初
	永登	镇羌滩	沙金	永登县西北约二百里	约3万两	成鳞片状,色淡黄	近世纪	谢家荣
	皋兰	棺材涝池	铁	皋兰西北约一百四十里	0.03Mt	赤铁矿	古生代	陈贲
	漳县	盐井镇	盐	位于漳县西约十里	未详	品质纯洁	第三纪?	甘肃建设厅
青海省	门源	俄博	煤	位于门源县西北二百里	约58Mt	烟煤	二叠—石炭纪	孙健初
	民和	享堂	石油	在湟水下游,一部分在甘肃永登境			白垩纪及第三纪	孙健初
	门源	野牛沟	沙金	东南距门源县约三百里	约3万两	鳞片状,呈浅黄	近世纪	孙健初
	都兰	硫磺山	硫磺	柴达木盆地北边	未详	未详		居民口述
	都兰	达布逊	盐	都兰县东南一百里,东距西宁约五百里	约70Mt	结晶呈灰白色	近世纪	孙健初

表1中所载矿产为两省蕴藏量丰富、有开采价值之矿产,对于其他储量较少或质量不佳、无开采价值之矿产,孙健初没有列入其中。由表1可知,孙健初分别对两省所藏主要矿产的类别、矿区、矿区位置、矿产储量、矿质、地质时代及根据来源作了细致整理。他在《余言》中又对不同矿产价值的品定各依其价值条件,重新做了补充说明。例如对煤的开采价值分析,四川侏罗纪煤虽储量丰富,但因其层厚仅有数寸,无法开采。而甘肃省兰州市阿甘镇窑街红山窑及樵渔堡的煤矿,虽其储量不多,但“煤层较厚,品质尚佳,所以遍经开采。惟各煤田均系土窑破坏,将来从事大作,颇感困难”。^{[35]276}

矿的储量比较富裕、有开采价值及必要,孙健初还将西北地区部分省份煤田储量与我国其他地区的煤田储量制表作比较。

表2 我国部分省份煤量统计^{[36]127}

省名	产量(Mt)	省名	产量(Mt)	省名	产量(Mt)	省名	产量
山西	127127	辽宁	1836	黑龙江	1017	广东	421
陕西	71950	湖南	1764	江西	992	福建	396
四川	9847	山东	1679	热河	614	安徽	360
河南	7674	云南	1627	察哈尔	504	广西	300
新疆	6000	贵州	1549	绥远	486	江苏	217
河北	3071	吉林	1143	湖北	440	浙江	100

由表2可知,孙健初共统计了24个省份的煤田储量,其中陕西的煤量排于第二位,新疆的煤量排于第五位,所以西北地区的煤量虽不能称之为富裕,但也绝对不能视为贫困,有开发价值和必要。此外,孙健初还指出西北煤矿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西北之煤皆系小窑开采,矿业至为幼稚”,究其原因“每年出煤不过9万余吨,全销于本地,售价每吨平均五元左右,年产总值不过40余万元”。^{[36]28}

虽然孙健初以考察石油为主,其他矿产为辅,但他三进绥远、冒险青海、翻越祁连山,对西北地区主要的矿产均做了详细考察与整理。他对各种矿产的储量、矿质,还对目前我国西北地区的矿产开采和冶炼业进行分析,为此后西北矿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四、西北地质考察成效及意义

(一) 喜得石油, 支持抗战

1938年,孙健初确定玉门油矿开采方案后,便着手主持开采工作。1939年3月23日,从陕西延长油矿运来的钻井设备安装完备,老君庙的第一口油井开工。此后,孙健初每天都翻看挖出的沙土,不时地用手抓起来看一看,捏一捏,用鼻子闻一闻,他心里既担忧又着急。晚上睡不着,便围着一号井来回转或蹲在井口边默默地观察。因一号井的油层与干油泉同属一个油层,孙健初便取“干”字的英文首字母“K”为其命名。^{[35]77-82}1939年8月11日,当玉门油矿喷出原油的那一刻,“孙健初这位出生入死的钢铮铁汉、民族不屈的儿子,哭了,那泪就像横流的长河”^{[23]22}。玉门油矿的成功,揭开了我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帷幕,它为抗战,为开发、建设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表3为玉门油矿1939—1941年油井钻探情况及原油产量。

表3 1939—1941年出产原油数量^[37]

出产油井	数量(加仑)		
	1939	1940	1941
第一井	52460	60561	29678
第二井	54818	75936	397214
第三井	0	108209	90289
第四井	883	937	205744
第五井	6715	30244	9780
第六井	8638	33406	104488
第七井	3337	16144	34678
第八井			2042690
第一平巷		2185	32
第二平巷		50493	38774
第三平巷		35170	8982
合计	126851	413285	2962348

由表3可看出,1939—1941年玉门油矿的油井和绝大多数油井的原油出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1941年第四井和第八井突然井喷,原油产量突增,而这也是玉门油矿原油产量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第一个自喷油田的诞生。1942年,全国进口汽油不到3万加仑,而玉门油矿生产汽油已达189.57万加仑,远远超过进口汽油,^{[38]853}为国家节约了大笔石油进口费,同时极大鼓舞了抗战士气。自此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玉门油矿共钻井26口,生产原油7866.7万加仑(255546吨),占全国原油90%以上。汽油1303.35万加仑(37092吨)、煤油511.6万加仑、柴油71.7万加仑。^{[39]195}大后方共生产汽油、煤油、柴油、酒精及其他代用油等液体燃料共3625万加仑,其中玉门油矿产2000万加仑。^{[40]500}战时玉门油矿原油在全国原油量占比数以及在大后方各类液体燃料中的占比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玉门油矿对抗

战胜利的重要贡献,以及对大后方液体燃料工业的重要贡献。

玉门石油早期多为赤金堡之居民土法采之,每年产量约二万斤。“民初,此间工人数不过二三十,矿主则仅五六家。采得油后,以骡车拉运,销售于酒泉、玉门一带。每斤售价不过铜元十余枚,在产地价尤贱,四五枚即可购得一斤。附近居民用以燃灯,因其时提炼无方,燃灯时烟大而光暗,用之者均无好感。”^{[41]2}而自从玉门油矿规模化开采后,无论是原油的提炼方法还是用途范围,较之前都不可同日而语。开采油矿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周围民众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自1941—1944年,酒泉、金塔、高台三县,每年各拨壮丁400名到矿做工。后来新中国石油战线上的一代楷模“铁人”王进喜,即是在1938年到玉门油矿当徒工。玉门油矿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全矿专业技术人员631名,工人5097名,合计5728名。其职工人数是大后方仅次于重庆大渡口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二大工厂。^{[42]222}为了扩大油矿的开采事业,甘肃油矿局相继新办了采油炼油所需要的水泥厂、机械厂和发电厂,还办了各种职业学校,油矿局对员工福利事业较为注意,他们自设粮仓建设面粉厂,开办百货食品供销社,组织各种修理服务业,设立了医院、学校、俱乐部和戏院等生活娱乐设施。有人曾于1947年参观玉门油矿,感叹“其地交通及市街之繁荣,遂亦大为进步。昔日情形与今有天壤之别。”^{[43]6}

(二) 借鉴国外理念, 培育地质人才

1942—1944年,孙健初被派去美国实习石油开采事宜。他曾到美国的十几个油田进行实地考察,认真观看其地质调查方法。孙健初每学习新内容,必然联想到玉门油矿的情形,联想到我国石油发展的问题。他从西北地区和全国整体情形两个角度考虑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先后发表了《发展中国油矿计划纲要》和《中国各重要油区地质情况及开发计划》。孙健初指出:“中国地腹之油,究有若干,固然难以预为断定,然就其在所知者而言,当有不少之储量存在,惜乎发展为期过晚,致难比拟欧美。若不急起直追,扩大研究,则石油事业实难望人项背。中国地大物博,何所不有。况值需油孔极之时,似宜急起效仿方不致落人后。”^{[44]311}回国后,孙健初继续主持石油开采工作,并将自己在美国实习期间学到的先进石油开采方法和思想运用到我国石油事业中。1949年3月孙健初与玉门油矿矿长刘树人等赴青海省民和一带视察并决定在该地区进行勘探工作,并在距青海亭堂十公里的地方勘定井位一处。^{[45]2}孙健初

所提出的含油气远景区如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河西走廊区、陕北和东北、华北、四川等地区,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勘探实践已经多次证实了他的科学判断。1965年,中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彻底摆脱了“贫油国”的帽子,实现了孙健初在抗战留美期间擘画的中国“石油梦”蓝图。^{[46]3}

孙健初从美国学习回来后,认为美国近五十年来,石油地质研究的迅速发展与地质人员为数众多、素质之高有莫大关系。抗战胜利后,孙健初一边继续为我国石油事业忙碌,一边注重培养新一代的地质工作者。1945年,油矿局仅有二十几名青年跟着孙健初学习,且大多为大学刚毕业。孙健初一心要将他们培养成既有理论知识、又有现场实践经验的“科学救国”的人才。学生们经常跟着孙健初跑山头做野外考察,每至一处,孙健初必让学生绘制草图,绘完的草图经过检验合格后方可吃饭。为了能够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开阔视野,他将自己十几年来野外考察中遇到的难题作为重点一一整理出来,找出其共性和个性,再结合自己当时撰写的地质论文,在课上细致分析每个案例,同时还将在美国的学习体会和美国石油地质考察的先进方法讲给学生,以启发学生。在孙健初的耐心教导、严格训练下,玉门油矿一批优秀的青年地质工作者在全国各大油田的勘探开发或石油地质科研中担起重任,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石油会战中立下辉煌建树,李德生、田在艺都成为发现和开发大庆油田的功臣。

五、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东南、华北地区的逐渐沦丧,开发西北的声音空前高涨。孙健初来到西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事业。他与队友不惧艰险,足迹遍至陕、甘、青、宁、绥远等地,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贡献给西北地区。他历经艰辛,寻得玉门油矿,建立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玉门油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战时石油紧缺的情况,为我国节约了大量资本,鼓舞了抗战士气,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奠定基础。作为地方的一种新工业,带动了周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此外,孙健初对西北地区其他矿产资源如煤、铁、金等矿产的考察与整理为之后的开发与利用提供重要理论支持。解放兰州前期,孙健初一边埋头研究油田地质理论,一边冒险保护他所掌握的全部石油地质资料和仪器设备,使其未落入敌人手中分毫。1950年,孙健初任中国石油管理总局探勘处处长、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孙健初对我国石油事业及

对我国地质学术界的重大贡献,对于今天开发西北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爱国和献身地质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参考文献:

- [1] 樊库. 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自序[J]. 禹贡半月刊, 1934, 1(12).
- [2] 张江一. 孙健初传[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89.
- [3] 穆伟, 袁冰洁. 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M]. 北京:地质出版社, 2018.
- [4]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地学卷1)[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5] 武沐. 甘肃通史·明清卷[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
- [6] 宋麟. 西北考古工作队拟赴甘青研究史前文化[N]. 申报, 1948-01-01.
- [7] 陈裕淇, 陈梦熊. 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M]. 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6.
- [8] 华侨林义顺读开辟西北富源:救国必须开辟西北,有决心不患无办法[J]. 华侨周报, 1932(19).
- [9] 马龙翔. 中国液体燃料工业之概况[J]. 中国实业杂志, 1935(6).
- [10] 黄成助. 肃镇志·地理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
- [11] 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 大地文学(第20卷)[M].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4.
- [12] 皇甫秋实, 贾钦涵. 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 [13] 贺渊龙. 关于报告孙健初等人行程的呈文[Z]. 1937-9-20, 甘肃省档案馆藏, 027-008-0221-0003.
- [14] 孙健初, 韦勒, 萨敦. 中国西北部甘肃和青海省地质考察报告[C]//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8.
- [15] J. M. 韦勒. 戈壁驼队:中美地质学家西北找油纪实(1937—1938)[M]. 赵辛而, 译.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2.
- [16] 李天相. 关于玉门油矿的开发[J]. 石油学报, 1999(1).
- [17] 甘肃省府. 关于报卫楼、萨敦与孙健初的代电[Z]. 1937-12-11, 甘肃省档案馆藏, 027-008-0221-0005.
- [18] 孙健初. 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C]//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8.
- [19] 赵蔚祖, 吴周卿. 孙健初发现玉门油田[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玉门文史资料(第1辑), 1992.
- [20] 王仰之, 黄希陶, 安延恺. 孙健初:我国杰出的石油地质学家[J].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1982(3).
- [21] 孙健初. 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地质志[J]. 地质专报, 1934(12).
- [22] 缪金华. 孙健初[C]//政协濮阳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 濮阳县文史资料(第9辑).1993.
- [23]孙健初. 绥远之宝石矿[C]//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
- [24]绥远开探宝石矿[N]. 新天津,1932-05-03.
- [25]地质调查所委员孙健初赴绥西一带调查地质矿产[N]. 包头日报,1932-06-10.
- [26]金钟超. 孙健初的精神力量[C]//孙健初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 孙健初先生纪念文集.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
- [27]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地学卷1)[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28]孙健初. 黄河上游之地质与人生[C]//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
- [29]实部地质调查所继续调查甘青矿产[N]. 西北文化日报,1935-04-24.
- [30]孙健初赴青调查将转西路各县[N]. 甘肃民国日报,1935-05-15.
- [31]孙健初. 青海湖[C]//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
- [32]王仰之,徐寒冰. 我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学术活动年表[J]. 中国科技史料,1992(3).
- [33]实部地质调查员昨晚离省赴平[N]. 西北文化日报,1935-10-30.
- [34]高树理. 遥远的驼铃声:记我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孙健初[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9.
- [35]孙健初. 甘肃青海矿产图表编制余言[C]//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
- [36]孙健初. 西北煤田纪要[J]. 地质评论,1939(1).
- [37]金慎作《甘肃玉门油矿三年来出产原油数量及最近工作情形》呈蒋介石[Z]. 1942-1-25,台湾“国史馆”藏,001-113230-001,
- [38]陈真. 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创办和垄断的工业[C]//近代工业资料(第3辑). 北京:三联书店发行,1961.
- [39]宋仲福,邓慧君. 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
- [40]许涤新. 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1]祁连山下的新社会:玉门油矿形成一种新式工业[N]. 西北日报,1947-10-18.
- [42]贾芳,陈钰业. 文明的兴衰:疏勒河流域历史文化解读[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
- [43]昔日之. 玉门油矿[N]. 中央日报,1947-03-16.
- [44]孙健初. 发展中国油矿计划纲要[C]//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
- [45]享堂近郊发现油矿[N]. 甘肃民国日报,1949-03-25.
- [46]张江义.“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的“石油梦”[N]. 中国档案报(中央级),2016-2-19.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the Northwest Geological Survey of Sun Jianchu

ZHANG Chuanq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his personal growth environment and the national aspiration during his schooling time,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Sun Jianchu complied with the sound tide of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China, and resolutely devoted himself to the geological expedition of northwest China. He entered Suiyuan, Jiuquan and Qinghai, and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geologist to cross the Qilian Mountains. Sun Jianchu's actions greatly boosted the morale and reflected the dignity. In particular, the success of Yumen Oil Mine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supporting th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riving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Sun Jianchu also made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coal, gold, iron and other other minerals in northwest China, so as to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later.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etroleum geological and mineral undertakings, Sun Jianchu has trained a number of outstanding young geologists, who have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geological work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Sun Jianchu; Northwest China; Geologica Survey; time period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理论逻辑的伟大源泉

范 峥,马林靖,张 欣,时漫扬,李 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稿。它是无产阶级人生价值观的经典阐述,指明共产党人应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和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带领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初心为人民,使命有担当。

关键词: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理论逻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4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86-05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鲜明的政治表白。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论逻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路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为了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根本立场,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1]他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他强调:“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3]

事实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道德观始终贯穿着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是一条主红线。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至上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以实现公有制为目标。“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

从历史维度来看,党的“一大”到“六大”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特别是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强调了党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之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百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史表明,党的这一宗旨始终没变。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优秀代表。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写下了著名的“老三篇”。他最先规范地提出并最早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价值理念,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号召向张思德、白求恩同志学习。它至今影

收稿日期:2021-12-28

基金项目:郑州地方高校党史学习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课题(2021 DSZX 039)

作者简介:范峥(1987—),男,辽宁营口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响着 21 世纪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实现途径和实践活动。“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5]

那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高屋建瓴地写下了著名的“老三篇”,形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不得不说是与其早年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形成有关。

一、毛泽东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

毛泽东出生于农家。其父希望儿子当个米店学徒、会计,承继家业,过上温饱生活而已。可儿子却成为历史伟人,建立了新中国,彪炳史册。毛泽东又是一个充满学识智慧胆略魄力的旷世奇才,这都与其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人生价值观有关。

(一)少年毛泽东人生观的形成

少年毛泽东先后受到老师文正莹、邹春培和毛宇居的修身启蒙教育和诗文书法培育。毛宇居评价毛泽东:“闾中肆外,国尔忘家。”

1907 年,毛泽东读李漱清老师《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书,接受了维新救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几十年后,他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将会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6]

1910 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入学考试作文是《言志》,毛泽东联想到国家民族危机的现实,天下百姓生活困苦,联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校长李元甫高兴地说:“我们学堂取了一名建国才!”毛泽东最爱听李元甫讲的“中国一天天贫弱,是遭受列强欺侮之缘由”的时事训话。班主任谭咏春给毛泽东作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均判高分,给学生们传观。

1911 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长沙)“成为这所了不起学校的学生”。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参加了辛亥革命,第一次正式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

1912 年 2 月,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长的符定一极其看好毛泽东的国文入学考试卷,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符校长深为毛泽东闾中肆外、纵横捭阖之文风感染,以第一名优异成绩录之。他说:“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

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个栋梁之材啊!”他还说:“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国文老师兼班主任柳潜给毛泽东所作的史论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打了 100 分。他在毛泽东 600 字文章上,批示却有 150 个字,有一句批语:“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7]毛泽东竟用一生去践行之。

人生观就是关于人生目的、态度、价值等问题总的观点和看法。1893 年出生的毛泽东所处的年代,正是晚清政治、经济和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毛泽东亲眼目睹了社会之怪现象,加上先进知识分子的引导,毛泽东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那就是:推翻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毛泽东的人生观核心是爱国主义。

毛泽东来自人民。他的人生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涵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也是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即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服务。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它还具有一种崇高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二)毛泽东的价值观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毛泽东非常重视人的价值。他把个人的价值实现与革命的解放、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它承继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实践性和实事求是的观点,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他认为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在实践中完善自我、丰富自我,以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所以,他提出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价值评判的标准。

毛泽东价值观的两个核心组成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原则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关于人的价值观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己任的政党,所以,毛泽东强调了集体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具体表现为共产主义道德与无产阶级政治的高度统一性。这在“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均做了深刻阐述。

(三)毛泽东的伦理观

毛泽东的伦理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观,具有中华民族化特征,即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诠释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双赢关系,解决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

毛泽东在伦理实践中提出了“五爱”的社会主义公德,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

公共财物”，并规定为中华民族全体国民的社会公德。它是毛泽东伦理观的首次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还把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统一起来，并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做了具体阐述。

而这三观的统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准确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与人的物质利益原则的关系，提出了评判标准和善恶效果的依据。其中心思想就是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为人类彻底解放。

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体系是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五部分组成。而这一切伦理观的核心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达到以服务于人民的动机与有益于人民的效果的统一。这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方面是首次，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规定。

二、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共产党人标准统一于实践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直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正式形成。“毛泽东关于人的价值观是毛泽东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确定的人生价值取向并实现人生价值的科学总结。”^[8]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价值目标，在实践上予以完善，强调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个性发展的规律性。

毛泽东的价值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而《为人民服务》就是对人生观价值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他指明了人生观与党的宗旨相统一，人的价值实现途径与实践活动相统一。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评价标准。毛泽东提出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并把它们同人民利益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最高标准。

毛泽东价值观又以政治与经济相统一原则，提出了共产党人政治标准。中国共产党人为解放生产力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发展生产力，巩固新政权，其政治标准就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正确主张和态度。^[9]

三、无产阶级人生观与剥削阶级人生观

人类社会各个阶级的人生观是大不同的。奴隶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其实质都是剥削阶

级利益集团的人生观。它具有反动性、腐朽性、没落性。而毛泽东的人生观是无产阶级人生观，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具有先进性、科学性、革命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就会有对人类社会高度的责任心，那就要先解放整个社会，以最后争取自身的解放。这是由无产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

1939年12月，毛泽东以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为例，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0]

无产阶级人生观应当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利益放在次位；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祖国需要之时，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四、从爱国学子到五四先锋，再到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时年26岁，受湖南一师杨昌济恩师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几十年后，他向斯诺回忆如是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1]

1917年3月，毛泽东在《新青年》第3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认为增强全民族体魄对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9年4月，毛泽东在《解放》上发表论文《五四运动》。他说，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2]。

五四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在五四运动前后，成立了新民学会，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13]

五、《实践论》《矛盾论》赋予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

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论》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具体范例。它是主客体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知行的统一。它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和古今各种思想的纷争,因为,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主流。

《实践论》从辩证唯物论角度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知行关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实践论》就是告诉中国人民用正确的认识来改造世界,去解决矛盾,既要解决“两对主要矛盾”,又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并最终使之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高度科学正确的评价,定性为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正是事物的一般性。而中国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的工人阶级代表们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率先进行具体的革命斗争。这正是事物的特殊性。

它们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与《实践论》相比较,《矛盾论》的认识过程侧重于从客体的一般和个别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来观察,以此来解读人类认识的逻辑演进过程。“两论”在学理上相得益彰,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认识论与方法论结合起来了。《矛盾论》批判吸收了古代中国哲学“两点论”的矛盾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逻辑汲取其丰富的营养,其把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贯穿始终。

《实践论》是认识论中的辩证法;《矛盾论》是实践论中的认识论。“两论”把辩证法与认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两论”的精神实质赋予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六、《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力量源泉

“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时,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专访时如是说。^[14]

习近平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回答就是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当代写照。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精神和活的灵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新升华。他汲取了《为人

民服务》中国精神的伟大力量源泉。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稿。其中心思想是无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所具有的一种崇高思想境界。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思想与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原则,以及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结合起来。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5]

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仍需要勇于献身精神,把革命理想与实干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完成新时代党的理想目标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统一起来,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落实到实践中去,把爱国主义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坚持人民至上的人生价值观,听党话、跟党走,实现中国梦。

七、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立足于为人民服务的基点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表达,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呈现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最核心理念。它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它是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所说:“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6]

一生都为人类求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吃喝住穿”等物质需要作为人类社会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的生活依据,必须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活需要—物质生产—社会结构”的理论逻辑和以“人、社会和自然”三者关系为主题的理论论域。^[17]

1956年、1981年和2017年,党先后三次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逻辑的新发展。新时代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需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与基本矛盾得以良性互动,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这都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是唯物史观中国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继承和发展科学,“以人民为中心”理论逻辑的伟大思想源泉就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崇高价值取向是扎根人民又贴近实际,

具有可持续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八、结语

毛泽东同志来自人民,扎根人民,为人民服务是他人生价值观及伦理观的崇高思想道德境界。毛泽东的人生观是中国人民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与党的宗旨相统一,为人类彻底解放服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和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其理论逻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继承和发扬了《为人民服务》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今天,中国青年应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把爱国主义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把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前途结合起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N]. 中国之声, 2015-11-25.
- [2] 习近平. 2021年两会“微镜头”之三:3月5日在内蒙古团,这些事谈得很深[N]. 新华网, 2021-03-06.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5.
- [4]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EB/OL].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00>, 访问日期:2021-10-01.
- [5]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

[N].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25.

- [6] 夏燕月. 毛泽东与启蒙恩师[J]. 文史精华, 2020(11):6.
- [7] 夏燕月. 毛泽东与启蒙老师[J]. 文史精华, 2020(11):9.
- [8] 张昌文.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J]. 毛泽东人的价值观, 1992(1):11.
- [9] 陆剑杰. 毛泽东思想研究[J]. 论共产党人的价值标准, 1988(4):17.
- [10] 纪念白求恩[EB/OL].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纪念白求恩/1685623>, 访问日期:2021-10-01.
- [11] 五四运动时的毛泽东: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EB/OL]. 搜狐文化频道: <https://cul.sohu.com/20090508/n263843168.shtml>, 访问日期:2021-10-02.
- [12] 毛泽东五四运动修改稿[EB/OL]. 中国网: http://guoqing.china.com.cn/2019-06/18/content_74888069.htm, 访问日期:2021-10-02.
- [13] 毛泽东与“五四”运动[N]. 搜狐新闻: <http://news.sohu.com/20100702/n273240791.shtml>, 访问日期:2021-10-3.
- [14] 习近平.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N]. 人民日报, 2014-02-09.
- [15] 为人民服务[EB/OL].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item/为人民服务/40335?fr=aladdin>, 访问日期:2021-10-03.
- [16]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求是, 2018:10.
- [1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166.

(责任编辑 林川)

“Serving the People” is the Great Source of Theoretical Logic for the “People – Centere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N Zheng, MA Linjing, ZHANG Xin, SHI Manyang, LI Li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Serving the People” is a speech delivered by Mao Zedong at the memorial service of comrade Zhang Side. It is a classic elaboration of the values of the life of proletariat, indicating that communists should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interests and revolutionary interests, serve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and hav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mmunist moralit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eople – Centered” in the new era adheres to and applies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eople – Centered” is the practical summary and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of the party leading the people to build a better lif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is for the people, and the mission is responsible.

Key words: serving the people; people – centered; theoretical logic

高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

罗文华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媒介信息素养概念的衍变及素养评估现状。综合媒介信息素养已有的评估成果,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从评估原则、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四方面构建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以评估促培养,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提升大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能力。

关键词: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媒介信息素养;评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5

中图分类号:G206-4;G2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91-06

信息社会时代,媒介信息素养已成为一个人终身学习的必备素养。提升大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有利于完善发展终身学习能力,帮助学生可持续发展。研究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融合,尝试开展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并对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成效开展评估,以帮助发现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期能为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措施、提高教学效率、持续提升学生的自我教育和终身学习能力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融合及评估现状

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是媒介信息素养的核心,它们起源于不同年代的不同学科研究范式,但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媒介信息素养的衍变及评估进行梳理,便于我们对媒介信息素养这个动态的概念进行更精准的把握,有效开展高校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并对教育成效进行客观的评估。

(一)媒介素养及评估现状

1933年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汤普森首次使用“媒介素养”这一概念,认为媒介对青少年有负面影响,提出要对媒介信息进行批判和辨别。1933年媒介素养教育被倡导引入学校教育,至20世纪70年代,

逐渐被世界许多国家纳入学校正规教育。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上日趋成熟,实践上卓有成效。比较有代表的观点是E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森的“免疫法”,又称“文化保护法”^[1],约翰·斯托里的“文化研究方法”^[2]、Len Masterman的“屏幕教育”^[3]、大卫·帕金翰的“超越保护主义”。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初目标是防御、抵制流行文化对青少年的侵蚀,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之后逐渐发展成超越保护主义的赋权教育^[4]。

为观测媒介素养教育成效,对媒介素养评估的研究也在同步进行。但由于专家学者对媒介素养的概念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媒介素养的评估体系及指标的构建都是从本国实际需求出发的。2008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介比较学项目组发布了《面对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世纪媒介教育》,指出媒介素养包含游戏能力、表演能力、模拟能力等11项核心媒介素养技能。2011年欧盟委员会颁布的《测试和改进评价标准以评估欧洲媒介素养水平》中提出媒介素养包含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36个具体评价指标^[5]。2013年法国教育委员会首次将传媒教育纳入“法国基础教育计划法案”,制订“分层融合”的媒介素养教育方针,对“多纬量化”的媒介素养教育

收稿日期:2021-12-1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高校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构建的研究”(GD17XTS04)

作者简介:罗文华(1971—),女,湖南祁阳人,硕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媒介信息素养教育。

评估原则进行了探索研究^[6]。

国内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引进和本土化实践等方面。1997年媒介素养教育由卜卫首次引入国内学者视野,之后学界除介绍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情况外,还尝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对媒介素养的内涵及评价体系也基本达成共识,主要聚焦于接触、认知、参与与使用^[7-8]等维度的研究。李金城基于媒介信息素养评估体系,聚焦媒介素养的获取、评估和创建维度,设计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测量模型与量表工具^[9]。

(二)信息素养及评估现状

信息素养是由信息检索技能发展而来,基本内涵是人们有效寻找、评价和使用信息的能力。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Paul Zurkowski 1974年首次提出信息素养概念。198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下属机构信息素养委员会在其总结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信息素养的5大构成要素,客观上为信息素养评估阐述了5项宏观指标。美国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协会2000年颁布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图书馆馆员和教师依据这一标准,根据评估对象的学科、能力层次的不同,分别制定了适用的评估方案和策略,并探索出信息素养评估的有效途径及评估模型。美国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信息素养评估理论完善和实证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息素养评估体系。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汲取美国信息素养评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对信息素养评估的标准及准则进行了本土化创新发展,制订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信息素养评估标准。2000年,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协会在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澳大利亚的信息素养标准。2004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修订2000年的标准,并将标准更名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信息素养框架,该框架有6个一级指标^[10-12]。2011年英国国家和大学图书馆协会下属的信息素养咨询委员会更新升级了信息素养的7项核心指标模型。

1995年金国庆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素养教育概述》中首次将信息素养引进国内,之后信息素养教育得到了国家的重视。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在高中阶段的学校和有条件的初中、小学普及计算机操作和信息技术教育”,并在2000年颁布《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提出了六个方面的信息素养教育目标。很多高校也广泛开展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2005

年北京高教信息素质专业委员会制定了《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指标体系》,以规范北京市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教育评估工作。2013年教育部启动开展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教育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14年5月27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2014年5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又发布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

(三)媒介信息素养及评估现状

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发展,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日益融合。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媒介信息素养定义为一个复合型概念。实施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提升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并对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成效开展评估得到了世界组织和各国政府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讨论研究媒介信息素养的概念,发展媒介信息素养的指标,推进成立致力于促进公民获得媒介和信息能力的国际合作组织——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合作联盟,联盟有80多个国家的媒介和图书情报等机构参与,定期组织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在媒介信息素养学习与发展领域的教育合作活动。

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合作项目。2011年至2012年底,联合国组织了“国际媒介与信息素养调查”,通过了解国际大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状况来设计构建评估指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担了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调查。清华大学是媒介信息素养课程的研究和发展平台——联合国“国际媒介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大学网络”成员高校,在2014年主办了“全球媒介素养与跨文化对话教席大会”,且发布了学术报告及在线媒介信息素养教学工具等成果^[13]。黄丹俞、邱子清构建了针对老年人的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包含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34个三级指标,体系完整并带有权重^[5]。

二、高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的构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信息科学、传播学和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多次研讨,在媒介信息素养关键内容上达成共识,出版了《媒介与信息素养课程方案(教师用书)》《媒介与信息素养策略与战略指南》《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国家战备与胜任力》《媒介与信息素养五大法则》四大纲领性读物,对媒介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能力要求指标、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阐释,以指导不同国

家或地区实施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成效。

图书馆是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机构,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融合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四大纲领性出版物的指导下,对标所在地区所在学校及所在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开展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并对教育成效进行评估,以进一步完善教育内容和过程。高校开展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构建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也是从微观层面进行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探索实践。

(一) 评估的原则

根据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的内涵、教学内容及方式的多样性,结合大学生的认知规律、认知特点及心理发展水平,开展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规范化和本土化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3 年发布的《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阐述了媒介信息素养的概念与理论依据,为各成员国实施媒介信息素养评估提供了评估框架细则、评估方法及工具。高校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应在《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纲领性的指导下,根据各高校的实际情况,设置媒介信息素养评估标准需全面、系统地反映媒介信息素养一级指标“获取、评价和创建”的要求,实现媒介信息素养评估与干预的并重,进一步提升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质量。二是标准上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原则。高校媒介信息素养的相关标准应根据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而有层次性和差异性,分级评估既体现了学生媒介信息素养的差异性,又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提供支持。三是可行性原则。所谓“可行”,就是在评估实践中行得通。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世界观要求。建立媒介信息素养评价标准,不仅要考虑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特征,还要考虑不同高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认知及心理发展特点。评价标准是期待可实现的目标,评价观测点可观察、可感受、可测量,简单易操作,便于评估判断。

(二) 评估的内容

对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评估需要涵盖媒介信息环境、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和媒介信息行为等影响因素。具体的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通识媒介信息素养评估。这一阶段首先考察学校的媒介信息素养培养环境,如是否有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政策、制度、文件及经费等支持媒介信息素养培训;

其次考察是否开设了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文献检索、信息技术等与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课程;最后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基本的媒介信息技能,能否完成基本的媒介信息搜集工作。第二层级是专业媒介信息素养评估。这一阶段包括关注大学生能否明确媒体信息需求,如有效获取、评价媒介信息等;考察媒介信息素养课程的研究和实践训练效果;考察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是否融入学生的其他学科教学之中。第三层级是创造媒介信息素养评估。该阶段考察内容首先是大学生在专业实习实践,毕业设计、论文撰写等方面能否利用媒介信息手段来提升研究能力,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实践活动;其次是大学生能否在媒介信息环境下,批判性的高效获取媒介信息,整合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进行媒介信息知识的构建和创造。

(三) 评估的标准

媒介信息素养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涵盖了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核心能力要素。我们在制订高校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标准时,对标《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评估框架》,提取媒介信息素养的“获取、评价、创建”三个一级指标,同时考虑大学生的认知和心理特点去设定评估标准,重点考察大学生的道德、有效地获取使用创建媒介信息进行自主学习和知识创新的能力。评估标准^[14]见表 1、表 2、表 3 所示。

表 1 “获取”能力评价观测点

指标	表现标准
1. 能解释和表述所需信息	1. 能解释和明确对媒介信息的需求; 2. 能明确对媒介信息提供者的需求; 3. 知道所查找的信息或解决的问题需要不同的信息来源出处(图书馆、传统媒体、互联网); 4. 能知道与所需信息有关的关键概念及学科专业。
2. 查找、定位、访问媒介信息内容及其提供者	5. 能使用恰当的工具,构建有效的查找方法及检索方式去查找、定位、访问所需的媒介信息; 6. 能了解所查找到的媒介信息的特色和功能; 7. 能确定提供媒介信息内容的作者、制作、组织和传播者; 8. 能理解元数据; 9. 能区别和鉴赏不同格式的媒介信息; 10. 能明确由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技术等原因,查找定位访问媒介信息内容的局限性和挑战性。
3. 能检索保存媒介信息内容	11. 能使用系统和工具或其他查询形式检索不同类型的媒介信息内容; 12. 能使用恰当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提取、组织和保存所检索的媒介信息内容。

表 1 从 3 个指标 12 个表现标准去评估大学生获取媒介信息的能力。主要考察大学生能意识到对媒介信息的需求,使用媒介信息工具快速查找、提取、甄别、存储媒介信息内容的能力。

表2 “评价”能力评估观测点

指标	表现标准
1. 理解媒介信息	1. 能理解媒介信息提供者的职责及社会功能; 2. 能明确媒介信息提供者对社会环境及其个人的影响; 3. 能了解媒介信息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警惕媒介的负面作用; 4. 能明确媒介信息创建的权限及如何呈现媒介信息内容; 5. 能明确用户或受众解析媒介信息内容采用的方式; 6. 能解读媒介信息的要义,用审美鉴赏媒介信息内容; 7. 能理解广告对媒介信息提供者的作用。
2. 评估、评价媒介信息内容及其提供者	8. 能创建或使用评估工具来评价媒介信息内容及其提供者; 9. 能理解媒介信息的内容及媒介信息塑造的环境; 10. 能解析媒介信息内容; 11. 能明确对媒介信息内容及其提供者的审查制度; 12. 能描述媒介信息的目标受众; 13. 能使用不同的工具识别和验证所要查找的信息源、方法及检索策略; 14. 能清楚知道评价的局限性和主观性; 15. 能检查评估所收集到媒介信息内容及来源。
3. 组织收集媒介信息内容	16. 能使用多种技术归纳总结评判媒介信息内容; 17. 能记录总结媒介信息内容; 18. 能理解使用索引选择媒介信息内容的重要性; 19. 能存储评估过的相关媒介信息内容以备用; 20. 能将媒介信息内容以另一种格式呈现; 21. 能综合如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格式的媒介信息内容

表2从3个指标21个表现标准去评估大学生理解、评价、收集媒介信息的能力。主要考察大学生在法律和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使用不同工具检索、获取、评价、保存等收集、分析及应用数据能力。

表3从4个指标18个表现标准去评估大学生创建媒介信息的能力。主要考察大学生有道德、高效、创造性地运用媒介信息的能力。

(四) 评估的方法

基于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多层次性特点,对媒介信息素养的评估,一定要科学客观灵活。既要有定性评价,也要有定量评价。根据媒介信息素养教学的目的、对象和教学阶段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如:测验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学生评教法等。

1. 测验法

测验法就是依据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目标、教育教学计划,通过出一些作业、练习和题目,让学生口头、书面回答或进行实际操作,以此来检测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成效。在实施课堂教学时,通过提问、实际操作等环节,及时了解学生的动态,适时调整课堂教学;每个学期结束后,对媒介信息素养公选课和专业课融合媒介信息素养教学的课程进行测验,以了解大学生在接受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后各方面的媒介信息能力改进的情况。

表3 “创建”能力评估观测点

指标	表现标准
1. 能进行知识表达	1. 能把现有的媒介信息内容与原有的想法、实验和分创造和创新性析相结合,产生新的信息和知识; 2. 能通过收集到的媒介信息内容达成目标的实现,问题的解决; 3. 能使用多种工具创建呈现多种格式的知识; 4. 能反思并在需要的情况下修正创建过程; 5. 以符合道德标准的方式应用国际国内标准、要求和建设创建新知识; 6. 能认识到新知识可能具有的深远目的和后果。
2. 能合法、合理地交流媒介信息内容和知识	7. 能了解新知识应当被分享、传播和交流并通过媒介信息工具进行分享交流; 8. 能以道德的、合法的方式交流媒介信息内容; 9. 能把媒介信息内容和知识标示、复制、传达、传播和分享给目标受众; 10. 能清楚如何保护自己的作品、个人数据、公民自由、隐私和知识产权; 11. 能清楚媒介信息传播分享的风险和后果。
3. 能使用媒介参与社会公共活动	12. 能明确媒介提供者通过媒介信息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的重要性; 13. 能意识到通过媒介参与网络虚拟世界的风险和后果; 14. 能在与其他媒介信息提供者、生产者、用户、受众进行分享交流时,清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不同; 15. 能通过多种方式和工具参与社会公共活动。
4. 能监控媒介信息内容和知识的影响	16. 能了解监控媒介信息内容和知识分享的重要性; 17. 能理解媒介的功能和角色及媒介对受众及輿情的影响; 18. 能了解媒介监控公共服务和宣传的功能。

2. 观察法

观察法就是在自然条件下,对被评估对象的行为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观察和记录,客观地评估大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状况,判断大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是否达到既定的培养目标。在实施课程教学和体验式、参与式教学时,着重观察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形成课程后记。学生在图书馆、网络中心、校报及校广播站实习时,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记录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以指导学生不断提升媒介信息素养。

3.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就是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到大学生的需求、对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教学相关内容的满意度、学习成效及培养整体效果的看法。在给学生开展媒介信息素养培训时,培训之前和培训之后都会以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培训前后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找学生反复多次测试修正,以尽可能多地了解有意义的信息,以改进媒介信息素养

教学。

4. 学生评教法

学生评教法就是让学生对授课老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方法、课堂表现、语言表达、作业布置批改、教学效果及自己学习收获等方面进行评价。通过学生评教,为提高教师媒介素养水平与教学能力制定标准和方向。在新生培训教学、新进老师培训、媒介信息公选课、媒介信息素养融合专业课的教学、与学校其他部门合作开设的项目培训课程中,都重视学生评教工作,全方位多层次地构建评估体系,提升教师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如:与师资培训中心联合开展2021年职业院校教师“数字资源精准获取及教学应用创新能力提升”项目时,图书馆共开设了“网络信息检索技术及流程”“玩转网络资源检索,助力你的课堂教学”“搜索引擎检索技巧与综合应用”三门课。课程结束后,及时指导学生在这三门课客观理性地进行评价打分,以便教师能了解教学的实际情况,改进完善教学。

三、高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构建

(一) 高校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媒介与信息素养”下的定义是使用媒介信息工具,有效检索、获取信息和媒体内容,批判的理解、评估、使用和创造的能力^[14]。对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媒介信息素养概念和内涵构建的评估体系,旨在帮助高校完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根据所在学校和地区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特点,制定各自适宜的教育目标及教育内容,构建“课程教学—环境涵养—体验式、参与式教学”立体化多层次教学模式,全方位提升媒介信息素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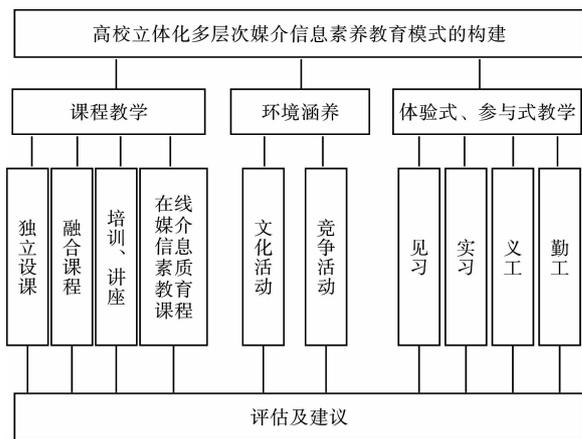


图1 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

(二) 教育目标及内容

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并通过实践让学生掌握媒介信息知识,养成媒介信息意识,能批判解读媒介信息和主动使用、创新使用媒介信息,具有正确健康的媒介信息伦理道德观。

课程教学包含独立设置的媒介信息素养课、融合课程(媒介信息素养课嵌入各年级的专业课中)、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相关培训讲座、在线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资源;环境涵养主要是图书馆利用。世界读书日及节日活动为契机,与学校相关部门多方合作,共创文化育人的媒介信息环境;体验式、参与式教学主要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到校外媒体机构及学校的教育技术中心、网络中心和图书馆等部门实习的机会,通过实习提升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

(三) 实施的主要策略

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融合需要教师具备多学科复合素养,对师资队伍建设是个挑战。争取学校领导的重视,依托图书馆,成立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心,选取具备图书馆学、新闻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等多学科背景的教师到中心来,通过教师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媒介信息素养。

实施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与校外媒体、图书馆,校内二级教学单位、职能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框架,发动教职员工参与到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中来,集社会和全校之力加强媒介信息素养教育。

评估教育效能及时完善教育方案。在教育实施过程中,运用生活教育观评估教育成效,及时调整完善教育目标、内容和实施过程。

四、结束语

媒介信息素养是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人类必备的能力,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与个人学识和能力相关,也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社会环境相关。本文对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媒介信息素养及评估进行文献梳理,从宏观和微观上,归纳总结借鉴素养教育的成效,进而结合高校的实际,考虑媒介信息环境的不同,开展高校媒介信息素养的评估。从评估原则、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方面设置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评估体系,以评促建,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模式,高效提升大学生媒介信息素养水平。通过提升大学生素质,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工作者和高层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逐步提升国民和社会媒介

信息素养水平。

参考文献:

- [1] Leavis F R ,Thompson D.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33.
- [2] 斯托里. 文化原理与通俗文化导论[M]. 3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3] Masterman L. Teaching About Television and Teaching the Media [M]. London: Comedia Publishing Group, 1975.
- [4] 帕金翰. 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 超越保护主义[J]. 宋小卫, 摘译.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0(2): 73 - 79.
- [5] 黄丹俞, 邱子清. 数字环境下老年人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构建[J]. 图书馆论坛, 2021(8): 96 - 107.
- [6] 姚姿如, 宇璐. 法国媒介素养教育评述[J]. 社会科学战线, 2017(2): 275 - 278.
- [7] 路鹏程, 路杲, 王敏晨, 等. 我国中部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比较研究: 以湖北省武汉市、红安县两地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3): 80 - 88.
- [8] 生奇志, 展成. 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及媒介素养教育策略[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66 - 70.
- [9] 李金城. 媒介素养测量量表的编制与科学检验[J]. 电化教育研究, 2017, 38(5): 20 - 27.
- [10] 肖燕秋. 国外信息素养评估实践研究及启示[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4(8): 124 - 127.
- [11] 黄丹俞. 跨媒体信息素养的概念、特点及对图书馆的意义[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7): 56 - 60.
- [12] 李玉斌. 美国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评估项目介绍及启示[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4(8): 103 - 105.
- [13] 吴淑娟. 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融合途径: 联合国“媒介信息素养”的启示[J]. 图书情报工作, 2016(3): 69 - 75, 147.
- [14] 程萌萌, 夏文菁, 王嘉舟, 等. 《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评估框架》(UNESCO) 解读及其启示[J]. 远程教育杂志, 2015(1): 21 - 2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Discussion on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for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UO Wenhua

(Library,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edia integr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sort out the media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media literacy and the status of literacy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ing on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results of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an attempt to build a three - dimensional multi leve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cultivation mode, and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 evaluation principle, evaluation content,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evaluation method so a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and enhance the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media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evaluation

融媒体语境下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科学治理

杨清华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融媒体语境下网络谣言传播呈现新表征,传播者的“合理幻觉”、传播语态的“迎合力”、社交媒体的“圈层传播”、受众的“传授杂糅”导致网络谣言产生严重的“次生灾害”,给政府及社会治理提出了艰巨挑战。只有政策遵循“公开透明”、媒体坚守“真实及时”、运营商“优化把关”、公民“理性自律”,多方科学认识、科学研判、协同治理,才能建构虚拟社会科学善治的新格局。

关键词:网络谣言;传播特征;科学治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6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097-05

融媒体语境下网络叙事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量,深刻革新人类的工作与生活方式。而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无疑对社会认知、社会心理、社会情绪产生复杂影响。当前,对网络谣言的研究,学术界已形成基本的框架体系,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切入角度较多,内容聚焦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传播路径、控制机制。国内外诸多成果将理论融入实践,就具体的社会中介事件做个案研究,探究谣言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扩散和转化规律,进而探索应对策略。诚然,网络谣言的内涵(即“是什么”)与如何进行网络谣言治理(即“怎么办”)同等重要,而中层理论强调“统一经验发现、局部构建整体关联”。本文希冀在厘清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及传播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揭示网络谣言的内在逻辑,进而形成对网络谣言治理内在理路的规律性认识。

谣言研究先驱、美国学者奥尔伯特(Allport, G. W.)与波斯特曼(Postman, L.),认为谣言是“缺乏具体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的、与当时事件的命题。”他们提出了重要的“谣言传播公式”:谣言的流通量=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1]由此可见,“重要性”“模糊性”成为谣言传播的关键因素,在融媒体语境下“谣言传播公式”依然适用,且其“重要性”“模糊性”在虚拟世界中更易扩大化,谣言传播更易

生成“燎原之势”。因此,廓清网络谣言混沌复杂的传播特征,有利于建构科学理性的应对体系。

一、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

与传统谣言传播相比,无论是传播者、内容、媒介,还是社会影响,融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传播具有新的特征。

从传播者来看,谣言传播主体多以“群体”形象存在,极易产生“群体思考”和“合理幻觉”。如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说“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2]其传播行为多出于以下三种心理动机:一是出于情感宣泄。由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制约、法律约束、道德规制,公众内心在无形中积攒了压抑情绪,加之来自生活的压力,都极易产生焦躁、不安、不满、怨恨。二是传播者多出于恶性满足心理。如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由于认识局限等因素难免存在信息模糊的情形,造谣者利用契机在叙事过程中结合刻板印象,植入自我喜好,对既有事实进行恶意篡改、编造,期望事件朝着自身意愿方向发展。三是表现心理,社交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的表现欲。在网络虚拟世界委婉中和的表达不一定会引起注意,但造谣却是一种成本低、刷“存在感”的捷径,谣言的“新奇”与“震撼”可以获取接受者接受时的兴奋,同时佐证了自

收稿日期:2021-10-21

基金项目:2019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融媒体语境下湖南形象传播策略研究”(19YBA097)

作者简介:杨清华(1982—),男,湖南双峰人,博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网络传播研究。

身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优势地位”。

就传播内容而言,形式上以微信对话截图、微博截图、短视频、藏头诗、网络造句、网络行为艺术、跟帖“盖楼”等方式进行了“创新性表现”。截图和短视频通过后期技术稍做加工(如PS与恶搞视频),视觉冲击力与误导性极强、监控难度大,而且真假难辨。这种“眼见为实”的现场感、“内部私聊”的“真实感”让受众对此类谣言丧失“免疫力”。网络谣言不仅在形式上“创新”,在叙事上也下足了“功夫”。大多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一般采取短、平、快的叙事节奏,结合夸张、锐化的表现手法,精准捕捉受众易敏感的“弱势群体”与“明星群体”,引发较强“煽动性”。另如遇实名制局限,造谣者只需加上诸如“求证”“求辟谣”“是不是真的啊”此类前缀,谣言照样“满街跑”。网络谣言的娱乐逻辑赋予其更大的劝服性效果,同时通过“拼贴”与“戏侃”,异化“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提高了话语的传播力。

从网络谣言的传播媒介来看,由于传统媒体时有严格把关制度掣肘,信息不能全面及时传达,社交媒介则成了谣言滋生的“乐土”。社交媒体具有的责任模糊、便捷、高效、低成本等特点,成为谣言传播的“加速器”。根据我国主要辟谣平台发布的谣言数据统计分析,微信朋友圈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微信是一种小空间、强关系的社交媒介,具有半封闭性、地缘性、血缘性特征,信息的自我净化功能弱,再加上“信息茧房”效应,人们形成单向度接受习惯性信息,信息屏蔽现象严重,高度同质性信息易使谣言迅速扩散。微信的点式传播,公众号、朋友圈的散式传播,这种集合个体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的“圈层传播”模式,“强弱连接”的“混合双打”,重大公共事件常常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场域,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

在融媒体语境中,网络谣言的受众身份较为模糊,呈现一种“传受”杂糅。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受众在接受谣言后部分随即成为谣言传播者,促成“一场有着广泛公民参加并且利用各种信息传播手段进行传播的运动。”^[3]这种无意识的传播,一是基于个人在事件当下的猎奇恐慌、认知受限、刻板印象、“宁可信其有”的社会心理,将谣言作为一种排解、发泄的途径。二是基于非理性的“群体狂欢”。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危机与风险,负面信息的暗示能量远超正面信息,易形成“偏颇吸收”,失去理性的个人,产生“羊群效应”盲从大众,经过群体的“协同过滤”,谣言就变得越发“真实”,最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产生“舆论共

振”效应。网络谣言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由个人融入群体,基于群体共识、群体记忆进行一场“疯狂的”群体创作。

最后来看传播影响。融媒体时代网络谣言拥有巨大的传播能量,呈现放射状、病毒式传播。网络谣言相比普通信息更易被复制、转发,其传播过程杂糅多种传播方式与手段,呈现组合性、交叉性传播特征,网络谣言形成几何级的传播速度与“蝴蝶效应”。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一旦政府及官方媒体信息公开不全面不及时,臆想猜测立即转变成网络谣言肆意蔓延,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网络谣言叙事与传播对个人而言,会导致恐慌、焦虑的情绪,产生非理性行为;对社会而言,群体的恐慌与失控势必引发公共情绪共振,破坏生活秩序与生产秩序,导致社会信息系统紊乱。

二、网络谣言的科学治理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裹挟着强大的“集体性”与“感染性”,直接影响公众情绪、社会稳定,产生社会信任危机和价值迷失,甚至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而与此同时,网络谣言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社会问题的“极端映射”。谣言的干预与治理是公认的世界难题,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面前,政府、社会、信息生产者与管理者需冷静、科学、辩证地审视网络谣言,精准研判、多元协同,建立网络谣言的长效治理机制。

(一)科学认识

首先,正视网络谣言,是科学干预与治理的第一步。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社会管理的观念由“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逐步转变,但“社会管控”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依然视网络谣言为“洪水猛兽”,视造谣者为“乌合之众”,一旦出现便盲目打击,较少去厘清其背后的生成逻辑与社会心理。网络谣言是谣言发展的新形式,是一种未经证实却极具传播性的公共信息形态,本身具有较强的复杂性。网络谣言既具有虚假性,又具有现实性,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心理诉求。勒莫认为:“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4]在全球化及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功利主义思潮影响,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并不能“并辔而行”,极易产生道德精神的“判断迷失”或“精神困顿”。在突发事件中,人们对信息提供的疑惑、对生命安全的担忧、对政策与管理行为的存疑、对现实经历不满的发泄都演化成虚拟世界的逆反与盲目表达。“谣言之所以能够兴起并被传播,是因为谣言与相信谣言的人的已有信念相

吻合,并且能够被这些人接受。”^[5]由此可见,网络谣言体现了外在的“信任危机”,但在网民内部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信任关系”。因此,网络谣言的治理绝非“一劳永逸”,也绝非“一朝之功”,而应科学理性认知。

其次,网络谣言兼具风险性与警示性。网络谣言叙事是一种“风险叙事”,大多关注社会风险议题,诸如公共卫生、公平正义等,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当网络谣言与官方舆论场形成某种“话语竞争”时,网络谣言又往往采取诸如PS、行为艺术、恶搞音视频、表情包等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效应,这给官方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谣言与真相的“赛跑”,倒逼管理部门、媒体和民众在开放性空间里寻求理性、权威,检验和批驳谣言,从而最终阻击与消解网络谣言传播。与此同时,官方主体借此研究社交网络、在线社区等平台网络谣言的生成与演化逻辑,聚焦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互通问题,线上“狂飙”与线下动员的相互关系,这都将给此后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渠道及新方法,为其框架建构、资源动员提供经验价值。这种警示性“练习”在某种程度上将提高政府、社会、公众的免疫机能,给政府与社会进行了“预防接种”,并“弄拙成巧”地设置了“安全阀”。

诚然,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处于“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国家与社会关系会呈现出复杂而又多变的形态特征,一方面国家通过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改革,倡导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关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忽略了网络谣言的影响。因此,要实现社会治理的长足发展,政府与社会都应科学辩证地重新审视网络谣言的本质,广泛倾听社情民意,疏通官民沟通渠道,与网络谣言展开正面博弈、科学博弈,真正发挥其“安全阀”“警示器”的社会功能。

(二)科学研判

理性认知是网络谣言治理的理念革新,而科学研判则是网络谣言治理的技术革新、组织革新。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诚信建设论坛发布了《后疫情时代网络谣言治理社会价值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主题类型分散化、传播主体分众化、内容形态伪装化、传播周期短平化是后疫情时代网络谣言的整体特征。《报告》在基于舆情大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网络谣言治理社会价值评估模型,为网络谣言科学研判、网络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对网络谣言的分析与研判是干预谣言传播、降低谣言破坏力的前提,实现精准的科学

研判在于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与群体智慧。

首先,政府可以结合网络谣言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空间、传播时间、传播情感等,组织大数据分析、分类演算等谣言检测技术手段,提高谣言检测的有效性,识别谣言的真伪。就传播者而言,根据网络用户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网络行为习惯综合判断网络造谣的可能性,一般来说,注册时间长短、活跃度与造谣指数成反比。在传播内容方面,《后疫情时代网络谣言治理社会价值研究报告》中显示,热度排名前100的网络谣言中,近40%的网络谣言多次出现,标题含数字、特殊符号等占比29%。因此,可爬梳情感词、动词、代词的文本特征以及诸如“@”“#”等符号特征,同时选择有效算法对词向量进行降维,选择强分类能力的特征词提高情感分类的精准性,从而提高网络谣言辨识度。传播扩散方面,紧密关注用户的信息响应行为,即转发数与评论数,同时追踪信息的首发平台、峰值时间、持续时间等要素,《报告》显示,单次网络谣言的生命平均周期为5.3天,38%的网络谣言7天内会消弭,但其社会影响不会伴随消失。因而通过不断优化技术手段,提升谣言自动检测的准确性,准确鉴别“谣言”“舆论”“舆情”“民意”,提高谣言的前期研判介入是降解网络谣言社会影响的关键。

其次,网络谣言治理需要发挥集体智慧。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也是信息的判断者。我国诸多官方网络平台、商业网络平台、传统媒体都先后投入网络辟谣工作中。自2013年8月北京网站联合辟谣平台上线以来,先后有“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科学辟谣平台”等权威辟谣平台开通,传统媒体、新媒体的辟谣平台遍地开花。“辟谣”工作也是一场“总体战”“人民战”,官方机构联合权威媒体、行业专家科学鉴定评判、网民积极参与辨识,采取联动发现、联合判断、联动辟谣,提高信息判断的权威性、时效性、协同性、精准性。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辟谣参与群体不局限于各领域专家,谣言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的辟谣有时比专家更有说服力。然而,科学精神的要义在于“始终经得起检验”,辟谣不仅涉及技术,还涉及道德操守,要始终坚守辟谣平台的权威性、公信力,因为辟谣平台科学精神的失守,会比网络谣言的破坏力更大、影响更恶劣。

(三)协同治理

网络谣言的干预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媒体、运营商、公众的多元协同。

网络谣言是在信息传播的模糊性阶段介入的,

官民信息的不对称、民众对信息的迫切渴望,这些都成为网络谣言滋生的现实土壤。政府应发挥首因效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获得舆论主导权,这将有助于政府获得公信力,从而在公共事件处理上获得善治优势。一般来说,政府可信赖程度的具体衡量指标包括三个方面:能力、善意与正直。^[6]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初期,一旦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公共事件处理能力示弱,信息公开不及时,给后期社会信任修复带来巨大压力。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是信息的最大拥有者,“当政府及时就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布全面、真实的信息时,这种信息具有排他性”^[7],根本原因在于其信息的权威性、公众对政府的本能信赖以及首因效应的主导印象。其次,政府面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机制存在单一化倾向,“防”“堵”管理方式较为常见,治理效率大打折扣。因此,管理部门应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正面应对网络谣言,深掘其潜在的社会矛盾,标本兼治解决问题。另外,我国现行法律对网络谣言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相关法律制定相对滞后,权威性、系统性、可执行性有待强化,制裁刑期与谣言的社会影响不相匹配,建议加大处罚力度,同时提升公民自诉意识,共同治理网络谣言。随着社会治理的日渐成熟,基于虚拟世界的“去中心化”“扁平化”“共享性”特征,政府在网络治理的角色定位也由“强制”中心转变为“组织”中心,网络谣言治理逻辑由“防堵”转变为“导控”,积极吸纳、组织协同网络科技公司等市场主体、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网络社区与网民等参与治理,合理地运作和生成积极的“对话关系”,高效协调各参与主体融入网络谣言治理进程之中。政府既要在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扮演“权威性”“制度化”角色,发挥其“导向”功能;同时也要秉承“分类治理”“精准治理”理念,将极具“流变性”的网络谣言科学划分不同发展阶段、演变形态,灵活设计与应对,竭力促成高危、中危型谣言安全消解。

作为媒体,在政府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期间应发挥“社会雷达”的强大功能,强化职业操守与责任意识,真实、及时传播信息。在融媒体时代,突发公共事件中真相与谣言的较量“分秒必争”,“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状态已成现实,“乌合之众”可以超越空间迅速聚合,网络谣言也可能异化“成真”。人们头脑当中90%以上的世界认知均来自媒介“镜像”,媒体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尤为重要。谣言爆发初期,主流媒体应第一时间主动发声,提供权威信息,即便无法提供准确的结论性信息,过程性信息的持续发布也会起到遏制谣言的目的。在谣言

持续传播期,主流媒体应善于用专业、直观、鲜活的形式解答公众疑虑,利用网络谣言对民情民意的反射,提升舆论引导的对话性与亲和力,将公众议题、社会议题、媒体议题三者融合,降低信息的模糊性,激发辟谣效果。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认为:“辟谣要想有效果,也得翻来覆去地说。”^[8]主流媒体引导的多渠道、多平台、多频次权威信息释疑,将有利于网络谣言消解。而在网络谣言消退期,主流媒体应引导公众反思谣言的传播过程及社会影响,同时为政府提供潜在民意,共同促进社会矛盾的有效解决。自媒体之所以成为网络谣言的主阵地,主要原因在于“监管”缺位,再加上微信的半封闭空间、视频等自媒体内容的检测难度,导致把关可行性降低。自媒体运营商作为其“把关责任主体”,大力推行实名认证机制,树立担当意识、专业把关意识,主动对网络谣言进行科学过滤,同时改变一味“删除、屏蔽、拉黑”等生硬处理方式,创新把关模式,提高把关成效。如微信平台通过引入辟谣小程序,为用户提供科学权威信息。

网络环境的净化还有赖于公民的理性自律。自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网民在虚拟世界中的角色获取成本极低,网民只要申请账户即可获得“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表演”。这种“表演”极易受经济利益、观众期待、社会舆论影响而产生社交幻化、自我迷失、偏离理性,进而成为网络谣言的制造者或传播者。于是,“理性培育”就成为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成为维护网络生态良性发展的系统工程。它是一个从认知到情感,从道德习惯养成到法律约束管理,从外在规范引导到内在自觉自行的复杂过程。诚然,“善”的养成来自“自化”与“教化”。自化的过程需要培养“反省性思维”,这种思维与网络谣言中的情绪式“批判”“质疑”不同,它表现在人们的分析、解释、评价、判断均基于具体证据、标准、语境基础之上,科学理性批判并有“建设性”,并非“只破不立”,批判与建构并行,是公民理性培养的深层次内涵。要让公民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不信谣、不传谣,一靠教育,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公共理性教育,通过媒体宣传、思想教育、心理引导等手段推动公众“自化”,尤需强化广大大、中、小学生的网络行为规范教育,使他们由“受教者”逐渐转变成“守望者”,最终促使全社会趋向“规范认同”与“理性自控”;二靠法律,法律是网络秩序的“维护者”与网络行为的“指南针”。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立法执法部门需细化网络谣言的法律约束与制裁条例,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完善法律法规,依法追责惩治。只有社

会个体能动自律,严守言论自由界限,外部世界优化伦理规范、价值引导、法律制约,才能最终实现“公共的善”。

三、结语

诚然,网络谣言治理有待接受检验,亟待建构科学的效果评估体系。据《后疫情时代网络谣言治理社会价值研究报告》显示,辟谣传播力、治理响应力、谣言阻断力、情绪恢复力成为计算网络谣言治理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而辟谣响应速度、辟谣信息传播量、内容风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效果评估的具象化指标。以《人民日报》的《求证》栏目为例,2011年起开设,“力求通过严谨核实与深入调查”,澄清事实,阻击谣传。但其调研时间长,发布频次少,传播效果有限。2017年成立的腾讯“较真”事实查证平台,联合专家学者及第三方机构,通过约稿、原创、优酬的方式,致力于社交媒体谣言治理。同时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建构专门的24小时监控机制,从网络谣言源头、传播路径进行研判分析,提高信息辨别精准度。“较真”平台还开辟了微信公众号“全民较真”和微信小程序“较真辟谣神器”等,拓展了辟谣矩阵,提升了治理的响应力与阻断力。但随着数据化程度与技术不断升级,信息核查的常态化、覆盖面有待不断提升,在线核查、人工算法、集体智慧等手段的运用效果也有待评估科学化。

融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传播呈现出庞杂性、不确定性,给网络谣言的干预与治理带来巨大挑战。黑格尔说,“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9]。因此,网络舆论亟须科学引导,理性建构。中国的网络叙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逻辑、民

众公共参与逻辑,回眸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近代先哲们曾不遗余力地将“科学精神”厚植于国民塑造,只因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科学知识、科学精神能够重构理性。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个体理性便于探究真理,群体理性则促使进步。面对当今虚拟社会的纷繁驳杂,政府有能力建构多元参与、科学善治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奥尔波特,波斯特曼. 谣言心理学[M]. 刘水平,梁元元,黄鹏,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41.
- [2]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9.
- [3] 严富昌. 网络谣言研究[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51.
- [4] 弗朗索瓦丝·勒莫. 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M]. 唐家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5.
- [5] 凯斯·R·桑斯坦. 谣言[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6.
- [6] 徐彪. 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受损及修复机理: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 and 情景实验[J]. 公共管理学报,2014,11(2):27-38.
- [7] 叶浩. 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2.
- [8]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 谣言[M]. 郑若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48.
- [9]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Rumors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Media

YANG Qing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integration, the spread of online rumors presents new features: the “Reasonable illusion” of the communicator, the “Pandering power” of the communicator’s voice, the “Circle spread”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Mixture of imparting” of the audience, which lead to serious “secondary disaster” of the Internet rumors and post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To construct a new pattern of good governance of science in virtual society, the polic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the media shoul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authenticity and timeliness”, the operators should “optimize supervision”, the citizens follow “rational self-discipline”, combining with multi-party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judgment,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Key words: internet rumors;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 management

诗歌译解:跨越翻译叙事的审美距离

——基于刘华文《翻译诗学》的考察

张宏雨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诗歌译解研究,鲜见从“审美距离”思维方法论角度来展开。因诗译叙事常伴随创造,故而译文并非“零度写作”的结果,它与原文之间难以保持零距离,会产生审美心路及效果的差异,即审美距离。从刘华文《翻译诗学》来看,原诗与译诗之间审美距离被拉远的动因在于:原诗中的“眼前之物”与译诗中的“言下之物”之别;翻译选择中的“近取譬”与“远取譬”之别;“观译”与“看译”之别;原诗与译诗不同“自感”下的“感人”之用之别。译者可以通过主体审美经验体认的主动介入,明辨原诗“表于言”(小用)与“隐于言”(大用)之间的关系,化“小用”为“大用”,深入诗意之“心源”,努力跨越翻译叙事中的审美距离。

关键词:汉语诗歌;英译;《翻译诗学》;审美距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7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102-07

一、引言

《翻译诗学》是刘华文先生于2015年出版的一部译学著作。该书“精当地将翻译与诗学、中西哲学和美学、中西文论和语言理论、中国译学史料和翻译实践相结合,已初步构成一个学贯中西、打通古今、理论联系实践的体大思精之作”^{[1]iii}。它聚焦的一个重要问题为诗译叙事的审美旨趣,作者试图从美学视角来阐释翻译理趣,许多思想别出机杼、富有创见,例如:从审美感应视点提出诗译的感应论;从中国古代“境界”审美观提出诗译的化境论;从绘画欣赏视野提出诗译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从“言象”与“物象”的差异性出发,探讨原诗与译诗在审美功效上的不同。诸多视角与鲜见为诗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用心志给予灵感,凭美学予以滋养。

基于此认识,刘先生将诗歌的翻译释义视为一种对“美”的传递,一种审美态度上的翻译战略意识。汪榕培指出:“诗歌翻译有其特点,它要传达 information,更要传达 aesthetics。诗歌翻译主要功能是美学功能,是情感的宣泄和表达。”^{[2]22} 这表明诗

译是一种审美体验的事实。诗歌的这一审美功能及特质也得到许渊冲的肯定:“译诗的主要目的不是使诗人流传百世,而是使人能分享美的感情”^{[3]76}。许渊冲的理想就是通过诗译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美,且在这一“美”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因此说,诗译叙事正是一种审美活动。这一角度诗歌译论大凡众多,但“审美距离”思维方法论的诗译探讨却鲜有所见。故而,本文以美学思想为据,引入古文论先哲言说,通过对《翻译诗学》中有关见解的分析,以期对“审美距离”问题研究有所突破。

二、诗歌译解中的审美距离及其生成动因

(一)诗译叙事审美距离的思维实质

刘华文在《诗歌翻译的审美距离》中提出了“翻译是一种非零度写作”^{[4]60}的观点。“写作的零度”概念由巴尔特(Roland Barthes)首发,意指“应努力挣脱社会性价值判断与实践介入的束缚,以达成文学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内在一致性的一种写作范式”^{[5]7},其实质就是“一种只起到工具性作用的直陈式写作,中性的即白色的写作”^{[6]50}。后来,一些

收稿日期:2021-12-15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语用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6BY029)

作者简介:张宏雨(1993—),女,河南罗山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叙事哲学。

学者在用它来观察翻译叙事时,顺承了巴爾特的见解,认为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功夫,译者应真实、客观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及内美,勿过多掺杂个人的主观经验。这一翻译即“零度写作”的看法,其根本特点在于主张原文与译文应持有一种可感而透明的零距离。然而在具体叙事实践中,原文和译文往往很难保持零距离,译文不会是一种“零度写作”的结果,尤其汉语诗歌翻译,常常伴随着译者的创意思维。因此刘先生认为,完全绝对的“零度写作”是不存在的,“零距离通常被审美距离所取代”^{[4]59}。

瑞士语言学家布洛(Edward Bullough)于1912年在英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作为艺术的一个要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一文,提出了“心理距离说”,又称“审美距离说”。他指出,人的审美活动与现实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审美的效果与主体方的文化意识、艺术修养、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审美活动中的普遍差异性即审美距离必然由此产生,而美学距离究其内质就是一种心理距离,即介于主体自身和让主体感动的根源或媒介对象之间的距离。因而,不论是艺术的创造者还是欣赏者,他们与文本之间“既应有切身感受而非冷眼旁观,又要带着一定距离”^{[7]126},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审美姿态。布洛的这一假说就为审美距离的客观存在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就作为一种艺术的诗歌原创来说,其里必然包含着审美的过程心路,而对它的翻译,原作与译作之间于审美上的先后之离也在所难免,这种审美之离就是原诗与译诗在审美效果上的差异,差异越大,审美距离就越大。诗译叙事的这种审美距离思维特征及过程,可用图1来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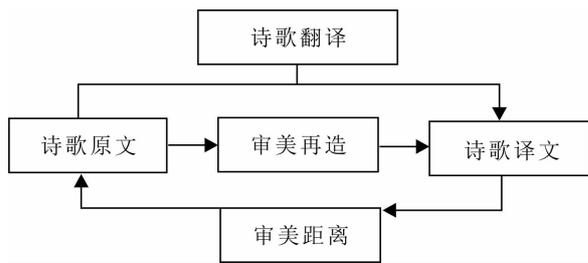


图1 诗歌翻译中审美距离的思维过程体现

(二) 审美距离的生成动因

1. 诗译中的“物”之别:眼前之物与言下之物

刘华文指出,原文与译文审美距离的产生与汉语诗歌的创作特点有关。“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感物美学”^{[4]60},借物起兴、触景生情,而在承沿传统美学哲思的传统诗学中尤见其风骨,即“诗意的激发、传达和表述都寄托在‘物’的身上,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由‘物’生发的物象和意象更是诗人所赖以托付

诗意的介质”^{[4]59}。即诗意产生的空间逻辑体现着“物”在前,“言”在后。因而,诗者大多时候并非直抒胸臆,常常藉景抒情、寓志于物,景物成为诗意的引发者和情感的托付者。

然而,原诗中“物”与译诗中“物”并不可等同。原诗之意旨理趣是诗人藉借眼前之物触发的心中之情,因而诗中之物是直观的、现实的、有生命的,正所谓“眼前景物悉如诗中之语,然后知其工也”^{[8]161}。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梅花》)等,这类诗中物皆为作者眼前之物,诗人心中情致由物所发,又依附于景物之中。而作为译者,激发其情致的物已不再是眼前之物了,而是言下之物,是原诗文字所呈现的物,因而这个物是被语言描述了、静态化的、抽象为概念的间接之物。那么,在翻译时“译者只能通过借助化入‘言’中的‘物象’间接感发而作,只能凭借想象而不能亲身感受,所翻译出来的实际上都是‘脱空诗’而已”^{[4]60},正所谓“想象中的空间、凭想象而支持的传播最终也是止于虚构之层面……于想象的外围,依赖想象所无法克服的现实距离,实在难以避免”^{[9]234}。也正因为眼前之物与言下之物间的距离,原诗与译诗由物所生之情也顺随产生间隔,从而拉开了原诗与译诗的审美之离。易言之,这两个物处于审美进程的两个不同叙事阶段,有着各自的意象属性:前一个物是客观的,静候审美主体去觉察、认知和表达的物象;后者已贯彻了诗人这一审美主体的主观体悟,是一个主客相融后的意象。这种原诗与译诗的物之别就使得二者在审美效果上产生距离。

2. 诗译中的譬喻之别:“近取譬”和“远取譬”

刘先生在其著作中用“近取譬”和“远取譬”这两个概念来阐释诗译叙事中的审美距离,所谓“近取譬”指喻体与本体间的距离较小,“远取譬”则指喻体与本体间的距离较大。他认为,中国传统诗歌创作通常采用近取譬的方式,所取用的喻体“物”一般都与诗人的感知身体相切近,存在于诗人目光所触及的范围之内^{[10]157}。如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等,文中喻体皆为诗人所能直接感知的身边景物。当然,也不乏远取譬的,如苏轼《水调歌头》是诗人想象中的场景,并非眼前直接感知的近身之物。譬喻是汉语诗歌常用的描述方式,那么如何对原诗譬喻进行处理,尤其近譬,会影响到译文的审美效果。如果照搬原诗近取譬的取材方式,审美距离可能会由此被拉大,这是因为审美距离多会因原诗“随物宛转”和译诗“随言宛转”构思方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也正因如此,原诗中近取譬

的物象若毫无易变地复制至译文中,其真谛或许难以译出^{[11]83},“实则将原文之义隔于古代与远方”^{[12]73},会让译文读者感到遥远而陌生。这里以王维《山居秋暝》的诗译加以说明:

原文:“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译文:“After fresh rain in mountains bare//Autumn permeates evening air.//Among pine - trees b - right moonbeams peer;//Over crystal stones flows water clear.//Bamboos whisper of washer - maids;//Lotus stirs when fishing boat wades.//Though fragrant spring may pass away,//Still here 's the place for you to stay.”(许渊冲译)

诗中的松林、明月、溪流、竹子等皆为诗人眼前之物,是切近诗人的喻象,尤其“竹子”“松林”这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意涵的意象,衬托出诗人高洁的情怀。诗人将自己的情感体认寄托于眼前之物,欣赏主体与物象之间的距离自然被拉近。然而上例诗译,直接在目的语中寻得“pine - trees、bamboos、moonbeams、lotus”等现成对应语,将原作者之思想堵隔在“遥远的向日”,那么,西方读者所能感应到的只是这些物象的“常识”,难以捕获它们所昭示的奇异和内美之功,也就感受不到诗人所营造的那份高雅、恬淡、璞真及“文质彬彬”的意境。这样,译文读者与这些物象之间的审美距离就远大于原文读者与其之间的审美距离。这是由于译者直移了原诗“近取譬”的构思方式,尽管保留了原诗中意象与审美主体之间的距离,即二者的间隔没有被译者人为拉开,但是对译文读者来说,他们对这些物象所蕴之教义的陌生感却一仍旧貌,带来译文物象与读者间审美距离的拉大。

3. 诗译中“观”“看”之别:“观译”与“看译”

“观”和“看”是绘画艺术中常用的术语,“观”是一种宏观上的、总领式的欣赏,“看”则是某一角度的、细微之处的观察。而中国古典诗歌与绘画向来密不可分,朱光潜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有一幅画。”^{[13]116}可见,古典诗歌与绘画如影随形、息息相通:中国诗歌极富绘画性,一首诗就是一幅画,给人丰富的画面感;同样,中国绘画也呈现着极强的诗性,画亦诗。因而,将绘画中的欣赏理路嫁接于诗译的审美思考之中,便义顺理成,观与看即为其中一种。

受此启发,刘先生提出了“观译”和“看译”的概念,认为“‘观’和‘看’提供了绘画艺术中的两种真实,而这两种真实也相应地体现在诗歌创作之中,决定着山水诗审美旨趣的高下,诗歌在翻译中也同样面临还原这两种真实的问题”^{[10]123}。为此,他引用苏轼的《题西林壁》来更加直观、细致地阐释观和看的区别,前两句是观,包括“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看”等不同方位的观察;后两句是看,因选取的是庐山的一个角度,也就无法得到其真实的全貌。由此可发现两种不同的审美旨趣:一是“观之作”的审美旨趣,它强调统一性、直觉性和诗性,正所谓“观的世界,是诗化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是超越与有限生成无限的人的精神世界”^{[14]68};二是“看之作”的审美旨趣,其是单一的、局部的和零散的,只能呈现某一视角的观察。诗歌创作在这一审美旨趣上的区别也会出现在诗译中,即“观译”和“看译”两种不同的审美取向。

一般说来,古典诗歌常为“观之作”,诗人会超越眼前之物的局限,突破所看景物的羁绊,任凭意象在无尽的想象中自由驰骋,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观之境界。而西方的绘画观念如同其语言形态特征,注重看而非观,因而其诗歌创作多为“看之作”。那么,译者会受到英文表达特征及思维习惯的影响,多采用“看译”的方式,将原语的观之作转换成看之作,从而改变原诗的艺术功用面貌,原诗与译诗的审美距离由此产生。刘华文点明了这一现象的要义:“将具有绘画性的诗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好比译者用画笔重新作一幅画,但是因为译文语言特点不同于原语,再加上译者这位‘画家’所持有的语言转换理念上的原因,势必会带来与原诗不同的‘绘画’效果。”^{[10]123}例如:

原文:“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望天门山》)

译文:“I can see the Yantze cut//As my boat reaches Tianmen Mountain;//The green water running east//Turns here in a fierce whirl.//Green ranges of the mountain//Rush toward me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A single sail bends with the wind//Where the sun comes up on the water.”

原诗意境开阔、气象雄伟,诗作者并未将自己的目光集聚在某一点上,而是总览全景,因而全诗呈现的景象浑然一体。这样,原诗赋予观者极大的自由度,其心灵可以自由驰骋,不受任何一点的束缚,这

便是“观之作”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而在译诗中，首句“I can see the Yantze cut…”一下子将读者的视线从宏观的散角聚焦在某一点（即长江）上，因而读者感受到的不再是一幅山河气魄的雄壮画卷，而只是某一处的景致；而后几句中的“turns”“bends”“comes up”等动词亦将读者的视角从散点变成聚焦，作为观者的读者便会将目光聚拢在这些独立的场景，而非整体的画面。译者这种“看译”式的翻译改变了原诗“观”的审美旨趣，意味着原诗思想的不再，古人之心志本身，“呼之”不得“欲出”，被堵塞在了“一个遥远的时代”^{[12]72}，如此拉开与原诗的审美距离。

4. 诗歌翻译中的审美感应进路：自感和感人

如果说“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莫言语），那么诗译更是一种有缺憾的艺术。因为原作中的美与诗性很难完整而又原汁原味地保留在译作之中，两者的审美距离便因此被拉开。这种现象，通常发生于诗歌翻译的审美转移过程，“所谓审美转移，就是将原作中的美转移到译作中来，以另一种方式重塑美的形象，而实现审美转移的唯一主体便是译者”^{[15]64}。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又体现于译者对原诗审美物象的自感和感人的审美感应特征上。

刘华文在其《翻译诗学》中认为“感”是诗歌审美的重要环节。从方向性来说，诗歌的“感”负载着自感和感人，两者的关系为自感为体、感人为用。原诗或译诗，自感皆为途径，感人才是目的；自感是创作者自身的感受，感人则是创作者通过此作品带给读者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但是在感的推进中，自感和感人在原诗和译诗里会存在不对等现象，因为在把原文译成译文时，原诗的感人变成了译者的自感。“译者利用原诗的‘感人’之用作为‘自感’之体，继而再将所获得的‘自感’之体转为译诗的‘感人’之用。”^{[10]136}由此看来，作者与译者的自感存在着错位：作者的自感对象是耳目所及之物，是对鲜活事物的直接感应；而译者的自感对象则是这些客体事物的语言文字形式，是一种间接迎受。这样原诗和译诗的自感就发生错位，这两种不同自感下的感人也会随即显发不同的效果。由此，原诗与译诗的审美距离便产生。例如：

原文：“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译文：“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Under a small bridge near a cottage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goes. //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诗中的枯树藤、昏鸦、古驿道等皆为诗人的自感景致，是诗人对眼前之景的切身感受。不过，诗人并未对它们做细致描述，只是将其简洁地排列起来，其感人之用需要读者去体悟，这为读者留下了阔大自由的审美空间。而译文，原本并置的意象被具有完整主谓结构的句子串联起来，不再独立。因为动词的参与，原先的名词意象具有了事件性，名词本身所包含的广阔意象也因具体事件的参与而被收窄，致使读者所能获得的审美空间不如原诗那般阔大。因为，作者和译者的自感发生细微的变化：译者的自感是建立在原诗“感人”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包含原作者意欲阐发的情感，也有自己作为读者的个人体认于其中。译者再将自己个人体认以某种形式呈现于译文之中，这一“形式”在上例译文里便是名词意象事件化。所以原诗的“感人”之用与译诗的“感人”之用就孕发不同的效果，审美距离由此被拉开。

三、跨越诗歌翻译中的审美距离

诗歌翻译所需传达的不仅仅是表面的文字信息，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含蕴的美，翻译的本质和宗旨就是使译诗与原诗拥有相同的审美效果。然而，在实际中，原诗与译诗的审美效果每每发生偏差，产生距离。那么，译者的首发工作便是悉力消除或减小诗译中的审美距离，使译诗读者获取与原诗读者同样的审美旨趣。其思维路径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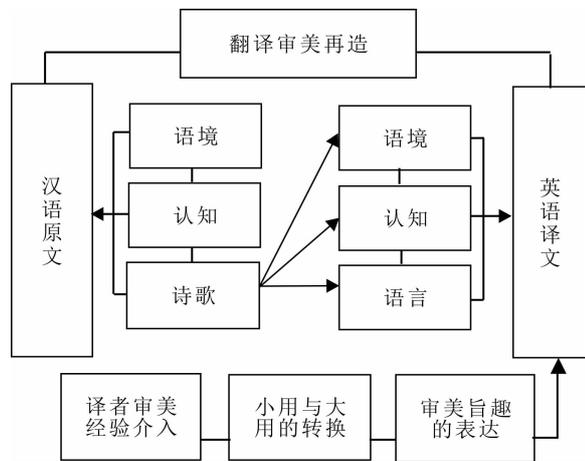


图2 诗译中审美距离跨越的思维路径

(一)“有”“无”之用：化“小用”为“大用”

“小用”和“大用”之说出自《老子·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6]375}“有”和“无”，“有用”与“无用”乃相依互存，辩证统一，很

多看似无用的东西,实则有大用之处。这里,若将有之用看作是具体的、形而下的用,即器之用,将无之用看作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用,即道之用,那么,有之用便可称为“小用”,无之用称为“大用”。以类相联,老子“大用”“小用”之旨趣于诗译论说中皆可见其风质,以此来审视诗译中的审美距离。

刘华文对诗歌语言的“小用”与“大用”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认为,如同马车、房屋、器皿一样,其用处恰恰在于“无”(器之空白处),诗歌亦如此,诗歌的内涵意指和审美指向在于其言语之外的空白之处,这空白便留给诗意无限生成之广阔领域^{[10]163}。这里,诗歌表于言的部分可看作有之用,即“小用”;隐于言的部分可以视为无之用,即“大用”。一首诗的审美内涵既包括有之用的语言本身,又包括无之用的意义延伸。这种有之用和无之用,或曰“大用”“小用”便构成汉语诗歌审美结构最基本的元件。那么,若译诗的大、小用间的关系与原诗的大、小用间的关系出现偏离,译诗的审美情韵与原诗间的距离就会产生。因此,要想克服原诗与译诗的这种审美距离,传达出原诗的意蕴之真,就要把握好诗歌“小用”和“大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努力实现将“小用”化为“大用”的翻译审美再造。例如:

刘禹锡《乌衣巷》,林语堂曾将“乌衣巷”译为“the Blackgown Alley”,把“王谢堂前燕”译为“the swallows graced the Wang and Hsien halls”^{[17]112};而许渊冲将二者分别处置为“the Street of Mansions”和“Swallows which skimmed by painted eaves”^{[18]96}。林译偏于字面意思的释读,相沿原诗“近譬”方式,并无变动诗中的物象与其审美主体之间的距离,这种译法仅考虑到诗歌表于言的“小用”,却无关注并译出隐于言的“大用”。其实,“乌衣巷”“王谢堂前燕”的言外意指(即含而未发部分)要远远大于言内指向,即它所外加于言之外的空白处,这“空白处”便是“大用”,它能给读者留下多方位的审视空间,使之见仁见智、各逞臆说。对于熟悉中国文化的汉语读者来说,其认知很容易从“乌衣巷”“燕子”的“小用”上升至“大用”,但西方读者,很难领悟到“Blackgown Alley”和“swallows”常规意义外的隐喻及诗意之处,这样因横截词语的内外之义,隔断拉远了文意与义理密切的关系,使译语对原词语难以自我回返。因而,原诗中本来具有“大用”特征的意象在译诗中降格成仅具有“小用”特质的物象,造成原诗的审美旨趣在译诗中的缺失。而许译选用译文读者更为熟悉的喻体取代原诗的物象,看似与原文本体的距离拉远了,实则体现着“译者,易也”之古则,

引入原诗思想,自然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这些物象存在与审美主体相贯连的文思通道瞬间被打开,从而消除他们对原诗物象的陌生感。

诗歌语言极富诗性,在原诗“物象化”的翻译中,“乌衣巷”“燕子”等会由静趋动,引发自身的改变,促使其呈现为一种动态过程。其间,这些物象不会局限在“小用”之上,“只有自我归化,也就是自我启动,自我出离自身或曰进入似乎是异己的动态之中,然后再次回归,才能真正成就并壮大自身”^{[12]77},一种“大用之用”的诗韵境界于此过程中自成。如果仅囿于表于言的“小用”,会很难挣脱其字面语义“世俗功用”的羁绊,从而掩盖或抑制诗歌的“大用”,使原诗的审美结构、旨趣发生可能的变形,话语所包含的能让原诗经久传诵的诗德文性就被遮蔽,译诗就失去像原诗那样的生命力。

(二)主体审美经验的介入:从“无”到“有”

刘华文指出,译者主体审美经验应从“零介入”到“介入”^[19],由此提出诗译“同一性梯度”和“审美性梯度”的观点。“同一性”指原文与译文的一一对应,包括概念间的结构对应性同一、表达性同一和认知性同一。在具体诗译中,有些话语如专有名词的翻译,对“同一性”的要求较高,不容许译者的具有个体差异的审美经验等方面的主观因素的干扰,这时译者的审美介入程度比较低。但对于文学尤其诗歌翻译,主体审美经验不可缺席^{[19]90}。话语之间纯粹概念性同一关系转译的实现凭借的是概念思维方式,如“北京”和“BeiJing”,但是“诗歌翻译中的译者主体的审美介入所达到的认知性同一关系则依赖的是审美经验思维”^{[19]91}。因为,作者会投射语言以强烈的主观色彩自然会留下许多无定之处;而译者的翻译作为又一次叙事再造,也会介入主观色彩在这众多“无定之处”的基础上再次进行许多无定的创造。这样,双向反馈,形成审美的无限性。由此讲,在具有强烈审美特质的诗译中,同一关系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同一,而是属于相像中的同一、近似中的同一和自变中的同一,显发了翻译主体审美经验介入之事实^{[20]112}。

西方语言往往是具有定义性的、精确性的范式语言;而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以此为符号所记录的汉语言多基于对物象的经验感知而构建起来,被称为“意象语言”^{[21]39}。特别是汉语诗歌,字里行间盈满着意象,而意象的创造通常依靠名词来实现,因而名词作为意象的载体在诗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名词背后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象,每一个意象的情思含发与意旨指向也不同,所以读懂名词背后

真正的意象所指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同一,这中间当然少不了译者的审美介入。由此说,在对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同一性进行理解时,既不可拘泥于机械式的绝对化一端,仅满足于原文和译文表面结构概念性上的同一,也不能走入漫无边际、恣意任性的另一端。而应拿捏好二者同一性程度的分寸界定,创造性地介入自我主体的审美经验体认,以促使译文与原文同一关系的“和一”达成。例如:

王昌龄《出塞》后两句有两个不同的译本,分别是“*If General Li on duty guarded the Dragon - Line boundary//No Hun's cavalry horses dared to pass the Yin - Mountain.*”和“*If the Flying General were still there in command//No Tartar horses would dare to invade our land.*”前者将“阴山”直译为“*Yin - Mountain*”,原文和译文在语义结构对应性上达到完全同一关系。译者于译名中决无自己的经验感知介入,译者的审美感知处于零介入的状态。但是这种重复性的一式一样的同一表达并无融入该词于原诗中的文化内涵,读者自然难有与原语读者那般的情感体验。而后者将“阴山”译为“*our land*”,虽然在结构对应性上毫无关联,看似没有实现原文与译文结构对应性上的同一关系,却实现了认知上的互持、互渗和互成,达成新的同一格局。因为这里的“阴山”不仅是普通的山脉,还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个军事要塞,代表着国家的完整和统一,而后者“*our land*”正拥持着这一思想内涵的力量。这样,诗者便能与原文读者达到同样的构想趋向,领有同样的审美效果。这说明,认知关系同一性的实现需要译者审美经验的自反、自见与介入。

四、结语

诗译是一种跨文化“会通”,其不仅是对文意的传达,也伴随对义理(诗美)的传递。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如原诗与译诗对“近譬”和“远譬”的不同选择,原诗“观之作”的创作方式和译诗“看之作”的释译方式之别,原诗中“眼前之物”和译诗中“言下之物”的呈现差异,以及原诗与译诗不同的“自感”和“感人”过程等,原诗想要表达的审美效果和译者所传递的审美效果便会产生差异,二者的审美距离就会由此被拉开。

虽然审美距离的产生是诗译的惯习之事,但是,译者作为原诗美之传递的唯一主体,需要努力减小或消除二者间的审美差距,以期实现对原诗“人世精义”的完美转达。于此过程中译者还要意识到,作为审美主体,自我审美经验的适当介入十分必要,因为诗译并非机械复制的结构对应性同一关系,而

是包含着审美体验的认知性同一关系;而“复制意味着传统的不再,显现的正是思想的不在场”^{[12]72}。故而,译文应有译文的作为,以原意象为本,再锻新词,意象意象的意象,才可于终了再还回原文之所本。同时,译者更要分辨诗歌“大用”和“小用”之间的关系,努力化“小用”为“大用”。只有通过这种审美介入,才能深入诗意之“心源”,发掘原诗意象的情趣之妙和初心之善,努力去“见”诗人之所“见”,“达”诗人之所“达”。唯有如此,才能使译诗较之原诗神思默契而毫不逊色。

参考文献:

- [1] 顾明栋. 本书序[M]//刘华文. 翻译诗学.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 [2] 汪榕培. 为邵斌著《诗歌创意翻译研究》所作的序言[M]//门顺德. 传神达意翻译理论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 [3] 许渊冲. 诗书人生[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 [4] 刘华文. 诗歌翻译的审美距离[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 [5] Barthes, R(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6] 项晓敏. 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 [7] 高美云. 论譬喻的远近和诗歌翻译中美感的变化[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 [8] 胡仔. 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四[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9] 浅见洋二. 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M]. 金程宇,冈田千穗,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10] 刘华文. 翻译诗学[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 [11] 焦丹,赵志男. 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实践研究:价值、问题与对策[J]. 中州大学学报,2021(2).
- [12] 蔡新乐. 《论语》之中“仁”的英汉译解原理简论[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2).
- [13] 朱光潜. 诗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14] 刘继潮. 游观:中国古典绘画空间本体诠释[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 [15] 陆钰明. 诗歌翻译中的审美转移:以白居易《长相思》的英译为例[J]. 东方翻译,2017(3).
- [16] 王力. 古代汉语(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7] 林语堂. 诗词翻译的艺术[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 [18] 许渊冲. 唐宋诗一百五十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19] 刘华文. 诗歌翻译中的同一性梯度与审美性梯度:诗歌翻译的认知修辞学考察[J]. 外语学刊,2005(3).
- [20] 刘大为. 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M]. 上

Bridging the Gap of Aesthetics Distance in Poetry Translation

ZHANG Hong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poet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distance. It is impossible to realize zero degree distance betwee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and the original poem, for the process of poetry translation is also the one of poetry creation, thereby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aesthetics which is called aesthetics distance in the present paper. In light of Translation Poetics written by Liu Huawen, causes that aesthetics distance is broaden between a translated poem and an original on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the image in a poem derives from the author's vision or mind, while, in translated version, it only comes from translators' mind. Second, in describing an object, the author of original poem usually chooses the object before his or her eyes while a translator has no other choice but makes one available in his mind. Third, feeling from the author towards a poem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ranslators. Hence,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poem, a translator uses his or her aesthetics experience to identify the implied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poem and spares no effort to bridge the gap of aesthetics distance.

Key words: Chinese poetry; C - 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oetics; aesthetics distance

(上接第 53 页)

参考文献:

- [1]宋思曼.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理论与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3.
- [2]张国祚.中国软实力研究论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3]贝兆健.文化治理体系构建的上海实践及思考[J].上海文化,2014(8):63-73.

[4]汪玉凯.准确理解“顶层设计”[N].北京日报,2012-03-26.

[5]马懿.在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N].郑州日报,2017-08-16.

[6]侯红.政府工作报告[N].郑州日报,2021-02-03.

[7]郭国锋,李玲玲.郑州市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力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19(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Promote the Cultural Image of Zhengzho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City

HAO Yanyan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city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Zhengzhou.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refers to a major city that has national influence in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and other fields and can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behalf of the country. To build Zhengzhou into a national central city,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city's cultural image and lea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we should analyze the cultural image of Zhengzhou, find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culture,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top-level design, locate the core resources of city culture, and aggregate the advantages of human resources to help Zhengzhou improve its cultural imag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city.

Key words: Zhengzhou; national central city; cultural image; strategy

语言特区理论视域下诗歌文体对 新闻标题语言的影响

张 力¹, 张剑英¹, 仵兆琪²

(1.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2. 重庆师范幼儿高等专科学院 初等教育系, 重庆 万州 404047)

摘 要:诗歌文体作为语言特区的一个重要区块,是语言发展演化的重要源泉,其高度概括、简约凝练等特点与标题语言有着很多相通之处,而且在实践中已有不少诗词佳句进入新闻标题中。因此新闻工作者在制作标题时需要充分考虑语言的简洁性和创新性,恰当使用新词新语,力求写出诗化的标题,以增强新闻的吸引力、提高新闻的阅读量。

关键词:新闻标题语言;诗歌文体;语言特区;诗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8

中图分类号:G2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109-05

一、语言特区的属性和区域

语言特区理论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具有深远影响的当代语言学理论,它是在“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特区”属性在不同的领域或平台具体化的呈现。“经济特区”是指可以实施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特定区域,它可以突破主流经济法规政策(如减免关税等)的限制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行政区”则是指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可以实行特殊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的行政区域。出于语言使用者表达的需要,语言也有自己的“特区”,所谓“语言特区”则是指可以有条件突破常规语法规则约束的语言运用的特定领域。

特区的存在依存一定的区域或平台,如中国目前有包括深圳、厦门、汕头、珠海、海南、喀什、霍尔果斯在内的七个经济特区,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语言特区也并非“空中楼阁”,同样有自己发挥作用的平台和区域。研究发现,诗歌文体、标题口号和网络语言是语言特区运用的三大区域。此

外,特区属性允许特区成员突破惯常“法则”的束缚,但是这种突破是有其限度的,如经济特区不能突破自愿平等的交易原则,特别行政区的一切政策制度必须在中国宪法的范围内制定。与之类似,语言特区也不能突破人类语言能力的束缚,即不能突破“普遍语法规则”的范围^[2]。而诗歌文体作为语言特区运用的三大区域之一,其语言的高度概括性和简约凝练性等特点都与新闻标题的特点相暗合,两者的运用方式也密切相关。为增强新闻标题语言表达的艺术化和精确化,有必要在语言特区理论的框架下探讨诗歌文体对新闻标题语言的影响,并为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标题撰写时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参考。

二、诗歌文体的语言特点及其影响新闻标题语言的理论基础

诗歌是指使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达作者的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新闻标题是指出现在新闻正文前面,对新闻内容进行概括或综合评价的简短

收稿日期:2021-12-10

基金项目:2018年度中国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诗词韵文中的语言创新及其对语言发展演化的影响研究”;2021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语言特区理论视域下的网络语言中的句法突破现象及其制约机制研究”(2021-ZZJH-386);202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语言特区理论视域下新闻标题中的句法突破现象及其制约机制研究”(2021CYY036)

作者简介:张力(1988—),男,河南南阳人,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句法学理论和汉语语法。

文字。新闻标题作为标题口号的次类,具有语言特区的属性,亦是语言特区的一种^[3]。作为语言特区成员的诗歌文体对新闻标题语言有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诗歌文体简洁的语言特点符合新闻标题的表达要求

诗歌语言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语言的凝练概括性,与散文小说等文体不同,诗歌不需要铺排陈述式的叙述和描绘,它追求语言的简洁,力图达到“词约意丰”的表达效果。诗歌语言概括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量省略手法的运用。如语气词是表示语气的一类重要虚词,通常位于句子的末尾用来实现句子的某种语气。语气词在散文、小说等文体中比比皆是,但是在诗歌中却甚少使用,尤其在代表中国诗歌最高水平的唐诗、宋词中更是少见。

在散文、小说等文体中,谓语一般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诗词中却经常可以隐去不出现^{[4][146]},例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全诗没有一个谓语动词,却为读者呈现了一副极富流动感、生命感的秋郊夕照图,这在散文或是其他文体中是很难见到的。

除了语气词和谓语的省略以外,诗歌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由关联词的省略而造成的紧缩句。如王维《观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这句诗中,上下两小句都省略了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联词,原诗可还原解读为“因为芳草枯萎,所以鹰眼才能够锐利;因为积雪散尽,所以马蹄飞驰才更加轻盈”。诸如此类的省略关联词的用法在诗歌中数量繁多,举不胜举。

新闻标题是出现在正文内容之前、对正文进行概括或评价的简短文字。为突出新闻的时效性,标题往往采用省略的方式以简洁化的语言帮助受众在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如“种桑养蚕 致富路宽”(《人民日报》2021年08月18日),字数一致、句式工整外,这一复合句式标题省略了条件从句中的关联词,在省略关联词“就”后的标题语言比通常语句更符合经济原则,简单凝练,读起来朗朗上口。由此可见,诗歌文体力求简洁而采用的省略手法同样适用于新闻标题,两者在炼字、组词和选用句式方面有相同之处。

(二)诗歌文体的创新属性为新闻标题创作注入活力

语言特区的性质允许语言使用者在这些特区区域中突破共时常规语法规则的束缚大胆地进行创新,推动语言的发展和演化。因此,语言特区与语言

接触以及语言习得共同构成语言发展创新的三大动力源泉。

1. 诗歌文体的创新属性

诗歌文体作为语言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发展创新的重要源泉。通过考察发现,诗词文体中蕴藏着大量的创新语言现象,其中不乏对后世影响久远的常见词语和语法现象,这些对汉语的演化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在此酌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词语方面的创新现象。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汇、成语等有很多都是从诗词歌赋中产生的,如“月亮”一词最早见于唐朝著名诗人李益的《奉酬崔员外副使携琴宿使院见示》诗中,“亭木已衰空月亮,城砧自急对霜繁”。这里的“月亮”并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短语,表示“月光明亮”意义的主谓短语,它们在诗词格律的作用下凝固成一个双音节词。诗歌也是成语产生的摇篮,通过对《汉语成语考释词典》的统计,我们发现其中有不少的成语都源自于诗歌,如“风雨如晦”就是出自《诗·郑风·风雨》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明日黄花”出宋代苏轼《九日次韵王巩》中的“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此外,量词和介词也有不少产生于诗词当中。如《汉语大字典》中提到,“簇”的量词用法始见于唐代白居易的诗中,“几声清淅沥,一簇绿檀栾”(《题卢秘书夏日新栽竹二十韵》)。

第二,诗歌对句法方面的创新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前人考究发现,现代汉语中常见的“把”字句,就是在唐诗中由目的句(如“倒杯水喝”,倒水的目的就是为了喝)演变而产生的。由于诗歌独有的韵律特征(句尾重音,通常是诗句的最后三个音节),迫使目的句的重音结构发生转移,如“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的焦点重音在“仔细看”上,而不是“茱萸”上,这一情形恰好满足了把字句的重音特征。^[6]

2. 创新性语言是新闻标题成功的必备条件

新闻标题也具有“语言特区”的属性,它允许语言使用者有条件地突破常规语法规则的束缚,大胆地进行语言创新。在这一点上,诗歌文体的创新属性与新闻标题的创新性不谋而合,因此,制作新闻标题时就必须充分借鉴和吸收诗歌文体的优秀创新性成果,以期写出内涵丰富、吸引力十足的新闻标题。

新闻标题起着评价新闻内容、吸引读者阅读的重要作用。随着现代媒体的传播方式不断更迭变化,碎片化阅读日益盛行,新闻标题是否有“新意”

成为新闻报道成功的关键。而新闻标题是否有“新意”，就在于能否把事件的矛盾或者焦点在标题中凸显出来，而且立场要鲜明，具有生动性，能引导受众看下去。具而言之，“准确、鲜明、生动、形象”是创新新闻标题的四条公认标准^[7]。但在新闻标题实际制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一些标题老套缺乏新意，如“80后‘纺织状元’的奋斗路：要干就干到最好”（《工人日报》2019年02月28日）、“江西‘90后’农民返乡种猕猴桃 亩产2万元成‘田状元’”（《中国新闻网》2019年01月13日）、“官金仙：从‘物流女状元’到‘全国最美家庭’”（《中国新闻网》2018年05月15日）……“XX状元”标题层出不穷、乏味雷同。标题是新闻的“眼睛”，它要求以简短的文字概括出新闻的主要事实和本质内容，因此语言的精炼、准确是标题语言的根本要求。在这个层面上，标题与诗歌语言都需要以新夺目，以奇制胜。

此外，诗歌语言凝练，极富意蕴，很多新闻工作者在制作标题时会采用不同方式借鉴诗歌内容，以期用“诗化”的标题吸引读者、提高新闻表现力。而以诗歌入题不仅能使标题简洁凝练、生动形象，给人艺术的享受，而且在特定的语境下还能引发联想，起到传神点睛的非凡效果。如“非法传销 掀起你的盖头来”（《法制与经济》1997年第05期），这则新闻标题的副题直接引用王洛宾先生由维吾尔族民歌《亚里亚》改编而来的现代流行音乐《掀起你的盖头来》歌词，“盖头”就是传销的遮羞布，“掀”开遮羞布，将传销的非法本质暴露于阳光之下。借用耳熟能详的歌词作为新闻标题副题，新颖独特、触动人心。再如“西海固地区率先脱贫的盐池县这样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白了滩羊，绿了草原，红了日子。”（《人民日报》2020年08月15日），直接借用南宋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句式，使新闻标题新颖灵动、生态之美跃然纸上。

三、诗歌文体对新闻标题语言影响的具体表现

由上文可知，诗歌文体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新闻标题的简约、凝练等制作要求，因此新闻工作者在制作标题时也应借鉴诗歌的意境内容和炼字组句的方式。诗歌文体对新闻标题语言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词语充实新闻标题语言的词汇

诗歌作为语言发展创新的重要源泉，产生了大量的创新语言现象，其中不乏为数繁多的创新词汇，而且我们发现这些创新词汇已有不少被引进到新闻

标题之中。如“景仰”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新兴词汇，出自《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它是通过抽取“高山仰止”中的“仰”和“景行行止”中的“景”组合而成的偏正式复合词，用来表示敬佩尊重的意思。“景仰”具有浓重的正式语体色彩，已被广泛运用到新闻标题之中。如“冯子材与镇南关大捷：保家卫国 后辈景仰”（《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9日），“范曾：对传统应当景仰 我们只有守成才能腾飞”（《西安晚报》2014年11月15日），“暨南大学一日痛失两名教授 名师风范令学子景仰”（《南方日报》2015年05月15日）等。“袍泽”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诗歌词汇，出自《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它是通过抽取“与子同袍”中的“袍”和“与子同泽”中的“泽”组合而成的联合式复合词，用来指军队中的战友。“袍泽”偏向于书面语体，也被广泛地运用到新闻标题之中。如“奖章背后的故事：熊寿明——青山埋忠骨 袍泽寄哀思”（《央视新闻》2015年09月05日），“分析：美军能否摆脱‘袍泽相残’误伤悲剧阴影？”（《中国新闻网》2003年03月12日）等。再如“悲欢”作为表悲哀与欢乐的并列式联合词，出自南朝颜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邑野沦藁，戎夏悲欢。”它常被用来形容情感上的各种感觉，而且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下也引申为形容各种经历。由于其高度的凝练概括性，“悲欢”一词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了新闻标题中。如“让两代人悲欢相通的体育偶像”（《中国青年报》2020年12月01日），“综述：人类的悲欢跨越民族和地域——中国影视剧走红中东”（《新华网》2021年06月14日），“台山海口埠：广府人出洋第一港 华侨史悲欢承载地”（《金羊网》2020年06月29日）等。

除了普通词语，诗歌文体中还孳乳出大量的成语，这对新闻标题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公务员聘任制引出人才的‘源头活水’”（《中国广播网》2014年07月28日），“源头活水”这个成语出自朱熹的《观书有感》中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来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将公务员聘任制人才比喻为“活水”，以便促进公务员队伍的良性竞争，破除“考上公务员就端上了铁饭碗”的刻板印象。再如“柳暗花明又入蜀 韦庄的最后十年”（《华西都市报》2020年11月16日），“柳暗花明”这个成语出自宋代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来比喻在困难中遇到转机，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韦庄在人生最后十年终于

功成名就的自豪与畅爽。诗歌文体中滋生的大量成语,具有庄重、典雅的语体风格特征,而新闻标题是典型的书面语体,因此,由诗歌文体中诞生的大量成语成了新闻制作者撰写新闻标题的绝佳素材。总的来说,标题词汇对诗歌词汇的借鉴,能够促使新闻工作者创造出创新性与艺术性并存的好标题,从而激发读者阅读兴趣,以提高新闻的阅读量。

(二) 诗化句式增强新闻标题的艺术魅力

新闻标题语言要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一目了然,就是要用最精简的文字表达新闻中最核心的内容。而诗歌语言精练、含义丰富深刻,因此新闻工作者在撰写标题时会充分考虑到诗歌因素,直接引用或改用诗歌句式作为标题。

“范美忠老师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人民网》2008年05月28日),这则新闻标题的后半句直接引用现代著名诗人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通过借用诗歌中的诗句为标题严厉痛斥了在汶川地震中置学生的生命于不顾的范美忠老师。再如“让人民摆脱贫困,从不以山海为远——那些照亮未来的灯塔”(《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2021年06月16日),这则新闻标题出自《抱朴子·博喻》:“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迫。”将原诗所传达的朋友相处之道改用于形容广大领导干部脱贫攻坚的坚定决心与毅力。又如“惟愿苍生俱饱暖——民生保障制度如何惠及全体人民?”(《人民日报》2020年08月11日),这则新闻标题引用《于肃愍公集咏石炭》:“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将原诗中的“但”改为“惟”,将希望民生保障制度惠及全体人民的殷切期盼写得真切动人。这些标题直接或间接改用诗歌,使标题诗化,让标题有意境且简练、含蓄且有吸引力。

诗歌文体为了达到凝练概括的目的,会有大量紧缩句式的出现,当然这一句式也同样受到以追求简洁扼要为表达目的的新闻工作者的青睐,并在新闻标题的撰写中广泛运用。“神吐槽:赢球不可怕,缺谁谁尴尬。”(《新浪体育》2017年03月04日),这则新闻标题中“缺谁谁尴尬”实际上是“只要缺谁,谁就尴尬”这个一般复句经过紧缩而成的,它省略了关联词语“只要……就……”。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搜狐网》的一则新闻标题,“输球不可怕,有谁谁尴尬!1胜3负,马刺全队都在针对莱昂纳德?”中的“有谁谁尴尬”是省略了关联词“如果……就……”而形成的紧缩句。不可否认,这两则新闻标题都是受到古诗词紧缩句影响的结果,它们与严恽

近体诗“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中的“问花花不语”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酌举。

(三) 用韵和对仗等语言技巧增强新闻标题吸引力

诗歌文体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韵律,极具音乐感,在结构形式上一般讲求对仗工整,富有建筑美。标题口号借鉴诗歌文体,在制作时追求合辙押韵、节奏鲜明,以便让读者阅读起来朗朗上口。

众所周知,诗歌尤其是近体诗讲究平仄押韵,一般而言,绝句和律诗的偶数句句尾一字会选择通过押韵的方式来实现诗歌的韵律节奏^{[4]255},我们以王昌龄的《出塞》为例来说明,“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押“an”韵,分别通过第二句和第四句句尾最后一个字“还”和“山”来实现。仿照诗歌的押韵,不少新闻标题在撰写的过程中也采用押韵的形式来增强标题的韵律感。如“‘钓鱼执法’谁比谁傻?”(《新京报》2009年10月25日),这则新闻标题使用“法”“傻”二字押韵,“法”的权威公正与“傻”相对,以此抨击目前行政机关中存在的“公权碰瓷”现象。再如“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新华网》2015年12月29日),这则新闻标题中的“康”“乡”二字押韵,将能否成为小康的评判标准直接与三农挂钩,指出了“三农问题”正是迈向小康的关键所在。

对仗是诗歌特别是近体诗的又一大特点,诗人们经常采用对仗的手法来达到形式上整齐美观、节奏上铿锵有力、气势上大气磅礴的目的^{[4]18},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属杜甫的《登高》一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被称作古今七言律诗之冠,全诗八句话全用对仗,工整巧妙,极富表现力。对仗手法在新闻标题中的运用也比比皆是,如“胡锦涛致意劳动者:问民生民意 看开放开发”(《中国新闻网》2011年05月02日),这则新闻标题中“问民生民意”与“看开放开发”工整对仗,音节协调,极富节奏感。又如“习近平:铭记伟大胜利 推进伟大事业”(《新华视点》2020年10月23日),“铭记”与“推进”相对,“伟大”与“伟大”相对,“胜利”与“事业”相对,合辙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语感,提高了阅读吸引力。

四、诗歌文体的语言特征对新闻工作者的启示

(一) 提高自身诗词修养,提升标题诗化感知力
诗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瑰宝,迄今已有

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给世人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句、成语新词,不仅给我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陶冶,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的创新精进,是人类语言发展演化的重要源泉。因是之故,新闻工作者要想制作出言简意赅、旋律优美、新意十足的新闻标题,必须要吸纳和借鉴诗歌文体的优秀成果,努力做到诗歌入题,达到标题诗化的效果。具体言之,新闻工作者要努力积累学识、提高诗词素养。只有积累足够的诗歌素材,才能在广阔的诗歌海洋中选取合适的诗歌元素,制作出精良、吸引力十足的诗化标题。

(二)增强诗歌语言甄别能力,做好新闻舆论引导工作

诗歌文体具有创新和凝练概括的属性,这与新闻标题语言的要求契合若合符,因此新闻工作者可以而且应该汲取诗歌语言的优秀成果,提升新闻标题语言的表现力。但是,与此同时应当指出,诗歌语言还具有含蓄、委婉、艰涩难懂等特点,其结果是很多诗句以及字词的意义和用法难以把握和理解,这给我们的新闻标题创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甚至会造成误导读者乃至引发社会舆论等问题的出现。譬如,“卢瑞安:香港旅游业从欣欣向荣变惨淡经营 我很痛心”(《中国新闻网》2019年09月03日),这则新闻标题中的“惨淡经营”语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一诗中,诗中“惨淡经营”原指煞费苦心地从事绘画或诗文创作,后来也引申表示苦心规划和开拓某项事业,

但绝不表示经营不善,显然上述标题存在误用。再如“留学生数量呈井喷 曾几何时香饽饽今朝成色不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9月06日),这则新闻标题中的成语“曾几何时”出自王安石《祭盛侍郎文》:“补官扬州,公得谢归。曾几何时,讵者来门。”用来表示时间过去没有多久,但在使用时容易望文生义,经常误用为“曾经”“不知何时”,在这里“曾几何时”被误用为“不知何时”。通过对《中国新闻网》的调查,发现被误用的诗歌词语还有很多,诸如万人空巷、休戚相关、蹉跎岁月等。因此,新闻工作者在借引诗词语言的时候要提前做好甄别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舆论的正确引领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徐杰,章业位.“语言特区”的性质与类型[J].当代修辞学,2015(4):20-31.
- [2]司罗红.网络语言对新闻标题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6(8):75-77.
- [3]司罗红.新闻标题的语言特区属性[J].新闻爱好者,2015(12):73-75.
- [4]王力.汉语诗律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
- [5]张力.诗歌,语言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N].光明日报,2021-01-31.
- [6]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311-335.
- [7]李世清.新闻标题之创新[J].记者摇篮,2009(5):3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oetry on News Titl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Special Zone Theory

ZHANG Li¹, ZHANG Jianying¹, WU Zhaoqi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2. Primary Education Department, Chongqi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Wanzhou, Chongqing 404047,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lock of linguistic special zone, poetry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t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gh generalization, simplicity and concision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title language. Moreover, in practice, many words and sentences of poetry have entered into news headlines. Therefore, when making headlines, journalists need to fully consider the concision and innovation of language, properly use new words and phrases, and strive to write poetic headlines, so as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news and increase the reading amount of news.

Key words: news title language; poetry; linguistic special zone; poetic

河南沁阳方言的人称代词和复数标记“个”

张明明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121)

摘要:河南沁阳话的人称代词系统比北京话的人称代词系统复杂,有着独特的语法特征。沁阳话中的复数标记“个”相对于北京话中的“们”,它不仅可以用作人称代词的后缀表示复数,也可以用作疑问代词的后缀表示复数,沁阳话“数词+个”两个音节同化融合,发生跨音节音变产生合音词,有着明显的地方方言特征。

关键词:沁阳话;人称代词;个;合音词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19

中图分类号:H1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114-05

一、沁阳方言的调值调类

沁阳市属于焦作地区,在河南省西北方,焦作市的西南面,沁阳市的北面为太行余脉,跨过北面的太行山即为山西省晋城市,从山西流下的沁河水横贯其南北。沁阳市东面为焦作市博爱县,西面连接着济源市,南面与温县、孟县接壤,沁阳市总面积623.5平方公里^[1],境内人口总数近45万。本文的考察是以沁阳市城区周围18平方公里为对象。

沁阳方言从全国性方言分区来讲,属于北方共同语,从地域性方言划分来讲,属于河南方言片。因境域同山西省搭界,历代经济、文化交流甚密,特别是明洪武年间又有山西洪洞等地移民迁入,致使沁阳话受晋语影响很大,从语音特点来讲,又隶属于晋东南方言小片。再因太行山和黄河的天然阻隔,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河南话、山西话的沁阳方言,《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2]将沁阳方言划归晋语获济片。沁阳话人称代词复数标记常以“个”“都”为主,其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个”[kə²⁴]最为常用,用法也较为特殊。

与作为普通话基础音的北京话相比,沁阳话的音系相对较为复杂,沁阳话中的方言音素、存古的入声

声调以及音节的结构形式较多,但无“子尾”轻声,舌尖前后音含混,是豫西北独特的一块入声方言区。沁阳方言声调除轻声外,和众多方言一样,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种声调。古平声、上声、去声三声在沁阳话里的演变情况和北京话相同,古入声今大部分仍读入声,较大部分有明显的喉塞音韵尾。

其调值调类如下表:

表1 沁阳方言调值调类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沁阳	54	313	424	24	13
北京	55	35	214	51	
例字	星期三	男同学	枯水井	正义路	剥葵竹

二、沁阳方言人称代词的类别

沁阳方言的人称代词“俺、我、你、他(她)”可以单独用作主语、宾语,用作这个情况时,沁阳话和北京话的功能相同。当用作定语时,表示单数的人称代词一般要加上“呐”[ne⁵⁴](相当于结构助词“的”)才能修饰名词,例如:

我呐书/你呐车/他呐脚

后有方位短语时可以省略“呐”。例如:

我(呐)车里有饼干/你(呐)身上有灰尘/

他(呐)房里有电脑

收稿日期:2021-12-15

基金项目:2021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文化软实力提升视角的明清河南五种韵书比较研究”(212400410200);2020年度河南省高等职业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明清时期的河南韵书研究”(2020GZGG065)

作者简介:张明明(1983—),男,河南沁阳人,硕士,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与北京话中人称代词修饰亲属称谓名称时“的”字可隐可现的情况不同,沁阳话的人称代词修饰亲属称谓名称时不加“呐”,要单独使用,但是,“我”后可以跟“呐”修饰亲属称谓名称,也仅用于哭丧,以强调亲属关系,表示悲痛感情:

俺大姨/你奶奶/他爷爷/我呐爹啊(哭丧)

需要指出的是,沁阳话第一人称作定语时,“俺”与“我”有着明显的分工:通常是用“俺”修饰亲属称谓(哭丧时表示强调和悲伤要用“我”)、“家”和行政区划名称,用“我”来修饰其他事物:

俺妈/俺家/俺村/我呐笔/我呐手/我呐车

沁阳话的第一人称代词用作定语修饰“家”和行政区划名称时,可以单独使用,但通常后面要加上“个”,表示复数,以指明“家”和行政区划范围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其他成员:

俺(个)家/你(个)村/他(个)县

但,“俺”修饰亲属称谓时,不能加“个”,以此表示排除说话对象的专属性,与兄弟姐妹指称自己的亲属时不用“俺个”而用“咱”来表示复数:

俺爸/俺姐/咱叔/咱姑

沁阳话的“他”有“我、你”的语法功能,与北京话中表单数的功能相比,可以在“他”后加上“几个”或数量词,以此来表示复数功能,这时的“几个”和数量词都可以被“个”代替。例如:

他几个(个)一起出去了/你把这东西给他

俩人(个)

沁阳话的“咱、人儿”对应“我、他(她)”表示的是单数,于北京话不一致的是,沁阳话的“咱、人儿”不能单独作主语和宾语。“咱”表示自我的谦虚、客套,通常有自我贬低的意思,“人儿”有羡慕、尊敬、嫉妒、期待之意。例如:

咱不中/把书给咱呗/人儿可能哩/咱会有人儿强

“人儿”同“他”一样,后加上“几个”、数量词或“个”,以此来表示复数功能。例如:

人儿几个(个)学习都可好哩/人儿俩人(个)呐关系可好哩

沁阳话中表示单数的“咱、人儿”可以用作定语,这种情况下,它们只能够用来修饰亲属称谓、“家”和行政区划名称表示隶属关系。例如:

咱村/咱家/咱妈/人儿爸/人儿家/人儿县

沁阳话中“俺个、你个、他个”的用法相当于北京话“我们、你们、他们”,但不能修饰亲属称谓,沁阳话中修饰亲属称谓用的是“俺、你、他(她)”。

沁阳话中的“咱、咱个、人儿个”是表示复数概念的。“咱”是包括式,“人儿个”是排除式。“咱”表示复数只用在说话者与兄弟姐妹指称自己亲属的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咱”,不能用“咱个”来表示复数;“咱个”与北京话“我们”的用法相当;“人儿个”表示预设前提中的某些人,相当于“人家”,它可以单独作主语和宾语。

咱妈去地了/咱个进城吧/人儿个走呐可早哩/我把资料给人儿个了

“咱”“咱个”在沁阳话中是表示自称的,除此之外,沁阳话中的“俺”“俺个”也是表自称的。不同的是,与“人儿个”一样,“俺”“俺个”也是排除式,只不过“人儿个”排除的是说话双方,“俺”“俺个”排除的是听话者。

沁阳话中的“自己”“别人”“大家”与北京话的用法相同,不再作特别说明。

表2 沁阳方言人称代词的类别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其他
单数	俺[a ⁴²⁴] 我[ua ⁴²⁴] 咱[tsai ³¹³]	你[ni ⁴²⁴] 你[ni ⁴²⁴]	他(她)[xa ⁴²⁴] 人儿[z _{er} ³¹³]	
复数	俺个[a ⁴²⁴ kə ¹³] 咱[tsai ³¹³] 咱个[tʂɿ ³¹³ ə ¹³]	你个[ni ⁴²⁴ kə ²⁴] 你个[ni ⁴²⁴ kə ²⁴] 你个[ni ⁴²⁴ kə ²⁴]	他个[xa ⁴²⁴ kə ²⁴] 人儿个[z _{er} ³¹³ kə ²⁴]	大家 [ta ²⁴ tʂia ⁵⁴]
其他	自己[tsi ²⁴ tʂi ¹³]	别人[pie ³¹³ z _{ən} ³¹³]		

三、沁阳方言的复数标记

北京话的“们”作人称代词和指人的名词后缀。沁阳话的“个”相对于北京话的“们”,不仅可以用作人称代词的后缀,也可以用作疑问代词的后缀表示复数,用作指人的名词的后缀时仍用“们”不用“个”。沁阳话的“个”也不能用作指物的名词的后缀,这点与北京话相同。

- (1) 这都是俺个的。
- (2) 他个呐车叫偷了。
- (3) 咱个呐东西咋办咧?
- (4) 咱个去哪耍?
- (5) 这是谁个呐拖拉机?
- (6) 这车是谁个家买咧?
- (7) 大人们呐话他就不听。
- (8) 工人们都下班了。
- (9) 孩儿们都放学了。

沁阳方言的“个”不仅可以加在人称代词后头表复数,上面例子中的(1)(2)(3)(4)都是人称代词后加“个”,表示复数;“个”也是可以用作疑问代

词的后缀,表示复数的,上面例子中的(5)(6)就是疑问代词后加“个”,表示复数。当用在疑问代词后表复数时,通常指的是一个家庭全体家庭成员,沁阳话中的“谁个”“谁个家”就是“谁家”,当说到“谁家”时一般用“谁个”或“谁个家”。当不表示家庭成员时,疑问代词后就不加“个”。比如说“这几本书都是谁哩?”而不说“这几本书都是谁个哩?”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话中表复数概念的“们”在沁阳话中几乎都能被“个”代替,但是指人的名词后只能用“们”不能用“个”,上面的(7)(8)(9)例就是“们”用在指人的名词的后头表复数。当说到指人名词表复数不加“们”时,有时可在名词前加“几个”或者在名词后加“都”(例7用作定语的情况除外),还有“们”和“都”同时使用的情况,例(8)(9)。当话语所指有复数概念时甚至可以不加“几个”或“都”就可以表示复数概念。例如:

“孩儿们没人管”可以换说作:

几个孩儿没人管。(不加“们”,名词前加“几个”)

孩儿都没人管。(不加“们”,名词后加“都”)

孩儿没人管。(不加“们”,也不用“几个”和“都”)

虽然上面几种说法都可以,但是,多数情况下话语所指有明了的复数概念,为提高话语的简洁性和效率性,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不加“们”,也不用“几个”和“都”的句型,即“孩儿没人管”,这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为了表示强调作用要用加“都”的句型,即“孩儿都没人管”。但表示陈述事实时用“们+都”或“都”句型。例(8)(9)有两种用法:

一是“工人们”“孩儿们”属于同一家庭,这种情况下“们”就可以不用,用“几个”或“都”替换,但他们所强调的内容不同:

工人都下班了。(强调家里的几个工人回到家了)

几个工人下班了。(强调家里的几个人的身份是工人,且下班回到家来了)

孩儿都放学了。(强调家里的几个孩子回到家了)

几个孩儿放学了。(强调家里的几个人的身份是学生,且放学回到家了)

二是指陈述事实,这时的(8)(9)例要用“们+都”的句型:

工人们都下班了。(陈述“工厂下班”

的事实)

孩儿们都放学了。(陈述“学校放学”的事实)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指出:“跟代名词合用时,词尾‘们’只有把代名词变成复数的作用,例如:‘我们’‘咱们’……但没有‘谁们’,因为‘谁’字可以指单数也可以指复数。”“虽然‘谁’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几个人,但是指多数时要用‘些谁’,就更清楚。……例如:‘叫些谁来帮忙呐?’”^[3]就北京话和部分地方的方言来说,情形的确如此,但,作为和北京话对应的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沁阳方言可以在“谁”的后面加上复数标记“个”来表示,沁阳话人称代词表示复数时有“谁个”的用法,前面的(5)(6)例就是“谁个”表复数的例子。又如:

(10)是谁叫门咧?(这里的“谁”表单数。)

(11)谁来了?(这句问话里的“谁”可以是单指表示单数也可以是多指表示复数,但表单数的时候多一点。)

由此可知,沁阳话中的“谁”通常是指单数,用“谁个”表示复数。前面已经讲过,沁阳话的“个”用在疑问代词后表复数时,通常指的是一个家庭的全体家庭成员,所以,沁阳话的“个”作疑问代词的后缀表示复数时,使用的范围比较窄,不是同一家庭的几个人的疑问代词的复数表达形式是在“谁”的前面加“都是”,也就是说非同一家家庭的几个人的复数的表达形式是“都是谁”。试看下面的例子:

(12)谁去上海哩?

(13)谁个去上海哩?

(14)都是谁去上海哩?

例(12)中的“谁”表单数;例(13)(14)中的“谁个”“都是谁”都表复数,但“谁个”“都是谁”所指代不同。“谁个”是“谁们家”“谁家”,指的是一个家庭的全体家庭成员,而“都是谁”指的是非同一个家庭的几个人。

四、沁阳方言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的形成动因及其多性化

我们推断,沁阳方言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个”是由其后表示多数的数量短语省略而来的,语言使用的简洁原则和效率原则是其形成的动因。根据语言实际使用情况,沁阳方言中存在一个由“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到“单指人称代词+个”的演变链条,也就是说充当复数标记的“个”是数量短语(如“几个人”)省略和弱化后形成的。数量短语所

表示的多数意义凝聚到了量词“个”上,从而使“个”能够代替“几个人”的功能来标记复数。

(15)俺们几个人准备去打工哩!(俺个准备去打工哩。)

(16)俺们几个人干不了!(俺个干不了!)

(17)我们几个人把意见讨论了一下。(俺个把意见讨论了一下。)

(18)我们几个人准备去上海。(俺个准备去上海。)

(19)人儿几个人关系可好哩!(人儿个关系可好哩!)

(20)人儿几个人可厉害哩!(人儿个可厉害哩!)

通过以上语例,有几个情况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几个人”在演变过程省略后,没有“我个”的用法,只有自身代词“俺个”来表示,例如(17)(18),这里蕴含着作为向他人陈述事实的情况,这个他人是不包括“我们”的成员的他人,(15)(16)也是这样的表达,这即是之前说过的排他式;第二,沁阳话中的“咱”表示自我的谦虚、客套,通常有自我贬低的意思,而“人儿”有羡慕、尊敬、嫉妒、期待之意,(19)(20)中的“人儿”的作用相当于“他们”,但不能替换为“他们”,一旦替换,“人儿”所表示的感情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会直接影响话语的表达效果。

在江西南昌方言和福安方言中,量词“个”都可以用作人称代词的复数标记,还有指示代词的用法^[4],也就是说在“指示代词+数词+量词”这种结构中,指示代词可以省略,单用数量词“个”做复数标记,沁阳方言与其不同,沁阳方言中“人称代词+数词+量词”结构中人称代词是不能被省略的,数量词或“个”不能单独作为复数标记,更不具备指示代词的功能。在回答问句的特殊用法中,存在着“几(个)人”的简省用法。

(21)——刚才呐几(个)人哩?

——有几(个)人往东边走了。

(22)——刚才呐几(个)人哩?

——不知道。

(23)——刚才呐几(个)人哩?

——几(个)人往东边走了。/往东边走了。

(24)——刚才呐几(个)人哩?

——没注意。

(25)——老王他个几(个)人哩?

——几(个)人往东边走了。/往东边走了。

(26)——老王他个几(个)人哩?

——不知道。/没注意。

在(21)(22)中,问话人预设了被询问对象见过这里有几个人的情景,还预设了一种不清楚被询问对象是否见过这里刚才的那几个人,冒失请问的情景,而这里刚才的那几个人一定是被询问对象不认识的人,被询问对象做了肯定的回答(21)和否定的回答(22),而(21)回答中的“有”字明确表明了被询问对象不认识问话人问的那几个人。

在(23)(24)中,含有问话人确定被询问对象见过这里有几个人的情景预设,也就是说问话人问的刚才的那几个人,与问话人、被询问对象在之前不久的时空上有交集,存在被询问对象认识问话人问的那几个人、认识其中的部分人、不认识三种情况,被询问对象做了肯定的回答(23)和否定的回答(24)。

在(25)(26)中,问话人确定被询问对象见过这里的那几个人,也就是说问话人问的刚才的那几个人,与问话人、被询问对象在之前不久的时空上有交集,用“老王”虚指那几个人,确定了被询问对象认识问话人问的那几个人、认识其中的部分人两种情况,被询问对象做了肯定的回答(25)和否定的回答(26)。上面语例回答语中的“几(个)人”是“刚才呐几(个)人”的简省用法,同样是语言简洁原则和效率原则决定的。

此外,沁阳方言中存在着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复数标记的多样化路径选择:沁阳方言中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除了存在一个由“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到“单指人称代词+个”的演变链条外,还存在着类似于充当复数标记的“个”形成的另一复数标记“几”的路径选择,即由数词“几”充当复数标记,这个演变链条为“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到“单指人称代词+几(个)”。数量短语所表示的多数意义凝聚到了数词“几”上,类似于第一种演变路径,使“几”能够代替“几个人”的功能来标记复数。

(27)你(们)几个(人)去那边。/你几去那边。

(28)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咱个村。/你几代表不了咱个村。

(29)你(们)几个(人)轮着班来。/你几轮着班来。

在这个演变链条中“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中的“人”字通常不用,演变为“单指人称代

词+几”的情况。其中,有一种特殊的固定问句中“人”字必须存在,不能简省。

(30)你(们)几个人?/你几人?

在(30)中“人”字后已经没有其他语词,不论是在演变前的“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中,还是在演变后的“单指人称代词+几”的情况下,“人”字都不能简省,不能为:

(31)你(们)几个?/你几?

如果为(31)情景,那语言交流前提话语应已经指明复数所指对象,而这个对象一般不指人。

(32)我有两个核桃,你(们)有几个?

(33)我有两个核桃,你(们)几个?

(34)我有两个核桃,你(们)几?

(32)至(34)我们看到了不断简省的过程,而交流所指一般为物品。

五、沁阳方言复数标记与合音词

沈括《梦溪笔谈》曰:“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5]《语言学名词》^[6]定合音词为: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音节通过缩合语音形式而形成的词语,例如“不用”合音成为“甬”。

沁阳方言中有“数词+个”的合音词存在:

一个: $i\eta^{13}k\alpha^{24} > i\alpha\eta^{13}$

两个: $lian\eta^{424}k\alpha^{24} > lia^{424}$ (没有“二个”的合音)

三个: $san^{54}k\alpha^{24} > sa^{13}$

四个: $s\eta^{24}k\alpha^{24} > s\eta\alpha^{24}$

五个: $u^{424}k\alpha^{24} > u\alpha^{424}$

六个: $lu\eta^{13}k\alpha^{24} > lu\alpha^{54}$

七个: $t\phi\eta^{13}k\alpha^{24} > t\phi\eta\alpha^{54}$

八个: $pa\eta^{13}k\alpha^{24} > p\alpha\eta^{54}$

九个: $t\phi i\alpha u^{424}k\alpha^{24} > t\phi y\alpha^{424}$

十个: $\eta^{313}k\alpha^{24} > \eta^{313}$

几个: $t\phi i^{424}k\alpha^{24} > t\phi i\alpha^{424}$

合音字的声母、韵母与数词声母、韵母主元音基本相同,增加了量词“个”的韵母或其音位变体,声调基本保持不变。

总之,沁阳方言的人称代词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有着特殊的所指,同样是后缀,沁阳话的“个”相对于北京话的“们”,不仅可以用作人称代词的后缀,也可以用作疑问代词的后缀表示复数,用作指人的名词的后缀时仍用“们”却不用“个”,另外复数标记存在着“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到“单指人称代词+个”和“单指人称代词(们)+几个(人)”到“单指人称代词+几(个)”两条演变链条,具有明显的地方方言特征,是进行方言研究很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市地方史志编委会.沁阳市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
-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M].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3]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4]王苗.论汉语方言复数标记的有定性及其语法化[J].语言科学,2019,18(1):50-61.
- [5]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 [6]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On the Personal Pronouns and Plural Marker Ge in Qinyang dialect Henan Province

ZHANG Mingming

(Zheng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121, China)

Abstract: The personal pronoun system of Qinyang dialect in Henan Province is more complex than that of Beijing dialect, with unique grammatical features. Compared with ‘men’ in Beijing dialect, the plural marker ‘ge’ in Qinyang dialect can not only be used as the suffix of personal pronouns to represent plurals, but also as the suffix of interrogative pronouns to represent plurals. The two syllables of ‘numeral + ge’ in Qinyang dialect are assimilated and merged, and cross-syllable sound changes occur to produce compound words, which has obvious local dialect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Qinyang dialect; personal pronouns; ge; syneresis words

高校礼仪教育视角下立德树人路径探索

程 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高校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高校礼仪教育在美育入心、内外兼修、涵养修身、清朗和谐等方面以其独特的功能助推立德树人。以高校礼仪教育的视角,从“以文化人”“以师育人”“以礼润心”“以境诱思”等角度探讨了实施立德树人的路径。

关键词:立德树人;高校礼仪教育;路径探索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2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119-05

一、关于立德树人

2018年,立德树人这四字曾被选为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左传》中,“德”位居首位。何谓立德?立德即以德为根,培养有德行之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树人即以人为本,培育有品行之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8年5月2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一) 立德树人——教育之根本

教育的对象是鲜活的个体与生命,育人是其根本任务。“何为‘根本’任务?根就是树根,根本就是最本质、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1]教育,不止于单纯地向受教育者传道解惑,更为重要的是,与此同时,渗透德育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在“立德、立功、立言”中,“立德”被摆在了首位。若无德,立功、立言则失去了意义;若无德,一个人就等于失去了灵魂。没有德浸润的教育,形同于空壳。

(二) 立德树人——培养得力“接班人”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和主力,全方位地立德树人,是党和人民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的需要。

(三) 立德树人——高校肩负的神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高校是青年学子成才的摇篮,此阶段是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形成时期,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是当代高等教育的生命和灵魂,是高校所应担负起的历史使命。

二、高校礼仪教育所发挥的立德树人功能

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忌讳灌输式教育,德育的落实不是落到教材里与课堂的空洞说教中,而是要真正地落在学生心中,调动其主体意识与自觉性。礼仪教育在立德树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效能。

收稿日期:2022-01-1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传统礼仪文化与高校立德树人教育融合研究”(2022-ZDJH-00230)

作者简介:程燕(1976—),女,河南原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郑州礼仪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礼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 美育入心——塑造形象,正确审美

礼仪课程是一门美的课程,它虽然不能像其他专业核心课一样给同学们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但能从多个维度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尤其是能够帮助同学们塑造良好的形象,从而展示其美好的风貌。礼仪课程中的仪表礼仪、服饰礼仪,让同学们清楚场合有别,着装有别,暴露装、短小装、拖鞋等不宜出现于校园和教室;作为大学生,着装要符合身份,“衣贵洁,不贵华”,不作盲目攀比;与老师交谈时,站姿要端正,“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上课时,忌双臂抱于胸前斜靠在椅背上,忌采取傲慢无礼的“二郎腿”坐姿;大学生的妆面要清新淡雅,忌浓妆出现于课堂,补妆要回避他人,不宜在公众场合公然补妆。这些内容无疑在打造良好大学生外在形象方面起到了其他课程所缺失的重要作用,同时无形中提升了大学生的审美品位,激发他们对美的追求,意识到内在美需要和外在美相得益彰,正如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所言:“人的一切都应该都是美的:容貌、衣裳、心灵、思想。”周恩来同志风度翩翩,举止得体,他以自己的形象引导着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印象。“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是著名教育家、南开体系创建人张伯苓所订立的闻名的“容止格言”(亦称“镜铭”),当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周恩来就以此对自己作严格要求;宋庆龄女士一向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一颦一笑皆为范本,仪态万方,优雅迷人,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六十岁的她出现于各种外事礼宾场合,无论服饰或是妆容,均和谐得体,乔恩·哈利曾形容她“富有魅力,落落大方,为中国创造了最美好的形象。”

“君子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在儒家的仪容观中,这是最基本的规范,“儒家倡导的仪容观,以自然、优雅、真诚、适度、敬人敬己为特点,以提升理想人格、和谐社会关系为目标,要求表里如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培养了像周恩来总理这样一些集崇高的品德与优美的仪容于一身的光辉典范,造就了人们彬彬有礼的社会风气,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盛誉,其思想和观点,积淀为中华民族既注重内在美又注重外在美的传统。”^[2]一个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必定也注意外在的细节,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曾说:“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就是他的教养、品位、地位的最真实的写照。”礼仪课

程可以帮助大学生认识到何谓真正的美,通过形象礼仪的学习树立其正确的审美观。

(二) 内外兼修——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言:“外表的美只能取悦于人的眼睛,而内在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论语》记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外在美与内在美的有机结合,方能做一位内外兼修的君子。在人际交往礼仪中,称呼礼、自我介绍礼、握手礼、鞠躬礼等礼节让同学们知道如何称呼老师方显尊重,不同场景下谁先伸手更为合理;沟通礼仪教会与人交往时应当采用的语气、语速、语调,“凡道字,重且舒”,知道如何用词等才能更宜让交往对象接受,明白“尊长前,声要低”;新媒体礼仪提醒微信、QQ使用时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用餐礼仪让大家知道了宴请时的座次安排,知晓长先幼后的规矩。通过相关内容的学习,让礼内化于心,而非浮于表面,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做内外兼修的大学生谦谦君子形象。

(三) 涵养修身——恭敬待人,尊重有加

礼的繁体字为象形字,其本义谓敬神,后来演变为敬人的统称。礼仪是人际交往过程中人们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和法律、道德并称人类社会的三大保护神,但它不像法律那样严苛,也不像道德那么凛然。无论是敬神或是敬人,其中均离不开“敬”字。《论语》中多处提及“礼”,“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欲立身,先立品,若无礼,则无立。“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均体现了礼之敬意。

礼仪课程可以培养大学生对他人的谦敬意识,明白了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内心要常存尊敬之心,“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修身,礼仪教育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

(四) 清朗和谐——改善习气,净化风气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礼且格。”古代强调以礼治国,教化人民。当今,礼也如同润滑剂一样,在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际交往变得更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在交往过程当中,大学生注重礼仪行为,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化干戈为玉帛;掌握了一定的礼仪规范,就会以礼待人、以礼行事。因之,校园风气也会愈发美好。

礼仪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反映,它对社会风尚能够产生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接受高等

教育知书达理的大学生,他们得体的行为也会对周围的人起到榜样的作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净化社会风气,为和谐社会增色添彩。礼仪可以彰显一个单位的精神面貌,体现民族的气质,它是社会发展的助力器,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

三、高校礼仪教育推进立德树人的路径探索

(一)以文化人——高校礼仪教育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2014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年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学》有言,“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为根本。《论语》记载,“德不孤,必有邻”,有道德的人一定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相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之本,其中多处皆可融入礼仪教育。

1. 诚信做人

诚信是历经社会发展而沉淀下来的传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交往准则。诚信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内容,是我国公民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之一。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是人际交往的基石。国家需要诚信之人,民族需要诚信之人,社会需要诚信之人。在礼仪的原则中,首当其冲提到的即是“遵守”,它包括了遵守时间和遵守约定两层含义,其与诚信之意不谋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诚信”的表述俯拾皆是。

《大学》:“为人君止于臣,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论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

作为大学生,不迟到、不旷课、考试不作弊是最基本的诚信;与人交往,要有时间观念,不做失约之人;助学贷款,要及时还付。在讲到礼仪遵守原则时,教师可运用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融入传统经典名句,排除空洞的口号式的刻板灌输,以引发同学们的深思,深刻认识到诚信之重要性。

2. 孝老敬老

孝老敬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与传统,它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作为子女的我们。“孝悌者,其为人之本与?”“孝”为德之根本。在“新媒体礼仪”章节中,可以以“感恩”

为主题,让同学们以短信、微信等方式为父母发一段文字、语音,或者直接通话,向父母的养育之情表示感谢,于无声处领会到“孝悌”之多重含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孝同时要伴以“敬”之心:“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要同学们懂得,人生在世,必要以一颗良善仁爱之心孝老敬老。

3. 克己宽容

克己宽容之人,方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关于克己,朱子释义:“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服,譬如尘埃既去,则理自明;瓦砾既扫,则室自清。”在礼仪宽容原则讲解时,采用音乐冥想法,大家在音乐中反思片刻,然后自由发言,由他们自己贡献答案,从而学会克服内心的私欲,克制不当之行为,行事有所节制,不为外物所诱惑,不为外因而大喜大悲,向内修心,方能够消灭心中之“贼”;对己以严,对人以宽,做一个虚怀若谷不斤斤计较之人,如此,才能外塑内修。

4. 亲近益友

青年人在择友时,因思想欠成熟,易判断失误,给自身成长带来一些负能量的影响。孔子提倡“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交友要交益友。“友直,友良,友多闻”,益友能够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端正自身,远离“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友”。大学生应该清楚,亲近益友,亦是提升修养的一种途径,正如当今流行的话:“与优秀的友人同行,你将会遇到更完美的自己!”

5. 行为有度

“中庸”,朱熹注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之无不及之名。”中庸,即凡事不走极端,不走偏锋,要随时做到适中,恰到好处。

礼仪中的“适度”原则,与此有相通之义。“适度”指在施礼时既要到位,又要拿捏好分寸。不到位与过了头都是失礼行为。在礼仪课程内容中,关于“适度”的例子,散见于各篇章。

大学生妆容之礼需有度,适当的妆容可以提升自信,美化形象,展示对交往对象的尊重。但因场合不同,妆容亦有别。求职时的妆面宜清新淡雅,倘若浓重的“烟熏妆”亮相,反而弄巧成拙;仪态之礼需有度,它能够折射一个人的修养与对待外界的情感态度;表情之礼需有度,它是社交场合相互沟通的形式之一。与人交往,“目中有人”是最基本的礼貌,交谈时,如若你的心思沉溺于手机,则会给人以漫不

经心、心不在焉之感,看人要注意把握时间长度,学会控制向度,异性交往,长时间地盯着对方会带来误解;服饰之礼需有度,公务场合着装体现端庄大方,社交场合着装彰显个性时尚,休闲场合突出轻松舒适,喜庆场合风格热烈,肃穆场合色彩素静。若违背之,就为“失度”之表现;拜访之礼需有度,拜访是人际交往必不可少的增进友谊、联络感情的环节。作为客人,需要把握“为客”之道:不过早,不超时,不失约,及时提出告辞,不拖泥带水,不过久停留。馈赠之礼需有度,《仪礼》记载,士与士见,必带之以贄。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馈赠作为表情达意建立良好感情的方式,一直未曾退出历史舞台。“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礼物能表达心意则可,不可过于贵重。

(二)以师育人——做好榜样引领示范

教育是强国之基,教师是教育之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师者,生之榜样与表率也。教师须先立德,以良好的师德师风,正向影响学生,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形成典范示范效应。“以良好的师德、师风为大学生树立楷模,发挥示范作用,真正地做到爱岗敬业、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为学生提供直观的学习榜样”^[3]。礼仪教师要切实担当起立德树人的职责和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礼仪教学融合起来,以德立身,不断修身正己;以德育人,将授业与培养学生的品德有机统一;以德施教,在教学的相应环节注入道德精神。既要有正确的言传,又要有与身份匹配的身教,在礼仪教学的过程中,以德立学,德的育人功效才会更有信服力。

作为礼仪教师,其风貌与言行较其他科目老师更具示范性,并会因此感染、感召学生,给学生以积极向上的情感和动力引导。

1. 礼仪教师的服装示范性。服饰是一种非语言交流的媒介,是无声胜有声的交流语言。身为礼仪教师,着装要尤为用心。礼仪老师的服装某种程度上应当是典范与表率,因为它无形之中就会被学生所评价、模仿,也会间接影响到课堂效果。“服饰礼仪”为礼仪教学的重要内容,如果老师自己的服装没有示范作用,就无法与教学内容相得益彰,也难以形成有效的说服力。通过老师的规范着装,让同学们明白因场合而选择衣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教师的服饰之美,也应为师德师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教师对教学、对岗位的深沉热爱,会在无形中对同学们产生深远之影响。

2. 教师的行为示范性。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春风化雨般之影响,比如是否能提前到教室候课,是否能在授课时关闭手机,这些细节行为均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并改变着学生。作为礼仪教师,需要更有时间观念,至少提前一刻钟到教室,保证同学们到教室时就能看到以微笑候课的老师;上课时,将手机调成静音或关机模式,决不让手机成为课堂不和谐的音符。因为老师足够自律,同学们才能自觉地管住手机,不在课堂上做“低头族”。有时间观念,杜绝手机对课堂的干扰,也是师德师风建设与立德树人的一个构成部分,它体现了教师对职业的敬畏之心与对教学对象的尊重。

《孟子》:“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服孔子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当教师能够率先垂范时,不需要催人欲睡的说教即能感召学生,形成正面引领的强大正能量场效应。

(三)以礼润心——全面系统开设礼仪课程

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在《在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一体化育人,形成各门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毫无疑问,思政课程要充当起立德树人的主阵地,而礼仪课程的育人功能同样也不容忽视。

根据调查与了解,目前礼仪课程开设的基本状况为:有的高校教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该门课程,有的高校仅限于部分专业如文秘、旅游专业开设,有的高校仅仅是作为通识选修课开设。这种局面说明了高校对礼仪素养教育重视度不够,未形成“大德育”^[4]教育格局,导致了该课覆盖面小,无法让更多的学生受益。建议将该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体系之中,作为全校公共基础必修课开设,扩充礼仪师资队伍,完善系统的教学内容、足够的教学学时,方能将“礼”内化于心,养成良好习惯,保证礼仪教育的延续性、全面性,如此才有可能通过礼仪课程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四)以境诱思——全方位地创设礼仪育人环境

环境是学校育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教育活动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它虽然无声,但同样可以涵养性情,净化灵魂,以独有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师生的观念和行为。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人之成长的重要性。

学校可以利用宣传栏,张贴大学生日常基本礼

仪、公共礼仪等知识或典故;教学楼内,可以悬挂关于礼仪的名言警句;校广播站可开设固定的与礼仪相关的栏目……要使校园里的每一处建筑,每一处景物都生发出教育的功用,营造出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教育氛围,发挥教育的深层教育之效能。通过创设浓郁的礼仪环境,在“无声”的氛围中感染学生,激发他们良好的内心体验,从而塑造其心灵,达到育人之目的。

参考文献:

[1]文东茅. 立德树人是每个人的根本任务[N]. 中国教育

报,2019-08-04.

[2]吕艳芝. 公务礼仪标准培训[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

[3]马学敏. 大学生礼仪教育路径探讨[J]. 唐山学院学报, 2013(1).

[4]杨海,郑伟氏. 立德树人视角下当代大学生礼仪素养培育研究[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103-108.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ing the Path of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iquet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G Yan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tiquet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uld facilitate moral education with the unique functions of nourishing souls with artistic education, getting students refined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cultivating one's personality, and keeping clear and harmonious and so 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etiquet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paths of implementing the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views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culture and by teachers, nourishing hearta with etiquette, triggering thoughts under actual circumstance and so on.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etiquet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ths exploration

高校声乐课堂中的情感交互探究

郭楠楠

(信阳师范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情感交互是不同的个体处于不同的状态下,情感因素对相对独立的个体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情感交互具体实施策略应该增强积极的情感交互,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适当调控消极情感,始终保持饱满热情;遵循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满足不同学生的心理需求;教学过程中,情感交互要注意一视同仁。高校声乐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互更为频繁和突出。因此,应该要注重情感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应用,努力构建师生和谐的声乐教学氛围,从而提升高校声乐课堂教学的学习效率。

关键词:情感交互;高校声乐课堂;实施策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2.01.021

中图分类号:G434;J6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2)01-0124-05

情感交互对于声乐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高校声乐课堂中,许多声乐专业教师总是会有意无意地侧重认知因素,着重于技巧训练和曲目演唱,忽视情感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重要性。有关高校声乐教学研究发现,高校声乐课堂中,教师普遍认为声乐学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容易产生“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心理,一味按照自己的心情随意安排教学活动,忽视学生内心真正的情感需求,不顾学生对所教授知识的接受度和相关回应。高校声乐课堂中存在有的教师在课堂中自己唱自己的,陶醉其中不能自拔,整堂课基本都是教师在做范唱(只会唱,不会教);有的教师则很少做示范,让学生一遍一遍地唱,不能给学生很好的声音范唱(只会教,不会唱);这些缺乏师生情感交互的高校声乐课堂会使得教学效率低下,导致学生的声乐演唱不进反退,并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模式^{[1]163}。究其原因,师生之间没有形成亲密感和信任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普通高校声乐课堂中的情感交互特点、实施策略,以及如何运用情感交互

构建和谐的声乐课堂,为高校声乐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出一些参考。

一、情感交互简析

情感交互是指情感的交流与双向互动,是不同的个体处于不同的状态下,情感因素对相对独立的个体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既可以是合作,还可以是感染,甚至是一种对抗与竞争等。情感交互应用在教学中则指的是教师与学生主客体之间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充分考虑认知因素的同时,发挥情感、态度、评价等方面的作用,教师通过运用自身的感染力对学生的情绪产生影响,使学生在过程中体会到教师所带来的情绪,并对教学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的一种状态。

情感是由个体的主观体验、外部表情、生理唤醒三个部分构成,是以个体的体验、愿望和需要等为中介的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2]162}。现代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以神经系统为中介的主体与客体因素之间的交互活动,能够引发情绪体验,产生认知活动,对激发条件引起广泛的心理调整,导致身体产生各

收稿日期:2021-10-1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一般课题“疫情防控期间声乐网络课程教学创新研究”(2020YB0167);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2018GGJS-18)

作者简介:郭楠楠(1987—),女,河南焦作人,博士,信阳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音乐学、音乐教育、语言音乐学研究。

种与之相适应的行为。

(一)情感与情绪的区分

在音乐美学领域,早已对情感与情绪进行了细致的区分^{[3]73}。如《音乐美学教程》中指出,在音乐审美中,音乐直接引起的是情绪的体验,而在联想活动介入后才会产生情感体验^{[4]105}。另外,《音乐美学通论》中作者将“emotion”以及“feeling”这两个词都译为“情绪”,情感这一概念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深刻性,较多用于表达感情的表现内容,而情绪则具有较大的情景性、激动性和短暂性,多用来表达感情的表现形式^{[3]325-336}。“情绪”是一种指代心理活动的形式性的状态,而“情感”不仅是心理活动的“形式”,还包括了心理活动的“内容”。

(二)情感交互对教学的影响

情感交互应用在教学中可以对教学产生影响,其中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情感交互不仅包含教师与学生之间知识的交流,还应包含有情感的交流与互动。课堂教学教师的主要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传授其知识与技能,使其在智力和创造力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7]34},同时还要兼顾知识传递和情感传递两方面内容,使学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第二,教师应该具备积极向上的情感,这是积极的情感交互应用到教学时要非常注意强调的一点。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递出应付、冷漠、消极等负面情感,那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学生拒绝接受其传递的知识,甚至会有抵制状况的出现^{[6]34}。教师要拥有积极的、正面的情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发挥出自己真正教学水平,使得课堂教学效果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第三,情感交互所要达到的教学主客体目标一致,教师要在积极情感的帮助下,使学生的情感和认知达到动态的平衡发展。教师和学生都应该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通过积极的情感交互帮助学生从被动的“要我学”向主动的“我要学”转变,进而提高教学效率,促进教学目标、教学任务的尽快达成,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在教学中得到双赢。

教师如果可以充分利用情感交互,发挥情感交互的积极作用,那么教学效果势必会事半功倍。情感交互应用在教学中既要重视教学过程中的认知因素,又要强调教学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做到知情互促、知情交融,从而使得教学效果得到优化。

二、高校声乐课堂中情感交互的特点

高校声乐课堂中师生双方会呈现出各种各样复

杂多变的情感。我们要了解教师上声乐课时的情绪、学生上声乐课时的态度、教师对学生的情感、学生对教师的感情等,只有对高校声乐课堂中存在的不同情感现象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才能提高高校声乐教学质量,获得良好的高校声乐教学效果。

(一)高校声乐课堂的特点

高校声乐课堂的特殊性体现在声乐教学是教师对学生需要进行一对一的具体教学,教学程序分为“练声”和“演唱”两部分,具体教学方法是“示范”和“模仿”,教具是钢琴。高校声乐课堂的教学过程是教师依照学科内容或歌唱需要对学生进行基本功训练,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掌握歌唱的基本技能,在声乐学习实践中,逐步扎实基本功,熟练掌握演唱技巧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7]8}。高校声乐课堂要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情绪、情感,教师要避免只是做一个好的“匠人”,教出来的学生“千人一声”。

著名声乐教育家邹文琴老师说,声乐教学并没有统一规格,声乐表演在舞台上应该是五彩缤纷的,好的教师在教学时要会找出每个学生的特点,还原其最真实的嗓音。邹文琴老师培养的学生有:韩红、吴碧霞、雷佳、龚琳娜,她们的演唱风格各有千秋。高校声乐课堂要百花齐放,尊重每一位学生的真实情感,让他们用自己的歌声来自然流露和真实表达。

(二)教师上声乐课时的情绪

教师在上声乐课时的情绪从表面上看来是单方面的,并没有和学生发生过多的情感交互,然而教师上课的情绪必定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状态^{[8]97}。教师可能某天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心情不好,把坏心情带到了课堂中,那么学生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学生经常得不到教师的表扬和鼓励,这样会使她们更加胆怯和不自信,这将会严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给学生的心理留下一个较大的阴影。由于高校声乐课堂的特殊性,声乐教学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深层的人际交往,是在琴房这种特殊场合下的一种人际交往活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除了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递之外还要有情感方面的交流,教师传达出来的情绪会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要传递积极的、正面的情绪,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更加积极乐观,在这种情绪的帮助下使得学生的认知达到全面发展,从而帮助学生找回自信,更好地克服胆怯,通过努力学习专业技巧,提升其声乐专业技能水平。

(三)学生上声乐课时的态度

高校学生正处于情感富有张力的特定的年龄阶段,他们的自尊心和独立性明显增强,独立思考能力

和社会情感也在进一步的发展。高校声乐课堂中,专业教师在进行示范演唱时,学生会更多地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通过呼吸方法、共鸣腔体、声区位置、发音咬字等方面作比较,得出正确的判断。学生在上声乐课时并不会盲从专业教师所教的歌唱方法,而是会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有的学生在上声乐课时刻苦学习,尊重专业教师的教学,为考研或找工作等目标积极奋斗;有的会对专业教师的教学方法提出个人的不同意见,表现出半信半疑的态度;有的甚至会全盘否定自己的专业教师,觉得专业教师并没有使得自己的歌唱水平得到提升,申请调换教师,或者单独出去找其他专业教师上小课^{[9]13}。教师要靠自身不懈的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教学水平,认真并且富有耐心的教学,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互,使学生与自己的默契程度逐渐提升,使他们端正学习态度,跟随专业教师的脚步以知寓情,学有所获。

(四) 教师对学生的情感

教师对学生的情感,是教师对所教学生无条件的关心、理解、爱护和接纳,是一种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教育观基础上的一种无私的、伟大的职业情感^{[9]14}。高校教师作为影响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人物,对学生的情感起到直接的激励和感染作用。教师要把自己的心血、温暖和关爱凝聚在学生们的身体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其全面发展。“学艺先做人,做人德为先”,在高校声乐课堂中,学生不光可以向自己的专业教师学习演唱技能,还可以向专业教师学习做人。教师将个人情感融入教学当中,这将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学生的人格甚至都会因为教师的影响而得到重塑,教师的教学以及教师自己的人格和内在修养都会对学生一生产生深远影响^{[6]36}。教师对学生的情感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使得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表演二度创造等能力都可以在积极的情感交互中得到更好的发挥。

(五) 学生对教师的感情

高校学生的年龄段大多是在18到22岁左右,这时候的学生思维较为成熟,社会情感得到充分发展。高校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既不能高估学生的自制力,放松对学生的约束力,又不能对学生过多的束缚,要注意把握一个度,及时有效地对他们进行指导。^{[9]14}声乐专业学生较其他学科学生心理方面有所不同,可能更具个性化。学生对教师的感情表现各不相同。有的学生对教师崇拜有加,敬畏不已,懂得感恩;有的学生对教师不信任,不尊重教师的辛勤劳动,认为教师对学生付出是理所应当的;外向活

泼的可能在上声乐课时和老师闲话连篇;内向胆怯的会在上声乐课时不敢和老师多说一句话,也不进行任何多余的情感互动。高校教师应该具体了解所教学生的性格特点,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他们建立好良好的情感交互,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课堂教学应有的效果。

三、情感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实施策略与应用

(一) 情感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实施策略

情感交互目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并运用到高校声乐课堂中去,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可以运用情感交互教学营造一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亲密教学氛围,从而使得师生关系更加愉悦和谐。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下,提高学生的自信心,使其养成活泼、开朗、积极进取的良好心理品质,这样不仅能够缓解部分声乐学生在高校声乐课堂上紧张、焦虑等一些比较常见的不良情绪,而且还能够增加其学习声乐的趣味性,把声乐学习变成一件开心快乐的事情,用更加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现在和未来。首先,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是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声乐教学的第一步。教师在教学之初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嗓音条件、歌唱能力、接受能力、表现能力等,其次,教师还要全方位熟悉掌握学生的个性、爱好、气质、兴趣、特征等。只有这样,教师才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安排合适的曲目,将与学生嗓音条件、内在性格相适应又具有针对性的作品布置给学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7]18}。在高校声乐课堂中,教师应注重与学生的情感交互,加大师生互动,提高高校声乐课堂的教学效率。具体实施策略如下:

1. 增强积极的情感交互,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高校声乐专业教师与学生之间要营造一种自由活泼、民主和谐的氛围,教师应走到学生中去,关心学生、理解学生。通过增强积极的情感交互,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声乐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专业技能习得上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提高声乐课堂的教学效率。如果教师不求上进,工作不够热情,对工作持消极应付的态度,教师的漠不关心、教管不严,导致学生在声乐课堂上消极应付、演唱作品不能脱谱,一学期只唱会一首曲子甚至大学四年浑浑噩噩度过,这些都是消极的情感交互对学生产生的后果。因此,作为高校声乐专业教师,自身要认真钻研教学,在高校声乐课堂上精神饱满,对学生关爱有加,带动学生更主动地参与到高校声乐课堂教学活动中去。笔者作为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在课堂上,尤其是每学期开学第一节课都会和新生

进行简单聊天,放松她们的警惕心,消除彼此之间的陌生感,通过轻松愉悦的简短闲聊对她们的性格特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再开始练声和歌唱,通过声音去了解学生的嗓音特点。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才能够加强全面的了解学生,让师生间有效互动,实现有效教学。

2. 适当调控消极情感,始终保持饱满热情

高校声乐教师也是凡人,也会有七情六欲。但是由于教师这种职业的崇高性和特殊性,教师在教学中应适当调控,避免把这些不良情绪带到课堂中,以免对教学造成不良影响。高校声乐教师在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要对消极情绪加以控制,降低坏情绪带来的干扰。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真正的教师是一种情感丰富的人,他同样感受着喜悦、忧愁、激动和愤怒。问题在于,要让儿童感到教师这些人之常情之中,包含着正直,有道理。”^{[8]97} 作为一名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应该发自内心的热爱专业,热爱教学,在高校的声乐课堂中要学会调控消极情感,始终积极向上、充满激情和感染力,从而调动学生的演唱积极性,使得声乐课堂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 遵循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满足不同学生的心理需求

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在声乐教学中,要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遵循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做到因材施教,教学有法。如果遇到反应快、聪明伶俐的学生,要注意少表扬他,可能他已经听多了夸奖,满足自身拥有的一流的先天嗓音条件,但是要知道,不努力训练基本功也许并不如先天嗓音条件没他好的人;如果是面对谨慎敏感,性格腼腆的学生,要注意教学中的用语也要先进行试探,在他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再提出自己的教学要求;碰到反应迟钝的学生,可能会对授课内容接受度不高,这时教师要耐心讲解,主动和学生进行沟通,多鼓励和引导学生和老师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遇见活泼开朗,求知欲强的学生,教师要给予积极有效的反馈,合理引导学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见解。高校声乐课堂要“融情于教”,激发学生声乐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学生声乐演唱的兴趣和自信心,使得学生乐在学中。

4. 教学过程中,情感交互要注意一视同仁

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指导,指导方法可以有所不同,但是情感交互却要做到一视同仁。高校教师要积极寻找适合每一位学生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面对演唱水平较高的学生要帮助他们克服骄傲,使其歌唱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面对演

唱水平较差的学生,要鼓励其不抛弃不放弃,多多给予关心和支持,重点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心,建立自信心。高校声乐专业教师要怀着博大的胸襟深入地走进每一名学生的内心,针对不同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不同的措施,启发学生自我提升,最终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提高声乐演唱水平。^{[9]20}

(二)情感交互在高校声乐课堂中的应用

高校声乐课堂是需要一对一的具体教学,教学过程首先是听一下学生对歌曲的演唱,然后对出现的声音问题进行正确的示范,并给学生具体讲解如何运用腔体进行歌唱。这时学生就会根据教师的示范和讲解进行模仿和演唱,与此同时教师会精神集中的听辨学生所发出的声音是否达到了要求,是否与教师预期的效果相近或一致,并认真指导学生找到正确的发声方法进行演唱。由于高校声乐课堂具有特殊性,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1. 学生理解不透某些体验或感觉时会向声乐专业教师进行咨询,并寻求示范和讲解;2. 学生能够理解某些概念但却做不到那种效果,达不到教师描述的那种感觉时会跟教师进行深入交流,模仿教师演唱的歌唱感觉,并请求老师给予引导和指正;3. 当教师听到学生的发声状态不对但学生却自我感觉良好时,教师会制止学生,并与其交流,让学生及时调整状态,学会听辨正确的歌唱感觉,这样即使是单独在课下进行练习时,也能够保持清晰的头脑。经过这种反复地听辨、调整和演唱,师生之间情感交互与配合密切,无形中达到了高校声乐教学中隐性的互动^{[8]10}(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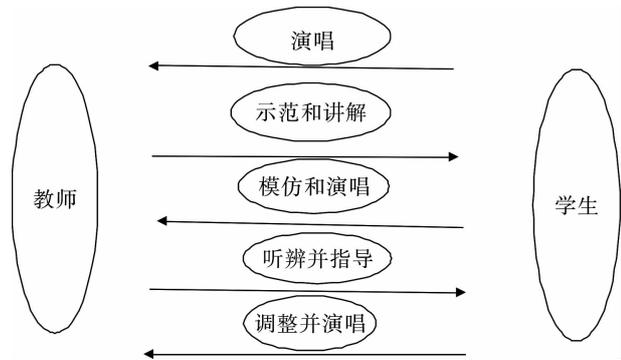


图1 高校声乐教学中的互动

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和学生的高校声乐课堂上的教与学是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合作的一个过程,除了关注高校声乐课堂中教学个体认知的因素以外,还要利用积极的情感交互因素来促进学生对于声乐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高校声乐专业教师在专业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的情感交互,往往能激发学生相应的体验,从而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歌唱

的发声状态和情感表达。在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用自己的爱心和激情使学生感受到教师对他们的关爱和期望。教师要准确地理解学生的心理,及时用眼神和言语将温暖和鼓励传递给學生,给予他们安全感。高校声乐课堂中积极的情感交互可以提高声乐教学的有效性,营造融洽的课堂氛围可以增加学生的歌唱兴趣。完美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温暖的、轻松的、愉悦的,而成功的教学依赖于真诚理解、彼此信任的师生关系,高校声乐专业教师要努力使学生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得到全面发展。一方面要求教师要做到知情合一,努力营造一种和谐的教学气氛,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要求学生要给予相应的积极响应,努力去实现情感的积极交互。教师和学生要在更为和谐的课堂环境下,为高校声乐课堂的教与学而共同努力。

四、结语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高校声乐课堂教学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重视积极的情感交互的作用,只有培养起师生之间积极的情感交互,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不断增强,学生的声乐专业学习兴趣才能得到提高,声乐演唱水平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10]33}。对于高校声乐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应该在专业教师的积极督促下,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课下进行刻苦训练;对于高校声乐专业教师而言,应当尊

重、欣赏、关爱声乐专业学生,认真教学,耐心讲解。相信通过师生间共同努力,一定会构建更为和谐愉悦的声乐教学环境,最终提高高校声乐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 [1]池浩东.构建高校声乐多种风格演唱的教学模式探索[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5(11).
- [2]李森,钟巧平.论教师教学情绪与课堂有效性[J].当代教师教育,2011(1).
- [3]钱丽娟.音乐聆听与情感陈述:谈大学生音乐偏爱中的情感主导因素[J].音乐研究,2005(12).
- [4]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 [5]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 [6]惠秋平,何安明.情感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及实施策略[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5(12).
- [7]杜金菊.论互动教学在声乐课堂中的应用[D].开封:河南大学,2009(5).
- [8]刘晓祥.新课程改革下情感交互在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
- [9]李丹.声乐课堂教学心理探析[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2.
- [10]吴丹,王晓静,刘荣臻.情感交互理论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作用[J].新西部(理论版),2015(6).

(责任编辑 许峻)

A Study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in Vocal Music Classes in Colleges

GUO Nannan

(College of Music and Da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interaction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motional factors when relatively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are in different states. Vocal music classes in colleges are of particularity. Teachers need to conduct one-to-one specific teaching to student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enhances positive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establishes a harmoniou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properly regulate negative emotions and always maintain full enthusiasm; follow the laws of student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meet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different student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emotional interaction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treat equall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in vocal music classes in colleges, we strive to build a harmonious vocal music teaching atmospher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 a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vocal music classes in colleges.

Key words: emotional interaction; vocal music classes in college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